

# 目 录

前言	1
导言	3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局势	9
第二章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消亡	39
第三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	68
第四章 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97
第五章 西班牙内战	123
第六章 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消亡	154
第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芬兰	174
第八章 比利时、荷兰和瑞士	190
第九章 东欧	198
第十章 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	209
第十一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苏联	230
第十二章 三十年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262
第十三章 回顾和展望	288
附:主要人物表	332

## 前 言

G. D. H. 柯尔于 1959 年 1 月突然逝世。按计划本卷是他的遗作《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最后一卷，初稿已经写完，并且有一小部分已经打好字；但主要由于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折断了胳膊，以致无法将初稿送交前几卷曾请教过的权威人士作仔细的订正和校阅。因此，初稿中便出现了一些重复和讹误之处，而这些都是他本人倘若在世一定会删改的。此外，他原先计划要写的关于以色列和印度的两章以及本卷的参考书目（有关中国的部分除外）显然都太不完整，无法按原样发表。他遽然谢世，临终不及留下遗言，因此我便把这几部分删去了（关于中国部分的参考书目，附在第十二章之后）；同时我又在我的儿子汉弗莱·柯尔以及本卷导言作者朱利叶斯·布朗撒尔的帮助下，把重复之处和我们所能发现的小错误删掉了。换句话说，我已经竭尽所能编订了这卷书，难免尚有微瑕，那就要请批评家鉴谅了。除了上面提到的部分，本卷一概按原样付印。正如第三卷的前言中所述，他曾一度打算将这部历史写到 1945 年，但他的宿愿只实现了一部分，大部分叙述都只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不过，本卷最后一章篇幅很长，这就清楚地说明作者打算以此卷作为这套书的最后一卷，而且他已经把他所要说的都说完了。

基于上述理由，这篇前言便不像前几卷的前言那样，提出众多应致谢意的人名。对于在编写期间那些为数一定很多的为本卷提供资料的人士、尤其是提供有关外国资料的人士，只能对不起他们，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谢忱。然而对于其中几位，如汉弗莱·柯

尔曾为本书作了必要而详尽的校订工作,朱利叶斯·布朗撒尔曾仔细阅读校样并提出许多宝贵建议,诺菲尔德学院在打字方面曾鼎力相助,该学院的布拉泽胡德小姐曾以惊人的准确性辨认字迹极其难认的手稿——对于他们,我必须特别致以谢意。

玛格丽特·柯尔

1960年于肯新顿

## 导 言

ix

我非常感激玛格丽特·柯尔夫人约我校对已故 G. D. H. 柯尔的遗作《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五卷的校样并写一篇简短的导言。这一邀请使我的名字得以同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这一极其重大的贡献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殊荣使我深受感动。

G. D. H. 柯尔的这部著作是一项卓越的成就，以往任何国家的任何学者都从未作此尝试。在他反复思考他打算写的这部著作的范围时，原来打算仅以社会主义思想史为限，这一点他在本书第一卷的前言中已经作了说明；他认为要独立地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运动史，“对于任何一个著述者来说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他竟然完成了。而且他所做的比他答应要做的还要多。他的著作在任何一种文字中的确是写得最详尽的一部现代社会主义史，它不仅是一部社会主义思想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百科全书。

这一贡献是他在健康日益恶化的不利条件下完成的，因而就更加不同凡响了。他多年患糖尿病，知道自己难享天年。正如他在 1958 年末出版的本书第四卷的前言中所述，他想到自己矢志肩负的工作如此艰巨，因而常常担心是否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但是他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撰就了构成本卷的 500 页书稿，从而使这部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著述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甚至还有所超过。

G. D. H. 柯尔给本卷定名为《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实际上本卷论述所及却超出了书名的范围。欧洲社会主义的悲惨历 x

史描述得十分详尽,对法西斯主义这个现象的本质,也从新的观点作了透彻的分析。本卷对于美国劳工运动在三十年代初期经济大萧条的刺激下所形成的高涨,以及美国工人阶级的实力地位由于新政而发生的变化,都作了概括和给予评价。对于墨西哥社会革命以及拉美其他国家社会运动的特征,也作了描写和阐释。然而,本卷的中心内容却是描写共产主义。他在考察促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衰退和法西斯主义胜利的各种基本力量的过程中,重新彻底研究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它的意识形态,以及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几乎一直到俄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夕的苏联经济发展的意义。最后应当提出的是,还有一章以引人入胜的文笔描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哲学和取得权力的过程。

此外,G. D. H. 柯尔所写的最后一章也超出了本卷原定的范围,这一章的标题——“回顾和展望”——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这一章中力图评价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并估计它的未来。因此,本卷在许多方面都是他对观念和事态发展的最后评断。他追溯了社会主义思想从十八世纪末开始一直到我们当代的发展,指出社会主义思想在观念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的演变情况。然后他就转而深入论述关于当前社会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各种发人深省的见解,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所存在的灾难性的鸿沟怎样才能弥合的问题。他探讨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力图付诸实现的价值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的本质:前者是指对个人平等的基本要求所产生的公民权、政治权利以及社会与经济的安全保障;而后者则是来自否认个人权利的优先地位的基本的集体主义。他的结论是:找不出摆脱这种根本分歧的途径。

G. D. H. 柯尔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信奉的都是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

制度的信条；而他认为——正如他在本卷结束语中所说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要忠实奉行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平等原则，从根本上说，就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分散权力和责任。”<sup>xi</sup>

这种社会主义观是 40 年前 G. D. H. 柯尔本人在他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著作中首先在理论上加以阐述的，他毕生著书立说就一直以这一概念为指针。此外，本书各卷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评述，尤其是对蒲鲁东主义的论述和巴枯宁主义的某些方面的探讨，对塞西尔·德·巴普派的社会主义见解和法国工团主义的某些方面的探讨，都是在上述概念的启发下进行的。他对当代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特别向往，他认为这两种类型最接近于他所持的理想。其中一种类型是以农业合作运动和犹太工人总联盟为基础的以色列社会主义；另一种类型是文诺瓦·巴维和雅普拉卡什·纳拉扬所宣扬的并体现在赠地运动中的印度共济哲学。

G. D. H. 柯尔的这部不朽之作虽然不完整，但在今后的许多年里，将会一直是社会主义史的权威著作。有了这部著作，他将不仅以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史学家闻名于世，而且还会赢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多产的史学家的殊荣。

G. D. H. 柯尔非但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一个伟大人物，而且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同样是一个伟大人物。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究竟有多么深远，自然极难充分估计。他的著述已译成许多种外文——日文、中文、希伯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波兰文、塞尔维亚文，当然还有德文、瑞典文、挪威文和荷兰文，——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世界社会主义者中成为知名的第一流学者。他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首先是以当代英国工人阶级最杰出的史学家而博得敬仰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简史》已经被翻译成日文、希伯莱文和意大利文，在许多国家中还被选为大学教科书。他曾经写过一篇论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令人称赞的论

xii 文,那便是为《人人丛书》版的《资本论》所写的序言;此外,他的名著《什么是马克思的真实思想?》(1948年重版时改名《马克思主义真谛》)则更以明晰易懂的笔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以上两项著述对马克思哲学的传播和阐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请允许我根据亲身经历再说一句:他的某些书籍已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方说,他于1917年出版并被译成德文和瑞典文的《论工业自治》一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现的社会主义高潮在德国和奥地利形成了工业社会主义化的问题以后,就成了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建筑师的灵感泉源。德国工人阶级的杰出领袖、曾任德国社会党政府国有化委员会委员的鲁道夫·希法亭就曾为这本书的德文版写过一篇序言。此外,奥托·鲍威尔于1919年出版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书也深受柯尔思想的影响。同样受影响的还有奥托·诺尔拉特为当时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社会党政府所拟定的一项国有化计划。

然而,G. D. H. 柯尔作为教师的影响要远比他的著作更为直接,事实上也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在大学担任导师的头几年以及在工人阶级教育运动中,都曾深深影响过许多在战后世界的建设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青年男女。后来他当了教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教研究生。学生中有很多人来自美国、英联邦和亚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亚洲各国社会运动的那些学者,当他们解释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会在整个亚洲得到惊人的传播这一现象(这的确是现代史中最令人惊异的现象之一)时,往往都说这是由于社会主义思潮在亚洲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缘故。我曾同东京、香港、雅加达、新加坡、仰光、德里等地的知识分子交谈过,我发现不论他们是在劳工运动中活动,还是在大学里授课,抑或是在本国的政府中工作,他们的谈论都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在他们之中,不仅是拉斯基、汤尼等人的名字,还有柯尔的名字,都是尽人皆

知的。这几个人的教导和著述都被他们推崇为自己社会主义思想的泉源。

G. D. H. 柯尔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活的信条来信奉的。在<sup>xiii</sup>他看来,这不仅是可供学者们沉思的美好理想,而且是一种只有尽最大努力来实现它才能遇着的一种严肃的道德挑战。他早年曾任混合机械工人协会(后称混合机械工人工会)的研究员,同时是全国基尔特同盟和费边(后称工党)研究部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还在工党中担任过第一研究书记,而且一直是工人教育协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里,他曾在许多社会主义团体中积极活动,并且是新费边研究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激励费边社,使之获得了很有影响的新生命;他一直担任费边社主席直到去世。他晚年力图使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战斗精神复活,在他的鼓舞下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研究会。

推动柯尔在社会主义活动领域中获得最后成就的想法,正是他所富有的理想主义的高尚的证明。他曾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著名的论文,承认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绝境使他幻想破灭,他看不到能把社会主义运动从国家疆界的禁锢中解救出来的前景,唯一的出路是重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以此作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盟,而是各国忠贞不渝的少数派所组成的十字军。他建议成立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骑士团,其中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以个人身份保证把作为一种世界性事业的社会主义当作他们的首要职责。他坚决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福音,是一种只有全人类的兄弟手足之情才能使之具有生命的理想世界,是一种坚信不仅是本国同胞,而且是全人类都应该享有的社会平等的信仰。

G. D. H. 柯尔的这种了不起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在他



留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丰富遗产中,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部分。  
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

朱利叶斯·布朗撒尔

1959年9月

## 第一章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局势

1

本书这一卷所要讨论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从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起到8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这段时期。这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惊人变化的时期,也是一个社会态度和社会信仰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8年之中,表现为德国纳粹形式下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成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绝对主宰,而且对欧洲一大部分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它消灭了德国和奥地利一度很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其手段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原先摧毁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运动更加残酷无情。美国经历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与社会灾难;灾难过后,由于新政的实施而出现了力量无比强大的、并得到公众和社会空前重视的工会运动。苏联在实现警察统治的日益独裁的制度下连续实现了几个阶段的经济计划;与此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审判,消灭掉了许多革命领导人,以满足斯大林对权力和崇拜的猜忌无度和贪得无厌的欲望。在英国,工党于1931年下台,它一败涂地,甚至到1939年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在法国,经济危机比其他地方来得晚一些,左派于1936年联合起来发动了一次后来称之为“勃鲁姆试验”的运动,但是由于面临政治上的尖锐分歧,未能在选举中获得胜利,而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以致无力应付1940年的灾难。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温和的社会党人在应付大萧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萧条对这些国家的打击要比对西欧其余国家轻得多。最后,在西班牙,共和派和社会党人的胜利湮没在内

战的血泊之中，内战进行时，法西斯国家大力援助反革命力量<sup>①</sup>，而西方各国则采取所谓“不干涉”的片面态度，胆小怕事，袖手旁观。

我们很难评价这个多事之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功过得失。一方面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阶级运动被彻底摧毁；东南欧大部分地区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也已经日暮西山；西班牙的运动在内战中进行英勇抵抗之后全军覆灭；英国的运动在1931年和以后的年代里遭到严重挫折；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已蜕化为不受任何道德约束的个人专制制度——然而与此同时它却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而为近年来更加惊人的技术和科学进展奠定了基础。与这些不利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工会运动迅速壮大，不过社会主义的影响并未随之而有任何恢复；印度和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出现了规模虽小但却意义重大的社会主义运动；<sup>②</sup>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稳健的社会党政府获得了成就；加拿大出现了力量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劳工运动的影响得到了加强；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发展，尤其显著的是墨西哥；在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之中发展了激昂的反法西斯情绪，与中产阶级其他阶层中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上升势力针锋相对。大体说来，事情似乎很明显，直到1939年为止，社会主义者的损失大大超过了收获。但是收获依然很实际，而且其影响在战争状况下还大大地加强了，至少在1940年以后情况是如此，因为社会主义者已经成了动员舆论支持战争努力所不可或缺的力量，而这至少在民主国家就需要与劳工运动合作，

---

<sup>①</sup> 这里的原文是“revolutionary forces”（“革命力量”），根据前后文（如原文第10页、100页）的论述，这显然是“counterrevolutionary forces”（“反革命力量”）之误，因而译者作了更正。——译注

<sup>②</sup> 论述印度、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章在作者去世时不曾写完。

所付出的代价是大大增强劳工运动的实际影响和社会威信。

在苏联西面的欧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鼎盛时代。理解这一点对于正确判断现实的法西斯主义是什么，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如果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衰亡时期的孤注一掷，那便大错特错了，尽管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掌权及其所采取的摧毁工人阶级运动的措施当然都得到过资本家的大力协助。我同意，法西斯主义势力在这一场斗争中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同盟者，但它绝不单纯是资本家权益集团的仆从。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经济逆境在青年思想上所造成的沮丧情绪都大大助长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发展，但是它仍然不是一种经济运动，而是一种迎合屈居人下者的狂暴情绪的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如果从纯经济角度来说明法西斯主义的特性，就无从抓住它的驱动力量的主要关键，而且也看不到它最危险的性质——不可抑制的好战动机。如果没有出现那次经济大萧条，使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失业，并且使那些保住职业的人的劳动条件大为恶化，希特勒在德国十有八九始终无法上台。但这并不是说，希特勒或他发起的运动完全或哪怕主要是经济条件的产物，尽管这些条件是他上台的主要原因。纳粹运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它起因于力图重振民族声威和报仇雪耻的战败的德国的受压抑的情绪。它利用了德国资本家而不是德国资本家利用了它。纳粹运动所建成的德国资本主义性质比军国主义性质要小得多，这个国家的推动力是这样一种狂热的信念：德意志人比人类其余部分优越。纳粹运动的反犹太主义和反斯拉夫主义绝不是资本主义的情绪或看法的表现，而是来自原始得多的心理根源。如果纳粹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不稳固的（无疑是如此），其不稳固性也不是来自它无可逃避的资本主义矛盾，而是来自它那侵略邻邦以显示德国对全世界的主宰的固有倾向。

- 4 共产主义者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经济角度解释一切问题，因而无法看到纳粹主义的本质。他们一眼就清楚地看出，纳粹是他们必须千方百计与之战斗的敌人，他们尽一切力量同任何人妥协，只要这些人接受参加任何形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他们携手合作。但是德国共产党人在纳粹逐步掌权的危急年代，却特别显得无能为力，根本不理解自己所要对付的局面，而且如我们所见，他们在某些危急的时刻甚至还与纳粹携手合作，反对社会民主党人。<sup>①</sup> 在魏玛共和国的末年，唯有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才有可能成功地抵抗纳粹主义运动，但是德国共产党人却指控社会民主党人是德国革命的叛徒，敌意极深，绝不可能达成任何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共产党人自欺欺人地认为，纳粹党的胜利说到底并不那么可怕，因为它的本质到头来就决定它只能是昙花一现，它会由于无法逃避或超越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注定消灭；因而实际上，纳粹主义运动会违背它本身的意志和利益为共产主义运动开辟道路。这种看法在当时毫无疑问能够聊以自慰，而且事实也证明纳粹主义的胜利只不过维持了十一、二年。但是造在它崩溃的原因并不是陷入资本主义的矛盾之中不可自拔，而是由于它那种疯狂的权力欲望导致它发动侵略战争，并驱使它肆无忌惮地一面进攻苏联，一面又招惹美国参战来驰援它的西欧盟国，从而扩大了它的敌人的数量。诚然，纳粹主义运动不存在固有的稳定性；但是共产党人却把它不稳定的根源完全弄错了。如果他们正确地判断出纳粹主义运动的邪恶所在，而且预见到要铲除纳粹主义运动会造成多么大的破坏和毁灭——其中以苏联各民族所受灾难最为深重——他们就不大可能像他们所表现出的那样自慰了。
- 5 因此，首先让我尽可能讲清楚我认为德国纳粹主义运动的实

---

<sup>①</sup> 见本书第4卷下册第657页以下。

质是什么。人们往往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些政权笼统地归纳在一起,信手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我虽不否认这些政权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事实上它们的性质相差很远。除了纳粹政权以外,这些政权包括: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巴尔干半岛上的各种独裁政权、波兰的皮尔苏茨基死后的“元帅”政权、葡萄牙的萨拉查独裁政权,以及西班牙内战之后的佛朗哥政权。这些政权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全都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的死敌。它们都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但其中没有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要动力。这些政权是在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相差很远的一些国家里出现的,所以其经济特征各不相同。有些国家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主要依靠封建贵族阶级的支持,这些阶级对于来自下层的威胁或革命深感恐惧,这里所说的倒不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因为某些有关国家的无产阶级还很不发达,无力单独发动革命,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的革命力量,没有他们的积极参加,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这种封建贵族分子在凡是法西斯主义运动活跃的地方到处给予支持,他们在匈牙利、波兰和西班牙尤其突出,在东德和意大利南部当然也是如此。在这些地方,正像在某些其他地方一样,天主教会是站在反社会主义一边的强有力的力量。在另一些国家里,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绝不是封建或贵族力量:恰恰相反,主要是获得中下层社会的分子坚强支持的平民,这些人一方面极其憎恨工人阶级的平均主义的奢望,同时又感到经济衰退以及优越而体面的职位的缺乏使自己蒙受了不利影响。这种中下层社会的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影响与投奔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保守分子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如何保存现有的社会秩序,而是怎样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以便取得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无法取得的谋求权势和高升的机会。实际上,在意大利和德国,这

种更加激烈和更具颠覆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到头来也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纠缠在一起,不过在德国,未能免于“大屠杀”,在大屠杀中最激进的分子被坚决消灭了。但是即使在这种联盟建成之后,德国纳粹主义运动的本质既没有变成封建贵族的,也没有变成资本主义的,它基本上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它鼓动群众的方法主要是诉诸他们根深蒂固的民族进取心,而不是诉诸任何经济动机。毫无疑问,经济动机对许多支持者个人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认为在纳粹主义运动中不但可以抓到权,而且还可以捞到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纳粹主义运动的经济恶化就看不到它以倾向于残酷和偏激的原始动力为基础的真正本质,纳粹主义运动力图把这种动力与进取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

在希特勒之前,墨索里尼已经围绕着民族崇拜建立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个独断的权力集团,它以集体“社会利己主义”来与世界其余部分交往,并以对“暴力”的崇拜作为鼓舞的源泉,每当在这样一种民族事业中采取暴力和残酷手段时,暴力和残酷就被推崇为美德。然而实际上,尽管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肆无忌惮地进行暗杀,并且把一切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都斥之为感情上可耻的低能,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远不像纳粹分子那样极端,对待对手所显示的残酷兽性也要少得多,正如在马特奥蒂和罗色利兄弟案件中所说明的,他们无所不为,不惜暗杀,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大屠杀的手段,一般说来,他们也不进行一贯的严刑拷打。意大利的犹太人很少,反犹太主义在其推动力为民族主义而不是种族主义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中之所以始终没有起重大作用,部分原因无疑就在于这一点。然而在德国,疯狂的反犹太主义乃是纳粹主义理论的首要特色,对德意志人作为统治民族的吹捧一直是纳粹主义最首要的号召手段。纳粹主义运动实际上比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要卑劣得多，并且包含了彻底否定西欧模式的整个文明传统，从而也更积极地唤起受屈辱者潜在的非道德感。

这两种主要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赋予“领袖”的地位方面也彼此不同。墨索里尼是“领袖”，并以此身份享有大权和党徒的尊敬，但始终没有像希特勒那样成为唯一的权力的来源，即使在理论上也没有这样提。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把个人领导与“总体国家”这两种概念集于一身，其中的大权按规定应当属于法西斯大议会——法西斯党的代表机构。有些权力，即使只是次要权力，被公认属于一些组合，法西斯党徒正是通过这些机构来组织主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但绝大部分活动都不成功。领袖、党与组合三者之间权力划分所依据的原则从来就是含混不清的，但至少没有像纳粹德国那样毫不妥协地坚持一切权力来自富有灵感的元首的意志这一提法。用马克斯·韦伯的名言来说，墨索里尼无疑有他的“超凡魅力”；但他的超凡魅力与希特勒自称是德意志民族全部意志和命运的化身的说法比起来，就显得远为逊色了。可以说意大利的各组合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而且简直就没有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存在过。即便把这一方面抛开不谈，领袖与法西斯党之间的权力和职能的划分也根本不同于德国元首与纳粹党之间的划分。这种差别无疑主要是由于意大利与德国的民族性不同：德国人将其理论贯彻到极端时，比意大利人要更加无情和缺乏幽默感。罗姆和施特拉塞兄弟对党的职能所持的集体观点超过了希特勒所能容忍的限度，于是便被消灭掉了。然而在意大利党内，像波太这样的人还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并且能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力主进行集体领导。对不满的发泄，在意大利也不像在德国那样进行压制。我曾亲自听说，在法西斯政权的鼎盛时期，一个法西斯党的地方领导人在一次临时的露天集会上对大家说，他对官场



事务已经“腻透了”，想要辞职退休。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否退休，也不知道他说了这番话之后遭遇如何；但是我敢肯定，纳粹分子在德国建立政权以后，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统一整饬运动在意大利和德国都曾大力推行，但在意大利却远不是那样全面；意大利人只要保持缄默，只要自己的政治履历没有招惹迫害之处，要远比德国人容易过不受干扰的平安日子。

事实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始终有一种做戏的成分在内，而德国的纳粹主义运动却显然没有这种成分存在。墨索里尼对“财阀民主制”的嘲弄在语气效果上与戈培尔的指责以及施特莱歇的反犹太怒吼的语气效果大不相同。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只说明德国纳粹分子在提出他们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理论时更为真诚，其中有许多人无疑确实是如此。但是，区别仍然是明显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德国纳粹主义运动都利用人类本性中较残酷和较狂暴的成分，不过他们在蓄意把政权建立在对十足的兽性的崇拜上，后者远比前者为甚。当然，两个政权内都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是天生的暴徒或不择手段的钻营者，他们追求权力，而不太关心权力用于什么目的。这类人自然投奔这两个政权，而且不论在哪一个政权中都能找到满足自己的邪恶的冲动的手段。但除了这些暴徒和追求权势者外，两个运动中也都有真诚的献身者；在遵照两个运动的总目标的范围内，这些人在做恶事方面的确存在着真诚的同志关系，这一点可以从自我牺牲的精神上看出来。我认为，这种精神在德国纳粹分子中比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中更为强烈，而且成为纳粹政权重要的力量源泉，使它干坏事时更有力，也更彻底，——因为所谓“人性”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9 我认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德国纳粹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都既不是经济性质的，也不是主要以阶级利益或阶级感情为基础的。这两个运动当然都包含着这种成

分,而且在它们的主要特点中都有这样一点:结集了一批要求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集团去反对主要通过工人阶级运动表现出来的平均主义倾向,而工人阶级运动则是双方都立意要摧毁的。不过德国纳粹主义运动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都确实赢得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我认为,这种支持主要并不是由于这两个运动慷慨地允诺把工人从失业和穷困中挽救出来而赢得的,尽管这种允诺无疑也起了一些作用,特别是在运动发展的初期。工人阶级的主体之所以支持纳粹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受它的经济主张所吸引,还不如说是受它的坚决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吸引。至少可以说,他们之所以一致支持纳粹主义运动,主要是由于这些非经济的原因。即使资产阶级和一大部分中产阶级认为纳粹主义运动首先是一种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并维持他们优于工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力量,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那样多工人抛弃社会主义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而持久地团结在纳粹主义的运动周围。魏玛共和国到了末年非但在经济上不景气,而且使那些希望挺起胸脯做人并感到德国在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下受到屈辱的人甚至更为沮丧。这种屈辱感不但影响了“上等”阶级的人物,而且也影响了工人,于是便使纳粹分子能够以民族的名义取得政权,而不是以那些在经济上反对社会主义平均说的阶级的名义取得政权的。我再重复说一句,我并不是说经济因素不重要,而只是说,如果把经济因素当成最重要的因素,或者把纳粹主义运动单纯解释成衰亡中的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那就完全错了。

我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落入一般所谓的“法西斯”政权魔爪的其他国家,情况就不相同。比方说,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虽然有许多特征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体制相同,但其主要驱动力来自资产阶级势力的成分显然比德意两国少得多。支持它的主  
10  
要有两种成分:一种是地主贵族及其依附者,文官大都由他们充

任；另一种是强大的马扎尔民族主义力量，他们一心要恢复和保持马扎尔人对斯拉夫人的优越地位，后者是残留在马扎尔统治下的、或者可以设想可能重新受马扎尔统治的斯拉夫人。经济成分在匈牙利也有强大的影响，在贝拉孔夺取政权以后尤其如此，但这些经济成分在性质上主要是封建贵族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由于匈牙利的工业大部分不发达，而工业和商业又大部分控制在非马扎尔人的手里，它们就受到了束缚。在佛朗哥的西班牙，资本主义在加泰罗尼亚和少数其他地区虽然是一个重大因素，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区却没有多大作用。反革命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教会和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而不是来自经济方面。在巴尔干半岛各国，1918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代议制政权基本上是被主要军事顾问们包围的野心勃勃的君主们破坏的。资本家力量比较弱，不过是君主们的次要同盟者，此外还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偶而起些坏作用。在波兰，皮尔苏茨基起初是作为左派人物起家的，他始终没有与德摩夫斯基和民族主义右派妥协。他死后建立的“元帅”政权是军事领袖和地主阶级和解的产物，而不是任何真正强大或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产物，尽管这个政权在与社会主义者、工会以及农民运动的左翼作斗争时当然得到过资本家的支持。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所谓“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能够单纯用穷人与富人之间，或者用工人阶级与本民族其余部分之间的经济冲突来加以解释的，尽管这些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曾牵涉到“上等”阶级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殊死斗争。凡属法西斯政权当政的国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几乎都被彻底消灭了。

用经济力量和阶级斗争来解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之所以似乎有理，主要是因为几乎在所有地方，工人阶级运动即令不是反对新政权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也是其中主要的力量。至于自由民主主义反对派，只要它们的代表者是左翼和中派的资

产阶级政党,就到处显示出无力发起一场坚持到底的斗争来反对新的独裁主义力量,反倒是独裁力量一举消灭了它们,甚至连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因此只有让共产党以及主要由共产党控制的左翼工会的人数不多的少数派在这些法西斯政权下尚能继续存在的地下抵抗运动中起主要作用。至于社会民主党领袖,有少数人在有机会时便利用非常有限的可能性,在法西斯国家内进行合乎宪法的反对活动:他们中大多数人流亡国外,力图维持“流亡党”的空架子,但很快就和原先的支持者失去联系,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代表多少人了。

不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基本性质如何,它总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运动进行无情的斗争,这个事实让人看起来似乎有理由说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本质上一定是一种资本主义,其基本目的是要铲除它的主要敌人——社会主义运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被断定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这种说法大体正确;苏联具有社会主义化的经济,因而没有受危机之害。当时大家都看到,资本家无法通过纯粹的经济对策解决这一危机,并且看到他们在感到左右为难之后,就诉诸暴力的政治行动,希望使工人无力反对他们,从而腾出一只手来应付经济问题。当时盛传资本主义已经接近最后的危机。危机一旦爆发时,它将由于自身固有的矛盾——首先是由于它无法为自己日益增长的产品找到市场,而产品的增长又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而崩溃,以致不得翻身。当时的说法是: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大众消费力的限制是资本主义一再发生危机的最后原因;因为如果大众的购买力被资本家的剥削所遏制,由此而对总市场所加上的限制就必然限制投资的利润率,从而导致普遍的萧条和失业。于是当时就得出一个结论:粉碎工人阶级运动就会使资本家得以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进一步威胁消费者市场

之后,就会使投资更加减少,于是就会使萧条景况更趋恶化而不是好转。因此,资产阶级诉诸法西斯主义运动实际上是自掘坟墓,不论他们在摧毁工人阶级力量这一点上眼前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情况都是如此;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是在摧毁资本主义本身,并播下世界革命的种子;尽管工人阶级的组织已经被破坏并被赶入地下,由于工人阶级日益贫困,世界革命也会以某种形式降临。资本家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看不到萧条的真正原因,而希望腾出手来随心所欲地对付劳工从而进行补救。因此,如果社会党和工会果真被破坏,实际上也没有有什么关系:如果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的社会党和改良主义工会被剥夺了它们贻误工人并出卖工人的力量,从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敞开道路,倒是肯定有好处的,因为真正革命者的理论会使他们即令在法西斯独裁政权下也能逐步建立起地下力量,这种力量到时候就会使不能再组织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归于完结。

如果法西斯主义运动实际上只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上述希望倒可能有一些真实的基础。因为一个明显地旨在加紧剥削工人、并剥夺他们进行集体抵抗的一切手段的资产阶级专制政府,面临着日益加深而无以自拔的萧条,就会造成一种可被坚决的地下革命力量加以利用的革命形势。不过,如果严格地就事论事,这种论断就完全错了。至少在德国,纳粹政权在当时能够把失业减少到相当低的程度,并且使生产大大扩展。的确,这一点主要是在非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公共工程提供紧急就业,而在不久之后则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增加军备开支——也就是增加在“大炮”方面而非在“黄油”方面的开支才办到的。但是,即使当时的工资很13 低并且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依然基本上没有解决,大多数工人总算勉强有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地下鼓动就根本不能煽动群众起义。资本家可以不受工会的抵抗而剥削工人,但是他们要承受国

家为了加紧军国主义化、以便逐步建立进行侵略战争的资源而加给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包括工人在内，都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所控制，这种宣传对全国人民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因为在纳粹政权领导下动员了全国的力量，而且还运用了所有最新的心理学方法。这种情况绝不是资本家所需要的，至少在他们摧毁了工人阶级运动以后并不需要。这种情况使资产阶级不是成为主宰，而是成了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民族扩张学说以及暴力学说的默认的奴仆。整个德国经济在纳粹主义统治下成了一个庞大的备战结构：所以德国资产阶级的命运就与战争胜利的前景结合在了一起——这种胜利主要不是、或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纳粹党以及那位受命于天的疯子元首所领导的统治民族的胜利，这位野心勃勃的元首不达到征服全世界并使之归属于他的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因此，共产党人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些法西斯制度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的断言是正确的，但是关于其不稳定的原因的看法却全然错了。使法西斯制度不稳定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没有能为工人提供职业，而在于它们的领袖决意要把生产资源主要用于备战，并明确表示旨在和邻国开战。如果纳粹主义运动仅仅是设法摆脱经济危机和萧条的资本主义，它就不会要“大炮”而不要“黄油”，它就会为德国工业的大量产品尽量扩大市场。但纳粹德国的当政者只有当他们能够利用资本主义来为自己的民族扩张的目的服务时才对资本主义感兴趣，而当资本主义不适合自己的计划时，便立即给予决定性的打击。

此外，在幸免于法西斯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并不像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在受打击最大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的确带来了尽管不全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复苏。同时社会权力的分配

也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变。美国工会运动原先在有限的工业范围以外一直软弱无力,而且社会威信总的说来也很低,但是随着产业工会联合会成功地控制了汽车和钢铁等大规模工业,随着普遍存在的“公司”工会被取消,随着美国的雇主被迫迁就集体谈判的方式,工会运动出现了中兴时期。美国的劳资关系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得到了根本改变;工人在技术进步的成果中分享很大的一份,这已经成了公认的做法。在这些业已改变的情况下,美国资本主义按照大体上可为美国工人的主体所接受的条件进行的改造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因此,当工联主义不断增强及其影响日益扩大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完全消失了。资本主义恢复了它的力量,但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恢复的:承认工会的新地位,实际上承认公众对经济事务进行更多的干涉,后一点包括大大增加公共的社会服务事业,并由国家负一定责任来维持充分的就业水平。许多美国资本家极不愿意接受这些变化,他们渴望恢复旧日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抢先就占便宜,落在后头就只好吃亏”的状况,但是他们的呼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没有能引起恢复以往那种进行公开的阶级斗争的状况。同时,在与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发展基础相类似的民族偏执方面,在美国存在着的仍然主要是潜在的趋势;由于美国“生活方式”基本上比较民主,这种趋势没有寓于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而是后来以麦卡锡主义和“百分之百的美利坚主义”的形式公开出现,以莫须有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牺牲任何可以被指控为不忠于现存政权的进步运动。但其中大部分是在我此刻所论述的时期以后很久才有了重要发展:在整个三十年代,美国的主流似乎是趋向于比较开明的改良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准备与工人阶级的要求妥协,并且准备对任何显然没有得到“公正待遇”的庞大集团作出让步。

在这一时期,英国所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远远没有美国那

样严重；尽管工党在1931年的大选中几乎一蹶不振，工会在限制削减工资方面却获得了显著的成就，虽然工会在1926年的大罢工之后力量已经被削弱。在某些领域，经济萧条的确非常严重；在造船业以及煤炭和钢铁工业中尤其显著；在这些萧条的工业部门，直到大战爆发，恢复工作始终很慢并且没有完成。在政治方面，工党在遭到失败以后又逐步恢复了力量，但在1935年的大选中还是过于软弱，无力作出有效的挑战，所以保守党能够毫不间断地执政到大战爆发以及“声东击西的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工党当时一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非战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希望参与集体抵抗来对付法西斯主义运动这个国际的破坏力量，从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否则它的恢复过程可能比较迅速。它一方面持非战主义态度，加之又对保守党的意图疑虑重重，因而不愿支持保守党政府所领导的重整军备运动；而当时的局势却日益清楚地说明，没有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有效制止纳粹的侵略。工党暧昧不明的态度在西班牙内战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当时，它由于部分受到被本国强烈的非战主义情绪所削弱的法国布鲁姆政府的压力而支持一种不切合实际的“不干涉”政策，其实这种政策根本没有能够阻止法西斯主义国家站在反叛分子一边进行干涉来反对西班牙共和政府。

工党的确极难从困境中脱身。当时几乎每过一个月，形势就16更加清楚地说明，法西斯主义国家，特别是纳粹国家正在走向战争，除了以压倒优势显示力量以外，就无法制止这些国家。但当时还不能确定，希特勒会按什么样的先后次序来进攻他的对手；英国保守党中有些人始终希望希特勒会放下西方，而进攻苏联；摧毁苏联，即使是在希特勒手里摧毁，也是他们所欢迎的。工党即使在它接受了重整军备政策以后，仍然把它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通过国联来实现的集体安全之上，而国联在当时事实上已经靠不住了。工



党根本没有力量来决定政府的政策,或者哪怕是对它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在慕尼黑事件时尽管提出了抗议,也只能束手无策地作壁上观;当西方在1939年实际爆发战争时,它一直无能为力,直到法国崩溃以后张伯伦被迫下台,并迫使新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召请工党加入政府共掌国政——该政府实际上要孤军作战,需要团结整个民族来从事这项显然是孤注一掷的工作。

经济大萧条在法国出现的时间比其他地方晚,这主要是由于普恩加费将法郎的比价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所以其他国家的通货在1931年及以后的时期里左右摇摆时,法国的经济却大有回旋余地。但在政治上,法国的青壮年男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惨重损失还没有恢复元气,很大一部分法国人对纳粹主义势力在德国的兴起忧心忡忡,这种情绪使他们不愿竭尽所能准备再战,而是愿意几乎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与德国人妥协,以便避免战争。法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与英国不同,已经由于共产党人与民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吵而发生分裂,有组织的体力劳动者大部分倒向了共产主义运动一边,使社会党成了一支苟延残喘的力量,支持者大部分是公务人员和其他非体力劳动者集团。这种分裂扩大到了工会方面,使得经济运动几乎完全失去了力量;而且情况变得很明显,没有共产党支持,任何左翼政府就根本没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所抛弃的统一战线,在法国却被接受了,但之所以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的而不是国际的原因。莱昂·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所针对的问题与其说是法西斯主义运动,还不如说是企图在国内通过进步的社会立法改善劳工状况。人民阵线使工会力量在此后大部分受共产党控制的法国总工会中重新得到统一。接着就出现了马提翁协议,这些协议一方面牵涉到更正式地承认集体协议权和扩大国家对劳资争议的干涉,另一方面牵涉到实行四十小时工作周制度,这种制度对设备和生产方

法都不现代化的法国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工人在当时得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但法国的收支平衡却受到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雇主阶级愈来愈难驾驭了,右翼则以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形式的暴乱,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左翼进行反击。布鲁姆感到自己的力量过于薄弱,既不能对西班牙的共和派提供任何帮助,也不能坚决地与德国人站在一起。继他之后担任总理的激进党人达拉第在慕尼黑的投降中和张伯伦是平等的伙伴。代议制政权由于蒙面党以及其他法西斯主义集团的暴力行为而严重动摇,皮埃尔·赖伐尔以及一批有影响的政界人士坚决认为有必要对付法西斯分子;当时全国一团混乱,显然绝不存在像是会导致战争胜利的气氛,自从纳粹主义兴起以后,法国的军事战略几乎完全以静止的防御为基础,马其诺防线成了这种防御的堡垒。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后,这种形式的防线马上就无险可守,不可收拾,于是法国人在精神和军事上都崩溃了,轻而易举地便沦为德军占领和可耻的维希伪政权的牺牲品,这个政权打算把贝当奉为领袖来遮羞,结果只是使一个战败而垂头丧气的民族蒙受了更多的耻辱。

当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一蹶不振,在英法两国也遭受严重挫 18  
败时,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稳健的社会党人却获得了显著成就,与上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整个说来轻易地度过了艰难的萧条年代,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主要出口物资始终销路很好,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应付本身所遇到的重大困难时,显得颇有见识。当时大多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企图用通货紧缩的方法来应付经济困境,这种做法至少是暂时使状况更加恶化了,而瑞典人则特别显得机智,他们使预算暂时出现赤字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又创造条件在以后的年代里恢复预算平衡来防止通货膨胀的影响。社会民主党政府采取的这些谨慎政策,有些是得到独立的议会多数的支持,另一些则是得到思想上十

分接近的小党派的联合力量支持。这几个国家事实上并没有打算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化方面取得多大进展,而是满足于让大部分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宁肯实行大规模的社会保险,并满足于对资本家的行为产生愈来愈多的控制性影响。他们借助于当时比较顺利的经济状况,一般说来都相当成功,并且能在人民大众支持的基础上长期维持政权。此外,在这几个国家的人民之中,财富和收入方面存在的差别已经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这方面的差别小得多,这一点对他们无疑大有帮助;因为像这样更接近于平均之后,就降低了政治争论的火气,并使共产主义运动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劲敌不致于壮大起来。在三十年代,人们总是把瑞典当作稳健社会主义的成就的最高典范,在经济上也把它看成是利用国家作用的新方法来维持高额就业水平的先锋。大体说来,这些称许都是当之无愧的,尽管有些成就主要是由于环境顺利而取得,而不是由于任何特殊的社会主义天才找到了解决确实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而取得。19 19 法解决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取得。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固有弱点是:看来它在不久之后通过社会立法来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做法必定会结束,而且它没有显示出任何迹象准备进一步着手建立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阶段。不过是在当时暂时受益就够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特别是瑞典人——似乎提供了一个说明在人民大众以及在大体上心满意足的议会选举人集团的持续支持下、进化社会主义的潜在可能的令人信服的范例。

另一方面,荷兰和比利时——还有瑞士——的社会主义者似乎陷入了僵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便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然后就稳定下来,成为人数众多的少数派舆论集团的代表,但是它们并没有显示任何迹象说明它们将继续前进,争取多数,使它得以掌握政权——也许甚至与其他它们需要作为平起平坐的伙伴、而不是当作从属于它们的盟友看待的党

派联合执政。在荷兰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教会党派的存在（在比利时是天主教，在荷兰是天主教和新教），它们能够得到有实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归根结底支配这些党派的不是工人阶级的信徒，而是一批与教会上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保守势力。工会在这些国家中也分裂成为由社会主义者和宗教所控制的两个敌对运动；看来，当时根本没有办法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统一起来，或者在实现不了这种统一的情况下取得议会多数。

在三十年代，西班牙经历了共和国的浮沉以及佛朗哥和长枪党所领导的法西斯分子的胜利。当初共和国继普里摩·德·里维拉的独裁政权之后成立，后来由于内部纠纷而四分五裂，遂为另一个严厉和反动得多的独裁政权所取代。最初，共和派是形形色色的分子组成的最难对付的联合体，其中有像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那样的保守派天主教立宪党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反教权的激进派，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党人、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些人对自己所要建立的新社会的性质，持有完全不可调和的见解。有些人强烈主张中央集权，有些人坚决主张权力的多元论，还有一些人则是彻底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领导人物虽非全部、却是大多数人强烈反对教权，他们都对天主教会漫无节制的特权进行殊死的斗争，这种特权在西班牙垄断一切，不容异己。他们的许多支持者都是反对一切种类的权威的天生的反抗者；这些人以不亚于反对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威的程度反对共和国的权威。群众性的罢工在西班牙的许多地区长期以来风起云涌，而在许多其他地区则蔓延着自发的农民起义；当时独裁政权和君主政体已经崩溃，并存在着普遍实行新政的前景，于是就出现了让这些现象获得空前发展的明显机会。那时的西班牙不存在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派可以安然度过伴随共和革命而来的风浪。在初步

胜利之后一旦要决定如何行动时,当初携手共同进行革命的集团便陷于四分五裂。最初,互相争吵的各派分子大部分还能聚首一堂,草拟 1931 年的新共和宪法,并据此通过普选建立了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国会;然而即使是在这样早的阶段,当教会受到攻击时,右翼共和分子就不再支持国会了,反教权的激进派不久也和他们一起反对国会,而极左派的工团主义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则远离新国家机器,对于力图安然渡过风浪的历届政府不予支持。曾经设法通过 1935 年的人民阵线恢复共和派的团结。这一企图在选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功,1936 年 2 月左派在国会中相当于右派和中派的联合力量取得了明显的多数。但在此之前,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行使任何实际的权力。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不断罢工,农民们由于在中派拒绝热忱地推行土地法的情况下得不到实际进展,也感到牢骚满腹,于是他们就日益自作主张,根本不等待法律批准就抢夺财物,占领土地。与此同时,右派则在为反革命行动进行准备;在它未来的领袖圣·胡尔霍从葡萄牙返国途中坠机身亡以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于 1936 年 6 月在西属摩洛哥举起了公开反叛的旗帜,内战就此开始。

除以上所论述的国家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微不足道,因为除了小规模地下运动或日益脱离国内的舆论潮流的人数寥寥无几的流亡者集团以外,简直就没有社会主义运动可言;不论是地下密谋者还是流亡分子,都没有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他们陷入难解难分的派别斗争。比方说,南斯拉夫在 1929 年发生的联合王室与军人政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全都受到了迫害,只有地下活动还有可能存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以及其最享盛名的托帕洛维奇都跑到国外安身立命去了,而大部分共产党人也逃往国外,企图从维也纳领导党的工作。即使是铁托在 1937

年接掌领导权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没有多大作为，直到第二次大战期间轴心国占领了这个国家之后，才使他们得以领导一个民族抵抗运动，从而为1945年的“解放”开辟了道路。

在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在三十年代不可能发生多大影响。它只在一个国家之中力量强大，那就是巴勒斯坦。该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领导的，许多经济发展都采取了社会主义形式，比如农业合作区、“集体农场区”以及以合作社的方式经营很大一部分工业的工会组织。在其他地方，景况是令人沮丧的。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继续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并且由于社会党人在由法西斯政府或其他形式的独裁政府所统治的国家中遭到暴虐对待，他们便找到很多机会提出抗议。但是在德国以及后来在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一蹶不振，使该国际元气大伤，而且它还要不断地与第三国际进行斗争，后者在斯大林放弃了他对世界革<sup>22</sup>命的希望、转向以加强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基础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作以后，就日益明显地成为推进俄国利益的机构。这一转变当然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不再努力加强苏联以外的共产党，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他们较少注意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鼓动革命，而且更少注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以及受到它们经济渗透的国家——如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鼓动共产主义活动。在许多这类地区，共产党在经济萧条年代发展得非常之快。那次萧条对不发达国家打击特别严重，因为它使初级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暴跌，从而严重地恶化它们与先进国家的“贸易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共产主义运动，还有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在自己原先几乎从未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存在的一些不发达国家中生根，比如印度就是一个例子，那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主要机构是国大党，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是在国大党的范围内发端的。在某些阿拉伯国家中，也采取了小规模

和试验性的步骤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在埃及尤其突出;但是这种运动仍然主要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很少得到群众支持。然而,共产主义运动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更多地注意欧洲以外地区的反帝潮流,并殚精竭虑使那些忙于应付国内困难的帝国主义强国处境尴尬。

三十年代初期,情况更是如此。由于纳粹党所造成的世界大战的威胁日趋严重,俄国人逐渐地被迫改变了他们当前的政策,并使他们针对庞大帝国主义强国所采取的行动服从于在凡属可能的地方通过人民阵线的形式建立基础广泛的反法西斯运动的工作。在下文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在法国怎样做到了这一点:他们重新统  
23 一了工会运动并支持莱昂·布鲁姆的左翼政府——虽然不久之后由于该政府未能驰援西班牙的共和派而去立即攻击它。我们也会看到人民阵线的运动在英国由于工党完全拒绝对共产党那一套奉承作出反应而流产的经过,而在西班牙本国,人民阵线又是如何在1936年使左派获得突出的选举胜利之后在叛乱和内战的冲击下归于瓦解的。在国际事务方面,以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为外交人民委员的苏联有一个时期曾经作过认真努力,试图与西方国家妥协,以便联合起来抵抗法西斯的侵略,并试图运用国联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是这种努力由于张伯伦和达拉第所遵循的“绥靖政策”和西方国家不肯认真对待苏联和西方军事司令部之间最终安排的军事谈判,结果一事无成。这些事态的结果就是苏联的政策急转直下签订了1939年的《苏德条约》;不过这种异乎寻常的逆转并不意味着俄国人原先企图建立一个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共同阵线的努力在进行时就不是十分真诚的,也不意味着能够把这个条约的全部罪责归于俄国人。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西方的政治家在慕尼黑走了那么远来“绥靖”希特勒,他们的态度中包含着一种希望,即希特勒会挥戈指向俄国人,而不指向西方国家;或者说,他

们甚至准备鼓励他采取这种政策，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似乎认为这种政策是轴心国家之间缔结反第三国际盟约的必然结果。《苏德条约》无疑是严重背弃了前几年作为共产党世界政策的根本基础的反法西斯信念；但是，尽管对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共产党人来说，这个条约完全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且要求他们出尔反尔，或者放弃原来认为苏联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倡导者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因而他们感到吃不消。尽管如此，鉴于西方“绥靖主义者”的态度，签约一举也是不无理由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之所以硬把这顿不可口的饭咽下去，原因不仅仅在于苏联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们，非效忠苏联不可，也在于在1939~1940年那一段“声东击西”战争期间，当那些绥靖主义者仍然执掌<sup>24</sup>着各国的政权时，他们大有理由怀疑西方国家的意图。法国的沦陷和英国军队从敦克尔克撤退，使其中许多人猛然惊醒；到1941年时，希特勒撕毁了《苏德条约》并且对苏联发动进攻，于是他们又欣然地转变过来，再一次地投身于反法西斯十字军之中，而这正是不到两年以前他们不正确地抛却的事业。

然而，第二次大战即使在苏联被迫参战之后也不是一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战争。这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西方国家与苏联是作为不情愿的和自然互相猜疑的伙伴抵抗一个共同的危险。在战争期间，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态度暂时由于进行合作的紧迫需要而被遮掩起来，不过在骨子里始终是存在着的，而且一俟战争结束，显然就注定要再次明朗化。

在有限的程度上，这种情况在三十年代就存在，但是后来由于有法西斯主义的存在，成了对社会主义和代议制国家的主要挑战，情形就变得复杂了，而且防止了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性集团。此外，由于当时这种威胁咄咄逼人，而且迫在眉睫，就分散了人们对



共产主义和代议制国家之间的根本对抗的注意,并使这两种制度的一些支持者同心协力来反抗法西斯主义,虽然并非所有的支持者都是这样,甚至这样做的人也不够多。早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这种对立要比后来明显得多。在那些年代里,第三国际被俄国牢牢地控制着,奉命在全世界执行一种“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或者用那时到处流行的口号来说,“以阶级对抗阶级”的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人不断地设法把工人吸引到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去,并使他们脱离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这些领袖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走狗,而且愈来愈多地被指  
25 责为“社会法西斯分子”;因为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开始采取这样的策略:否认社会民主党人与法西斯分子有任何实质的区别,并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与法西斯主义者积极合作反对工人阶级。在纳粹党人在德国取得统治地位的整个时期内,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种态度,抵制与社会民主党人采取共同行动反对法西斯分子的一切概念。

事实上,在第三国际成员党所能影响事态进展的一切国家里,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的兴旺和上升时期,还是在三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陷入严重危机的时期,所执行的政策大致是相同的。直到德国工人阶级运动被彻底摧毁之后过了一段时期,共产国际才改变了路线,放弃了“以阶级对抗阶级”的口号以及组成“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德国有些在斯大林愿意改变政策之前就主张改变政策的领袖——如里美尔和诺伊曼——被撤除了领导职务,由始终百依百顺的台尔曼来接手;在许多其他国家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洗,特别是瑞典的基尔博姆和美国的某些持不同政见者。不论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策给了共产党人什么口实,共产党人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所遵循的毫无疑问是祸患无穷的政策;希特勒之所以能在德国获胜,世界工人阶级之所以对大萧条的恶果

以及对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抵抗遭到削弱，主要应由这个政策负责。

在苏联国内，显而易见的是，纳粹在德国的当权以及英法两国政府显然不愿对纳粹在欧洲的侵略采取任何有效的抑制步骤，这两者对于苏联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布尔什维克的舆论的气氛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三十年代末的大叛国案审讯中，有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都成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人的牺牲品；这些审讯无疑与纳粹的兴起以及轴心国家对共产主义运动公开表示的敌意所引起的恐惧有密切关系。三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衰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要由于斯大林个人负责，或者斯大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纯粹体现了没有他也会在别的领袖身上体现出来的逆潮流而动，这一问题将永远成为悬案。然而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斯大林的猜忌和个人权力欲对于清除批评政权的人，或者甚至是对潜在的批评者所实际采用的方法是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就这一点而论，人们在他死后所说的“个人崇拜”的弊病是确实有些根据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不容异己的作风和对传统道德束缚不耐烦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固有”特性，甚至早在列宁的时代就是如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作风和态度在马克思本人的许多言论中就可以找到根据，尤其是在他与他的至友恩格斯推心置腹的通信中可以找到根据。共产党人的这种行为绝不是斯大林首创的，尽管他做了不少事情使这些表现日趋极端。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作为苏联计划经济的一个要素在三十年代的发展，也不单纯是起源于斯大林个人的看法。有一点至少是十分可能的：如果没有斯达哈诺夫运动以及五年计划期间所提出的其他经济刺激，产量的提高就不会那么快；因此，不论是谁只要认为五年计划的成就比任何其他一切都重要，就可以认为这些做法是言之成理的。斯大林个人的气质无疑使他更容易采取这种方针，因为这使他看不到在敌对的世界面前逐步建立苏维埃政权时究竟牺牲了多少代价；不

过,即令是比较重视这些代价的人也会认为,单纯为了保存苏维埃政权,这些代价也是不得不牺牲的。斯大林当初的所作所为如果当真曾使党内的大多数同僚深感震惊,那么他的做法就不可能像实际上那样成功。所有的事实都有助于证明,情形并非如此——也许是因为他所使用的那些方法的全部罪恶在当时并没有被理解;也许即使是大部分被理解了,也可能仍然不会使那些人深感震惊。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情形使人无可怀疑,共产党人对于人类的痛苦是冷酷无情和麻木不仁的;这种品质不仅在斯大林身上存在,而且在苏联共产党的大多数领袖身上也存在,很可能在大多数追随者身上也存在。共产党既然从俄国过去的历史继承了不人道的遗产,这种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事情仍然是十分可怕的。然而,即使斯大林合作者之中有许多人一定知道,或者至少坚决怀疑过,叛国案审讯中有许多罪名绝不可能是真实的,要相信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充分了解,或者甚至全部意识到在叛国案审讯中对他的对手的诬害和捏造证据的事所达到的程度,那是困难的。像本书作者这种局外人,对三十年代俄国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很难作出有把握的判断;而对于俄国人来说要作出这种判断是否要容易得多,我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无论如何,在三十年代,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甚至大多数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敌意的社会主义者似乎都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俄国革命必须存在下去,苏联计划经济的伟大创举必须获得成功——由于当时世界其余地区并没有发生什么使我们感到鼓舞的事情,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几乎毫无阻拦地取得的进展又使我们大为担忧,情况就更加是如此。社会党人不论怎样迫不得已地严厉批判共产主义哲学及其在苏联的实际表现,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打算批判到希望苏维埃制度被它眼前的敌对力量推翻的地步。有许多对共产主义深怀敌意的人仍然极为钦佩苏联在以下方面取得

的巨大成就：为高度先进的工业经济奠定基础；以任何其他国家——至少是迄今仍然处在贫穷状态的国家——无可比拟的规模举办教育；以及以高度先进的水平发展社会服务事业。当时有人指出，这些事情是牺牲了眼前的消费并使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之后才办到的；但是许多人认为，这些痛苦大部分是获得经济成就所不可避免的条件，而且认为在一旦获得成就之后，立即就会获得报偿，非但生活水平会提高，而且个人也会得到更大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普遍倾向于对被认为是极有前途的新生的苏联经济的缺点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并且宽容其中的流弊，或是干脆不加理会，这一点使得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大为不快——尤以流亡者为甚——他们竭力否认苏联共产党人有充分资格算作社会主义者；而且几乎不论是谁，只要反共叫嚣响亮，他们就愿意与之携手并进。当时要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彻底拥护苏联的人与彻底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之间采取一条合理的中间路线，甚至比今天还要困难，不过到了三十年代，天平大大地偏向于苏联一边，原因是法西斯分子猛烈谴责苏联，而且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至少是左派，对苏联的经济成就感到衷心钦佩。 28

除此之外，有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对共产党以及党对其党员的纪律约束衷心感到真诚钦佩。共产党人忠诚地为党服务，而绝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党的要求却是漫不经心，甚至相应不理，这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区别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人有一种基本的哲学来引导并鼓舞他们的忠诚，而西方的社会党却没有强制性的共同信条来作为这种团结的纽带。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有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哲学大相径庭，它以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延续为基础，而不是以否定这种传统为基础。然而有一点是事实：共产主义对其成员的要求

远远超过社会民主主义对其成员的要求；而且不管前者怎样咒骂“唯心主义”，实际上似乎却是唯心主义得多的信条；它鼓励其成员以实际行动效忠并准备作出个人牺牲。在那些共产党没有当权、而是企图推翻现存秩序，因而遭到反对或者甚至是遭到迫害的少数派的国家里，公开表白共产主义信仰确实往往要使个人遭到重大牺牲，然而他们却甘心情愿为了“事业”而忍受这种牺牲；在苏联国内，共产主义虽然毫无疑问地吸引了许多钻营者和追求个人权力的人，仍然还是有很多绝对忠诚的人，领导人可以依靠他们；而许多真诚的服务则是对人们所相信的正在经历痛苦过程而诞生的新社会的纯粹热情的表现。即使苏联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已经大大地官僚主义化——我确信是如此——，而且在斯大林那种阴险狡猾的政权下已经抛弃了一大部分国内民主，许多人仍旧认为逐步加强苏维埃政权来抵抗法西斯主义运动乃是高于一切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将鼓舞愿意接受中央集权的党的支配的真诚感情。

尽管斯大林和他的仆从在三十年代作恶多端；尽管农业集体化运动残酷无情，而且对所谓富农根本不讲公道；尽管斯大林陷害假想的或实际对手时完全不讲道德；尽管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以及对托洛茨基本人的追击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尽管存在这一切情况，我仍然认为那些继续投身于保卫苏联抗击它的敌人的人，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极权主义的独裁者，最贪图权力，而且完全不择手段，在这些方面他们是彼此相同的。然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区别，那便是他们追求权力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希特勒追求的是一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一心想的是为了一个所谓优等的种族的利益征服全世界（这是一种只有通过侵略战争的胜利才能实现的野心）；而斯大林所追求的则是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世界范围的起义，这一目的使得苏联在世界事务中基本上站在正确方面，尽管实现这一目的时使用

了种种不法手段。有人也许会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所追求的实际上不是世界革命,而是苏联的民族利益;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苏联尽管有种种反常之处,在三十年代仍然是社会主义抗击法西斯主义的真正堡垒;尽管它在文明生活的舒适条件方面明显落后,也仍然远为可取。当时可以合理地期望:如果法西斯分子对苏联的根本生存的威胁被消除,因而使牺牲生活水平来保障安全的需要不再存在,苏联独裁政权的严峻程度就会逐渐减少,而且在大众的压力下,个人自由也会逐渐扩大。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苏联到时候就会转向西方所了解的那种自由民主制度;但当时却可以合理地期望:俄国人到时候就会为自己创造出一种生活方式,其性质不会像他们现存的一党专政制度那样与西方的概念格格不入。苏维埃国家无疑会像曾经许诺的那样,要经过一段漫长得令人难耐的时间才归于“消亡”;不过在一旦消灭了法西斯主义,从而使苏维埃国家所受到的压力肯定解除以后,它就一定会开始“消亡”。<sup>30</sup>

无论如何,以上论述是我个人与那多灾多难的三十年代里许多其他观察世界大局的人的共同希望和期待;我认为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希望。过了二十年以后,我如今仍然抱有同一希望,并且相信已有某些迹象说明这种希望可以实现,因为苏联已经明显地放松了对舆论的控制,而且也已经更加重视消费者的要求。如今苏联的领导态度无疑仍然相当强硬,而且对西方深怀疑忌。但既然美国以往的政策是如此,而西欧在美国的坚持下又唯命是从,苏联难道没有权利有所疑忌吗?它原先几乎是被迫采取了强硬的路线,在最近几年是否对它进行了充分的诱导使它修改它的路线呢?肯定没有。

不过我在本章中主要只打算谈本世纪三十年代的事,而不打算多谈今天的问题。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三十年代,尽管斯大林

做了许多恶事,西方社会主义者站在苏联一边反抗它的敌人,并且准备与它联合一致抗击法西斯侵略,仍然是应该的。当时果真像这样做了的话,并且果真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被迫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不是在一条战线上作战的话,那么西方就完全可能一点也不遭受 1940 年的那场灾难,而且纳粹分子的失败也会从一开始就成定局。但就 1938—1939 年西方的政治状况来看,左派力量过于薄弱,即使是联合起来争取这种共同行动,也无力坚持,何况他们并没有联合起来。西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意见是分歧的,“绥靖政策”<sup>31</sup>一直把西欧推到了无可挽救的灾难的边缘,然后才完全被放弃,而英国在新的领导下有一个时期只落得几乎是孤军作战——最后由于两桩事情才得救:一桩是美国参战,另一桩是希特勒疯狂地向苏联发动进攻。这两桩事情加在一起起了摧毁纳粹主义的作用,但除了这一有限目标以外,没有能使苏联和西方达成任何和解。因此,在将近二十年以后,整个世界仍然是“冷战”的牺牲品;新的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爆发,仅仅是因为毁灭力量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其他人类成就,威胁到人类的根本生存。

##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消亡

在这部思想史的第四卷中，我曾试图将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一直写到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真正严重地开始时为止，并且描述了德国的民主分子在军事领袖日益得势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潮流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不断遭到侵害的情形。毫无疑问，从1924年以后，德国经济有了迅速的恢复，这是由于获得了大量的借款——尤其是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借款——才有可能的。当时德国的通货在道斯计划之下稳定下来，协约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赔款要求实际上也已经放弃，于是德国在几年之中成了外国资本投资的乐园：当资本充分流入时，已作修改但仍旧很不现实的赔款要求是可以偿付的，用来支付赔款的不是任何真正的剩余款项，而是借来的钱，实际上，德国人所支付的赔款是由美国投资人支付的，是否能继续支付完全取决于外国资金是否能继续流入。然而这一点在资金流入时是看不出来的：借给德国的道斯贷款以及其他贷款的借款者都能按时取得利息，而根据道斯计划应分期付给的赔款也都照付了。德国的生产和出口迅速扩大，工资开始时非常低，但是在工会的压力下逐步有了提高。当时有人信心十足地预言，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德国已经走上了持久的经济恢复的康庄大道。

这种形势一直继续到1928年，那时真正不稳定的初步迹象已经开始明朗化。美国人为求得他们本国的繁荣，开始发现在外国投资不如在本国投资有吸引力，于是从美国流向德国的资金就放慢了速度，不久就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到了1928年末，就开始出



33 现了相反的流动,因为美国各机构实际上已经开始抽回借给德国人的短期资金,以便利用这些资金在国内投机牟利。德国人原先一直把这些短期贷款大部分用作较长期的贷款贷给欧洲的贸易主顾,这时便无法偿还这种一接通知便立即要偿还的贷款;于是便千方百计从别的地方取得贷款来填空补缺。但是其他国家由于本国的金融急于想分享美国繁荣的利益而输出资金,也感到资金短缺。德国人虽然从英国以及其他地方取得了大笔贷款,但如此借得的资金也被卡住了,当债权人催促还款时,不能用来还债。于是德国人就产生了燃眉之急,其原因不是美国的萧条,而是美国的投机繁荣,后者使证券价格猛涨,上涨的幅度与有根据的期望获得的营业利润全然无关。

1929年秋,美国的股票市场的繁荣景象骤然消失,股票价格暴跌,使得大批未加提防的投机家拼命抽走流动资金,以便弥补自己的损失;于是德国的金融状况极不稳定。美国从繁荣转为萧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由于人们真正地争先恐后从国外抽回资金而大大加重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困难。1930年,它曾一度躲过绝对危机;在这一期间,赔款的支付条件又在海牙重新作了修正,并进一步打算借助作为杨格计划的一部分的贷款来稳定德国的经济。然而,尽管杨格计划的条款规定从德国人身上榨取的赔款总数减少了,这些条款仍然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它们是基于假定对德国的出口产品在稳定的价格下需求不断扩大;其中这种需求又由于购买国在支付平衡方面的困难日益严重而明显地大为减少。到1931年夏天,世界经济大萧条已经汹涌而来。奥地利的“信贷公司”倒闭,从而发出了欧洲金融界灾难即将临头的讯号;英国工党政府面临着一场财政危机,并因此而不光彩地被迫在8月下台;美国人本身也逐渐醒悟,认识到了这一场经济灾难的巨大规模,其中有许多人是由于前几年投机过分而面临这一场惩罚的。

这场灾难开始时对德国人的打击特别严重，因为他们没有(外汇)储备作为后盾，而且要债的人愈来愈多，根本没有办法偿还。在1924到1929年之间，德国的工业迅速用新的工业设备进行了改造，只要充分开工，就可以用低得出奇的成本生产，而当销路减少时，生产成本就会直线上升。此外，德国的出口工业基础很窄，主要依靠对资本货物——特别是钢铁、机器制造、电气和化学等方面的产品——的高度需求，而这些货物大部分都只有向买主提供长期贷款才能销掉，在任何情况下都最容易受到经济萧条时期需求缩减的影响。于是德国人不仅完全无力偿还外债，还面临着失业人数迅速增长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曾经接二连三地想出许多权宜办法来使德国经济渡过难关。1931年春，胡佛的延期偿付办法规定赔款停付一年，但是仍然要求德国人设法为道斯和杨格计划贷款付息。在往后的几个月中签订的一系列停付协议允许德国延期偿还短期债款。但这些一年之后到期时必须重新签订的协定根本不足以应付当时的局面。1932年的洛桑协定把协约国的赔款要求减低到甚至只等于1930年已降低数额的一个零头，并且允许在以后4年中完全延期偿付赔款。即使是这样，也远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只不过在签订这一协定时，许多人终于认识到，赔款已经不大可能恢复偿付了。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没有一种防止了德国出口货物的急剧下降，也没有防止德国国内的失业人数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或者防止仍然还有工作的人的工资暴跌。 35

这些沉重的经济打击落在了一个政治已经十分不稳定的国家身上，不久便使魏玛共和国不光彩地收了场，并使纳粹党完全掌握了政权。有一个时期，反动的天主教政客布鲁宁想用紧缩通货和限制进口等严厉措施来安然渡过难关，这样就需要使德国的生活水平迅速降低，而这种降低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都想不出办法来

制止的。布鲁宁政权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后果是使中派政党——其中必须算上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迅速减少，并使极端派——一方面是共产党人，另一方面是纳粹党和国家主义派——的支持者迅速增加。在1928年的大选中，纳粹党只有12名成员被选进国会，而到1932年7月，当选的有230名，所获选票也达到1375万张。诚然，紧接着在1932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他们所得到的选票降到了1175万张，当选的议员总数也减少到196人；当时许多人都相信纳粹主义的鼎盛时期已过，很快就会走下坡路。但两个月以后，在1933年2月，尽管有11月那次挫败，希特勒仍然当上了总理，这时纳粹党人所获选票又上升到1725万张，而且由于共产党人被赶出了议会，他们与52个国家主义派的同盟者一起在国会中便占据了明显的多数。

1930年3月，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联合政府中的其他党派要求大力削减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服务事业，于是这个政府便垮了台，取代它的布鲁宁政府一直执政到1932年6月下台，由冯·巴本所领导的右翼国家主义党内阁取代。接着冯·巴本愈来愈不得人心，执政到1932年11月又被施莱舍尔取代。此人也是一个老右翼分子，他曾有一个短时期试图争取工会的好感，但在第二个月就被兴登堡总统撤换，代之以希特勒；兴登堡强迫希特勒与国家主义党联合，并接受冯·巴本出任副总理。然而，联合实际上从来没有实现，  
36 全部权力随即落入纳粹党人手中。不久，国家主义党的领袖胡根堡被迫辞职，他的国家主义党被迫并入纳粹党。在纳粹统治下，社会民主党被彻底摧毁，自由工会运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工人被强制加入纳粹党所领导和控制的新“劳工阵线”。共产党已经被取缔和赶入地下，资产阶级政党也遭到无情的清算。纳粹分子着手通过“统一整饰”政策使德国社会的每一个有势力的组织都置于纳粹党的控制之下，并且把一切可能存在的反对派的中心统统清除

掉。社会民主党领袖凡是没有被捕或是没有被干掉的,都逃亡到国外去了;他们企图在布拉格建立一个总部,以便在德国国内进行宣传,但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运动者,甚至资产阶级的开明分子,都被杀害,或是被拷打一顿之后送到集中营里禁闭起来,在那里受到最残酷的对待。教会除了完全顺从的以外,也是不分新教还是天主教,全都遭到猛烈地攻击。整个德国很快就处于一种比法西斯意大利更为残酷和彻底的独裁统治之下。

此外,德国纳粹主义还受到一种使它对世界其余地区构成极大威胁的情绪所彻底激励。它仗着单纯的武力和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感而得意忘形,因而完全不能承认德国军队曾经在战场上败北是一个事实,而且使用“诽谤”的神话,说军事上的惨败是不知所措地、有意识地出卖德国的文官出卖了军人的结果。任何人只要是在战败的时刻接受了凡尔赛和约(通常被称作凡尔赛苛刻条件),或是随后接受根据道斯计划“履行条约”的政策,就被指责为叛徒;整个魏玛共和国被看成是体现了这种可耻的屈从态度,而且根本违背德国人民的这样一种要求:政权应体现其民族优越感以及他们对权利的坚持。每一个忠诚的德国人所遭受的痛苦,每一个忠诚的德国人在获得美满生活方式的能力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每一种挫折,不论其性质如何——这一切都被归咎于坏人玩弄的阴谋诡计,说这些人使自己成为德国社会的主宰,而且是在运用自己的权力来降低德国的地位或破坏它。人们对失业工人说,他们之所以无钱过像样的生活是由于人民的敌人假公济私,他们牺牲工人的利益来中饱私囊。银行家遭到谴责,说他们以稳定货币为名扣发贷款,商店店主和贸易社团遭到谴责,说他们串通一气敲诈顾客:由于把这些作奸犯科者说成是打进德国经济的要害部门的外国人——特别是犹太人,这些攻击就更增加了力量,说犹太人控

制了金融和商业的上层领域，并且蓄意利用自己的势力来破坏和屈辱真正组成德意志民族的正直的北欧人。对魏玛共和国当权人物和集团的这种攻击往往在表面上使用的这种极为激烈的腔调，实际使许多资本家以及中产阶级中许多较富裕的人感到不安。可是骨子里却是疯狂地仇视工人阶级运动，谴责它奉行普遍的和平主义，谴责它热衷于与战斗的民族主义要求和热心重申德国人的权利格格不入的民主议会的形式。反犹太主义在德国社会中早就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后来纳粹党人才把它变成了行动的根本原则，并且认为只要有犹太人的血液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连最起码的普通人道主义权利也不给他。

纳粹党的最初党纲是 1920 年主要由一个名叫戈特弗里德·费德尔的工程师起草的，共有二十四条，其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要求“全部德意志人根据所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中<sup>38</sup>统一起来”。文中并没有解释，这个大德意志国家是否要把德意志人在居民中仅占少数的地区也包括在内。但是统一所有的德意志人这个主张似乎暗示了这一点，尽管其中有关所有民族自决这个提法看来又否定了这一点。当然，纳粹党实际上从没有为任何非德意志人的权利操心。但党纲的第二条只要求“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并要求取消凡尔赛和约和圣·热曼和约<sup>①</sup>。第三条要求生存空间来维持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并解决它的过剩人口——这样也就重申了德国的殖民要求。

行文至此，这个党纲还仅仅是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第四条接着规定：唯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德意志国家的公民，或当作同胞看待；同时又引出一条值得注意的明确推论：“任何犹太

---

<sup>①</sup> 圣·热曼和约是协约国的对奥和约，规定废除奥匈帝国，成立奥地利共和国，重划疆界，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以及后来称作南斯拉夫的国家。——译注

人均不得被视为同胞”。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从一开始就被宣布为纳粹主义信条中的基本部分，没有具体提到任何其他非德意志人。接着，该纲领就以更笼统的词句谈到了德意志人与非德意志人在拟议中的大德意志社会中的关系。第五条规定，非德意志人在这个国家里只能作为外国人存在，须服从特别的外侨法。第六条规定选举权只限于公民（即德意志人），所有的非德意志人不得担任任何公职，不论是中央机构、地方机构还是市政机构中的公职。此外还宣布反对“民主化议会的管理，因为凭这种管理，职位是由政党徇私分配，而不顾个人的性格和能力。”

接着第七条要求：“各邦应设法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过体面生活并确保生计的公平的机会。”——后面附了一条很重要的附加条款说：“该邦如果证明无法维持全体居民的生活，即应将外国人驱逐出境”。第八条接着要求不但应当完全禁止任何非德意志人继续移民入境，而且应将1914年8月以后移入德国的一切外国人一律驱逐出境。接着第九条要求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第十条宣布：体力或脑力劳动是“每一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公民不得进行任何危害社会的活动，而应当为全体人民谋福利。 39

这十条对后面较细的要求来说形成了一个总导言。这些要求的第一点包含在第十一条中，内容很概括。它断然要求取消一切不劳而获的收入。接着第十二条要求所有在战争中牟取暴利的收入，应全部没收，“分文不留”，这一条同时宣称：个人从战争中牟取的一切利润，都应当被认为是叛国行为。第十三条要求国家接管一切托拉斯。第十四条要求国家分享所有大企业的利润。第十五条要求大大增加国家发给的养老金。

接着第十六条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殷实可靠的中产阶级”，接着又明确要求将大商店收归地方所有并主要出租给小商人，所有公家的物资供应合同应当优先照顾小商人。第十七条转向土地

改革,主张无偿地没收国家需用的任何土地,取消地租并禁止一切土地的投机买卖。第十八条内容十分笼统,要求“对一切危害公共福利的人采取无情措施”,对所有“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倒把者”,不分种族和信仰,一律处以死刑。第十九条要求以德国的不成文法代替罗马法,因为后者“为世界的唯物主义秩序服务”。

第二十条涉及教育和文化。其中规定:“为了使每一个有能力和勤勉的德国人有可能受到高等教育,从而有机会升任要职,国家应当组织国家的整个文化体系。”所有教育机构的课程都应根据“实际生活的要求”加以安排。学校教育从一开始就应灌输“国家的理念这一概念”。家境清寒、颖悟过人的儿童应由国家出资培养。下面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有责任提高国民健康标准,方法是设立母亲保健中心,禁止童工,实行强制的比赛和体操制度,并尽可能鼓励一切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组织。

往下第二十二条要求废除职业军队,代之以国民军。接着第二十三条是一系列有关出版物的要求,条文要求对任何利用出版物宣传并散布自己明知为“政治谎言”的人采取行动。在德国发行的所有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必须是德国公民。非德国人的报纸只有得到国家批准才能出版,而且不得使用德文。非德意人不得在德国报社中拥有经济权益,也不得对之具有影响。侵犯公共福利的报刊应予取缔。应对“任何对人民生活具有破坏作用的艺术或文学倾向”采取法律行动,鼓励这种倾向的组织应予解散。

第二十四条谈的是宗教。它规定:国内各教派“只要不危及国家的生存,或违反德意志族的伦理或道德意识”,就可以有信仰自由。接着又说,纳粹党“代表绝对的基督教观点,而不受任何具体教派约束”,并宣称该党反对“国内外的犹太唯物主义精神”。此外还宣称,国家的永久复兴只有根据“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从内部实现。

最后,为了实现以上各条所提出的要求,第二十五条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央权力机构,整个国家及其所有组织应无条件地由一个中央政治议会控制。”接着又要求成立专业委员会以及代表境内各级区域的委员会,以便保证中央权力机构所颁布的法律在联邦的各邦内得以实施。该党纲在结束语中说,该党领袖保证促使这一纲领得到贯彻,“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必要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希特勒在6年后(1926年)声言不可更改——虽然实际上在纳粹党当权时已经大大地更改——的这个纲领有四个突出的特点:它是大德意志主义的、反犹主义的、独裁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领袖”在制定或实行这个纲领方面具有任何特殊地位。事实上,在希特勒确立为唯我独尊的领袖之前,也就是在关于唯一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概念本身存在之前,这个纲领就已制定。它是一个集团的集体产物,其中除了希特勒以外,没有一个人命定要在纳粹主义的全面发展中起主要作用;这个纲领制定的方式显然与1918年以及那几年的德国局势有关,在那几年里,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其混乱,工人普遍失业,币制不稳定,协约国提出的赔款要求过高,德国根本无力偿付。该党纲的根本基础是进取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但它与旧统治阶级的旧式的贵族民族主义大相径庭:它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不仅激烈地反社会主义,也激烈地反资本主义。纲领对小店主权利的强调——比它对农民事业的支持要明确得多——突出说明了它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而且由于犹太人在商业上所占的杰出地位,显然又与它的极端反犹主义有关。最后,它的总观点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集权主义和独裁主义色彩,而且包含着纳粹党人当权后便着手贯彻的“统一整饰”政策的基础。如果说这个纲领是社会主义的,也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它



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国家的要求,并且宣布国家有责任安排和规划的既有政治和社会事务,又有经济行为。在这一压倒一切的原则之下,它显然期待私营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基础继续存在;不过它同时也向托拉斯以及资本大量集中的组织宣战——虽然它并不要求解散大规模的工业企业,而只是要求公家分享其利润。它反对地主,要求取消一切形式的不劳而获的收入;但它甚至没有明确宣布要瓜分大地产,而只宣布要取消地租。它的目的不是要恢复 1918 年的革命已经推翻的制度,而是要建立一个新德国,其权力由德意志人掌握——这些人为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所鼓舞,具有敌视一切外国人的强烈排外情绪;其中首先是反对犹太人,其次是反对声称已被划入大德意志国家疆域的领土上的一切外国人——主要是斯拉夫人。纳粹主义运动不论后来的发展如何,开始时绝不是资本主义针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浪潮所作的垂死挣扎;它是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企图摆脱德国战败的后果,并以极端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的国家为基础恢复德意志国家权力的一种企图。

然而纳粹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死敌。纳粹党人用各种迷惑人的理由来仇恨社会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的工会。理由之一是,在纳粹党人看来,甚至多数派社会党人也带有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色彩,并否定作为纳粹主义运动背后最基本的团结力量的种族主义概念。同时又由于不少犹太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当时就很容易言过其实地远远夸大他们在其中的势力——甚至说他们通过一种为最阴险的目的所鼓舞的秘密阴谋实际控制了这一运动。

其次,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肯定是斯拉夫人所鼓动和领导的运动的一个部分,而且接受莫斯科的指令来决定自己的政策。这些指令最后无疑并不由苏联政府或苏联共产党来发布,而是由形式

上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超国家代表机构的第三国际发布。但这一<sup>43</sup>点并没有使它比较能为其准则为进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纳粹党人所接受；而且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第三国际的控制权操在俄国人手中，其政策是根据苏联的利益确定的。诚然，德国共产党人曾经不时地与纳粹党人合作，反对魏玛共和国，而且是奉第三国际之命这样做的；后者误以为纳粹党人在推翻该共和国之后，就会不知不觉地为共产主义革命铺平道路。但是这种合作并不能影响到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根本不可调和的对立，德国共产党人轻易与纳粹党人联合起来反对魏玛共和国，根本没有捞到丝毫好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当然全然不同，他们对共产党人深怀敌意，而且最积极地维护魏玛共和国，即使在该共和国由他们的公开敌人——如布鲁宁和冯·巴本之流——统治时也是如此。但在希特勒看来，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可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宣扬“犹太”唯物主义的人，而且是民族精神的敌人，因而最好是把他们连同其共产党对头一起斩草除根地消灭掉。他们最大的罪恶就是主张平等，反对私有财产，而且还反对有战斗精神的善良的德国人实现这样合法的个人抱负：在为民族精神效劳时体现其个人品质，借以上升到社会的优越地位上去。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在企图维护魏玛共和国时忙乱了一阵，在纳粹党人看来仍然是庸庸碌碌的胆小鬼和帮衬者的党派，他们反对北欧人天生的自力更生精神和当仁不让的气概，因而成了民族复兴以及成功地对抗压迫德国的势力的最大障碍。事实上，不能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一概讥讽为受外国控制的运动，但当时它仍然被划为消灭的目标，并尽量将它与共产主义运动混为一谈，说它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宣扬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观点的党派而已。

在处理与工会的关系时，纳粹党人感到在最终掌握政权以前必须谨慎从事。虽然纳粹党人迫切希望在产业工人中逐步争取追<sup>44</sup>

随者,然而在他们争夺政权的年代里,他们始终没有打算建立自己的工会,来与主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由”工会相抗衡,或者与主要同天主教中派党有联系的较小的基督教工会分庭抗礼。1928年,他们的确建立了一个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小组组织的团体,作为纳粹党在工厂和工场中吸收党员的机构。这个机构于1931年在莱恩霍尔德·马霍夫领导下进行改组,不久之后就在大多数工厂中成立了小组,并吸收了相当多的成员,但是却被禁止插手工资谈判,或篡夺其他普通工会的职能。它只是作为政治机构,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纳粹主义运动,并为纳粹党本身的褐衫队(冲锋队)征集新兵。因此,工会进行集体谈判活动时就得不到纳粹党作为一个政党的支持——虽然这种态度在纳粹党领袖之间导致了相当大的分歧。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尤其不同意这样做,他在柏林地区担任要职,在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站在纳粹主义运动的左翼,希望党采取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路线,并且希望党明确地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纳粹党的势力在1932年年初取得长足进展之后,到年末的几个月看来已每况愈下,这时施特拉塞希望与冯·施莱塞尔将军和工会妥协,反对联合起来支持冯·巴本的社会反动势力,他希望通过这种联盟使纳粹党在以施莱舍尔为总理的联合政府中分享足够的权力,以便实现其反资本主义路线的纲领的一大部分。但施特拉塞反抗的结果是:由于希特勒坚决反对他的政策,从而被迫辞去他在纳粹党内担任的一切职务。在发生这桩事情的时候,决心只通过合乎宪法的途径取得政权的希特勒顶住了迫使他用暴力政变夺取政权的许多支持者的压力,他们中有许多人认为他坐失良机。

- 45 1932年7月,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辉煌胜利,使他们在议会的总共607个议席中获得了230席,几乎占总数的五分之二;希特勒与兴登堡总统曾进行谈判,后者同意让希特勒入阁在冯·巴本之下担任副总理——这一建议被希特勒愤怒而不屑一顾地拒绝了。冯·

巴本继续担任总理,只不过他在新议会中已经成了毫无希望的少数派,议长也由纳粹党的赫尔曼·戈林担任。冯·巴本面临在议会中遭到失败的危险,就运用总统的权力解散了议会,并且在11月初重新举行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纳粹党失去了200多万张选票,议席从230席减少到197席,而共产党的议席从89席增加到100席,贵族的民族主义党的议席从37席增加到51席。社会民主党人的议席从133席减少到121席,中派党的议席从97席减少到89席。由此可见,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在中派政党和纳粹党受损的情况下得益了。此外,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纳粹党在选举邦议会的地方选举中失败得更惨,而且似乎在以日益加快的速度丧失其影响。这就是导致既遭到纳粹党又遭到中派党憎恨的冯·巴本倒台的局面,也是使冯·施莱舍尔将军升任总理的局面,虽然除非他能在某种程度上同时争取到纳粹党和中派政党的支持,否则就无法治理国家。接着发生了勾心斗角的一场角逐。原来想与施莱舍尔妥协的格里戈尔·施特拉塞,这时在纳粹党内一败涂地,丧失了一切职位。施莱舍尔为了想走一条折衷的道路以摆脱德国的经济困难,主张进行土地改革,对东德的大庄园的土地重新作一些分配,于是触怒了兴登堡和民族主义党分子;后来兴登堡拒绝了他关于再度解散议会,然后重新举行选举的要求。极端民族主义党人要求解散议会而不举行选举——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发生一次政变,以建立总统独裁制,废除魏玛宪法。兴登堡对希特勒极不信任,希望请冯·巴本再任总理,但是又认识到这样组成的政府没有纳粹党支持便不会有足够的基础,于是兴登堡便设法再度劝说希特勒在冯·巴本的内阁中担任没有实权的副总理。希特勒坚决要求担任总理,但是拒绝使用武力夺取政权的任何企图。兴登堡强调必须以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为基础组成“权力集中”的内阁,于是拒不同意希特勒以纳粹党领袖的资格担任总理。当时的局势

似乎已经发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是绝处逢生，希特勒与民族主义党和中派政党的领袖们以及冯·巴本达成了协议，商定由他出任总理，由冯·巴本出任副总理，组成纳粹党在其中明确居于少数的联合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兴登堡才改变初衷，同意希特勒出任总理，同时明确声明，他委任希特勒，不是把他看作是纳粹党的领袖，而是把他看作国民舆论的集中表现。兴登堡与其他党派的领袖们采取这一步骤时，都是出于一种十分错误的印象，以为他们可以控制纳粹党人，而且希特勒也曾保证绝不利用职权营一党之私。纳粹党的领袖们的确曾被迫同意冯·巴本除了担任副总理以外还兼任普鲁士邦总理；但是纳粹党人弗里克担任了德国政府的内政部长，戈林担任了普鲁士邦的相应职位。民族主义党魁胡根堡得到了两个部——贸易部和农业部；在德国政府和普鲁士邦中这两个职位全都由他担任。保守党人冯·诺拉思男爵留任外交部长。其他内阁职位大部分分给了兴登堡和冯·巴本的支持者和朋友。老牌的反动人物深信自己的手腕胜过希特勒，并且深信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不久他们就醒悟过来了。戈林利用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有利地位将纳粹党认为不可靠的高级警官一律撤换，换上了纳粹党的忠实党员。他还进一步扩充警察部队，主要是从党卫军和冲锋队中  
47 招收特种警察，并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实际上是煽动警察采取暴力行动，其中包括保证他们在对“国家的敌人”以及特别是对共产党人采取最无情的措施时将得到充分支持。戈林在1933年2月17日发布的一道命令中宣布：“在执行任务时使用武器的警官，不论其行动的后果如何，都可以指望得到充分支持。”此后，不但对共产党人，而且对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对那些反对纳粹信条的温和资产阶级分子，只要可以采取暴力行动，这种行动都几乎不受限制。警察实际上具有无限的权力，可以破坏和驱散集会；出版物受到严

格的控制,连对纳粹政策的最温和的批评也在禁止之列。许多人遭到了杀害,还有多得更多的人遭到党卫军与冲锋队暴徒的毒打,这些暴徒有的当了警察,有的则是在警察的纵容下干的。共产党人企图发起总罢工,这种行动最容易遭到残酷的镇压。在希特勒拒绝中派党关于给予一定程度的宪法自由的要求以后,该党连集会也被破坏了。

纳粹党人一方面这样系统地采取暴力行动,同时又在选举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希望能在3月初进行选举的这一届新议会中获得多数。选举之后,纳粹党在647席中获得了288席,因而比1932年7月(他们前一次获得成功的时期)所获席位大有增加,但离明显多数还有一定距离,不过,当时还有52名民族主义党议员,这两个党加起来形成了明显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尽管遭到恐怖行动的迫害,仍然选上了120名议员,而1932年7月间选上的是133名,11月间选上的是121名。共产党当选的议员是81名,而前两次选举当选的分别是89名和100名。中派党获得73席,前两次分别为75席和70席,其他党派总共只获得14席。一度实力雄厚的人民党——施特勒斯曼的党——仅获得2席。此外,共产党人虽然在严酷迫害下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实际上在新议会中完全没有份了。他们的大多数议员不久都被关进了监狱,或是关进了在戈林的新体制下设立的集中营;有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与他们同样的命运。纳粹党在这样排斥异己之后就得到了原<sup>48</sup>先从选民手中得不到的明显多数,从而使他们得以粗暴地对待联合政府中那一批有名无实的伙伴。他们还进一步在议会中提出一条授权法案,该法案实际上废除了魏玛宪法的大部分条文,并授权政府不经议会批准便可制定约束性的法律,这样一来,就连装样子的议会政府实际上也取消了。这一措施在议会中以441票对社会民主党的94票正式通过;投票支持纳粹党人的不但有民族主义

党,而且还有中派党和各小党派。

2月间,在举行选举之前,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只不过选民如果愿意在3月的选举中还可以投票选举该党的候选人。该党被宣布为非法之后,它所剩下的党员转入了地下,它的有些领袖被逮捕并关进了集中营,另一些则逃亡国外,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是纳粹法网的漏网之鱼,仍继续进行工作。如我们所见,社会民主党人除了被逮捕和被杀害的以外,其余的人仍然可以在新议会中担任议员,该党虽然遭到了残酷迫害,仍然合法地存在了一个短暂时期。诚然,它曾拼命设法适应纳粹党的统治,希望能保住自己的财产和组织。该党领袖奥托·威尔斯在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猛烈抨击纳粹政权时,辞去了他在国际中所担任的职务。4月间,该党选举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排除了已经逃往国外的领袖。这种半投降的做法根本没有起作用。5月10日,戈林占领了该党的党部和报社,并没收了它的资金。尽管如此,一个星期之后,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在议会中出现,并投票赞成希特勒关于对外政策的宣言,不料所得到的报偿却是弗利克在下一个月中下令禁止该党继续进行任何活动,从一切议会和地方政府机构中排斥该党党员。最后把它所有的党部全都封闭,并取缔了该党的报纸和出版机构。这时,该党又有许多领袖逃往国外或被逮捕,奥托·威尔斯和他的支持者在布拉格设立了一个流亡的党总部。

49 一般说来,纳粹党人在建立他们的新秩序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说明他们所控制的武力手段是如何地全面,以及他们通过使用合法的暴力和非法的、完全不受禁止的暴力又是多么冷酷无情。社会民主党人起初仍在议会里表现了一定的个人勇气,投票反对授权法案;但他们根本没有打算以武力对抗武力,而是听凭他们的党“军”(国旗队)被摧毁而从未打算用它来抵抗纳粹党的冲锋队。毫无疑问,果真有任何这样的企图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当初尽释前嫌，共同保卫魏玛共和国，也是如此，何况实际上其中任何一个党都丝毫无意这样做。如果在1932年7月冯·巴本赶走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时进行这种抵抗，倒是最后的机会，说不定还有一点成功的希望。然而即使在那时，胜利的希望也是微乎其微的。国旗队人数虽然相当多，却几乎完全没有武装；共产党人原先已经表明自己是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的死对头，而且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议会中又没有构成多数，他们之所以能继续执政，完全是因为当时没有可能结合成一个多数派来对付他们。冲锋队的武器装备相当精良，党卫军尤其如此；而且除此以外，武器装备精良的国防军和民族主义党的钢盔团也会加入战斗反对他们。当时，如果奥托·布劳恩和卡尔·塞弗林所领导的普鲁士政府在冯·巴本显示武力时不是无可奈何地退让，而是试图强行抵抗，那就肯定会被击败。然而在那一个阶段，要进行抵抗还可以勉强办到，此后就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了。毫无疑问，当时有一个重要因素使局势不利于抵抗冯·巴本的政变，那便是工会的态度。工会在西奥多·莱帕特的领导下，极力赞成屈服，并且在希特勒和戈林登台以后，还维持着他们的卑躬屈膝的政策。工会领袖原先想通过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来保住自己的资金和房产，并保留一个形同虚设的组织形式，但结果并没有得到好处。1933年5月1日，纳粹党人把多年来的社会主义五一节变成了一个盛大的纳粹党节日，由他们新成立的劳工阵线来主持。第二天，他们占领了所有的工会大楼，逮捕了数以百计的工会领袖，并且让工会会员整个加入了劳工阵线。这个机构明确地附属于纳粹党，由勒伊博士控制，此人也是党组织的头目；在这个组织中，原先与纳粹敌对的“自由”工会、基督教工会和其他工会的会员，全都被强制合并到14个各自与一个具体的工业领域相关联的“工会”中去。勒伊起初想使劳工阵线具有组合的性质，把雇主和工人都包括进去，但此



举失败了。而且，“劳工阵线”的宗旨尽管是代表工人，却没有实权替他们说话。5月19日，在全德国所划分的13个区中，希特勒在每个区都委派了一个劳工理事，人选在与本地区的地方长官协商后确定。这些劳工理事有权取消集体谈判而自行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劳工阵线的作用不是在这些事情上讨价还价，也不是保卫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动员全国的人力为纳粹国家服务。这样，德国的工会运动就在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彻底消灭了。运动的领袖莱帕特和格罗斯曼尽管屈服，也被送进了集中营。

现在我不禁要问，德国雇主阶级的领袖在这些事情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有些大雇主，尤其是钢铁大王弗利兹·蒂森，早在政变之前就投入了纳粹党人的怀抱，并且以巨额资财资助纳粹党。蒂森和采取他这种方针的人想利用纳粹党来为德国资本主义服务，以便镇压和摧毁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工会；并希望能控制纳粹主义运动和利用它来作为支持资本家的要求的可靠力量。当纳粹党对魏玛共和国的挑战变得愈来愈厉害和愈来愈激烈以后，资本家中转而采取这种看法的人就愈来愈多，而且尽管纳粹党的纲领中无可否认地包含反资本主义因素，他们仍然与纳粹主义结成一51 体。然而，即使在希特勒出任总理之后，这种态度在雇主阶级的首要人物之间还不是最明显的；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有一部分依附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尤其是中派党——，另一部分则依附于各种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运动最接近于胡根堡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党，而不是接近于纳粹党。希特勒出任总理一职就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德国资本主义的中央代表机构内部将发生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其中包括主席是克虏伯·冯·波隆的德国工业全国协会。当时有人要求克虏伯辞职，该协会的执行董事克塞尔确实被迫辞职了。但是克虏伯仍然保住了自己的职位。纳粹党的主要经济指导者奥托·瓦格纳在企图把该协会置于党的控制

之下时遭到了惨败。瓦格纳与勒伊博士的看法相同,希望改组该协会,使它作为一个部分与劳工阵线一起组成既包括雇主也包括工人的组合。但是该协会根本不接受,反而宣布自己就是本地区的根本没有工人参加的组合;后来希特勒主要在该协会的影响下放弃了他的成立组合性质的组织的计划。瓦格纳后来被撤职,由工业家能够接受的威廉·凯普勒接任。6月间,另一个全心全意支持资本家权益集团的人被任命为贸易部长。当时德国的主要的资本主义代表机构还有: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经济利益保障协会——人称“长名联盟”——和西北雇主协会,后者主要在煤炭和钢铁生产地区活动。前者的领导人是施鲁舍尔博士,他原先属于德国人民党,后来与胡根堡的民族主义党关系密切。施鲁舍尔随即被迫辞职,过了不久就由蒂森接任,蒂森还兼任西北雇主协会主席,从而登上了西德工业界的最高权势的地位。一般说来,纳粹党人的确成功地控制了德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组织,但是他们完全是<sup>52</sup>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的:使自己的政策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并抛弃组成超越阶级分歧的组的诺言。在这种条件下,大雇主们多数人十分愿意与新纳粹政权合作,尤其是由于他们看到纳粹党人是那样疯狂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报复。

这倒不是因为大雇主实际上有多大选择余地。由于严重的经济萧条,德国工业有一大部分归于银行控制之下,而银行本身又不得已而要仰望国家支持。因此,不论是谁掌握了国家机器,就处于极其强有力的地位,可以保证使银行服从自己;而纳粹分子又不是那种可能不抓住一切机会来扩张自己的权力的人。但是早在1933年以前,希特勒至少已经对纳粹党的纲领中包括的反资本主义因素不感兴趣了。这些因素原先对于吸引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是有用处的,对大工商企业的指责可以吸引他们。但是在纳粹主义运动扩大了它的号召范围而且日益成为极得人心的民族主义的

代言人以后,它就愈来愈感到没有必要来号召小资产阶级反对富人了,并且它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征讨使它不得不与大雇主结成联盟。尽管如此,那些在工业中产阶级的“战斗协会”里组织起来的小商人和小雇主直到 1933 年还在满怀信心地指望纳粹党人实现他们那种分散大型商业联合企业并把它们交给“小人物”的纲领。1933 年 3 月,“战斗协会”显然在纳粹党控制下率先成立了德意志帝国行业组合,由冯·兰特伦博士领导。该机构还取得了对于德意志工商业委员会的控制,后者是地方商会的中央组织,也由兰特伦担任主席。然而这两个机构不久就与勒伊博士发生激烈冲突,他希望把纳粹帝国的新的组合性机构建立在自己的劳工阵线上,而不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的组织上。最后,希特勒非但不支持其中的任何一个组织,而且把整个组合国家的观念全部抛弃,并实际上站在大资本家一边反对它们,从而使这两个对头双双归于失败。

但是,正像我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纳粹主义完全成了或主要成了德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工具。纳粹主义与资本主义如此结盟之后,占上风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德国资本主义摆脱了急迫的困难并在纳粹统治下得到了复苏,而且在以后的年代里大体上给予了纳粹大力支持。然而在联盟中它始终只能当小伙计,而且只能唯命是从地追随纳粹党把“大炮”置于“黄油”之上,把纳粹党人的重整军备和备战运动放在比自己的经济利益优先的地位。这种妥协对资本家来说是很值得的,因为这样既消除了社会主义的威胁,也使雇主在与工人打交道时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在第三帝国统治下,是纳粹党人而不是资本家当家作主并使德国的工业为他们的民族主义目的服务。

对于纳粹党来说,要与大地主达成协议就没有这样容易了,因为他们反对一切旨在分散东德大地产的措施。1933 年,纳粹党已

经有一个新农民运动支持他们,这个运动的组织形式就是所谓纳粹党农业政治组织,由凡·瓦尔特·达雷领导,此人是一个阿根廷出生的社会经济学家,在纳粹党内平步青云,主要坚持必须把地租率降低到2%。这一措施既遭到胡根堡——他主要支持增加农产品价格的措施——反对,也遭到纳粹党内的一流财政专家如施密特和贾尔马·沙赫特之流的反对。达雷在希特勒的支持下,着手把德国农民组织到由他本人亲自控制的帝国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组合之中,并着手制定法律,禁止地主出卖农民耕地或因索债而收押的 54 田地,赶走农民。他宣称,农民是民族伟业的真实基础,是民族精神的促进者;他希望能东德的大地产上实现大规模的农民定居。但是这一政策使他与胡根堡和兴登堡总统都发生了尖锐冲突,这两个人都坚决维护地主的权利;而且他也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希特勒宣称,德国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不能用国内移民的方法来解决,而是迫切需要在帝国现有疆界以外去征服可供移民的地区——主要在东欧。达雷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得不放弃将地租率削减到2%的主张,并且把往东德移民的计划也放慢了步伐。但是这些结果对胡根堡以及其民族主义党的支持者并没有好处。6月间,纳粹党人在全德各地大举进攻民族主义党的俱乐部及其组织,占领他们会址,逮捕多人。胡根堡在内阁中强烈抗议这些进攻,但是无效,遂于6月27日辞职。希特勒的回答是解散德国民族主义党。半个月以后,内阁颁布一项新法令,宣布纳粹党是德国唯一有权存在的政党,并宣布所有其他政党一律解散。

这样就结束了德国的不稳定联合政府,在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头6个月,德国在名义上就是由这个联合政府进行统治的。权力的分享始终有名无实,不过有胡根堡在内阁里面,在某些方面可以使纳粹党人的意图受到一些制约——在土地改革方面尤其如此。胡根堡去职的主要结果是使得希特勒能够巩固对国防军的控制,

从而减少对冲锋队的依赖。冲锋队的领导人雷姆想继续以势必会使民族主义党以及大批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舆论界与纳粹党对立的形式继续大力推行革命性的暴力行动。1933年8月,戈林在普鲁士甚至解散了成员主要来自冲锋队的特别警察部队。这样就形成了发生冲突的局势,结果在1934年雷姆被赶下台并且丧了命。纳粹主义独揽大权之后,已经从一个攻击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变成了它所建立的新秩序的保卫者;它一方面抛弃原先的许多颠覆性经济理论,同时开始压迫那些仍然一心本着这种精神行事的人。这并不意味着纳粹主义愈来愈不是一种暴力理论了,而只是意味着它的暴力行动的对象有了更加明确和狭隘的定义。他们绝没有放松对犹太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自由”工会主义者的迫害;不过,对于接受纳粹新秩序的资本家,以及对于愿意与它合作的或者哪怕是默默服从它统治的雅利安人,它确实停止了迫害。

纳粹党人在1934年夏推翻并杀害雷姆之后,便最后摧毁了作为一支能独立行动的力量的冲锋队,从而也就最后制服了纳粹党的左翼。此后,希特勒无论如何公开的场合下已经成为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领袖,而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了;同时他还坚决维护资本主义企业,反对所有希望进攻这种企业的人,不论这样做是否为了一般人民的利益,还是为了当初大力拥戴他上台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纳粹主义的这种变化早已开始,而且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事实上,早在希特勒出任总理以前许久,在纳粹党一旦开始从蒂森和其他首要资本家那里接受大量津贴以后,这种变化就开始了。希特勒就职后不出数月,在他定下心来执行自封的使命、着手重整军备和准备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变化就很明显了。为了这些目的,他一方面需要大企业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所有能够加以劝诱以同意他为“领袖”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德国人支持——特别需要可以纳入

统一整饰过程的任何运动中居于要津的人物的支持。原先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进行反抗的可能性一旦消除,除了教会以外 56 就没有其他地方可能再成为危险的反抗势力中心了,因而纳粹党人认为必须比对于其他对手更加小心地对付教会。

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历来就是反对宗教的运动,既反对德国东部以路德派新教为主的教会,也反对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区、巴伐利亚区和南部其他地区的罗马天主教。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工人阶级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人都不受宗教的控制,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工会领袖也完全处于教会势力范围之外。互相倾轧的基督教工会,虽然接受新教会员,其见解及其领导人都属于天主教的,不过这些工会只代表工会运动中的少数人。从另一方面来说,纳粹主义从一开始就是非宗教的,而不是反宗教的。它既然自称代表一切真正的德国人,就不得不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投其所好,而且要想尽一切办法回避任何可能使它们发生分裂的问题。希特勒自小就是天主教徒,至少在形式上无论如何还得保留一个天主教徒的样子,不过他对宗教事物并没有什么兴趣。另一方面,兴登堡总统则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坚决维护新教自称高于一切的种种说法以及至少在普鲁士所代表的政教紧密结合的新教概念。德国的新教教会并不是在全国统一的基础上、而是在地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帝国范围内的各邦都各自有其与邦政府紧密结合的教会。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封建制度以及邦的主权的概念有联系,尽管普鲁士的路德教会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优先地位。纳粹主义作为一个以大力强调全体德国人的民族统一为基础的中央集权运动很早便与德国新教的地方主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同时,纳粹分子主张帝国政府具有绝对权力,这就必然要使宗教权力明确地服从于政治权力,而这一点却与宗教当局要求对信徒具有最高道德权威的主张相悖背。不久之

57 后,有些纳粹分子要求基督教接受种族主义作为信条,从而与纳粹主义中所提出的北欧日耳曼人的权利至上的主张相一致,后来随着纳粹势力日益扩展,就产生了一种北欧日耳曼人新教运动,其极端的形式几乎断然抛弃了基督教道德。路德教派有一个名叫哈森费德尔的牧师成了所谓“德意志基督教”的主要倡导者,他通过使在任的宗教领袖辞职,企图借此统一对路德教会的控制权。尽管教会历来服从国家的控制,哈森费德尔这种进攻也激起了广泛的反对;于是希特勒将他撤职,并指派东普鲁士国防军的军中牧师路德维希·缪勒作为德国基督徒的领袖来取代他。接着,在1933年5月,缪勒与许多显要的教会人士举行了三天正式会议,会上缪勒给予了教会不受国家监护的自由;据此,柏林的教会当局推选了一位著名的正统派神学家弗里德里希·冯·波尔施温担任帝国主教——也就是说担任德国路德教会的领导人。这是希特勒所不能容忍的,他拒不承认对波尔施温的任命,并指令戈林以普鲁士政府首脑的资格任命一个名叫耶格尔的文官担任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教会专员。耶格尔随即撤换了普鲁士教会的既定领袖,并任命缪勒为德国福音会联盟的领袖。波尔施温被赶走了;纳粹分子占领了新教教堂,并在教堂上挂了卐字旗。这一挑衅行为促使兴登堡总统采取了行动。他召见希特勒,责成他恢复教会自由,并通过友好谈判解决纳粹党人与教会领袖之间的争端。希特勒暂时作了让步。缪勒原先规定教会领袖往后应由政府委任的命令被取消;规定教友只能限于雅利安种族的所谓“雅利安条款”也被取消了,只不过对教士仍然适用。信条与宗教礼拜由各地区的邦教会独立控制的主张重新得到了肯定;耶格尔的专员职位被撤换。此外,还为重选教会最高管理机构作出了安排,当时纳粹党人正在对这些机

58 构进行统一整饰,使之完全归于纳粹控制。于是希特勒就向总统呈报说已经执行了总统的命令,教会与国家之间已经正式达成协

议。

到此为止，纳粹党人似乎遭到了一次失败，但是他们一刻也不放松地重申自己的主张。新的教会最高管理机构的选举是在到处受到恐吓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是德国基督徒获得了全部胜利，在普鲁士尤其是如此。因此，缪勒在处于支配地位的普鲁士教会中当选为邦主教；不久之后，在1933年9月，又在符腾堡的一次全国宗教会议上当选为帝国主教。这些措施激起了正统派人士的强烈抗议。有2000名牧师签署了一项“马堡”抗议宣言，波恩有一位名叫卡尔·巴思的神学家发表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我抗议》以示反对。但是这些抗议没有起作用，兴登堡也没有再进行干预。然而坚强不屈的教会人士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因为德国基督徒由于对当时的危机感到惊恐，没有把统一整饰运动推行到极端，从而使自己的对手保留了一点力量来维持他们的抗议姿态。

在此期间，纳粹党人一直力图与天主教会和好。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们曾经数度正式谴责纳粹主义运动，但是面对纳粹在政治上获得的胜利，他们匆忙改变了态度。在1933年3月，这些主教们宣布，在不撤回对纳粹党人在某些宗教和道德问题上所提出的异端邪说的谴责的情况下，“主教团认为，原先所提出的一般性禁令和告诫，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存在。”这样就朝着接受纳粹政权的方面迈了一步。但是天主教会仍然拒绝与纳粹主义的极端种族理论发生任何牵连，并且对于冲锋队那种过火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至于纳粹党人，他们不仅使基督教工会解散，还使天主教中派党及其在巴伐利亚的相应组织巴伐利亚人民党解散了。不过，希特勒也派遣了冯·巴本到罗马去与梵蒂冈商谈宗教契约，7月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一项契约。根据其中的条款规定，给予天主教徒信仰和公共礼拜的自由，并且保证教会管理权<sup>59</sup>独立；但作为回报，教皇方面同意禁止教士和修士在任何情况下参



与政治,同意凡是任命主教和大主教时均需取得民政当局同意,并同意授权主教宣誓效忠于其教区所在的邦以及帝国和帝国政府。这些都是极大的让步。天主教徒虽然保住了现有的参加教育活动的权利,并且在天主教的社会和宗教性质的结社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宽容,整个说来,胜利显然在纳粹党人方面,同时也表现为教皇不愿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反对纳粹政权的要求。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只要承认德国新秩序的总的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至少能得到纳粹党人的一定程度的宽容。对于那些倒霉的犹太人就不存在类似的可能性;从一开始他们就不但在法律上被剥夺了行动权利,无法动弹,而且还受到残酷的人身虐待和暴力行为对待。在医疗和法律等主要自由职业中,要立即把为数众多的开业的犹太人全都赶走是办不到的;但是纳粹党人毫不掩饰他们有意要尽快将这种种职业全部雅利安化,而且准许继续开业的犹太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的限制。此外,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商店立即一齐关掉,或者不让所有的犹太人参与批发业和商业,也是办不到的。在用暴力手段强制对所有犹太商人进行全面抵制之后,这种绝对的抵制虽然没有继续实行,仍然广泛地进行侮辱和采取暴力行动,阻止别人与犹太商店做生意,使犹太人继续不断地处于危险境地之中,随时可能遭到人身暴力行为和在经济上沦于破产。1933年的情形确实还不能与纳粹党人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进行的那种极端反犹的恐怖活动相比,但是即令是1933年发生的那种情况也是够糟的,已足以在国际间引起强烈抗议,并且使那些有办法逃走的德籍犹太人不断地流亡国外。

60 许多人曾希望,纳粹党在夺得政权以后,会把大部分反犹暴行连同其反资产阶级的极端做法一起抛掉,可是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趋势。事实证明,与纳粹分子夺取政权时所曾利用的社会激进主义相比,种族主义在纳粹党人的观点中是最最根深蒂固和最最强烈

的因素；在迫害行动的道路上每向前走一步，反犹狂热也愈加强烈和厉害。最初，富有的犹太人的处境比贫穷的犹太人好得多，但不久之后纳粹党政府就不仅把他们的武器对准比较孤苦无靠的犹太穷人，而且也对准了犹太人中的有产阶级。即使如此，仍然有不少阔犹太人得到允许只要把大部分财产留下，就可逃往国外；只是在战争爆发以后，纳粹党人才开始了旨在完全灭绝德籍犹太人的运动。但是自从纳粹主义取得政权以后，几乎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了最初纲领所规定的有关政策的范围；那项政策规定，全部剥夺犹太人的政治权利，但容许保留谋生手段。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被消灭，比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被法西斯政权消灭的事实，对于作为世界运动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打击要严重得多。这不仅是由于德国是一个比意大利强大得多的国家，能够对世界事务的进程产生多得多的影响，也是由于德国是具有最强大的组织的社会党的发祥地以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泉源。1918年德国革命显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新秩序来取代已瓦解的霍亨索伦政权，而且在往后的年代里，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显然趋于衰微，从而使德国的崩溃对世界其余地区的影响毫无疑问有所减少。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早在它被纳粹党人彻底消灭之前许多年，其地位已经远不如1914年以前的鼎盛时期了；这不仅是因为该运动壁垒分明地分裂为互相倾轧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两个派系，也是因为这两个派系都明显地表现出无力应付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治理下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从一方面说来，共产党人显然没有理解来自纳粹党的危险的真正性质，而且有时甚至还愿意与纳粹党人携手，反对社会民主党人，从而使自己声誉扫地；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为了“挽救共和国”，一再在反动势力面前退让，并一再委曲求全，从而使得自己的地位遭到了严重的损害。这种趋势甚至在大萧条的爆发使德国在经济上一蹶不

振,并使纳粹党人得以纠集一大群五花八门的不满分子和失意人物最终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崩溃以后回顾起来,不难看出在1933年的局势下,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完全没有力量对纳粹党人进行成功的抵抗。然而,曾经一度强大的德国社会党人竟然没有为自卫进行哪怕是最微弱的抵抗,就听凭他们的运动被消灭了,这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来说,仍然不失为严重的打击。

既然在德国和意大利一切社会主义运动都已完全失去战斗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生力量就被限制在了很狭窄的范围内。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在1933年以后实际上只不过是英法两国的党加上西欧某些小国的党所组成的松懈的联盟;在这些党当中,法国党已经让共产党取代了它的工人阶级主要政党的地位,而英国党则在1931年的大选中刚刚遭受了一次惨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东欧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光彩,在苏联则是完全失去了光彩。在欧洲之外,美国的社会党几乎完全消失,而且在美洲大陆的其他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能深深地扎下根。在亚非两洲的任何国家里,社会党实际上并不存在。澳洲的工党虽然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但社会主义成分很少,而且根本不愿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合作。尽管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社会主义者在西班牙的共和运动中也占有突出地位,这些都不足以弥补纳粹党人在德国的胜利使得非常突出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萎缩。

62 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形也比这好不了多少。第三国际实际上已经完全为俄国人所把持,在中国也已经遭到了似乎是彻底的失败。在苏联以外的一切共产党中,唯有法国党还有一点真正的重要性,但它影响法国大局的力量看起来几乎等于零。东欧各国的地下共产党以及拉丁美洲的尚在襁褓时期的党还不能起什么作用;在美国,共产党人的那些互相倾轧的小派系与软弱无力而又丧失威信的社会党的地位不相上下。当然,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欧以外的世

界大部分地区仅仅是一个力量薄弱的少数派运动,这种情况已经非止一日了;然而在1933年之前,不论它怎样力量薄弱,看来总是在发展,并获得新的追随者;而到1933年的时候,它却似乎到处在失势。即使在奥地利,尽管社会党人对反动派进行了最英勇的抵抗,仍不断地遭到挫败,而纳粹主义在德国获得胜利后又给他们形成了极其可怕的新威胁。

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各地遭到的失败当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生存;但是我必须重复说一句,使社会主义遭受这种挫败的主要因素显然不是资本主义。事实上,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声誉从来没有像1933年这样低落过。美国的情形尤其如此,那里大萧条的责任完全归在了大企业的身上,社会激进主义(尽管不是社会主义)在广泛的破产和大规模失业的压力下,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在英国,工党政府在1931年的失败无疑使资本主义力量获得了胜利。但即使在这里,大萧条也使资本主义的信誉降低了。最后,在德国,希特勒虽然抛弃了纳粹主义运动早期那种明显的经济激进主义,并且在摧毁工人阶级运动时把德国资本主义力量当作了自己的盟友,但是主要的胜利并不是资本家取得的,而是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取得的,后者使整个国家投入一场本质上属于争取世界霸权的军事斗争之中——资本主义在这场斗争中只有使自己63 谋利的野心服从于压倒一切的种族主义侵略的要求时,才能得到好处。总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德国纳粹主义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肯定不是资本主义在衰亡中的最后挣扎,也不是资产阶级在制定国内外政策方面的支配地位的体现,而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本能的表现,这种本能在经济逆境的刺激下达到了沸腾点,但是在经济动机在其中尽管不能说不重要、却只是起次要作用的运动中,这种本能突出地显现了出来。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

在 1931 年的大选中,英国工党遭到惨败,主要原因是它自从建党以来第一次不得不面对反对者组成全国规模的联合阵线来反对它的局面。在大部分选区中都是一个工党候选人与一个反对派的联合候选人进行一对一的两人竞选,自由党的三派破天荒第一遭团结起来与工党对抗。此外,曾在 1929 年拥护工党的中产阶级集团中的选民,也有不少人倒了戈。总的说来,工党的选票下降了 200 万张,而保守党的选票则增加了 300 万张以上。自由党——包括它的所有派系在内——失去了将近 300 万张选票;麦克唐纳的“国民工党”的追随者、奥斯华德·摩斯莱爵士的新党以及 26 名共产党候选人所得到的票数非常少。总票数比 1929 年少 100 万张。

从所获议席的角度来衡量,减少的票数更为严重。正式的工党议员从 1929 年的 259 人减少到 1931 年的仅仅只有 46 人;不过此外还有 6 名独立派议员,其中 3 名是在独立工党支持下当选的,另 3 名则不是,但其中 2 名实际上与独立工党有密切联系。“国民工党”获得联合派的支持,共得 13 席;新党只有 24 名候选人,而它预先承诺将派 400 名候选人参加竞选,它和共产党连一席都没有得到。在工党支持下当选的 46 名议员中,整整一半——23 名——是矿工候选人,其他 9 名是他们工会的正式候选人。只有 13 名议员(其中有几名是工联主义者)仍然是工党各区党部提名的候  
65 选人;而合作党减少到一个议席。工党在大伦敦失去 45 个议席,

在兰开郡和柴郡失去 39 席,在苏格兰失去 34 席,在约克郡失去 33 席。威尔士的情况较好,在 25 个议席中只失去了 10 席。1931 年的大选使工党在英国南部(除大伦敦以外)连一个议席都没有得到,在英国西部,只有斯塔福德·克里浦斯爵士一人获得席位。工党的内阁大臣只有兰斯伯里一个人保住了席位;他在新的下议院中的主要副手是艾德礼和克里浦斯。汉德逊、克莱恩斯、多尔顿、格林伍德、莫里逊、辛威尔、苏珊·劳伦斯、埃伦·威尔金逊和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都落选了。独立工党的马克斯顿和柯克伍德恢复了席位,但是约维特落选了。韦伯和诺埃尔-巴克斯顿已进入上议院。

因此,残存的工党就人数而言力量非常薄弱,大选刚过几个月,又由于独立工党的退出而使它的队伍更加萎缩。如前面的一卷所述,<sup>①</sup>早在工党政府成立之初,独立工党就在政策和党纪方面与工党发生争执,其后不久就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独立工党的议员拒绝遵照党的指示活动,同时实际上正在形成本派系的“纪律”,这种局面是工党领袖们所不能容忍的。大选以后,马克斯顿领导独立工党,又加强了这种趋势,结果在 1932 年无可避免的分裂终于来到,独立工党退出了工党;然而一小部分人不愿意断绝关系,仍旧设法继续留在工党内。

工党在议会论战中的实力薄弱,与党员人数的减少是相对应的。汉德逊重新被选为议长,不过他没有议席,而且大部分时间不在英国国内,而在国外主持正开始走向凄凉结局的裁军会议。他不在英国时,兰斯伯里担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艾德礼担任副主席。汉德逊在 1933 年 9 月又回到下议院;但他早在一年以前已辞去议长一职,由兰斯伯里接任。

---

<sup>①</sup> 见第 4 卷第 21 章。

总的说来,1931年大选失败的直接后果是迫使工党向左转。

66 人们广泛认为,工党政府的垮台归根到底是由于英格兰银行总裁蒙塔古·诺曼所鼓动的“银行家的诈骗”;当时工党明确地表示决心:绝不再上同样的当。然而就在同时,或者至少是在惨败之余而心神甫定的时候,举行了“善后讨论”,会上提出的意见认为,这次垮台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第二届工党政府缺乏明确的政策和纲领,如果工党万一重新执政,不论它是否拥有明确的多数,都绝不可缺少这样一种纲领。其中有一次讨论导致了本章后文述及的新费边研究局的建立。

当时人们一致认为,英格兰银行应该国有化,并置于财政部牢固的控制之下,工党应该着手制定新政纲,保证采取明确的社会主义行动,其中包括燃料和动力工业(指煤、电等)以及主要运输业实行公有制的问题;还保证向工党大会提交有关的报告。当头两份报告提交1932年的累斯特工党大会时,左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关于银行和财政的报告》虽然力主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却没有建议将合股银行国有化,尽管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合股银行的公有制是有效的经济计划的必要基础。一群反对政纲的人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合股银行国有化的修正案;人们欢呼这一结果是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同盟的胜利。第二个争论是工会在国有化工业和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中的代表权问题。正式的报告提议,管理委员会完全由政府提名的人组成,这一提议受到了强烈的批评;然而由于英国职工大会还没有在是否参加问题上拿定主意,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起来,留待双方日后再作讨论。

在此期间,英国国内有明显的迹象说明骚乱正在日益增长,在  
67 萧条地区以及在内阁组成后由于失业人数仍在继续增加而带来极大困苦的大城市尤其如此。1932年主要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组织了一次新的反饥饿游行,它得到劳工们的广泛支持;人们对政府强

行削减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服务事业表示十分愤慨。游行和抗议在此后两年中时断时续地发生，例如华尔·汉宁顿就曾组织过“黑棺”示威，失业工人在交通的高峰时刻一个接着一个地横卧在牛津大街上，他们抬着一口假棺材，棺材上的说明是“他没有得到冬季救济”。但是，由于工会和右派为一方与共产党和工党左派为另一方之间不断地发生争吵，这些示威陷于混乱之中。1933年英国职工大会终于作了某种努力，把失业者吸收到由准备接受英国职工大会领导的各地工会理事会主持的一个正式运动中去；但是这种做法是三心二意的，在与共产党所控制的“全国失业工人委员会运动”的对抗中没有得到什么成就，后者在主要工业中心稳固地建立起来了。

莱斯特工党大会总的说来是左派获胜。但是这次胜利仅仅是昙花一现，因为在议会外面，工党本身主要仍然由与已倒台的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领导，这些人在前届政府倒台以前曾打算对敌人大幅度让步；不久以后他们又恢复了对工党的控制。政治上的反对派尽管很活跃，而且畅言无忌，实际上并不强大；1932年以后，这个反对派除了共产党人以外，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同盟和已经退出工党的独立工党。

社会主义同盟本身是各种各样的人组合而成的。到1930年末，当世界经济萧条变本加厉，而工党政府又似乎对于如何应付萧条束手无策的时候，在我和我的妻子、《新政治家》杂志的C.M. 劳合、H.L. 比尔斯、G.R. 密契逊、批发合作社的W.R. 布莱尔等人的倡议下，一批社会主义者开始在埃塞克斯郡的伊斯顿别墅聚会；<sup>68</sup> 这所别墅是沃里克伯爵夫人的乡间别墅，这位夫人在青年时期就由于罗伯特·布拉奇福德的影响而笃信社会主义；这些人在1931年组织了一个以个人会员为基础的新的团体——社会主义咨询和宣传社，它的外号叫“忠诚的牢骚者”，这表明了它对它与工党的关



系是怎样看的；它请了欧内斯特·贝文担任主席，并请了艾德礼、克里浦斯等人担任社员，还着手执行一个举办讲座和印行小册子的计划。早期的会员来自许多方面，其中最有生气的是诸如休·盖茨克尔这样一批以往的大学社会主义者，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在第三届工党政府中任职。

如前文所述，不久以后，主要由同一批人组成了一个名叫新费边研究局的团体；当时费边社本身已经停滞不前，于是这个团体就打算致力于像费边社全盛时期所致力的那种“有目的的”研究。特意选用“新费边”这一名称是为了强调传统的延续性，这件事得到费边社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并得到汉德逊、休·多尔顿、国际和殖民地问题专家伦纳德·伍尔夫、伦敦经济学院的 W. A. 罗布逊以及韦伯夫妇的积极鼓励；伍尔夫、罗布逊和我本人拟定了一个全面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国际、政治和经济三部分。

我最初的想法是新费边研究局和社会主义咨询和宣传社应该相互依赖，前者进行研究工作，后者将研究的结果加以推广；但是，这个计划从来没有实现，因为 E. F. 怀斯所领导的、曾经拒绝跟随马克斯頓一起下野的独立工党少数派，在 1932 年夏季与社会主义咨询和宣传社接洽，要求合并，由怀斯担任新组织的主席。经过长时期商讨以后，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了；当时我虽然默认了，我认为这个决定是不明智的；社会主义咨询和宣传社就此结束了它的短暂的生命。最严重的后果是贝文极其忿怒地辞职了，这影响  
69 了他此后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态度。新组织取名为“社会主义同盟”，这使人立即想起了威廉·莫里斯<sup>①</sup>；怀斯在合并后一年逝世，由斯塔福德·克里浦斯接任主席一职。我早在 1933 年春

---

<sup>①</sup> 威廉·莫里斯(1834—1896年)曾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同盟，详见本书第2卷。——译注

季就已辞职,因为我认为社会主义同盟在怀斯领导下所采取的政治路线一定会使它与正式工党短兵相接地发生毫无益处的冲突。

新费边研究局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没有受到影响,仍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计划。开始时它的规模很小,在整个三十年代一直存在,由约翰·帕克担任总书记(他在1935年被选入议会),我担任名誉书记;它的会员人数日增,信誉日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与残余的费边社通力合作。已有五十年历史的“费边社”这一名称被保存下来了,如同各地区的费边社组织——当时已经所剩无几,但在战争的年代里又增加到100个以上——和在加入工党之后的费边组织一样,都一概沿用旧名;只是新费边研究局对费边社的组织章程补充了一条新规定,即不得以费边社的名义公布或作为决议提出任何政策,而只能以原制订者个人或团体的名义这样做。这条“克己的条例”极其重要;它非但消除了费边社在工党内部成为敌对者或反对者的危险,而且使意见相去甚远的各社会主义者得以在费边社内携手合作。这种合作以及经年累月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在一系列小册子、论文、书籍和报告上(最初由新费边研究局发行,战争爆发以后则由费边社发行),而且在费边社社员1945年选入议会的人数上,都可以看出来。工党内阁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费边社社员。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社会主义同盟的历史就大不相同了。

在工党内部,汉德逊虽然名义上是书记,但从1931年以后就很少起作用,部分原因是健康不佳,部分原因是全神贯注于裁军会议事务。因此,兰斯伯里继续在众议院担任议长,不过在1933年末他也身患重病,直到第二年秋季才复职,在他离职期间,由艾德礼在阿瑟·格林伍德协助下处理日常事务,后者是在一次补缺选举中重新选入下议院的。1935年在布赖顿召开了一次工党大会,汉 70  
德逊因病重未能出席;几个星期以后,他去世了;那次大会选举了

J.S.密德尔顿担任代理书记来接替汉德逊,但严格约定密德尔顿不得竞选议员。当时的局势已经很黯淡,正在这个时候,议会内外的领导职位又告中断,这无疑增加了混乱。

其所以说当时局势很黯淡,因为上述事件是在严重的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发生的。1932年和1933年失业情况十分严重,在造船业、重型机器制造业中心和煤矿企业中尤其如此,而内阁则一筹莫展。它在“学者委任统治”下所采用的总税制对于受损失最严重的出口贸易当然没有任何帮助。至于那些能够保持职业或者能够找到新职业的人在经济萧条下所受的影响,则由于萧条使基本必需的产品(包括食品)的价格急剧下降,而得到和缓。在这种情况下,萧条区和各行业中的工人与境况较好的人之间就发生了裂痕。这样就使联合行动不能像如果没有裂痕那样发展,使那些会员受影响较小的工会不能团结一致支持失业者,但却有助于这种工会维持自己的地位。政府除了在1931年削减失业救济金以外,还在这年年底以前设置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和报导有关失业保险和其他救济方式的整个问题;经过委员会的一再审议,1934年颁布了《失业保险法》。该法实际上把失业者分为三类:第一类人的需要可由自费保险来满足;第二类人已经用完他们的保险金,需要从全国性的资金中得到进一步的救济;第三类人有些根本没有资格在这些项目下领取救济金,有些则是在上述两项下享受过了他们有限的权利,只能根据《济贫法》领取当地的公共救济金,而根据该法规定,有的可能没有领取资格,而且金额多寡因地而异,要看当地公共救济委员会的态度如何而定。为了施行第二类救济,71 《失业保险法》规定设置一个全国失业救济委员会,责成其拟定它的救济标准。该委员会在1934年12月公布了救济标准草案,而且在这年年初,当英国开始从严重的经济萧条中复苏的时候,1931年削减的救济金又恢复了原金额。新标准一经公布,立即就可以

明显看出：许多失业工人根据这条标准所能得到的救济金要比他们根据原先实行的办法至今所领得的数额少。各地随即普遍发生骚动；全国失业救济委员会不得不收回它所提出的标准，重新考虑。结果，在 1936 年发表了另一个新标准；这次把那个成为风波根源的众所憎恨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作了很大的修改。这些修改使失业者的骚动减弱了，以后的骚动与其说是要求改善失业者的待遇，不如说是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帮助萧条地区。1936 至 1937 年，这些地区主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又组织了若干次反饥饿游行，但是由于工业情况有了改善，它们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大为减少了。事实上，这时候人们注意的中心主要已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国际事务方面——尤其是转移到由于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以及西班牙内战而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方面去了。

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是很自然的。1933 年纳粹党人在德国取得政权，摧毁了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到了这一年年底，世界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罗斯福已着手实行他的当时称为“新政”的果断的恢复措施。主要食品和原料的价格呈现出回升迹象；在英国这样一个十分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里，关税政策所加的限制引起了更加广泛的重视。1934 年肯定是经济恢复的一年，在英国至少是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面渐趋和缓的一年。如我们在前文所见，这年春季，1931 年削减的社会救济金又恢复了原来的金额。工党在 1934 年 3 月的选举中第一次在伦敦郡议会获得了明显的多数，并从此在该郡掌权。

与这些有利趋势形成对照的是，国外有若干非常不利的新事物。奥地利发生了二月内战，陶尔斐斯的基督教社会党推翻了奥 72  
地利社会党，建立了他那脆弱的独裁政权——不过他在 7 月份就被暗杀，由舒施尼格取代；舒施尼格企图与墨索里尼达成一项协议，希望借此保护奥地利免遭希特勒的侵略。在远东，日本在傀儡

国家满洲国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并进一步在4月份宣布控制外国干涉中国的《九国公约》无效。5月份,保加利亚风云突变,建立了独裁统治;6月份,希特勒进行清党大屠杀,杀害了雷姆和奥托·斯特拉塞。3个月以后,兴登堡去世,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统,从此他在德国事务中就可以毫无牵制地为所欲为了。

这时,法国的斯达维斯基丑闻<sup>①</sup>使当时的法国政府垮了台,取而代之的是杜梅格所组成的更反动的内阁。这导致法国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在1934年7月决定成立统一战线,并且导致法国各工会在10月份重新在法国总工会中联合起来。在后一事件发生以前,统一战线已在9月从法国扩大到西班牙,而在西班牙,接着在10月间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总罢工运动——这就是内战的前奏曲。11月罗斯福的民主党在美国国会选举中获胜;12月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莫名其妙地遭到暗杀;在远东,日本废弃了《华盛顿海军条约》。

由此可见,1934年是国外法西斯势力取得进展和远东的威胁越来越大的一年,但也是法国和西班牙反法西斯力量集中的一年。在英国,共产党人和独立工党当然抓住机会力求建立一个类似的统一战线,但遭到了工党的坚决拒绝;工党宣称:唯一真正的统一战线是它自己、职工大会与合作联合会的统一战线,而这三个团体已在全国劳工理事会中联合起来了;工党重申它反对任何独裁制度,并再次坚持这样的信念:“建立有自由的选举制度以及积极有效的议会机构的民主政府,后者在得到合理的讨论和批评的机会以后能作出有效的决策。”这一年工党执行委员会在党的大会上不

---

<sup>①</sup> 斯达维斯基事件——白俄斯达维斯基发行股票投机诈骗,1933年案发自杀,牵连政界人物很多,其中包括议员及执政党派代表,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详情参看本卷第4章。——译注

仅在某些专门问题上附带提出一些政策报告,还提出了一个名为 73  
《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新的总政策声明草案,旨在取代原先的  
《社会主义和国家》。对此,社会主义同盟提出不下 75 条修正案,  
反驳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整个政策;由于同盟这样反对全部政策,  
就激发了大会的其他与会者保卫纲领草案的决心,这实际上使社  
会主义同盟绝不可能修改纲领草案中的任何一点。我确信,社  
会主义同盟采取这一方针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它毕竟是由那些想要  
继续留在工党内工作而不愿脱离工党的左翼人士创立的;但是它  
一方面反对执委会的整个政策,同时又不顾执委会的反对而同意  
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这就很肯定会使它在工党内站不住脚;反  
之,如果它的这些建议是独立提出的,而不是形成全面挑战的一部  
分,那么对于它的某些建议的充分同情就可能使它大有成功的希  
望。其实,《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并不是一个倒退的文件,作为阐  
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声明,它倒是比它的前身(《社会主义与国  
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它一开始就定下五条总则,指导工党确  
定自己的目标。这五条中第一条保证工党将通过下列方法寻求和  
平:消灭国际争端的根源;进行国际协商和仲裁;放弃以战争作为  
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做法;进行裁军;通过国际联盟进行合作;  
并且与目前还不是国际联盟成员国的国家合作<sup>①</sup>。第二条规定了  
这样的目标:争取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享有满意的生活水平,无论男  
女都有平等的机会。第三条规定将工业从谋取私人利益的盲目竞  
争状态转变成有计划的国家经济,其宗旨和实践都在于为社会服  
务。第四条所谈的是以民主方式发展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  
事业。最后,第五条论述税收,规定税收应作调整,以便就维持和  
改进国家的工业机构(例如,就投资事宜)以及就社会力量所创造 74

---

① 苏联在 1934 年 9 月加入国际联盟,是在这个声明拟定之后。

的盈余用于为全体人民谋福利问题作出适当规定。

社会主义同盟一开始就责难这些原则，这倒并非因为它不同意这些原则，而是认为这些原则不够明确，不足以成为即将上台的政府的任何具体的义务。其实这些原则本来就没有打算做到这一点，整个声明是从长远目标的角度拟定的，而不是作为当权的政府的纲领。其中的确包含着若干具体的建议，但是却没有明确慎重地说明这些建议究竟有多少将列入工党政府最初任期内的施政纲领。在声明的结尾部分，虽然声明保证最终废除上议院，并答应如若贵族阻碍其纲领的实施，就立即着手废除上议院；虽然声明还宣布下议院的议事程序迫切需要改革——这个改革也曾在提交给1934年工党大会的特别报告中谈到，它还是明确地拥护议会和合乎宪法的道路。社会主义同盟所反对的是：第一，声明缺乏明确的当前纲领；第二，声明竟毫不含糊地保证，不论工党的反对者可能采用什么行动来阻挠其议案通过，都靠采取合乎宪法的方式应付。社会主义同盟所要求的是无可争辩地承担义务，“5年之内在向社会主义的英国前进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其中包括决定性地改变“生产和分配的全部基础，使生产力可以按照计划经济用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斯塔福德·克里浦斯爵士据此方针提出了声明的修正案。多尔顿代表执委会要求收回修正案，并答应发表一个体现工党当前纲领的较短的声明，但社会主义同盟拒绝收回。赫伯特·莫里逊攻击了他认为是该修正案骨子里的共产主义动机，结果在决议中，同盟的修正案以十多票对一票之比遭到否决。尽管如此，该同盟仍然坚持其主张，后来在其他若干修正案方面也遭到了类似的失败。最后，《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在工党大会上几乎毫无改动地被通过。与此同时，通过了一个论《战争与和平》的专门声明，这是在全国劳工理事会主持下提出的。该声明建议通过国际

75 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此外还主张民用航

空国际化,并主张促使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与美国取得协议,一步一步地前进。该声明提倡个人可以反对为任何违反国际联盟原则而进行的战争服役,但却认为在目前德国和意大利劳工运动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举行总罢工来反对战争是不恰当的。声明仅保证奉行一项已经被认可的政策,即面临战争危机时,召开职工大会特别会议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这一声明也遭到了社会主义同盟的责难,因为该同盟认为国际联盟与凡尔赛和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认为除了维持现状以外,国际联盟没有能力有任何作为。同盟的修正案要求与苏联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并号召各地工人竭尽所能——包括举行总罢工——抵制战争。在这一争端上,社会主义同盟的修正案也被否决;但是,左派集团与非战主义集团总共投了 673,000 张票反对这个声明,而赞成者的票数为 1,519,000 张。

在这些事件上,社会主义同盟代表着对 1931 年那次惨败的强烈的反应浪潮,这股浪潮虽不足以使该同盟随同独立工党一起退出工党,却已经强大到足以使它坚决地反对工党领导的宪政主义和亲国联态度。这种情绪在 1932 年的莱斯特大会上已经很普遍,以致使它能够矿工和铁路员工的支持下使大会通过一项要求合股银行国有化的决议。但到了 1934 年时,这种左倾的反应浪潮大部分已经消退,工党的领导权甚至更稳固地掌握在在前工党政府中位居要津的人手里,他们在和麦克唐纳最后决裂以前,一直参与工党政府的妥协政策。尽管这些老领袖们(其中包括莫里逊和多尔顿)大部分已不在下议院,事实仍然是如此。因为他们不在下议院,倒更能集中精力复兴工党,并为工党拟出一个比 1929 年或 1931 年时的纲领更加深思熟虑的纲领,从而给予工党以鼓舞。按照莫里逊、多尔顿和佩锡克—劳伦斯这批党的忠诚之士看来,从 1931 年的失败所取得的教训并不是工党应该放弃渐进的宪政主 76



义政策,而是应该更好地准备一个切实可行的纲领,以便让下届工党政府执行。他们争取在议会中获得明显的多数,他们认为原先大部分困难就是因为他们1929至1931年缺少这种多数而造成的;他们没有料到各资产阶级政党为了阻挠他们会抛弃立宪制度,或者相信他们会获得多数,如果他们对议会制度提出挑战的话。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同盟认为,工党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其对手迅速地采取了各种手段来击败它;该同盟确信,如果工党竞选获胜,这一策略会重新出现;它相信,直截了当地向敌人挑战会比妥协的态度获得比较强有力的支持。这样,左派与右派之间的观点便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工会的团体代表票在1932年以后都投向右翼,而反对左翼的半革命性的提议。

在1934年的工党大会以后不久,工党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萧条地区的专门报告,号召消除萧条地区仍存在着的广大失业者未得到改善的情况,尽管经济状况已普遍好转。当时政府发表了《特别地区法案》,规定建立援助这些地区的委员会,但是授与的权力却很有限,工党议会党团力图予以扩大,但毫无结果。全国失业救济委员会在12月发布条例草案,引起普遍抗议,从而使各地失业委员会在得到劳工理事会和工会分会广泛支持的新的进军中联合起来。英国职工大会通过全国劳工理事会参加了抗议行列,但它拒绝承认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和独立工党还曾一再要求加入工党,也遭到工党拒绝。共产党在1935年2月通过了自己的政策,并用一个挑战性的名称《争取苏维埃的英国》加以发表。劳埃德·乔治也再次在“创建繁荣”的口号下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拟定前并没有与自由党的其他集团商议。他主张成立一个由小的核心内阁领导的最高经济委员会,来执行一个发展主要工业的庞大的计划,这种工业主要仍属私人所有,但在有必要时能得到国家的财政援助。他表示愿意与内阁合作,以实施这一

计划,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相反,1935年6月,保守党终于抛弃了拉姆齐·麦克唐纳,将政府改组成了以斯坦莱·鲍德温为首的清一色的保守党政府。

在英国,不仅是国内的事情,国际政治的争论也使社会主义者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工党主张奉行在国际联盟领导下建立集体安全的全面政策,但是这项政策并没有明确地指明对于重整军备问题应持何种态度。直到1934至1935年英国进行和平民意投票运动时,尽管国际裁减军备会议表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凡尔赛和约中的裁减军备条款受到纳粹党人的明目张胆的嘲弄,工党一直是从裁减军备的角度出发谈论问题的。然而,1935年世界注意的中心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正在公开对阿比西尼亚发动战争。1935年6月,在斯特雷扎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要求谴责德国重新征兵,却没有提到阿比西尼亚问题,虽然赖伐尔<sup>①</sup>已经在五个月以前与墨索里尼签订了一项协定<sup>②</sup>。英国职工大会保证支持限制意大利政府的措施;但是墨索里尼丝毫没有因为国际联盟要制裁而有所顾忌,而是依靠轰炸侵入了阿比西尼亚。面临这种情况,1935年10月国际联盟确实采取了所谓经济制裁,但是只是三心二意地敷衍了事,并没有制止别国将石油运给意大利军队用于侵略。

1935年11月英国举行大选,鲍德温由于深受上述和平民意投票的影响,在大选中竭力装扮成国际联盟集体安全政策的捍卫

---

① 皮埃尔·赖伐尔(1883—1945年),1931—1932年任法国总理,1934—1935年任外交部长,1935—1936年再次出任总理。在希特勒侵占法国期间,他与贝当共同组织“维希”政府,二战胜利后,因叛国罪被处死。——译注

② 即法国与意大利的《罗马协定》,1935年1月签订。其中除了一个宣言、两个协议书和一个条约以外,赖伐尔还与墨索里尼签订了关于阿比西尼亚的密约,对意大利进犯阿比西尼亚起了鼓舞作用。——译注

者,从而使保守党重新获得了多数议席。工党当然增加了若干议  
78 席,达到 154 名,是 1931 年只有 46 席的两倍,但是比 1929 年仍少  
134 席。在新议会中,全国工会组织赞助的候选人仍居于多数,但  
是 1931 年落选的领袖中大部分又获得了议席。麦克唐纳在西哈  
姆选区被辛威尔击败,在 1935 年晚些时候再次当选为代表苏格兰  
各大学的议员,但是第二年他便去世了。在 1931 年退出内阁的人  
士中,只有托马斯一人继续任职,直到 1936 年他因泄漏预算丑闻  
而辞职时为止。独立自由党这时不在政府内,它力图争取 161 席,  
但只获得 21 席,而国民自由党在保守党的支持下获得 33 席。这  
样一来,保守党仍然稳占多数;在大选过去以后,保守党人提出了  
他们在选举前不敢向选民提出的重整军备纲领。在此之前虽然反  
对法西斯、却一直投票反对增加军备开支的工党这时不得不拿定  
主意,决定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纲领:它不能再像以往那样  
持骑墙态度,一方面把它对军备的支持控制在各国潜在军力的总  
和足以抵御侵略这个限度内,另一方面又拒绝考虑英国可能需要  
单方面采取行动的问题。然而要做出这个决定不是容易的事,因  
为人们怀疑政府扩大兵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国际联盟能起较为  
有效的作用,而是想以此为基础与侵略者达成协议,从而使侵略者  
能够放开手脚把他们的军队转向苏联。

当墨索里尼置国际联盟于不顾而大肆侵略阿比西尼亚时,希  
特勒一方面推行他的保卫西欧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的运动,  
同时继续向西方保证:他并无意威胁西方的安全,而是忠诚地愿与  
西方和平相处。这时,在 1935 年的工党大会上,兰斯伯里在其非  
战主义受到了欧内斯特·贝文大肆攻击之后,被赶出了领导阶层;  
艾德礼接替他担任了工党领袖。兰斯伯里实际上颇受左翼爱戴;  
但是他的非战主义一方面使左翼中的反法西斯人士众叛亲离,同  
时又没有能使他与右翼反对者取得和解,他已经不再能起应有的

领导作用了。1935年12月的臭名远扬的《霍尔<sup>①</sup>—赖伐尔协议》，主张让意大利占有大部分它所侵占的土地，致使群情愤慨，终于不79  
得不宣告作废；但是英国外交政策所蒙受的耻辱却无法洗刷了。1936年3月希特勒进军莱茵兰，撕毁了《洛迦诺公约》，触发了新的欧洲危机；6月，佛朗哥将军在北非发起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西班牙共和政府是否有权向外国购买军火和接受外援的问题；而法西斯国家则立即开始大规模支援叛军。西欧盟国试图以《不干涉公约》作为对策，而法西斯国家虽然参加了公约，却全然无意遵守。在法国执政的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由于面临着国内强大的非战主义情绪以及主张与德国妥协的强大势力，不愿意在得不到英国全力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而英国政府则对西班牙共和派持敌视态度。于是，法西斯国家就公然蔑视《不干涉公约》，而苏联又鞭长莫及，只能给予共和派极其有限的支援；尽管如此，西班牙共和派却越来越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

这就是1936年10月工党大会在爱丁堡召开时所不得不面对的局势。工党执委会在大会的最初几天内通过了一个决议，支持不干涉政策，但是坚持各方必须一致恪守这一政策；但是西班牙的兄弟代表团在会上就法西斯分子违犯《不干涉公约》的行径作了轰动一时的揭露，以致工党大会又改变了初衷，派遣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向政府提出抗议；他们回来以后，又通过了一个对西班牙共和派有利得多的新决议。早在5月间，全国劳工理事会就发布了一个宣言《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宣言声称：“工党决定准备承担其政策的后果”，“国联系统支持的运动不能在危急存亡的时刻抛弃这个系统。”该宣言仍强调国联的活动，并表示反对单方面重整军备；

---

<sup>①</sup> 塞缪尔·霍尔爵士(Samuel John Gurney Hoare, 1880—1959年)，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见本卷第4章：法国。——译注

但是，它显然已从无条件反对重整军备政策，转而有条件地支持这个政策，至于决定在什么时候投票赞成或反对政府的实际建议，仍然有待工党议会党团去做这项工作。工党实际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地步，一方面它已决定组织力量反对法西斯分子，另一方面又担心落在保守党政府手里的军备将不是被用来维护集体安全，反而被用来反对集体安全。

克利浦斯和社会主义同盟以及独立工党在这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中采取了明确的路线：只要保守党继续执政，就拒绝支持重整军备；可是工党的多数派虽然不相信政府，却已逐步转向赞成加强军备的政策。爱丁堡大会以超过二比一的多数通过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决议，但是实际的决定是由工党议会党团作出的。这时候，在西班牙内战所引起的问题上，工党领导的态度始终是暧昧的，实际上仅仅是想使《不干涉公约》起作用而已。法国方面派遣以让·龙格为首的一个代表团在1936年11月来到伦敦，询问英国是否将支持法国撕毁《不干涉公约》，以便援助西班牙共和派；但是，由于进行干涉就有引起战争的危险，该代表团所得到的只是一个含糊其词的回答。至于苏联，则除非它有把握得到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也不准备进行全面干涉。因此西班牙内战就拖延下去，法西斯方面的干涉越来越多，对共和派则越来越不利；可是马德里坚持抵抗，直到1939年年初战斗才告结束；接着，叛军大肆报复，并全面镇压西班牙工人运动，此后，西班牙工人就只能流亡国外——主要在墨西哥和法国。

1937年7月，全国劳工理事会发表了一个新的题为《国际政策和国防》的宣言，人们开始认为这是向重整军备的政策（即使是保守党政府的重整军备）做了明确的让步。该宣言承认国际联盟“暂时已经不起作用”，并且一方面主张恢复国际联盟的作用并在原则上主张集体安全，同时又坚决认为工党政府如果在目前的世

界局势下重新执政,就应该不但能够保卫本国,而且能在集体安全方面起应有的作用,并能应付法西斯国家的任何威胁;该宣言还坚决认为在该工党政府能改善世界局势以前,不能放弃重整军备的<sup>81</sup>政策。这项政策虽然受到当时平步青云的左派领导人物安奈林·比万的猛烈抨击,却在伯恩默思工党大会上几乎以十比一的压倒多数票通过。在此以前,日本已在华北和上海发动全面进攻;工党大会也通过决议,号召与美国联合采取行动,用财政和经济压力制止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全国劳工理事会号召抵制日货;但是,国际联盟虽于1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商讨这个问题,并没有达成有效的决议。实际上,当会议正在进行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重新试图取得西方对它们的对付苏联的计划的计划的支持。1937年就在这样一种气氛下结束,慕尼黑年代开始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开始的时候,甚至工党内部都有不少人看到了在对苏台德的领土要求上的某些势力,并且希望捷克人能够抵抗这些势力而不要绝对放弃。但是,夏季的协商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相信:希特勒不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抗拒他可能提出的任何进一步的要求的力量,是不会甘休的;还在慕尼黑讨论之前,舆论就几乎一致地转向了不惜任何代价支持捷克人。曾数度企图建立英法两国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战线;但是法国方面由于内部四分五裂并且意识到自己力量薄弱,因而裹足不前。由于日期变更的技术性理由,1938年没有举行工党大会;但是全国劳工理事会在9月份拟定和提交给职工大会一个题为《劳工和国际局势:战争边缘》的声明,其中宣称纳粹党人提出的要求是任何政府都无权建议捷克人接受的,并且说:“已经到了应当积极而明确地率先行动以进行集体防御来抵制侵略并保卫和平的时候了。”声明又说,“英国政府必须毫无疑问地提醒德国政府,他们将与法国

82 和苏联政府联合起来抵抗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进攻。”拟定这一声明时，当然还远没有临到危机的后期阶段，其涵义可以解释为：英国的决定要看法国和苏联是否参与其事而定。当时与苏联方面事先并没有进行磋商，也不打算采取协同一致的军事计划；但是显而易见，苏联政府由于认为本身的力量还不足以单独进行干涉，正在等候英国和法国作出决定，如果英法也进行干涉，它随时准备干涉。

早在慕尼黑事件之前，英国工党的言论中模棱两可的词句就已绝迹；而且已经表明，英国工党绝大多数主张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一小部分十足的非战主义者仍然反对。但是在取得这种几乎全体一致的意见以前，工党内部曾经发生多次剧烈的争论——争论得特别热烈的问题是：工党究竟应该继续独立行动，准备投入一次它可以独立取得明显多数的大选，还是应该寻求盟友立即组织反法西斯进军；如果走后一条道路，可以是在工人阶级运动的范围内，接受共产党、独立工党和社会主义同盟提出的组成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建议，也可以超出这个范围，号召一切反法西斯人士进行合作，主要以在法国和西班牙建立的人民阵线为楷模，组成某种人民阵线。对于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这两种运动，工党执委会在工党大会的支持下，表示绝对反对，它敦促所有善良的男女团结在它的周围，把它当作二者择一的政策唯一可行的代表；工党执委会还对不论是哪种统一战线还是人民阵线能否比独立坚持一贯政策的工党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或者哪怕是获得同样多的选民支持，表示怀疑。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主要在国内政策问题上责难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同盟在历届工党大会上遭到了惨败；但从1936年起，尤其是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后，争论主要限于国际问题领域。1936年5月出版商维克托·戈兰茨在哈罗德·拉斯基和约翰·斯特拉契的

协助下,成立了左派读书俱乐部,该俱乐部通过它的地方分支机构以及定期发行主要论述国际问题的对左派有感染力的书籍,不久<sup>83</sup>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对劳工运动的青年成员和知识分子。

在左派读书俱乐部的两位理论家中,较年轻的约翰·斯特拉契(1901年生)最初以提倡货币改革而崭露头角;他曾以工党议员身份支持奥斯华德·摩斯莱;在摩斯莱的新党刚成立时他就加入了,只不过几乎立即就退了党。1931年他失去议席之后,他的政治态度越来越左倾。他的言论和著作对于青年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他的《正在来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1932年)一书集中论述了阶级和权力问题,使他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有力的热心倡导者之一。

然而从社会主义思想的观点来看,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发起人中极其主要的人物是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年),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理论教授,而且从1937年起经工党地方党部推选为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执委会中通常总是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的领袖。尽管他愿意与共产党人合作,他却不是共产党人;工党执委会甚至相当巧妙地时常在工党大会上把他抬出来作为它的发言人,反对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议案,他以此身份发表了非常动人的演说。自从他的第一部著作——一部关于政治理论的学术论文集《主权问题》(1917年)——问世以后,他就以作家著称于世,无论在美国和在英国都享有盛誉,曾在哈佛、耶鲁和其他美国大学任教若干年,可是有一次他公开支持罢工工人,因而碰到了严重的麻烦。他还积极参加过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是兰斯伯里的《每日先驱报》的社论撰稿人。二十年代他在费边社中特别活跃,1926年,他继承了伦敦经济学院格雷厄姆·华莱士的教授职位。他在开始的时候总的说来是一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当了教授以后就越来越左倾,而且在工党中越来越活跃。他担<sup>84</sup>



任教师和主持讲座时，曾费尽心血培养自己的学生，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这些学生中有许多来自国外——有的来自英国的属地，有的来自外国，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在经济萧条的年代中尤其如此。1925年，他出版了一部名著《政治学入门》，1927年出版了家庭大学丛书版的《共产主义》，这本书标志着他以左翼思想家的身份的出现。此后，他论述当代的书籍中宣传的成分越来越多，受卡尔·马克思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这些著作中始终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的倾向，这一点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没有牵连。他还部分地根据个人的经验和部分地根据他与许多美国朋友和学生的接触，以批评的、记述的笔调写了许多关于美国的事情。作为左派读书俱乐部的首要人物，他在争取建立统一战线或人民阵线的运动中自然而然地要发挥显著的作用；但是，尽管他在这些运动中是共产党人的同盟者，他仍然严厉地批评共产党的策略；在他最亲近的同事克利浦斯和安奈林·比万被开除出工党的时候，他仍然保持他在工党和工党执委会中的地位。

三十年代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成就，有许多是由于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人给予热诚支持而取得的，他们不仅为它的许多出版物提供材料，而且热心组成团体来传播它的书籍和月刊。但是，它的创办人维克托·戈兰茨正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不能容忍《苏德条约》；尽管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曾使共产党人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再次联合，因而使左派读书俱乐部一度重整旗鼓，但是在共产党不再予以支持的时候，俱乐部就逐渐衰落了。

大约就在创立俱乐部的同时，曾经长时期是激进派刊物，但已经转归合作运动所有的星期日刊物《雷诺新闻》大事进行宣传，主张为了反法西斯的事业而发起一次反对政府的人民运动。在此期间，工党执委会主要从事反对青年劳工联盟的运动，该联盟是一个

85 半独立的团体，它声称有权批评党的领导；此外，工党执委会还精

心制订了一个当前纲领来补充原先的纲领《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在当前纲领中，工党执委会更加确切地说明下届工党政府在第一任内在议会多数的支持下应当着手做些什么。《工党的当前纲领》实际上于1937年5月发表，而于10月份经工党大会批准。其中没有怎么谈到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要工党保证使英格兰银行（但并非合股银行）国有化，还要使煤炭工业，主要运输业（不包括航运业）以及煤气和电力供应事业国有化。此外，纲领还提出了下列措施：简化用于公用目的的征购土地手续，但并非实行普遍的土地国有化；改组英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争取全体受雇工人享有照发工资的假日；争取实行带有若干例外的四十小时的标准工作周以及提高工资等。——这些措施应会同各工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来争取实现。《工党的当前纲领》还提出诺言，要改善社会保险措施，其中包括养老金、改善保健事业和取消收入调查。关于外交问题，它只重申了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政策，其中包括空军的国际化；此外纲领还保证维持足够的军队，“以便保卫我们的国家，并履行我国作为英联邦和国际联盟成员的义务”，而且保证成立国防部。这是一个颇有内容的纲领，与工党政府日后在1945年所实行的政策相去不远。但是，纲领是为大选拟定的，可是大选并没有举行；纲领没有指出工党在野时应如何应付当前的问题。

在《工党的当前纲领》发表以前，共产党、独立工党和社会主义同盟在1937年1月发表了《团结宣言》，在宣言上签字的人之中主要有：克列浦斯和拉斯基；混合机器工人联合会的杰克·唐纳尔；矿工联合会的阿瑟·霍尔纳；马克斯顿、约维特、波立特和汤姆·曼恩。这个宣言与工党的一些决定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的斗争性语气以及它强调必须反对侵略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并且坚<sup>86</sup>持不必等待大选而立刻发动斗争，尤其是在国内战线上，并且与法国和苏联缔结一个明确的保卫和平公约。工党执委会对《团结宣

言》马上作出了反应，将社会主义同盟开除出党，并且宣布社会主义同盟的盟员身份是与工党的党员身份不相容的。这些决定使社会主义同盟面临着严重的选择；因为同盟的盟员中有许多人很不愿意被开除出工党。该盟为应付这个局面而采取的对策是宣告解散，这样就使其成员仍然以个人身份留在工党内，除非他们个人被开除。但是，工党执委会在5月份又发表一个宣言，号召工党党员不要与共产党或独立工党采取任何共同行动，而要集中力量于工党自己的提议，即刚刚发布的《工党的当前纲领》上。

社会主义同盟宣告解散后，团结运动中就只剩下共产党和独立工党，此外还有若干社会主义同盟盟员继续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事。这些盟员还成立了“工党党员同情团结运动委员会”，与团结运动并存。但是该委员会也立即遭到了工党执委会取缔，各附属团体提交工党年会的赞成团结运动的一切提议也遭到该执委会拒绝，藉口是这个问题已经作过处理，根据议事规程，在最近3年内不得再加讨论。这样一来，旧盟员非难执委会的决定的唯一途径就只有追查它的报告；工党大会在10月份召开的时候，克列浦斯代表前盟员正式提出这件事，坚决认为执委会对工党党员同情团结运动委员会的禁令是完全违反党章的。他得到拉斯基的赞同，但是克莱恩斯和赫伯特·莫里逊答复他说：工党执委会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宽大为怀，根本无意于运用集体纪律来强制实行统一，但是如果叛党分子坚持，它将不得不这样做。莫里逊又劝说那些肆意妄为的反党分子“放弃”他们的做法，留在党内做“好同志”。接着，  
87 首先直接对开除社会主义同盟出党的问题，然后又对统一战线问题进行投票；在这两件事情上，追查执委会的报告一案都以相差悬殊的票被否决，只有30万至40万张票的少数赞成。但是1937年的工党大会确实修改了党章，一方面，执委会中又给了工党各地方党部两个委员名额；同时又规定，此后各地方党部应自行选举执委

会委员,而不由工党大会统一选举。第一个修改是以相当微弱的多数通过的——比数为 1,408,000 票对 1,134,000 票;第二个修改则几乎以三比一的多数通过。此后各届大会的日期也从 10 月移到圣灵降临周,以免紧挨着英国职工大会的年会。这就是 1938 年在慕尼黑投降事件发生时还没有举行工党大会的原因。

这些事件使统一战线寿终正寝,不过宣传仍旧继续进行。到 1937—1938 年间,它就大部分被人民阵线所取代,人民阵线旨在促进反法西斯人士大团结,其中包括自由党中的反法西斯人士,说不定甚至还包括保守党中的少数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得到《雷诺新闻》及其编辑 S. R. 埃里奥特的大力支持——其形式是组成和平统一同盟——的运动得到了合作党的赞同,可是不料在 1938 年 6 月又被决定该党事务的最后权力机关合作党大会所否决。人民阵线运动从来没有能够在全国规模上组织起来,但是它具有若干地方性运动的形式,并于 1938 年 11 月终于使左翼自由党人维农·巴特勒特在与一位保守党人争取一个保守党议席的剧烈竞争中当选为布里奇沃特的议员,以“独立进步派”的身份取得议席。在张伯伦执政时,提倡统一战线的人仍然反对重整军备,而人民阵线派则表示赞成,他们坚持说左翼政府要有充分的武装,否则就束手无策,无法抵制独裁者。

巴特勒特在布里奇沃特获胜以及人民阵线提出其他候选人,都是慕尼黑危机以后的事;一直担任工党执委会委员的克利浦斯,这时企图担任它的领导,这主要是对慕尼黑危机而作出的反应。他将一份主张容纳各反对派的人民阵线的备忘录散发给各执委, 88 并要求召开执委会会议来考虑他的建议。会议召开了,他的建议以 17 票对 3 票被否决;但是克利浦斯不承认失败,他接着就在一个全国请愿委员会主持下广泛散发他的备忘录。工党执委会要求他公开收回备忘录,并要求他重申对工党党章的忠诚。克利浦斯

拒绝了，执委会就此将他开除出党；当运动不顾工党执委会的取缔继续进行时，执委会进一步开除了若干人，其中有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和安奈林·比万。克利浦斯宣布他准备向工党大会就他被开除的事件提出申诉，但是他得到的答复是，既然他已不再是党员，就没有资格让大会听取他的申诉。这事使得舆论大哗，执委会不得不收回成命，同意让代表们决定究竟是否听取他申诉。当大会在圣灵降临周举行时，大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听取克利浦斯发言；但是他发表了一篇条文主义的言论，力辩他有权做他所做的事，而没有强调他在政策方面的真正分歧，因而失去了许多人的同情；追查执委会报告的企图以五比一的票数被否决，赞成克利浦斯的票数只有40万张多一点。

这实际上是人民阵线运动的终结。这时，西班牙内战已随马德里于1939年3月陷落而告终，德国人已开进布拉格，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意大利人则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尼维尔·张伯伦在3月份已改变了调子，向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提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保证——之所以异乎寻常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在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之后，英国已无法支援它们，而且这个保证是在事先未曾与苏联磋商的情况下提出的。莫斯科方面的谈判的确是整个5月份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这时苏联显然已放弃与两方达成圆满协议的一切希望。曾力图加强国际联盟体系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被解除了职务；斯大林开始转而注意与纳粹订立条约的意见，这项条约一方面可以维护苏联而同时又让希特勒腾出手来对付西方，另一方面又可以让纳粹党人与苏联瓜分波兰。

《苏德条约》一经订立，立即使西方的共产党人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几年来，他们一直鼓吹反法西斯事业，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积极抵抗法西斯主义运动。这时突然又不得不要么自食其言，要么被开除出共产主义的队伍。当时只有极少数人选择第二

条道路,大部分领袖都死心塌地地表态认为苏联在一切问题上无不是正确的,因而都宁愿走第一条道路。在英国,哈里·波立特先是发表了一本号召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小册子,但是当他不承认苏联是正确的并被撤销了共产党书记的职务以后,他又向党纪屈服,收回了他的话。不过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脱了党,在共产党同路人知识分子中间离开的就更多了,他们大部分人最初是反法西斯人士,后来又深深同情共产主义。如果人们不是很快看出“西方民主国家”故意手下留情,不使出全部力量来击败希特勒,那么脱离共产党的人就会远远不止此数。1939—1940年是“声东击西的战争”时期,直到法国被击败而英国只好在实际上不得不孤军作战或是承认失败这两者之间作一选择时,这一时期才告结束,而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承认失败是势所难免的。

英国人民选择了战斗。张伯伦虽然依旧获得保守党内多数的支持,仍被赶下了台。温斯顿·丘吉尔取代他担任了联合内阁的首脑;工党在联合内阁中主要负责“国内战线”,并且通过欧内斯特·贝文担任劳工和国民兵役大臣,同时还负责全国人力动员工作。丘吉尔确实使用过他的否决权,不准提出争论性的政治和劳资关系问题,他甚至抵制了工党争取取消或是至少修改1927年的《工会法》的提议,这项《工会法》是保守党在大罢工以后所通过的一项报复性措施。但是这并没有使工党和保守党的联盟陷于混乱或严重动摇。在战争期间,丘吉尔亲自处理国际事务并掌握对国际事务的最后决定权,而将大部分国内事务交给工党的大臣们处理,这<sup>90</sup>些工党大臣对于权力的划分并没有什么不满。他们至少懂得,他们可以信赖丘吉尔是不会向希特勒让步的;他们与他们的大部分追随者一样,最关心的正是这件事。

在战争期间,工党在选举中对保守党并不形成威胁;但是从1941年起,工党就积极刷新它的纲领。这个过程最初以1942年

发表的一篇总政策声明《旧世界和新社会》开始,并在拉斯基在那一年工党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中得到一致的赞同。就像以往从《劳工和新社会制度》起直到《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为止的历次声明一样,这一声明的宗旨并非作为竞选纲领,它没有明确指出如果工党当选执政,工党政府将着手做哪些事情。这篇声明倒可以说是关于长远目标的一般声明,措词很有力,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色彩。它一开始就主张必须彻底战胜法西斯独裁者,并主张战败国的人民不得不尊重和接受的世界反侵略力量也必须改造。声明还追溯了绥靖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的根源在于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并要求“为社会消费进行有计划的生产”,认为这是自由的根本条件。声明号召在战后过渡时期继续维持战时的管制,主张在公有制和公共管理之下实行有组织的市场交易和充分就业。它的四个主要重点是:(一)充分就业;(二)重建英国,使它达到无愧于它的公民的标准;(三)大大增加社会服务事业;(四)为民主社会进行教育。关于这些问题,它主要只谈一些通则,认为已在较早的关于具体问题的政策声明中论述过的细节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它比以往任何一般性声明用了更多篇幅来论述国际事务,指出英国在战后欧洲将起民主领导作用。关于印度问题,声明的措词多少有些模棱两可,主张给印度自治,但是并没有主张给予印度独立;关于其他殖民地,也没有直截了当地承诺给予独立,虽然它谴责了一切形式的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可是仍宣称托管制度是殖民地政府的基础。最后,声明强调在战争结束以前必须既和美国又和苏联达成明确的谅解,显然并不了解这样一种双边谅解究竟有多少困难。总的说来,尽管它有严重的缺点和遗漏,还不失为一个直截了当的,甚至是激动人心的文件。

在此后几年,工党复兴委员会所拟订的为数众多的特别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遗漏。这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前文已经

提到的新费边研究局和重建的费边社在战争爆发前许久就已开始的坚定不移的工作。工党和费边社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保证工党复兴委员会及其附属委员会的委员们得以阅读费边社所出版的报告和小册子,而且还保证有活跃的费边社社员在这些委员之中担任委员,发扬费边社提供咨询、批评和拟订方案的传统作用。截至1944年为止,复兴委员会提出了大约14份报告,每一份报告都颇为详尽地论述一项专门的政策,这些报告加上战前所拟定和通过的类似报告,至少在国内问题上对于将上台的工党政府建立了十分充分的基础。其中对国际问题的论述远不如国内问题全面,而且根本没有全面地涉及对外贸易,虽然在这个领域内显然一定会出现十分不易处理的问题。然而当执行委员会拟定较短期的当前行动纲领时,其中却有十分充分的材料可供选择。这个纲领发表于1945年初,题为《让我们面向未来》,它实际上成了那一年的工党竞选宣言。《让我们面向未来》的开始和结尾部分虽然有几段文字对国际形势展望作了相当一般性的讨论,但主要论述的是国内问题。这个纲领说:“全国需要粮食、工作和住宅”;接着就说明工党将如何着手提供这一切。纲领承诺说,工党政府将“通过优厚的工资、社会服务和保险事业以及降低对收入微薄阶层的税收”等办法来保证充分就业和提高生产。工党政府将控制房租和物价,并控制工业的分布,还将通过全国投资委员会来规划投资。工党政府将消灭萧条地区。使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并使其他银行的业务<sup>92</sup>与公共需要相“协调”。工党政府将使燃料和动力工业、内地交通事业以及钢铁生产社会化,还将禁止目前限制贸易的做法,并将使垄断企业置于公共控制下。在整个生产领域内,工党政府将先考虑一般住房,然后考虑高楼大厦,先考虑必需品,然后考虑奢侈品;还将制定农业计划,生产高级的优质粮食产品,并将保持战争期间所发展的新兴服务事业,其中包括设立公共餐厅和食堂并为母亲



和儿童供应廉价牛奶等。工党政府将防止通货膨胀影响食品价格的稳定,还将设置住房建筑和规划部——这是列入工党纲领中而工党政府未曾实施的少数几个项目之一——,提供人人都能享受的国民保健服务事业,并制定全面的社会保险法。工党政府将制定法律规定“更广泛和迅速地征购公用土地的权力,而业主则可得到公平的补偿,但须扣除‘土地改良’的费用”。它还将充分实施已经制定的《巴特勒教育法令》。

这个纲领的确十分直截了当和具体,但是在国际问题上它没有提出明确的诺言,只讲要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国际机构,其基础是英国、苏联和美国继续进行合作,并联合法国、中国以及其他对共同利益做出贡献的国家。纲领没有谈到与其他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也没有谈到战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制度问题。毫无疑问,在这些问题上明确表态是很难的;但是,像纲领以这样轻率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或完全略而不谈,却是不祥之兆。明摆着的事实是:工党渡过战争时期之后,并没有拟出一个明确而深思熟虑的外交政策,因此一旦执政,就会很快体会这种后果。然而,在1945年大选时很少有人理解这一点;关于这一点,《让我们面向未来》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 第四章

### 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法国遭受三十年代经济萧条的冲击要比其他国家晚，主要是因为普恩加费在 1928 年使法郎稳定在很低的汇率上，致使法国的出口货在国际市场上能占很大的便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法国的出口货大部分是奢侈品，因此由于需要减少而受到的影响就特别大；此外，法国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事业，而这一事业也大为削减。尽管如此，法郎的低汇兑率暂时使法国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机会，不过，即使不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法国的财政情况也相当混乱，而且怨声载道。

在 1928 的选举中，普恩加费和所谓中派党派——即较保守的共和派——取得了胜利。普恩加费辞职以后，接连有许多为期短暂的政府上台，有的是激进党政府，但是大部分是中派和右派政府，其执政者有白利安、泰狄欧、史蒂格、萧当和皮埃尔·赖伐尔，当下届选举在 1932 年举行的时候，赖伐尔正担任总理。选举结果是包括激进党人在内的左派获胜，而激进党人则实际上壁垒分明地分为达拉第领导下的左翼以及以卡佑和马尔维为主要人物的右翼。在社会党方面，莱昂·勃鲁姆在选举以前就曾宣布：如果他们在选举后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他们准备执政。但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他们共有 129 名能力强的人选入新的众议院，激进党有 157 名，共产党只有 14 名；共产党当初在“阶级对抗阶级”的口号下决定单独参加竞选，他们在第二轮投票中遭到惨败，而社会党人与激进党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则是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与右

94 派抗衡。但是，这两个党在社会党准备据以参加政府的条件上没有就共同的纲领达成协议；于是激进党就在没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情况下上台执政；只有保罗-彭古尔是例外，此人脱离社会党参加政府担任了陆军部长，不久之后，赫里欧在德国的赔款被洛桑会议一笔勾销后无法说服下院同意继续支付法国所欠美国的战债，因而辞职，于是保罗-彭古尔又担任了总理。

保罗-彭古尔和他的继任人歇隆执政的时间都不长。继承他们出任总理的是达拉第，他曾一再表示愿意延请社会党人参加政府，但是再一次没有与他们达成协议。不过社会党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尤其是在议员中间有实力的少数派认为，必须恢复“左翼联盟”，以便与国内日益高涨的法西斯主义潮流作斗争，并保卫共和国反对它的敌人。在持这种见解的人之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党右翼的老一辈领袖、波尔多市长皮埃尔·雷诺德尔、阿德里安·马尔凯以及计划经济的热心倡导者、奥弗涅人马塞尔·戴阿。不过，这些力主共和国团结一致的人物没有能够说服社会党的大部分成员，尤其是因为达拉第在应付预算赤字的措施中列入了一项削减公务员薪金的建议，而社会党中最有力量的部分之一就是这批人。尽管如此，那些持不同意见者仍然坚持他们的看法，并发表了一个宣言，接着他们就被开除出党。这些人随即另行成立了一个政党——新社会党，在旧社会党的13万党员中带走了大约2万人。

在这一时期，法国的反共和运动在1933年继希特勒在德国的政变之后，在议会外声势骤起，咄咄逼人，至少在巴黎是如此；不过极为明显的是，与其说它是仿效德国法西斯主义不如说它是仿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它的领导集团最重要的有两个组织：受法国保王行动党鼓励并由夏尔·莫拉斯和利奥·都德领导的保王先锋团；以及拉罗克上校领导的、其前身为一个退伍军人团体的“火十字团”。这两个组织以及“爱国青年”之类的其他组织，发动喧嚣的

示威游行和骚扰,据说警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视而不见。由于谢 95  
尔基·亚力山大·斯达维斯基案件被揭发,这无异于火上加油;这个  
骗子早在 1927 年就被人告发,但是在 1933 年 12 月他在贝叶地方  
滥发假证券案发之前,从未受审。斯达维斯基在事发后自杀,据称  
他在高级政界人士中有靠山,其中包括一位激进党部长达利尼埃。  
右派在议会中力主全面调查这一丑闻,当时仍担任总理的萧当拒  
绝了右派的要求。于是群情激愤,萧当因而辞职,由达拉第为首的  
新内阁取代;当时社会党人坚持,要他们支持达拉第政府,就必须  
撤换巴黎市警察厅长让·希阿普作为条件,此人是一位持极右翼观  
点的活跃的科西嘉人,达拉第把他撤换之后就使得骚乱变本加厉  
了。

政府在社会党的支持下,有把握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但是这  
样的多数已不足以保护它反对法西斯主义社团的暴力。1934 年 2  
月 6 日,正当达拉第代表政府向下议院发表正式声明的时候,一大  
批人聚集在河的右岸与下院隔河相望的地方,企图过河夺取下议  
院。当时把他们击退了,但是很不容易,而且破坏很大。然而遭到  
最大破坏的是共和国的威信。达拉第因而辞职,由共和国前总统  
杜美格接替他的位置,担任所谓“国民联盟”政府的首脑。实际上  
右翼又重新执政了。

2 月 6 日的右翼骚扰之后,一系列罢工事件接踵而至,虽然是  
短期的示威性罢工,仍然值得注意,并且很成功。这时候法国工人  
已分裂成两派对立的工会运动——这是指工人组织起来的地方,  
但大部分工人并无组织——:一派是旧的法国总工会,它名义上是  
独立的,但实际上与社会党人联合在一起;另一派是法国统一总工  
会,这是由共产党人管理并从属于共产党的工会。但是 2 月 6 日  
的事件和罢工运动导致了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派系争取重新联合的  
运动,后来终于在 1936 年 1 月获得成功,并且伴随着工会会员的 96

急剧增加,到这年年底时达到了5百万人左右。同时出现了争取社会党与共产党进行政治合作的运动。由于德国新发生的事件,莫斯科终于改变了路线;在1933年一直猛烈抨击社会党支持激进党政府的法国共产党人,这时也追随共产国际的新路线,开始大声疾呼,号召不仅与社会党人,而且与准备投入反法西斯事业的任何人团结起来。有一个最初名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后来称作无产阶级团结党的小党在1923年与共产党人决裂,此后又与其他持有不同政见的派别联合起来,有几年它曾试图使相互对立的各工人阶级政党联合起来,但是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这个第三派的领袖是研究法国社会主义史的历史学家保罗·路易;但是这一派从未十分强大,一向只赢得少数议席,即使在1936年的决定性的选举中也是如此。然而,1934年2月的事件使社会党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倡议,社会党在布洛涅召开的大会上,制定了一个纲领,其中声称它准备参加一个包括共产党和激进党在内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个纲领的内容有:颁布法令解散法西斯主义组织;实行银行和保险事业国有化;实行垄断资本所控制的大工业国有化;每星期标准工作时间减至四十小时;普遍承认集体谈判权;确立政府控制小麦和肉类价格;以及对资本征收累进税等等激进改革。

这时,继斯达维斯基丑闻之后,1934年2月21日又发现了一位参与调查此案的高级司法官员阿尔伯·普伦斯被谋杀的尸体。凶手从没有被查获,但外间纷纷传说,普伦斯是被杀害的,极其重要的文件已从他身边偷走,以免真相泄露,使政界要人受牵连。这件事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确有此事。杜美格为调查斯达维斯基案件的政治背景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揭露了若干舞弊情况,牵涉若干议员和一部分报界人士,但是却对受到控告的高级人士宣告无罪。杜美格本人则提出建议要求削减下议院权

力,以增加总理和政府的权力。他主张议员把提出涉及财政开支的建议的权利交给政府,并主张授权总统:根据总理的建议,无需参议院的同意,可以解散议会。参议院是势力很大的第二院,当时是激进党及其最接近的同盟者占据着稳定的多数席位。

杜美格的建议对于他的“国民联盟”政府中的激进党人来说太过分了,根本无法接受;于是他的政府于1934年11月被迫辞职。取代他的是中派的皮埃尔-艾蒂安·弗兰亭,弗兰亭的使命是使法西斯主义社团就范和保卫法郎,它从英国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以后仍然保持着金本位。后一件事是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因为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逐渐侵袭法国,迫使法国采取日益紧缩通货的政策。世界市场的粮价下跌尤其剧烈;法国人发现,用法律规定小麦的最低价格是一回事,而促使那些农场主切实遵守这一价格规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的谷物并没有按官价卖出。当时农民普遍不满,保守派政客多尔盖尔领导着他们的运动;而在城市里,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在保王先锋团和其他法西斯组织的协助下,不断制造骚乱,这就使已经十分复杂的局面更加复杂化,斯达维斯基事件不久就几乎被忘却了;但是由于大银行,尤其是私人拥有的法兰西银行大权在握,群情愤慨,该银行被看作是“二百家族”的工具,而“二百家族”则被认为控制着法兰西共和国的经济事务,听从它们吩咐的历届政府之所以奉行通货紧缩政策,根源就在于这些家族。与此同时,公众强烈反对法郎进一步贬值, 98 当时的法郎币值是不久前的1928年由普恩加费稳定为战前金价的五分之一。法国人作为一个小储蓄户的民族不愿看到他们的储金又一次贬值。其实,他们所要求的是一些相互矛盾的东西——一方面要求让农场主能卖高价,另一方面要求降低生活费用,同时还要坚持1928年的法郎币值。议员们并不同意准备用提高税收的办法来弥补公共财政的赤字。政府除了依靠借债以外无法使收

支平衡，而借债则使政府必须听从债权人的支配，并使之与法兰西银行发生冲突，而法兰西银行则主张另找补救办法，通过撙节开支和紧缩通货来解决困难。弗兰亭无法应付这一局面，因而辞职；一度曾经是社会党人的皮埃尔·赖伐尔取代了他，赖伐尔这时肯定已经是右翼的同盟者，他向法兰西银行屈服，制定了彻底的通货紧缩政策。

赖伐尔内阁的成立是法西斯暴力行动进一步爆发的信号，多尔盖尔的农民阵线发动了一次反对政府的抗税罢工。左派大声疾呼，要求解散法西斯组织，并指责政府对法西斯组织过于迁让。赖伐尔面临着激进党人可能背离他的局面，而他却必须有激进党人才能在议会中保持多数，于是他答应采取行动对付法西斯组织。当时通过了一个法案，该法案规定准军事组织为非法，并授权政府予以解散，还授权政府把煽动谋杀或暴乱的行为定为应受惩处的罪行。新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火十字团”再也无法施其技，它此后只不过成了右翼的一个拉选票的机构。如果确实存在过法西斯政变的危机，那末这时候也已告终了。但是赖伐尔的政治地位并没有因此就不那么岌岌可危，因为他仍然面对着越来越喧嚣的反对紧缩通货和法兰西银行的吵嚷，而且国际局势也迅速恶化。赖伐尔在这个阶段的主要想法是讨好意大利，从而离间德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因为如果不谈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阴谋，它对于希特勒在奥地利的野心倒是强烈反对的。1934年7月，纳粹党人在奥地利发动政变未遂，不过政变使奥地利的独裁者陶尔斐斯遭到杀害。于是赖伐尔便着手把意大利争取到法国这一边来，这意味着让意大利人在阿比西亚为所欲为。他似乎暂时成功了。赖伐尔在1935年1月访问罗马，与墨索里尼就若干悬而未决定的问题进行协商，其中实际上包括听任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冲突中为所欲为。在这一方面，赖伐尔相信他有把握得到英国的支持；

这是因为他看到国际联盟无法干涉日本侵略满洲，他估计国际联盟对意大利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因为英国曾经反对阿比西尼亚参加国际联盟，并曾于 1925 年与意大利就彼此在阿比西尼亚的势力范围问题进行过谈判。但是在由于国联在满洲问题上的失败而使人们心烦意乱的英国，1935 年是就和平问题进行全民投票和举行大选的年份，工党正力图在大选中挽回 1931 年的败局；而英国政府在安全地渡过大选以前，要抛弃国际联盟的盟约是吃不消的。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表示主张对意大利进行制裁；于是法国似乎就不得不在究竟是与意大利保持亲善的政策，还是继续争取英国支持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但是，英国政府虽然求助于国际联盟来制裁意大利，却满足于并不严重妨碍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温和措施，而且绝没有切断对意大利的石油供应的意图——如果采取了这一措施，本会立刻奏效，并且将意味着：墨索里尼必须撤退和承认失败，要不然就必须与国际联盟各国开战并完全投入德国阵营。这年 12 月英国外交大臣还访问了巴黎，与赖伐尔商谈了霍尔—赖伐尔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意大利可以吞并很大一片阿比西尼亚领土，并取得对该国其余地区的经济权。保守党在英国大选获胜以后，这个计划随即在巴黎公布，以致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霍尔不得不辞职，由艾登接替他担任外交大臣。继续进行温和的制裁，但是这并未能制止墨索里尼无视对他的制裁，去完成他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由于法国和英国专心致志于意大利问题，希特勒得到了机会在 1936 年 3 月进军莱茵兰非武 100 装区，这样就最后撕毁了凡尔赛和约，使法国人眼看着德国军队陈兵法国边境。

希特勒进军莱茵兰的确是走向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步骤。这一举动加上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政策软弱无力，就使得意大利与德国结成了联盟，并且使法国的欧洲联盟结构因此瓦解。希特勒在



重新武装莱茵兰以后，紧接着就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企图离间英法并确保英法两国不与苏联联合。洛加诺公约各国提出了一个对抗性的计划，希特勒拒绝了，并宣称在德国举行公民投票以后他将提出反建议——他及时举行了公民投票，当然获得了压倒多数票的支持。于是他又提出一个经过修订的“和平计划”，大意与第一个计划大致相同，但是更加强调，如果要德国同意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平等的会员，德国期望修订现有的各项条约。英国没有断然拒绝希特勒的计划，但是要求作进一步解释，而法国的答复则是提出了它自己的影响深远的计划。1936年7月，英国政府邀请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到伦敦举行会议，商讨德国的计划；但是英国政府的动议没有收到什么结果，而意大利则越来越深地进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在希特勒于1936年7月与奥地利签订一项协定以后，情况就更是如此；这项协定保证不干涉奥地利的内政，只要奥地利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德意志国家，正如希特勒无意恪守他关于保持和平的任何其他诺言一样，他也无诚意恪守这个协定。

这时候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西欧出现了新危机。1936年7月，佛朗哥将军在西属摩洛哥举起叛旗；西班牙许多地方发生了反对共和政府的军事暴动。西班牙政府想从国外购买军火来补充被叛乱分子夺去的军火，叛军则向法西斯大国求援，法西斯强国毫不迟疑地提供了援助。然而法国和英国则担心西班牙的冲突会引起欧洲大战，因而畏缩不前，并准备与意大利和德国——还与苏联——商订一项所谓《不干涉条约》。根据这项条约，英国和法国停止了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一切援助，而法西斯大国却几乎毫不理会它们的诺言，不顾条约的规定，送去了人员和武器支援佛朗哥。

在此期间，法国由于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组成了人民阵线，并且由于人民阵线在1936年4月至5月的大选中获得了彻底

胜利,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法国的这个新左翼联盟于1935年7月14日成立,其前兆是举行了若干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共产党人遵循莫斯科的新路线,热烈地参加这些运动。接着为了采取统一行动而举行正式协商;1936年1月11日左翼各党派发表了它们的《人民阵线纲领》。这个纲领包括以下各项要求:颁布更加严厉的法律反对法西斯组织,颁布法律强制各家报纸公布它们的财政来源,设立全国失业救济基金,缩短工时而不削减工资,在不提高生活费用的条件下重新估定农产品的价格——中间商应对批发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距负责——,以及改革税收制度以防止富裕阶级逃税。

左翼各党派以这个共同商订的纲领参加了大选。它们这次会获胜,几乎是早已成为定论的事;但是这次左翼各党派的胜利却意味着权力的分配有很大的改变,尽管上次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胜的左翼只能增加大约30个议席。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激进党人失去的席位几乎等于左翼总共增加的席位,另一方面共产党人这时借助于选举盟约,收票比1932年增加了一倍,实际所得议席为72席,而1932年仅有12席。社会党人获得200万张选票和146个席位,也有所增加,但是远不如共产党的增加显著。尽管如此,<sup>102</sup>社会党这时仍然成了最大的政党,因而它的领袖莱昂·勃鲁姆就要组织新政府,共产党人同意支持新政府,不过他们拒绝参加。勃鲁姆组成了由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担任部长的政府,并着手实行他们在竞选时提出的共同纲领,而不是实行激进党人所强烈反对的社会主义。马索·皮韦尔和济罗姆斯基领导的一个社会党少数派在社会党塞纳支部的支持下,反对这些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方案,但是没有人理会他们。

勃鲁姆政府上台时,正像西班牙爆发内战一样,法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罢工作为见面礼,不仅有组织的工人参加了,无组织的工人

也参加了。罢工工人们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占领了工厂,以便阻止雇主利用工贼来破坏罢工;但是他们与1920年意大利的罢工工人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没有试图夺取生产。他们只是稳坐不动,警察要把他们逐出工厂,他们也全然不理睬,直到他们的条件——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和取得全面的集体谈判权利——被正式认可时才罢休。勃鲁姆本人拒绝采取任何行动驱逐工人出厂,因为他懂得群众情绪的力量。他在马提翁大厦他的办公室里召见雇主们,劝导他们签订了马提翁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他们同意增加工资和承认全面谈判权,协议的细节留待每一个工业或企业的专门协议书去斟酌处理。他还进一步制定了关于四十小时工作周和有工薪假日的法律。雇主们慑于罢工和强大的群众情绪的威力,感到无法抗拒。他们屈服了,尽管法国工业的许多设备已经陈旧,成本已经很高,因而很难应付强加于它的新负担。左派获得了著名的胜利,这场胜利在工业上的意义甚至比政治上更大,于是工人们纷纷加入了工会。

马提翁协议和四十小时工作周制,是工人阶级的真正胜利;此外,雇主们还被迫同意增加工资12—15%;而且政府开始实行公共工程政策,以便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这两者在当时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真正胜利。但是后来雇主们恢复了镇静,而且不顾政府禁令物价迅即开始持续上升,一直上升到高昂的生活费用与工资的增长相抵还有余,因此在具体履行协议细节时,立刻就出现了麻烦。此外,政府既然被迫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法郎的现有平价,其财政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当时成立了一个小麦局,授权通过独家收购农民收获的小麦,来稳定小麦的价格,这的确使农民们感到宽慰;但是这件事也需要花钱,因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勃鲁姆政府取消了法兰西银行董事会,将总裁任命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实际上将法兰西银行国有化了;但是这并没有能够使它丝毫摆

脱财政困难。最后在 1936 年,勃鲁姆政府被迫抛弃诺言,在事先获得英国和美国的保证,不依样而效尤,之后规定了一个更低的新汇兑率,从而使法郎贬值;但是勃鲁姆政府没有敢将法郎贬值到使它能长期喘息机会的程度。在人民阵线上台以后不到一年,勃鲁姆就宣布需要“休整”来巩固已取得的成就——实际上是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消失成就;不仅是他的敌人,还有他的支持者也看得很清楚。政府实际上是在全面退却。勃鲁姆在他为了安抚投资阶级而任命为顾问的两位财政专家提出辞呈之后;终于在 1937 年 6 月被迫要求议会授予他的政府以全权。当时法国的大量黄金储备一直在迅速减少,许多黄金已被国内外的投机家们囤积起来。法国参议院本来从一开始就对政府的政策啧有怨言,完全由于群众舆论力量强大才接受了这个政府;这时参议院看到机会来了,就拒绝了勃鲁姆关于授予特别权力的要求。勃鲁姆因而辞职,于是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就在 1937 年 6 月告终,而由激进党人萧当领导的第二届人民阵线政府取代,勃鲁姆同意在这届政府中供职。但是 1936 年的劲头已经不复存在,从萧当这样的人那里已经不能期望获得什么新的进展。

104

在勃鲁姆执政期间,他不顾共产党人的强烈抗议,始终坚持对西班牙执行不干涉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得不跟着英国走,另一方面是因为舍此以外的其他做法有触发欧洲大战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是他几乎不惜任何代价所决心要避免的。他经常得悉,农民不愿意为西班牙战斗,而且全国人民中的大部分人也都不愿意这样做。法国的右翼支持佛朗哥,其中不仅包括法国的法西斯分子,而且包括许多天主教徒,不过绝非全部;至于资产阶级,则大部分毫不关心西班牙的冲突。当时流传着有关西班牙共和派人所犯暴行的荒诞不经的做法——其中也有一些确有其事——,同时也有关于西班牙右翼及其摩尔人雇佣军所犯暴行的谣传;但是最重要

107

的是,法国几乎愿意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和平。非战主义在社会党内很有势力,因为维护和平是社会党的一项传统政策,社会党人还常常抬出饶勒斯的伟大的名字来支持这项政策,而饶勒斯是勃鲁姆极其敬仰的。作为战争的领导人与勃鲁姆的天性格格不入;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有必要进行战争也是与社会党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1937年6月勃鲁姆摆脱总理职位时也许毫不感到遗憾,因为当时已很明显:不仅法西斯强国已不遵守《不干涉协定》,而且希特勒不久就要提出危害和平的新要求。萧当是一个习惯于担任昙花一现而且无所作为的政府首脑的政客,一旦有比较强有力的人物来取代他时马上就下台,而且在执政期间也未必能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他,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他的财政部长乔治·博内所能做出的事情就是再次使法郎贬值,这次让大约130法郎对1英镑的比值上下浮动;接着是把社会党人赶出了他的政府,在1938年年初成立了一个清一色的激进党政府。过了不到3个月,萧当辞职,因此当希特勒进军奥地利和吞并这个国家的时候,正处于政治危机之中的法国根本没有政府。不久,第二届勃鲁姆政府

105 取代了萧当政府;但是这时祸害已经造成了,奥地利已被并入德意志帝国,伦敦方面只不过提出了无效的抗议。在英国,安东尼·艾登因为抗议尼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1938年2月辞去外交大臣一职;哈利法克斯爵士接替了他的位置。情况已经很明显,希特勒已在考虑提出新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多半要成为他属意的第二个牺牲品。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几乎是法国所剩下的唯一盟国,勃鲁姆政府数度提出保证说,法国将履行自己的诺言,在必要时驰援捷克斯洛伐克。但是1938年4月勃鲁姆政府下台,新的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在达拉第的领导下成立。1938年5月,英国和法国向捷克斯洛伐克力陈为和平起见作出大幅度的让

步的必要性。接着,朗西曼<sup>①</sup>代表团在7月间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因而很明显,捷克人已处于可能被它的西方盟国抛弃的严重危险之中。苏联答应,如果英法两国驰援捷克斯洛伐克,它也这样做;但是在这两个西方国家中,“绥靖政策”显然占了上风。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直到1938年9月末,张伯伦和达拉第终于在慕尼黑会议上可耻地将捷克斯洛伐克拱手让给希特勒。这时候虽然法国人民阵线的议会多数仍然完好如故,激进党政府也依然执政,但是人民阵线实际上已经死亡。法国可能争辩说:它唯一可走的道路是追随英国的路线;并且争辩说,最初朗西曼代表团出使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张伯伦又在9月访问贝希特斯加登和戈德斯堡,<sup>②</sup>这两桩事情早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就已确切地表明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就1938年的具体形势来讲,情况的确是这样。问题在于:法国在1935年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鉴于此后几年中苏联又加入了国际联盟,法国当初是否能多做一些努力,与苏联更密切地合作,从而避免这种局势出现。毫无疑问,法国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指出这样一点是不无关系的:在这一期间,苏联在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害以后,正和法国一样经历着巨大的内部危机。《法苏互助条约》在法国无论如何本来就会有許多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由于对苏联军队以及作为未来谈判的对象苏联军队的领导人的可靠性存在怀疑,这些敌人的地位大为加强。李维诺夫在苏联外交部中无疑正在尽力使苏联与国际联盟在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政策中更加紧密地合作;但是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斯大林究竟打算采取什么路线,都是一个问题。共产国际以及在它

---

① 华尔特·朗西曼(Walter Runciman, 1870—1949年),英国政治家,1899年时为自由党议员,历任教育大臣、农业大臣及贸易大臣。1938年7月,他以英国官方顾问和调解人的身份前往布拉格。——译注

② 希特勒常驻办公的地方。——译注

指导下的西方各国共产党无疑都已改变政策。“阶级对抗阶级”的口号已被放弃，取而代之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将任何能够被说服参加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人都吸收进来。尤其是法国共产党，它已转而采取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的政策，它不仅像向社会党人呼吁那样呼吁天主教工会，而且还向中产阶级呼吁。它宣布：中产阶级只要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不仅压榨工人而且压榨他们的“二百家族”，以及反对一切剥削人的垄断资本家和居间人集团，就能依靠与无产阶级的这种联盟拯救自己。实际上，法国共产党在大声疾呼主张组织尽可能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方面，声音比社会党更响亮。因为共产党在与社会党打交道时觉得很难不把“统一战线”解释为在它自己集权控制下的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统一政党和运动——这意味着把社会党完全合并进来——，而在对付非工人阶级的政治同盟者时，共产党并不提出这样的主张，而是随意倡导一种有限度的合作，这种合作将使这种同盟者至少暂时可以任意奉行它们自己的路线。

因此，在这些年里，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一方面彼此猛烈地互相攻击，一方面又断断续续地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大部分是为了彼此矛盾的目的进行的。共产党人要社会党与他们合并，他们相信凭借自己集中的精力和决心，能够对这个统一的政党确立控制权；而社会党人由于抵制整个有关“民主集中制”和一党独裁的概念，而又理解赞成统一行动的舆情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因而赞成能使两党依然独立存在的一种合作形式。当时剧烈争论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把组织统一的问题还是把当前的共同行动问题置于首要地位；这实际上是主张合并的人与提倡暂时结成联盟进行合作的人之间的争论。实际上社会党根本不可能同意并入共产党，或者与共产党统一成为一个容易被共产党渗入的单一的政党，正如在产业领域，由于法国总工会与法国统一总工会合并而发生的情况

一样。但是,为了保证统一的反法西斯行动,必须有所作为;共产党人虽然继续竭力主张彻底统一工人阶级的各种力量,在办不到的时候却愿意甚至比社会党人更进一步,竭力主张建立广泛的人民阵线,向能够被说服参加的人开放。

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别加入的两个敌对的国际<sup>①</sup>之间的对立也促使了人民阵线成立以后继续举行的关于统一问题的谈判的失败。社会党人指责共产党人试图推行共产国际的主张,而共产党人则要求社会党人保证承担义务保卫苏联。社会党人对于共产党人拒绝参加第一届勃鲁姆政府感到恼怒,而一方面保证支持政府,一方面又置身于政府之外的共产党人,便能把政府取得的成就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同时又能任意批评政府的缺点。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与社会党方面参加两党统一谈判的主要代表保罗·富尔之间水火不相容。在第一届勃鲁姆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中,关系有所改善,但是当那届政府陷入困境,而勃鲁姆本人又始则要求“休整”,继而开始打退堂鼓的时候,关系就迅速恶化了。

勃鲁姆政府实际上显然是由于执政以后局势迅速发展而被推得远远地超过了它本身可能要走的路程。那届政府成立以后随即发生的巨大的静坐罢工浪潮,迫使它立即实施了四十小时工作周制,并迫使雇主们签订了马提翁协议,要不然,勃鲁姆政府毫无疑问会宁肯采取较有弹性的工时制度,而且也会把增加工资的幅度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因为当时它一定十分清楚:法国的工业很难承担强加于它的负担,尤其是普遍缩减工时所形成的负担;它也十分清楚,无论是采用新工作周制的问题,还是有关法定集体谈判权利的条款的具体实施问题,都会牵涉很广。另一方面,共产党人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多费脑筋。他们的目的是要立刻强行取

---

① 指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译注



得最大限度的让步；因为他们十分清楚，雇主们只要假以时间，就会恢复镇静，而且会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工人们的要求。发生罢工的责任主要不在共产党，而主要是群众情绪的自发性爆发；但是共产党当时有极好的条件来利用这些罢工，并迫使政府尽可能做出最大的让步。法国实际上十分突然地进入了一种它对之毫无准备的新的劳资关系体制。工会运动在它分裂为两三个相互敌对的运动进行竞争的时期，力量很弱，集体谈判只在一小部分工业中实行。忽然间，集体谈判几乎成了无所不在的事情，从来未曾与工会打过交道的许许多多雇主也不得不破题儿第一遭和它们打交道。当时雇主们不得不权且迁就，并承认四十小时工作周和假日工资照付。可是他们根本不愿意这样做；一旦他们惊魂稍定的时候，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捞回损失。事实上他们的确有苦衷——在没有任何缓冲的时间能让他们适应的情况下他们的生产成本大大增加了，小雇主们对于政府、工会和组成法国生产大联合会的大厂商三者之间协商而强加给他们的负担感到特别气愤，因为事先没有与他们商量。由于罢工的结果，各工会大大扩大了它们的势力，在大部分资金雄厚的企业中建立了工会所控制的企业委员会。但是仍有许多小公司内部没有建立任何组织；在这些公司实行马提翁协议从一开始就成了严重困难的根源。

为了应付罢工而在工资方面所作的让步，有相当大一部分不久就由于政府无法有效地控制物价上涨而打了折扣。工人们于是感到在实际工资方面并不比以往强，甚至更差了，不过他们仍旧享有休息天拿工资和每周工时缩短的好处。最初，他们大批涌到郊外去度假；但是不久，由于物价上涨，有许多人就寻找第二职业来弥补他们的工资的不足，各工会鉴于缺少工作，不得不采取行动来制止这种趋势。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政府企图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计划，以增加就业机会；但是政府的财政十分拮

据,当时黄金不是被输出就是被私人秘密地囤积起来,因而黄金储备正在迅速流失。勃鲁姆的财政部长文森·奥里欧尔曾答应维持法郎的币值,但是在他开始借债时却不得发行一批用固定金价偿还的公债,而当他终于不得不使法郎贬值时,他打算把私藏黄金所获利益划归国有的企图失败了,并不得不允许贮藏者自行保留利润。至于参议院,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它在最初的时候由于群众的情绪曾作出让步,这时只不过是等待时机准备使政府无法展其雄图;而由于它拒绝给予勃鲁姆所要求的特殊权力——随后参议院将这些特殊权力授予激进党人萧当——勃鲁姆政府因而倒台。整个经济结构不作重大的变革,人民阵线事实上既不可能履行诺言,也不可能应付工人的要求,而这样的变革却是激进党人所不能同意的;因为激进党虽然有其左翼,主要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政党——最固执地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并最坚决地拥护私有制企业,它的追随者主要是下层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对于在一开始110时对城市工人阶级作出的让步,它一点也不高兴。它没有正式背弃与社会党人的联盟;但是在经济方面除了完全是迫不得已地走过的一段路以外,决定绝不再往前走了。激进党人赞成政教分离,坚决反对天主教会的要求;但是绝不喜欢迫使他们与工人站在一起反对大小雇主的形势。

可见,勃鲁姆的试验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企图做的事情是相互矛盾的——它攻击大金融家和垄断资本家,而不是一般小雇主,同时又想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它不得不满足曾经一度很难驾驭的农民的要求。但是要想法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而同时又不容许生活费用上涨,却不是勃鲁姆政府力所能及的。小麦管理局和其他旨在帮助农民的机关的确帮助了勃鲁姆,但是同时却损害了广大消费者。无论如何,人民阵线是无法摆脱这些矛盾的,因为它曾允诺帮助一般老百姓却又不攻击资产阶级,它所企

图进行的改革便必然会使经济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法国经济究竟有什么毛病,使它无法承受哪怕是最温和的生产改革呢?第一,它在公共财政方面受慢性的不稳定之害,其原因一部分在于大量的逃税,尤其是较富裕阶级和农民,另一部分在于法国下议院不愿意征收必要的赋税来使收支平衡。普恩加费在1928年稳定法郎币值以后,曾有一段和缓的时期;但是当世界经济大萧条袭击法国的时候,此举带来的利益就被坐吃山空,预算赤字便重新出现了。此外,法国当时不仅要应付财政的困难,还要应付经济的困难。资本家不愿将他们的钱投资于更新生产资料,而宁愿在时机好的时候做投机生意,一旦时机恶化时,就在国内或国外囤积黄金;在英美两国货币贬值以后,法郎币值成为估计过高的时候,法国的储户就坚决要求保持法郎的黄金价值。储户所存法郎的名义价值五分之四以上已因普恩加费的贬值政策而损失;他们不愿意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依靠工资为生者是勃鲁姆政府的朋友,消费者也是它想要结交的人,但是消费者要求物价降低或至少不要上升,这与依靠工资为生者的愿望相冲突,于是使勃鲁姆政府感到进退维谷。然而要使两者都满意的办法是没有的,而由于该政府不得不借债,从而不得不与那些有钱出借的人和解,这就更加没有办法了。政府坚持固定的法郎币值,尽可能地拖延下去,所付出的代价是眼看着财源逐渐枯竭。后来不得不实行贬值时,也是三心二意,不敢充分贬值到能使它有回旋余地的程度。其它国家极感兴趣地注视着勃鲁姆试验的结果。人们必然要把它与罗斯福的那种革命性的新政相比较。但是,法国的情况与美国大不相同之处在于,造成经济萧条的原因主要来自国外,不能用单纯的国内措施来对付——至少不能用人民阵线所能同意的那些措施来对付。不到一年,人民阵线就全面退却了,它不能取消四十小时工作周制,但是也无法防止它在工资方面所作的让步不被日益上涨的

物价所抵消,它的公共工程计划也由于缺乏财力而不得不归于停顿。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人民阵线在下议院中占明显的多数,它的成员们绝不愿意将他们在1936年的选举中获得的权力交还给右派;因为法国的右派极其反动,而且极其敌视共和国。法西斯组织即使在已经依法解散之后,仍旧改头换面地继续活动。拉罗克的“火十字团”拒绝把自己转变为政党,或提出参加1936年选举的候选人,而是保持为一个大规模的、仇视整个政治民主概念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暴力组织,对于共和国制度来说,即使不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也是潜在的威胁。当时必须有一个政府在名义上代表1936年的胜利者;在勃鲁姆的伙伴们不再可靠以后,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组成由激进党领导的政府,而社会党人或是参加政府,或是以在野身份支持政府——因为没有这两个党在下议院投票支持,任何政府都无法存在。这两种办法都试过:先是勃鲁姆在萧当内阁中任职,接着萧当又在没有勃鲁姆参政的情况下自己单独干;但是社会党人继续投票支持政府,即使在他们与政府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不这样就绝不可能有享有议会多数的政府。但是人民阵线尽管在形式上继续存在,甚至在1937年勃鲁姆辞职以前,它的精神就已经丧失了。它的团结基础是消极的:它知道它反对的是什么,但是不知道它赞成的是什么。要想继续本着1936年的精神行事,就必须在议会外面发动新的热情奔放的运动,作为推动的力量;但是在这种外来压力下所采取的措施,无法在现有制度范围内行之有效。勃鲁姆政府在压力存在时所承担的事情在压力放松以后就感到非常吃不消;接任者在激进党的领导下除了设法维持下去以希望形势好转以外,就没有什么政策可言了。

当时国内的局势就是如此。在国际上情况甚至更为困难。人

民阵线组成时的使命是：一方面反对国内外的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要维护和平。但是面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采取的那种态度，除非向法西斯党人接二连三提出的要求一再屈服，要保持和平是办不到的。

此外，在这些危急的年份里，自始至终存在着西班牙内战这个流脓的痼疽。对于勃鲁姆政府来说，最不幸的是西班牙内部斗争开始的时候恰逢人民阵线上台执政。西班牙内战在敌对双方之中都激起了极其强烈的情绪。对于法西斯国家及其同情者来讲，这是对于民主制度各种主张的又一次打击，而且是一个扩张法西斯统治的机会——不仅将法西斯统治扩展到另一个国家，而且扩展到的这个国家会完成对法国的包围，使之处于三面受敌的危险境地之中。对于许多天主教徒来讲，西班牙内战是天主教会恢复特权的战争，因为教会的特权已被共和派剥夺，而且教会本身也处于很可能进一步受屈辱的极其严重的危险境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不仅对于社会党人，而且对于许多激进党人来讲，这是一场采取政教分离的战斗——也就是世俗国家反对僧侣和共和政体反对君主政体的战斗。对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来讲，这是一场工人阶级反对它的资产阶级敌人和封建敌人的战争，是一场左派反对右派的战争，而人民阵线则是在这场战争中联合一致反对结成一体的反动力量。在法西斯分子看来，这是反对“唯物主义”和伸张民族精神的斗争的一部分；而共产党人的看法则恰好相反。在开始的时候，人们似乎认为，根据国际法，西班牙共和政府为自卫起见，理所当然地应有充分自由购买武器；但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西班牙政府甚至付出十足的价格都买不到武器，那就无法制止法西斯国家援助佛朗哥将军，尽管他的身份是一个叛乱分子；同时也很快认识到，如果西班牙交战双方都从国外任意获得援助，战争就有可能扩大，直到列强直接在西班牙国土上短兵相接。人们还

担心,在一场混战中,法西斯大会像墨索里尼从一开始就扬言要做的那样,更加全力以赴地投入斗争。

在法国,正如在英国一样,各报从一开始就令人讨厌地登载有关暴行的传闻,其中大部分主要着重描写西班牙共和派的暴行,尤其是他们对教会的暴行。尽管佛朗哥毫无疑问是叛乱分子,他利用他的摩尔人军队反对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但是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中的大部分人是同情他的,很容易相信有关那些目不识丁的野蛮人的暴行的传闻,而这些野蛮人却被认为是西班牙共和国的中坚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抵制一些人的这样一种说法:即使佛朗哥不可能得到公开支持,也应当采取步骤使西班牙内战孤立起来,阻止可能导致战争扩大的外来干涉。于是签订不干涉公约的想法就此诞生,这个公约将阻止法西斯国家援助佛朗哥,同时又听任共和政府自生自灭。当时人们设想——或至少是装腔作势地设想——,只要能让法西斯国家在这项公约上签上字,它们就会确实遵守;根据这个设想,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准备剥114夺西班牙政府购买军火进行自卫的无可怀疑的合法权利。当时正忙于其大叛国案的审讯的苏联也同意参加。但是它谨慎地宣称:它遵守不干涉公约的程度只能与其它国家一样,而不能更多。基于这种理解,主要有关的五个大国签订了《不干涉公约》。不出所料,这项公约对法西斯国家所起的唯一作用并不是防止了它们的干涉,而是它们尽量使之成为名存实亡的一纸空文。

在英法两国,西班牙共和派的主要朋友是共产党人,他们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时期始终抗议“不干涉”这出滑稽剧,并号召左派普遍联合起来投入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在这方面共产党人获得英法两国知识分子主体和青年学生主体的支持;西班牙的斗争成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反法西斯人士的团结中心,但是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在此例,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人诱惑新成员的主要手

段,因此他们在即使并不积极反对专门为了解救西班牙和征募志愿军赴西班牙作战而发起的运动的时候,也始终很冷淡。西班牙问题对于法国来说,当然要比对英国的关系直接得多,而且更能激发兴趣,因为西班牙与法国接壤,而且法国吃不消在邻邦中再增加一个敌人。但是即使在英国,西班牙斗争无论在理智方面和感情方面,都使当时许多感受性很强的青年人蒙受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时至今日还萦绕不去。

在西班牙,正如在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绥靖”政策出卖了反法西斯事业,一部分原因是缺乏对西班牙共和派的同情,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有人几乎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以求避免战争——或者说,以求说服希特勒进攻俄国而不要进攻西方。对于在这方面负有纵容罪责的任何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件不名誉的事;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要法国人采取不可能指望得到英国全面支持的行动,是极其困难的;此外还必须承认: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即使难辞其咎,主要责任却不在他们,而在张伯伦政府身上。

关于西班牙事件就讲到这里,下面专门有一章将更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问,三十年代的法国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究竟有哪些成就?我只怕答案一定是“很少很少”;因为在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连绵不断的争吵中,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新的东西。正像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共产党一再发生分裂,有时候开除一个顽固的派别,有时候某些人又自动退出。自从法国共产党接收了法国旧社会党的机构以后,在整个二十年代这种交替过程一直在延续;法国共产党人几乎不断地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因为共产国际自称不仅有权从莫斯科替法共决定政策,而且有权越俎代庖地替他们决定谁应该被开除或降级,谁应该提拔到党的权势岗位上去。法国共产党以一再开除和使得人们退党的代价,一次又一次地屈从于共产国际的命令,可是结果却发现新的领导并不比

旧领导更能讨好莫斯科，于是又受到一次共产国际的纪律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党员的更迭和党员人数的变动很大，法国共产党总是做到时隔不久就设法吸收新的党员来接替那些退党的人。它首先摆脱了党内的工团主义者，因为他们犯了工联主义和工团自治主义的罪恶。接着又摆脱了托洛茨基分子、多里奥分子和若干其他派别；尽管在1936年以前它在法国下议院始终只能获得少数议席——一部分原因是它不肯同其他党派协同竞选——，它却不失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强有力的战斗团体，并且由于参加1936年的人民阵线而取得了很大收获。许多退出法国共产党的人不久就重新参加了社会党，其他的人则有很多年时间一直结合在他们单独组成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内<sup>①</sup>。但是在这一 116  
一切浮沉之中，法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为一个大体上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强大集团，其主要力量在大巴黎和从前盖得派得势的诺尔省；但是在全法国许多大工业企业中都建有它的工厂基层党组织。

在共产党内，莫里斯·多列士不久就成了杰出的领袖。他做过矿工，是社会党势力强大的诺尔省的矿工的后裔，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到矿场工作。莫斯科的路线尽管一再变动，他却始终忠实地追随莫斯科，因而在历届清党中得以幸存，继续担任党的领袖——他目前仍然是党的领袖，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

多列士并不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是工人阶级的战士，生长在法国社会党最有势力的一个地区，继承了茹尔·盖得的传统，后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并且衷心钦佩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诺尔省的大部分盖得派在1920年的都尔代表大会上参加了共产党，并在此后的兴衰浮沉中始终忠于共产党。当时多列士太年轻，不可能受到盖得的直接影响，他一成年就

<sup>①</sup> 参看第4卷下册第485页。



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由于他善于辞令和出身于工人阶级，所以被选拔担任领导；原因是莫斯科强烈地坚持法国共产党应由工人领导，而不应由知识分子领导，莫斯科非常怀疑法国的知识分子过分爱好个人自由，而且煽惑别人不遵守纪律。

当时，分裂以后的社会党，在大部分社会党议员的支持下——虽然没有得到旧社会党基层党员的支持——又重新建立起来，逐渐从他们在图尔所遭受的失败中恢复了元气，但再也不能恢复他们从前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地位了。实际上他们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且像共产党一样，发生了若干次分裂和退党的事件。在社会党内，主要的争论问题是与资产阶级左派各政党——主要是与激进党人——在选举和下议院中进行合作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人民阵线成立以前，大部分党员反对实际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只要不参加政府，许多党员都赞成与其他政党联合竞选，尤其是在第二轮选举中——当这种选举制仍然生效的时候——，并赞成以在野党的身份支持资产阶级左派政府。

可见，社会党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是使自己能够随机应变，几乎没有余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同时，由于共产党人忠实地听从莫斯科发号施令，追随它的不断改变的路线，而不试图制订自己的政策，因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出现，要是不算新社会党人的话；他们很快干脆退出了社会主义运动，其中有些人在经济计划阶段嘎然而止，不再前进，而另一些人，例如戴阿，则投入法国右派的怀抱，1940年在法国沦陷之后又立即成了维希政府的支持者。某些前共产党人经历了类似的演变——特别是多里奥，他曾在1933年的统一协商中起过首要作用，但是翌年被开除出共产党，他在1936年创立了“法兰西人民党”。后来他成了极其恶毒的法西斯分子，他的“法兰西人民党”接收了“火十字团”的许多狂暴的成员，还有五光十色的恶棍和暴徒。1944年他逃到德

国,当年他就死了——据说死于盟军轰炸。至于戴阿,则一直活到1955年,在法国解放的时候他逃到德国,成为济克马林根“政府”<sup>①</sup>的成员。战后他皈依了宗教,退遁意大利的一个修道院,在那里平静地结束了他的余生。他早年先是一个计划经济倡导者,在维希政府供职时成了法西斯左翼的强烈反社会主义的法西斯分子,在社会政策方面他的作风多少有些像奥托·斯特腊塞。另一个“新社会党人”——波尔多市的马尔凯在1940年担任贝当的第一任内务部长,他是皮埃尔·赖伐尔的挚友。在这三个人中间,多里奥是最声名狼藉的,戴阿是最聪明的。在三十年代晚期,他们都远远地脱离了工人阶级运动。

在社会党的正统的领导人之中,没有值得注意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勃鲁姆是笃信饶勒斯的信徒。他曾对法国在政府和行政组织方面的思想有所贡献,并且在他担任总理期间,在改组政府部门时将他的若干想法付诸了实施;但是这几乎不能说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卓越贡献。勃鲁姆是一位有高度教养的犹太知识分子,专心致志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他既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也不是一个伟人。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家来讲,比较杰出的是古典学者亚历山大·白拉克,他的真名叫德鲁索(1861—1955年),他不仅是希罗多德和索福克勒斯著作的编纂者,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也十分钦佩饶勒斯,因而亦步亦趋追随饶勒斯;但是很难说他是一位有创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马克思的外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少数派的领袖让·龙格,于1938年去世,但在他去世以前许久早就已经销声匿迹了。他也从来不是重要的理论家。他的劲敌皮埃尔·雷诺德尔最后也与新社会党分子一起退出了旧

---

<sup>①</sup> 济克马林根,德国多瑙河上游的城市,是贝当政府流亡分子(1944—1945年)的避难所。——译注

社会党,他死于1934年,比龙格早死几年。年轻的一辈,例如,茹尔·莫克和安德烈·菲利普,在1944年以后才开始出人头地,在三十年代几乎还没有什么名声。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间,法国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实际上等于零。

## 第五章

### 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独裁者、普利摩·德里维拉于1930年1月辞职。他的继任者达马索·贝伦格尔将军执政一年后就让位给海军上将阿兹纳，他规定1931年4月举行地方选举，并继之以大选。地方选举的结果从未正式公布；但是却大大有利于已于1930年8月加入《圣塞巴斯蒂安公约》<sup>①</sup>的各共和派。同年12月发生了共和党人起义，这次起义遭到武力镇压，起义领袖们以叛国罪受审并被定罪，但是很快就恢复了自由。大选中尽管存在西班牙惯有的贿选活动，共和派候选人在各大城市的选举中依然当选了；此后，以曾与当局发生过争执的天主教保守党人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为首的共和委员会要求国王在举国民情不可抗拒的形势下让位。阿方索十三世拒绝让位，但是同意暂时停止行使国王职权并离开西班牙，“以免采取任何可能使我的同胞投入自相残杀的内战行动”。共和派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安排进行立宪议会的选举以确定未来的政府。1931年6月进行的选举使各共和派获得了绝对多数的议席，他们在466个席中占了315席，但是其中成份极为复杂，包括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形形色色的激进党人以及拥护地方自治的加泰罗尼亚主张自治的人和其他主张自治论的人，其中只有寥寥

---

<sup>①</sup> 《圣塞巴斯蒂安公约》是在德里维拉辞职后，社会党和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们由于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意识到王政必遭倾覆，于1930年8月签订了这个联合行动的公约，旨在防止群众积极参与推翻君主政体和建立的共和国。——译注

120 无几的右翼和左翼社会党人。当局奉劝无政府主义者和支持者不要参加选举,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大概照样投了票。不过他们在议会中当然是没有代表的。

共和国成立之初,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大致有三个——土地改革、削减教会手中过大的权力、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渴望在西班牙联邦国家内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而其中最迫切的是教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内阁总理阿尔卡拉·萨莫拉与大多数同事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结果在许多教堂被捣毁和政府决定对天主教会采取措施之后,他和保守共和党人米格尔·摩拉于10月份辞职。政府在共和党左翼领袖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领导下改组;但在12月,以亚历山大·勒鲁为首的右翼激进党人跟随保守党人反对新政府的社会政策。在此期间,议会一直在起草新共和国宪法,它充分体现了议会民主制度,并直截了当地攻击了天主教会的种种特权。其中促使阿尔卡拉·萨莫拉辞职的宗教条款规定政教分离,停止神职人员从公共基金中支付薪金。强要别人“不服从国家的合法当局”而服从另一个当局的教团应予解散,它们的财产应予没收,其他教团应进行登记,只容许他们拥有正当需要的财产;禁止所有教团参与工商业或教育事业。这是特别针对耶稣会进行的打击,因为他们拥有巨额财产,广泛从事商业活动,从更广的意义上说,这一打击是针对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当时教育事业几乎全部在教会控制之下。

新宪法中关于世俗事务的条款规定设立一院制立法议会,议员由普选和秘密投票产生,任期不超过4年,男女都有选举权和当选为议员的权利。这在极端落后的国家中是一项重大革新,共和党人在1933年的选举中曾为这一点付出巨大代价。但是在开始  
121 时,左倾的趋势是很强烈的。摆脱了保守党人和右翼激进派的新的阿萨尼亚政府具有明显的左倾趋势,但是仍然局限在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范围内,在基层或者甚至在议会中,社会党人却寥寥无几。根据新宪法规定,总统由选举团选出,而选举团则由议会议员以及数目相等的特邀人士组成;尽管阿尔卡拉·萨莫拉在宗教问题上与政府和议会有意见分歧,由于他是一位出色的共和党人,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因而选举团仍然推选他担任了总统。

议会在制定宪法之后,就着手解决上述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年就制定了土地改革法(1932年),规定支付赔偿金后征收某些大贵族的大部分未耕种的大片地产并分配给迫切需要耕地的农民。这个法令还规定组织一个代表农业雇主和雇工双方的土地改革协会,来按计划改革土地所有权和分配制度。议会还制定了一项有关加泰罗尼亚人自治的法令,规定恢复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在独裁统治时被剥夺的权力——管理公安部、教育和其他各种机构的权力——并使加泰罗尼亚语和卡斯提尔语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两种并存的正式语言。

政府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后,第二年又颁布了一些使宪法中的宗教条款生效的法令,这些条款直到当时为止仍不过是一纸空文。《宗教团体和宗教集会法》规定所有各教派成员在当年年底以后不得再担任教师,从而直接打击了教会学校,不过政府并没有准备好足够的非教会学校和教师来代替他们,并扫除当时特别是在乡村地区所存在的大量文盲。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对于议会所提出的法律除了签字以外别无选择,于是他就尽可能拖延到最后一天才签字。在此期间,4月间的地方选举对政府非常不利,许多保守党人和共和国的敌人当选;各左翼共和政党在当年下半年的普选中成绩很差,在新议会中减少到99席,而右翼政党却获得207席,中派获得167席——所谓中派,即共和派右翼。阿萨尼亚内阁倒台,接着上台的是在勒鲁和其他中派领袖领导下的一系列短命内阁,

他们不仅制止了进一步的左翼立法，而且还尽最大努力来避免执行已经通过的法律。

这就是从1931到1933年以及1933年以后的议会情况。但是在西班牙，议会中所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实际情况的一小部分。西班牙不存在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传统，大家在新的局势下也和过去一样不愿服从议会。把国王赶走并建立共和国的势力并不是议会；这些势力的根源是群众的不满情绪，表现为普遍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和农民之中的群众运动。在西班牙，除了一大片加泰罗尼亚地区和毕尔巴鄂附近的一小部分巴斯克地区外，主要是赤贫的农业地区，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归大贵族或教会所有的大庄园，而且大部分地区即使耕种了，也几乎全部是使用极原始的耕种方法。由于地主自己既不耕作，又不许无地的农民耕作，所以土地大面积荒芜；其他的区域，例如在加里西亚，居民地少人多，几乎无法生活。在巴斯克地区各省或东方的河谷——例如在巴伦西亚附近——有几个比较繁荣的地区；在加泰罗尼亚，根据一种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持有土地的佃农与地主分享农产品，他们在弗朗西斯科·莱瑞特和他的继任者路易斯·卡尔维特的领导下紧密地组织了起来，与加泰罗尼亚的左翼资产阶级政党艾斯科拉联合在一起，该党最初由弗朗西斯科·马西亚上校领导，上校死后由路易斯·孔佩尼斯领导；而在其他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安达卢西亚，农村无产阶级大都处于无政府主义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并一向不时发动凶悍的地方叛乱，但是由于各个地区都是单独行动，因而很容易被镇压下去。

在城市里和凡是有大小工业的地方，都建立了工会组织；但是  
123 这些工会分成了若干单独的和对抗的运动。其中人数遥遥领先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该会大部分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和领导，在加泰罗尼亚势力最为强大，其人数远远超过一些对立的工会。该

会置身于政党政治之外,并且赞成一种与共产党的中央集权的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它的领袖们,不论是不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一致反对国家并提倡以松散联合的自由地方公社为基础来改组社会,但须使基本权力能保持在自由的地方单位手中。事实上该会内部分成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后者竭力以法国总工会的全盛时代为其榜样;而无政府主义者则遵循巴枯宁思想和马拉特斯塔思想,他们在法西斯党人获得胜利以前,与意大利思想的联系一直比与法国思想的联系要紧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1931年时规模很大,然而由于它放弃集中的权力,以致极不定形。在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的初期,它同情共产国际和工会红色国际,但是后来就由于共产党人坚持中央集权的纪律和工会从属于党而不敢领教了。它最有名的领导人是安赫尔·佩斯塔尼亚,虽然此人和一部分成员远远背离了不过问政治的原则而在工会内部组成了一种工团主义政党,该工会自从与共产党人决裂之后,仍然保持非常明确的左倾立场,提倡革命工联主义,实际上它全力以赴地投入了革命事业。

因此,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的工人中占有优势,并在其他一些地区也有强大的势力,马德里则是主要对立的工会运动——与社会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人总联合会的根据地。它的领导是曾在普里摩·德·里维拉手下任顾问的弗朗西斯科·拉戈·卡巴勒罗,但他的立场在革命后迅速左倾,并在佛朗哥叛乱爆发后一度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工人总联合会在纪律方面比全国劳工联合会严得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显然比它右;虽然它有时与全国劳工联合会<sup>124</sup>在罢工运动中合作,却经常拒绝参加总罢工——这是西班牙工人惯用的武器。除了在马德里以外,工人总联合会在毕尔巴鄂和阿斯图里亚斯矿工中也是主要力量,后者是它的左翼;虽然在西班牙南部的矿工中它有不少追随者,并且在革命后甚至在全国



劳工联合会没有控制的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也能吸收一大批新会员，整个说来它在加泰罗尼亚力量很小，而在巴塞罗那则几乎没有力量。它的右翼是胡利安·贝斯太罗，他担任该会的主席。该会在加泰罗尼亚所吸收的会员主要并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公用事业中的雇员和其他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员。

在这两个联合会之外，还有许多无所归属的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有艾斯科拉党的佃农所组成的所谓“自由”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由雇主建立的实际上是破坏罢工的暴徒组织；革命以后还有一个叫作统一总工会的共产党工会小组，该会后来与工人总联合会合并了，虽然它有些分会脱离了组织，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占优势的地区参加了该联合会。此外还有一些完全脱离于政治之外的联合会；也有少数（或陆续出现的少数）联合会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联系起来。但是有组织的工人的主体始终分别属于社会主义工人总联合会以及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而且除非他们能共同行动，否则联合运动就根本不可能出现。

1931年，在各工人阶级政党中，社会党毫无问题居于首要地位。当时共产党人数不多，作用不大，并分裂成若干集团，如列宁主义派、斯大林主义派、托洛茨基主义派等等；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以马德里为主要中心的社会党，虽然必须对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以及其他主张自治的人的要求做出让步，整个说来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该党原先是帕布罗·伊格里西阿斯创建的老马克思主义政党，帕布罗终生与无政府主义者及其自由共产主义进行斗争，高龄时于1925年去世。他去世之后马德里的拉戈·卡巴勒罗和阿斯图里亚斯的英达勒齐奥·普里托就成了著名的领袖。他们两人之间水火不相容；拉戈·卡巴勒罗是工人总联合会的领导人，而普里托则在毕尔巴鄂控制了该会的地方组织。第三个比较

重要的工人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直到 1935 年才成立，那一年何奎因·摩林的工农同盟与安德烈斯·宁的共产主义者左翼合并，组成了这个党。后来，就像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一样，该党的主要力量是在加泰罗尼亚，是 1935 年由当地的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主体合并组成的。

西班牙社会党从第一国际时代起，就一直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组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到 1927 年才正式成立，而且在 1936 年叛乱爆发以前一直是非法组织。在 1927 年以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是单独活动或结成小集团活动，而且大部分活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有关，他们在该会中有很影响，不过他们当中的“纯粹”无政府主义者对该联合会的工团主义倾向持怀疑态度，而对它愿意与任何政党联合的任何迹象则更是疑虑重重。虽然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时常扔炸弹，他们作为一个集团而言主要并不是专扔炸弹的人。他们是一个特别品格高尚的自由主义理论家集团，相信群众的天赋能力，而且不仅极端反对巴枯宁的孪生妖怪《上帝和国家》，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官僚制度和中央集权制——甚至反对任何一种领薪官吏，或者至少是反对任何比工人的工资收入多的人——以及任何形式的拥有强制权力的权力主义组织。这种态度使得他们与社会党及其同盟工人总联合会以及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尖锐对立，当然，与随着内战爆发才重要起来的共产党也尖锐对立。

于是在 1931 年时就出现了一种极为混乱和令人困惑的情况。共和国并不是由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建立的，而在形式上是由各种各样的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激进党人的广泛联合建立的，实质<sup>126</sup>上是由难对付的巨大群众运动建立起来的。由于国王严重丧失民心，共和国在开始时能得到大部分军队的支持，其中包括圣胡尔霍将军，不过后者不久就举兵反抗共和国。工人阶级在共和国中所

起的作用主要不在议会政治方面,而在巨大罢工浪潮中,这是新政府当初即令愿意镇压也不敢镇压的浪潮。农业工人也以巨大的抗议性暴乱参与其事,有时还伴随着实际的夺地行动。这些表现一部分出自矿工以及加泰罗尼亚和毕尔巴鄂的大工业工人,但也来自许多小规模手工业企业和许多服务行业,如侍者、理发师和职员等等。他们的领袖大都是当地人,并且大都是自发性的,工会只不过跟着群众运动跑,而不是领导群众运动。全国劳工联合会大部分确实受无政府主义者控制,其所属各工会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斗争之中;至于工人总联合会所属各工会,不管它们与社会党的联系多么紧密,也由于受到共同的推动力而卷入了冲突,这场冲突已远远超出了敌对的工会联合会的范围。这些工会趁此时机大肆招收新会员,而且在坚持它们的共同要求中大大地团结一致了;至于政治家们,不论他们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向它们作出让步,承认它们是远远超过他们在议会中的实力的群众力量的代表。

共和国的巨大困难之一是,它扶植上台的政治力量不符合人民的心意。阿萨尼亚的确是一位十分同情左翼的彻底的激进分子,但是他对工人阶级运动缺乏明确而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或态度。他倒是十分热衷于攻击教会和各宗教教派以及贯彻执行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但是在对付大地主方面就远不是那样在行;至于应付工业的需要,则更是逊色。他当权的时候恰逢经济大萧条,这严重地影响了西班牙收支平衡,而且接踵而来的是希特勒在德国取得政权——这些事件使他的处境更加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却不得不作出当时西班牙经济似乎无力作出的巨大让步;而且新政府根本没有任何政策来使经济适应这种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成立伊始时所获得的声望势必会失掉一大部分。人们自发地攻击宗教,许多地区还发生焚烧教堂的事件,这使得最初站在共和国方面的许多天主教徒与共和国疏远了;罢工经常发生,也使许多支

持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人物很不高兴。首先是阿尔卡拉·萨莫拉,接着是勒鲁和他的激进党人,在1931年年底之前都反对政府了;妇女参政权,不论其长远后果如何,在不久的将来就很可能对教会产生作用。

此外,无论是分配土地还是在非宗教的基础上改革教育,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迅速取得成就,如果要用合乎宪法的手段,至少是如此。教员必须培养,学校必须建立起来;要将无地农民安置在大庄园上,或者要改善已经占有有一些土地——通常总是土地少得可怜,只能过赤贫生活——的佃农或土地所有者的条件,是一桩艰巨的工作。如果农民能够不等法律批准就夺取土地,那么事情就能进展得比较迅速;在若干地区内确实零星地发生了这种夺地的事件。教会学校被自发地封闭了,新学校自发地开办起来了,根本没有等到政府来查封或开办;但是,这种行动根本不能提供当时所需要的大批新教员。

早在1932年8月,西班牙共和国就已经不得不面对第一次右翼军人叛乱。圣胡尔霍将军在塞维利亚举兵反对共和国,但是稍一交兵,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他没有得到共和国敌人的主力的支持。他的军事政变时机不成熟,而且计划不周。失败后他被判处死刑,但是200万人签署了一项请求宽恕的请愿书,使他得到赦免。共和党人组成了一支名为警备队的武装警察部队来保卫共和国,但是在其他方面,事态仍然一如既往。昔日的国民警卫队依然存在,但不可靠,他们对付人民时仍然主要采用一贯的残暴办法。

接着进行了1933年的选举,左翼各共和党遭到严重失败。在此后的两年中,次第上台的政府放开胆子大肆破坏前两年的成就,只是没有使共和国彻底垮台。希尔·罗夫莱斯组织了她的右翼政党联盟——“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前独裁者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摩·德里维拉组织了长枪党及其好战的附属机构——“全

国工团主义者进攻团”。卡尔沃·索特洛的西班牙复兴社是地地道道的保王党组织,大体上是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为模式组成的。所有这些团体和其他许多右翼团体全力反对左翼,同时也反对在选举后取代阿萨尼亚的历届所谓“中派”政府。他们想驱使这些政府越来越向右转,然后取而代之;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时机尚未到来。

那时西班牙共和国处境日益艰难,勉强撑持度日。1934年秋,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斯图里亚斯发生了叛乱。触发叛乱的信号是桑佩尔内阁的倒台和新勒鲁内阁的组成,这个内阁中包括了来自希尔·罗夫莱斯的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的若干右翼部长。当时加泰罗尼亚一片混乱;孔佩尼斯领导的地方政府与马德里政府、与驻扎在巴塞罗那的马德里的军队存在激烈争执;艾斯科拉党本身分裂成了东卡斯领导的埃斯塔特·加泰拉分裂派和孔佩尼斯派;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联合组成的工人联盟一致反对东卡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者既受到东卡斯派的迫害,又受到孔佩尼斯领导的地方政府的警察迫害。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了叛乱性的运动,在运动中,孔佩尼斯政府在东卡斯派的压力下,宣布成立“在西班牙联邦共和国范围内的加泰罗尼亚邦”,——这个口号没有使任何人高兴,反而招来蒙特胡依奇城堡的军方对他施加全面压力,工人们徒然地呼吁发给武器,以便使他们得以进行抵抗,可是已经为时太晚。军队只零星地遇到一些装备很差的部队的抵抗,就占领了主要的建筑物,孔佩尼斯被迫投降。孔佩尼斯地方政府被剥夺了权力,加泰罗尼亚再次处于马德里新右翼内阁的反动统治之下。

129 加泰罗尼亚的叛乱是一个悲喜剧;但阿斯图里亚斯所发生的事情却是真正的悲剧。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是西班牙无产阶级中最坚强地组织起来的一部分,1934年几乎唯有在他们之中共产党

还据有强大的阵地,而且与其他团体和政党还有密切联系。阿斯图里亚斯工人们先后在若干地方工人联盟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反抗政府,占领了奥维多和其他城镇;这些工人联盟具有各种各样的政治面目,但由设在奥维多的一个区域性联盟予以协调。大批军队立即集结起来镇压他们;他们非常缺乏武器,更缺乏弹药。政府军队无情地收缩包围圈,击败了他们分散的抵抗,用骇人听闻的残暴手段将叛乱镇压了下去。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送到集中营,受到残酷的虐待。当然,他们在失败以前也有过暴行,但是后来对他们进行报复的规模却大得无法比拟。

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叛乱以后,到处大肆逮捕共和党人的领袖。阿萨尼亚和孔佩尼斯都被逮捕,并作为叛乱分子受审。右翼似乎战胜了它的左翼敌人;但当时右翼没有各中派政党支持仍然无力进行统治,因为当时各中派政党在西班牙议会中有举足轻重之势,可是这些政党若无希尔·罗夫莱斯和极右派的支持,同样无法立足。事实上,1934年事件以后的局势是舆情迅速左转,同时左翼则决心摒除其内部分歧,以便夺回它在1933年失去的议会控制权。这时围绕着炙手可热的左翼人物阿萨尼亚开始形成人民阵线,准备参加1936年的大选。

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资产阶级左翼共和党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主张自治的人,工人总联合会的工会主义者以及许多较小的团体,全都参加了为竞选而组织起来的人民阵线。反对政治活动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参加人民阵线,但却破天荒第一次没有指令它的会员不参加投票;甚至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大部分卷入了运动。1936年2月举行选举,左翼各党派大获全胜。他们获得265席,比右翼和中派联合在一起要多39席。右翼共获得165席,中派只获得52席,而在1933年中派获得167席。因此,根据宪法,左翼可以执行凡是它认为合适

的一切法律；但是由于它的胜利而解放出来的真正力量，在议会外面要比在议会内大得多。在议会内，新的多数运用它的权力推翻了阿尔卡拉·萨莫拉的共和国总统职位；1936年5月阿萨尼亚当选总统。塞萨雷斯·基罗加出任总理，但他对大局起不了什么作用。正像在1931年那样，罢工和骚乱又再次几乎到处发生，同时还经常发生焚烧教堂和攻击教派组织的事件，这些组织大部分是在最近两年的反动时期内重新建立起来的。农民夺地的事件普遍发生，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发生总崩溃。左右双方都发生许多谋杀事件，卡尔沃·索特洛的谋杀案就是其中一例，他是保王法西斯分子的领袖，是共和国最凶恶和最难对付的敌人。

1936年7月，当佛朗哥将军在西属摩洛哥举起叛旗，在西班牙外籍军团和一支摩尔人军队的援助下进犯西班牙时，曾经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大部分海军拥护共和国——尽管海军大部分军官被杀，使之不能竭力支持共和国。但当时西班牙还是有许多地区发生了军事叛乱，不过并不普遍；佛朗哥设法把他的军队运到了加的斯，其中一部分是空运。然而，无论在马德里或在巴塞罗那，军事叛乱都失败了，因为当时士兵们拒绝追随军官，而是与人民交好。

西班牙内战的军事方面已经早就有人多次谈过，我不打算重述。此处谈的完全是它的政治方面。起初，尤其是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都成功地击退了军事叛乱时，共和政府方面对危机的严重性有些估计不足的倾向。但是时隔不久，人们便充分认识到了叛乱的严重性；在1936年9月托莱多陷落和这年最后几个月叛军几乎向马德里进军之后，对危机的严重性就认识得更清楚了。1936至1937年冬季，马拉加也被攻陷，接着叛军在1937年夏季成了包括毕尔巴鄂在内的巴斯克地区和桑坦德的主宰。第二年，叛军向东进军，侵入加泰罗尼亚；当他们进抵地中海海滨时，就把

西班牙共和国拦腰截断了。在此期间，马德里被围，政府撤至巴伦西亚。共和党人从1938年7月至11月在埃布罗河一线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在1939年2月被迫撤出加泰罗尼亚。第二个月，马德里在进行了长期英勇抵抗之后终告陷落，从而结束了西班牙内战，佛朗哥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从加泰罗尼亚撤退以后，阿萨尼亚已辞去他的总统职务：最后一任共和国总理内格林则亡命国外。

在1936年7月叛乱爆发时，基罗加辞去总理职务，在温和的共和党人马丁内斯·巴里奥的领导下组成新政府，目的在于结集温和派的力量来支持共和事业。但议会拒绝接受巴里奥，阿萨尼亚不得不任命何塞·希拉尔担任总理，希拉尔的内阁主要不是由社会党人组成，但比巴里奥的内阁要左得多。立宪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见机行事地打扮成立宪主义者的人们——宣称这种更迭破坏了政府的宪法基础，因为宪法规定唯有总统有权任命总理；但是，由于阿萨尼亚继续担任总统，这个论点似乎就站不住脚了。然而从那时以后，阿萨尼亚主要只是一个傀儡领袖，实权操在各届内阁手中，或者说操在群众手中，因为这些内阁实际上是群众的傀儡。无论如何，希拉尔的任期是短暂的：9月他被社会党和工人总联合会的领袖拉戈·卡巴勒罗所取代。拉戈·卡巴勒罗这时站在社会党左翼方面，赞成与共产党结盟，而共产党的实力自从苏联提供援助以来一直在稳步增长。在叛军开始围攻马德里时，政府将总部迁至巴伦西亚，并试图扩大政府的基础，邀请工团主义者的代表入阁，从而增强政府的力量；当时工团主义者面对着战争的需要，已经暂时放弃了反对政治活动的态度。这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说来，是很大的让步；但是，即使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也有许多人认识到必需集中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保卫共和国。

但是，尽管工人阶级的力量在表面上一致支持卡巴勒罗政府，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在内战的最初几个



月,实权主要落在各地工人委员会的手里,而这些工人委员会不是主要受无政府主义者控制,就是由所有地方性的工人组织派代表组成;军队主要由大部分参加某一政党或工会的工人民兵部队组成。共和国需要建立一支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的新军队,但是拥有民兵部队的各团体虽然在军事上显然无能,却很不愿意放弃民兵部队或者承认有必要用正规军官团来代替各团体选举出来的领袖。当时要供应武器并训练纪律严明的军队,都是极为困难的问题。根据国际公法,西班牙政府完全有权利向国外购买武器来镇压国内的叛乱;就法国来说,西班牙政府购买武器的权利还有条约<sup>①</sup>作保证。此外,法国还有一个左翼政府——人民阵线政府——在台上,可望全心全意地支持西班牙政府。可是,西班牙共和党人购买武器和输入武器的权利被剥夺了,接着,法国和英国的志愿人员也被禁止到西班牙去参加国际纵队。现在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值得注意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应该到西班牙发生叛乱时的欧洲政局中去找原因。那时意大利刚赢得了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制裁已经取消。柏林与罗马之间的工作“轴心”的谈判已有长足进展。在法国,勃鲁姆政府刚上台,正忙于国内的事务。英国保守党在1935年的大选中获胜后政权稳固,工党实际上已放弃了它反对重整军备的主张。在对西班牙的关系上,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法西斯国家是支持叛军的,后者在叛乱以前就与德国和意大利过从甚密。法国害怕在自己的边境上发生一场德国和意大利一定会支持法西斯的战争;这时苏联已经转而采取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政

---

<sup>①</sup> 1921年7月摩洛哥里夫族人在安诺尔一役大败西班牙军。普里摩·德里维拉执政期间,在1925年7月12日和慑于摩洛哥各部族解放运动的法国订立了共同出兵镇压里夫族人的协定。1926年春,法国和西班牙联军打败了里夫族军。文中所说的条约就是指这一协定。——译注

策，因而竭力支援西班牙共和政府。如果要阻止这一切事情发生，通过谈判签订一个总协定，让西班牙人自己去打，任何一切都不从国外取得援助，是不是就是上策呢？如果这种政策的确切实可行，而且法西斯国家也将照此办理，那倒是有些道理的。

勃鲁姻首先求助于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宣称它颇为赞同，苏联也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其他国家必须采取同样步骤，条约必须普遍得到遵守。意大利和德国在名义上也同意，其他小国则欣然效法各大国的榜样。27个国家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其中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还有西班牙的独裁主义邻国葡萄牙。它们都签了字；可是法国和英国一般都遵守了条约，并强制它们的人民遵守，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几乎毫不受限制地继续进行干涉。唯有意大利派遣了大批正规军到西班牙的土地上帮助叛军作战；但是德国人输入了大批弹药，提供了大量技术援助，而且供给了对于叛军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作战飞机；尽管佛朗哥自己几乎没有海军，但德意两国都帮助他封锁了共和国的各港口，并且在公海上劫掠载运武器或军需品到西班牙共和国去的船只。另一方面，苏联在看到法西斯国家几乎没有遵守条约时，便尽量用军需品援助共和党人，但其规模远不足以抵消法西斯国家的所作所为。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共和党人如何英勇作战，他们的失败终究是无法避免的。国际纵队为保卫马德里而顽强战斗，死伤惨重，因而暂时援救了共和党人，使之不致于马上失败。国际纵队由许多国家的分遣队组成，其中包括法国和英国的分遣队；但是国际纵队的核心来自已遭法西斯蹂躏的那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流亡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其中也有一些俄国人，他们不仅有来自共产党的，也有来自与共产党争吵并且最恶毒地批评斯大林的那些集团。因为最近发表了斯大林的新宪法草案的苏联在西班牙叛乱时期正在处理由于大叛国案的审讯而在国内引起的

严重风波，而担任官职的共产党人正在千方百计地缩小它的影响。

不干涉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一出滑稽剧，这一点几乎人人知道。但是法国和英国紧紧抱住这个政策不放，以它作为纵容独裁者而共同采取的“绥靖”政策的一部分，希望藉此暂时阻止战争发生，或者把战争引向东方，而使之不在西方发生，结果西班牙共和党人就遭了殃。有一个时期，拉戈·卡巴勒罗的政府似乎在共和党人的势力中实现了基础广泛的团结，但是在团结的表面背后，每一派都继续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尤其是在各局部战场之间缺乏有效的统一协调。持续的不团结现象起了有利于共产党的作用——这时共产党已是一支迅速上升的力量，它坚决反对所有那些在战争胜利以前力图进行社会革命的人。共产党人在西班牙事务中的确已明确地成为右翼势力。

在俄国本国，革命已进入明确的斯大林主义阶段，即刻板地坚持绝对服从党的官方政策；而且任何人一旦略有脱离党的路线的嫌疑，就遭到猛烈抨击。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即凡是这样偏离党的路线的人，不论事实上对流亡的托洛茨基是否有任何同情，都一律被斥为“托派分子”。在西班牙来说，这意味着正式的共产党人非常敌视共产党人之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是西班牙人或是到西班牙来参加保卫共和国作战的外国人。这还使正式的共产党人极其强烈地反对全国劳动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中的“意志自由论者”，而且举凡赞成大力推进革命变革、从而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有损于统一战斗行动的一切团体，也遭到他们反对。在整个西班牙，在雇主被大量屠杀或大批雇主抛弃自己的企业逃命的时候，工人们早已接管了被抛弃的工厂，农民们则占据了地主所抛下的土地。这些情况因地而异，因厂而异，不尽相同。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工人们直截了当地接管了工厂，选出委员会来进行管理，并且主要按旧的工资率继续像从前

一样从事生产。在若干乡村地区，农民们建立了自己的自由公社，废除了货币，并通过实物交换设法从外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其他地区，工厂或空地则被市政当局或其他地方当局接管，并在它们的主持下继续进行生产。共产党这时对那些已归于“工人管理”的工厂——主要是组织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中的工人所管理的工厂，甚至利用自己的影响阻止这些工厂获得物资供应，以迫使它们归官方管理。在主要的工业地区加泰罗尼亚，体力劳动工人大部分属于全国劳工联合会，而且无政府主义在工厂工人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个地区，共产党与联合会之间，或者不如说在该联合会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之间接着就发生了剧烈的斗争，因为共产党与社会党已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融合成一个整体，共产党还成功地说服了这个合并起来的党参加了共产国际。这时有许多俄国人在西班牙共和国，他们并不是士兵，而是各种各样的专家和政治战线上的组织者。苏联没有派遣军队到西班牙作战；但是作为共和国军火——西班牙必须付款的军火——的主要供应者，苏联的代理人对于共和国的政策拥有巨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影响。这些人衷心支持包括各资产阶级共和政党和社会党在内的人民阵线，他们起初支持拉戈·卡巴勒罗的政府，甚至当工团主义者参加政府之后也予以支持；但是时隔不久，他们就开始反对它，要求成立一个能完全统一控制的政府，并要求这个政府取消工人委员会，在统一战线内各个党派团体仍然享有的巨大自治权。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感到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社会党右翼要比与左翼社会党人或全国劳工联合会容易达成协议，而拉戈·卡巴勒罗是试图与后者亲密合作的。特别是，他们决心将已经参加政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驱逐出去，并且决心不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在政府中获得立足点。他们还很注意，不让俄国送来的武器分配给他们所反对的

任何集团：因此，依靠加泰罗尼亚供给军火的阿拉贡前线，只要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保持统治集团的地位时，就一直缺乏军火。尽管国际纵队在保卫马德里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俄国人仍然不得不与西班牙工人中存在的广泛仇外心理作斗争。尽管存在这种情形，俄国人还是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如果俄国的供给断绝，政府就面临着立即失败的危险，因此，与俄国人争吵，甚至向他们说一个不字，都是绝对吃不消的；而且在共和党人所控制的地区内，西班牙青年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俄国人方面。随着共产党人和右翼社会党人实力的增长，无政府主义者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就接连不断地失去地盘。甚至工人总联合会中也有一部分人倒向俄国人方面，尽管它的领袖们仍然效忠于拉戈·卡巴勒罗。

1936年10月，西班牙议会通过法律，给予三个巴斯克省<sup>①</sup>以自治权。巴斯克的民族主义者虽然是热诚的天主教徒，却拥护共和国，反对叛军，自治权就是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可是后来他们在莱昂、卡斯提耳以及西班牙保王党的根据地纳瓦尔陷于叛军的三面包围之中；1937年夏季巴斯克地区陷落。毕尔巴鄂在6月份，桑坦德在8月份，希洪在10月份相继落入叛军之手。如果不是由于共和国重整旗鼓发动攻击，在1937年12月占领了阿拉贡地区的特鲁埃尔，叛军当时本来会再度向马德里发动进攻。1938年2月，叛军再度占领特鲁埃尔，于是就开始了一场攻势，使他们得以  
137 侵入加泰罗尼亚，将西班牙共和国一截为二，并切断了巴塞罗那与马德里的联系，并且使之除了海路以外也不能与巴伦西亚联系。

但是，早在这件事发生以前，拉戈·卡巴勒罗就因被指控揽权太多而且在建立统一行政和权力方面无所作为而下台；前教授胡安·内格林得到积极主张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共产党的支持，取代

---

<sup>①</sup> “三个巴斯克省”指阿拉瓦、比斯开亚、吉普斯科阿。——译注

了卡巴勒罗的职位。1937年5月,当叛军对巴斯克地区的攻击达到高潮时,由于巴塞罗那重新爆发内部斗争,共和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巴塞罗那内部冲突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几乎无法说明——争端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混乱。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本地工会运动中的支配因素是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有密切联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但是,对立的工人总联合会下属各工会也吸收了大批会员,并且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的政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艾斯科拉党和它的佃农分子以及其他团体包括全国劳工联合会都参加了政府。未参加地方政府的有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以及安德烈斯·宁领导的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此外,还有一个名叫“杜鲁提之友社”的团体——这是以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的名字命名的,此人最近在前线阵亡,或者说被谋害,在此之前他一直从前线呼吁实现反法西斯团结。全国劳工联合会参加了地方政府,事实上却分为在朝派和在野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求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原先它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拒之于政府之外,说它不代表任何统一的力量。前者实际上主张实现不包括资产阶级左翼的工人阶级的团结,并主张工人管理工厂,它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中有少数追随者。

巴塞罗那那场战斗究竟是谁发动的,几乎无法说明。当时谣  
138  
逐纷云,说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曾计划发动政变,并试图  
夺取巴塞罗那城;但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和全国劳工  
联合会的领袖们否认此说,并接连不断地发出要求和平的呼吁。  
战斗开始时似乎是地方政府的警察在电话大楼与占领该楼的工人  
代表发生了争吵;但这一莫名其妙的事件使得地方政府的军队与

全国劳工联合会以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大批战斗人员发生了若干天混乱的巷战。局势变得十分严重,以致不得不从前线调回军队,并由巴伦西亚政府派来非加泰罗尼亚的警察和士兵,才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坚决号召它的成员复工,从而使事件平息了。接着就逮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其中包括安德烈斯·宁,他在狱中被杀害;地方政府也进行了改组,使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工人总联合会和反对这次暴动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人员的控制权加强了。

巴塞罗那事件对巴伦西亚的拉戈·卡巴勒罗政府是一个致命伤,它面对着共产党的一系列要求,希望他组成一个真正代表全体工人阶级和人民阵线各党派的内阁,但是要取消各党派对自己力量的单独控制权,以支持真正统一的组织,并由这个内阁统一集中指挥作战。拉戈·卡巴勒罗表面上接受了要求,实质上则提出一个在他本人领导下组阁的计划,这个内阁主要以工人总联合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基础,其中不包括政党,他认为这样的内阁能提供最好的统一基础。工人总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支持他;但是各党派激烈反对,结果辞职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各部长也退出了内阁;在内格林领导下组成一个新政府来贯彻这项统一工作。新政府的主要部长有阿萨尼亚的追随者希拉尔,他担任外交部长,还有社会党反对派领袖普列托,负责军事改组工作。内阁中共有3名社会党人、2名共产党人、2名左翼激进派、1名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和1名艾斯科拉党的加泰罗尼亚人——可见这个内阁本质上是人民阵线的内阁;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其中占据了微弱多数;这个内阁严肃地对待工作,根据共产党的要求行事,并迅速在统一和坚强的集权控制的基础上重新安排国家大事。但是这一切已经为时太晚,无法转败为胜,特别是由于德国海军选中了这个机会来加紧进行干涉,在5月31日炮击阿尔

梅里亚。

在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冲突中,真正的争端是什么呢?在许多乱作一团的争论中,有一个争端无疑是“工人管理”问题。在1936年10月发布,并在同年11月得到另一项法令补充的著名的《加泰罗尼亚集体化和工人管理法令》中,规定工业企业应该分为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两类。在集体企业中,管理权操纵在以企业委员会为代表的工人手中;在私人企业中,管理权由业主或经理掌握。但一切都须经工人管理委员会批准。雇佣工人在100名以上的一切企业,以及业主已被宣布为叛乱分子或已自动放弃产权的一切企业,都收归集体所有。企业委员会由全体工人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可以连选连任。该委员会既对工人负责,也对根据《法令》而设置的工业院负责。一般说来,它兼管生产和福利工作。每个企业委员会选出1名经理行使职能,并包括1名政府督察员,以保证其遵守法律的规定。非集体化的企业中也选举类似的工人管理委员会。总工业院包括4名企业委员会的代表,8名工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工人总联合会)代表和4名政府指定的技术专家。这些技术专家的任务是制定各企业的计划,他们的决定对于企业委员会具有约束力。

这是正式的法律,但几乎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如我们在前文所见,有的企业集体化了,有的还保持原状,根本没有一定的格局,而是五花八门,因有关的工人或其所属政党和工会的不同态度和策略而异。站在一个极端的是工团主义者或合作主义者,他们干脆将企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在另一个极端上则是将企业收归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管理,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在12月宣称主张完全社会化,以防止由于工人在各个企业中占用盈余而造成混乱;但是,无论是该联合会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强制实行一个统一的方案。全国劳工联合会赞成这



项《法令》，认为它是消灭混乱、建立秩序的手段；而工人总联合会则批评该《法令》在财政管理方面语焉不详，并批评它没有效率，他们说：选到委员会中的并非组织生产的高手，而是最著名的煽动家。实际上，《法令》是工团主义者与共产党人和右翼社会党人之间的一种妥协产物，工团主义者主张由工人进行管理，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而共产党人和右翼社会党人则根本不赞成工人管理，而一心要防止工人管理在工厂合作的基础上蜕化成集体牟利性质。在这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一样，站在工团主义者方面，但是他们反对以合作企业的形式牟利的程度，并不亚于工人总联合会和共产党。许多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拿同样的工资是理想的办法；但很少人认为这是目前可能办到的。反对追求利润的人主张将一切利润上缴给一个中央工业银行，用于帮助亏本的工业或需要投资的工作；但《法令》在财政方面的语意却含混到了危险的程度。

实际上，无论在加泰罗尼亚或其他地方，战争的紧急情况促使工业管理集中在政府手里，而没有建立工人管理的制度。1937年5月以后，加泰罗尼亚的军事工厂中的工人管理大部分被对政府负责的一长制管理所取代；共产党人及其同盟者牺牲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工团主义者，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很直接地卷入这场争论；因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几乎像反对个人受国家压迫那样反对个人受工厂委员会的压迫。但是在实现集中的纪律和一切服从于战争需要的新秩序下，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也衰落了。

在1936年共和党人竞选胜利以后的几年复杂斗争中，在思想战线上曾经有过激烈的斗争。正如西班牙政治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在右翼与左翼之间出现的斗争要少于中央集权主义者与意志自由论者之间的斗争。于是，随着战争的进展而力量日益扩大

的共产党人便与普列托领导下的社会党右翼和中派站在一起，主张统一管理，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团主义者，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后者认为自己站在左翼，其使命是将革命进行到具有完全无产阶级性质的阶段。拉戈·卡巴勒罗曾被认为站在社会党左翼方面反对普列托，并曾表示愿意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合作，并且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合青年运动合作；当普遍统一的措施有损害他个人势力之虑、他挺身而出加以反对时，他被赶下了台。伊利里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在理论上站在极左翼，但它受到不知如何妥协的高度理想主义的激励，后来又为了统一而捍卫中央集权的管理，反对分裂倾向，于是它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影响就失去了一半。资产阶级左翼激进党人，即阿萨尼亚和巴里奥的追随者，做不出适当的理论贡献，但他们却为了提高作战的能力而支持统一这个论点。艾斯科拉党的大部分情形也是如此，它反对东卡斯所领导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派中所隐藏的分裂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毫无疑问有权利自称为“真正的”左派，因为它主张立即从人民阵线过渡到建立在纯粹无产阶级基础上的工人共和国；但是，它不但远远没有使工人统一起来，反而使工人更加分裂。而且，它在加泰罗尼亚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势力，而在加泰罗尼亚则几乎与所有的人都水火不相容。它最有能力的领袖何奎因·摩林在战争爆发以前曾到加利西亚去访问，这时他与外界断绝了联系，被囚在加利西亚的叛军地区，此后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坐第二把交椅的宁，作为一个领袖来讲，能力远不如他；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1937年5月巴塞罗那暴动以后，宁被逮捕，并在狱中被谋杀。

在社会党人中间，杰出的人物是拉戈·卡巴勒罗和英达勒齐奥·普列托。卡巴勒罗在下台之前一直担任工人总联合会的书记；普列托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在西班牙议会中是毕尔巴鄂地区的代

142 表,是巴斯克社会党人中的领袖人物。普列托就其本性而言,纵然不是一位右翼分子,也是一个中派人物;但是他的组织能力和他对中央集权制的信念,使他在反对拉戈·卡巴勒罗的斗争中成为共产党的同盟者,他几乎从来不赞同拉戈·卡巴勒罗。他不仅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演说家,而且是一位坚强的人,但他的总的见解却始终是和缓的。他出身职员,但他想方设法参加了毕尔巴鄂那一批头脑冷静的工人的队伍;尽管大家都说他出身资产阶级,并且对巴斯克的大工业家奥拉西奥·埃切瓦里塔感恩戴德,但他仍在工人队伍中确立了强有力的地位。在其他社会主义者领袖中,工人总联合会主席胡利安·贝斯太罗确实是一位温和主义者;路易斯·阿腊基斯坦是社会党的主要理论家,他与拉戈·卡巴勒罗一起下台;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是外交事务专家,在内战期间长期侨居巴黎;最后,胡安·内格林是一位大学医学教授,在拉戈·卡巴勒罗被赶下台以后,他应召主持内阁。他曾在拉戈·卡巴勒罗的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在经济问题上多少是一位专家。在共产党人中间,领袖人物是曾任内格林内阁教育部长的胡安·埃尔南德斯、曾任农业部长的维森特·乌里巴,以及共产党领袖何塞·狄亚斯。赫米纳尔·德索萨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书记,曼里科·巴斯克斯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书记。胡安·科莫雷腊领导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胡安·卡萨诺瓦斯领导名义上属于路易斯·孔佩尼斯领导的艾斯科拉党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分裂)派。

人们指责共产党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控制了共和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在国际不干涉政策破产以后,除了遥远的墨西哥以外,非但苏联成了共和党人唯一能够指望给予援助或同情的政府,而且由于内战的爆发,需要集中共和国各派的力量并废除乱七八糟一大堆相互争吵的集团所声称据有的独立权力;而纪律严明的中央集权制则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党的主要政策。

执政的共产党人认为没有什么能阻碍这样的中央集权制,而且这种制度大有可取之处。因为在共产国际关于人民阵线的新政策指导下,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尽量多吸收人参加,并在联盟的主持下专为击败法西斯而战斗,除此以外,不为任何其他的目的,只顾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不惜放松反法西斯团结或妨碍作战行动,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是完全违反共产党的政策的。共产党人坚决相信社会主义——还有共产主义——在法西斯被击溃后一定会出现。反之,不击溃法西斯,则将一事无成。因此,他们根本不愿意把他们的要求强加给人民阵线的其他党派,除非出于确立统一行动的需要。他们说,首先要赢得战争,然后我们再负责处理其他事情;然而在赢得战争之前分裂人民的队伍,是宗派主义的犯罪行为,不论犯这种罪行的人目标是多么高尚,何况宗派主义者的某些目标在共产党人看来绝不是高尚的。共产党人不喜欢工厂由工人管理,他们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对于自由的幻想。他们也不喜欢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空想的个人意志自由论,认为这与阶级纪律和阶级团结背道而驰。他们与阿萨尼亚的左翼激进党人或与社会党右翼相联合,要比与工团主义者或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相联合容易得多。后者的确是共产党的最大的敌人,因为它们不断地指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已蜕化成为官僚制度的国家,并且还收容与斯大林派决裂而沦为激烈的反对派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

至于社会党人,他们最大的力量总是集中在马德里,而马德里与各省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对头。马德里总是大胆鼓吹中央集权,而加泰罗尼亚则自然而然地在它认为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尽量要求自治——当加泰罗尼亚地区(分裂)派抬头的时候,所要求的还不止于此。艾斯科拉党最低限度是一个联邦主义政党,它并不十分希望与西班牙的其他地区脱离而建立一个独立的加泰罗尼亚

144 国家,但它要求在很松散的统一联邦内享有充分的内部自治,党内有一部分人则要求彻底独立。该党领袖孔佩尼斯曾在紧要关头接受西班牙政府的援助来扑灭巴塞罗那叛乱,大部分加泰罗尼亚共和党人接受他的领导。巴塞罗那虽然是共和政府的最后的首都,但从来就与马德里不和,它一直怀疑马德里具有阴险的中央集权阴谋;甚至在极端的联邦主义派和分裂主义派在1937年失败以后,紧张状态仍然继续存在。

至于巴斯克地区,乍一看来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不仅是社会党人,还有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人也与共和国同命运,即使是为了回答共和国允诺巴斯克自治而这样做也令人感到诧异——这项允诺由普列托如期履行了,尽管普列托本人总的说来支持中央集权制。他们决定这样做部分原因是由于附近有支持叛军的纳瓦尔保王党,还由于纳瓦尔与巴斯克各省之间又有世仇。另一部分原因是社会主义运动在毕尔巴鄂很有力量,而毗邻的阿斯图里亚斯又有很大势力,阿斯图里亚斯的左翼尽管在1934年叛乱以后遭到严厉的镇压,当时该地仍然是左翼的根据地。不过巴斯克各省刚从共和国获得自治法令就遭到了叛军蹂躏并失去了战斗力。

西班牙内战在1936年开始时主要是西班牙人之间的战争,或者至少是西班牙共和党人与得到摩尔人及西班牙外籍军团援助的西班牙叛军之间的战争。但是后来就越来越成为法西斯分子与来自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人士在西班牙土地上和西班牙周围的海上所进行的一场国际战争。首先是意大利人,接着是德国人向意大利输送了大批军火,并派去了整批军队,援助叛军;后来苏联也供给军火,进行报复,但没有输送战斗人员。不过有许多国家都有人来参加国际纵队——来自意大利和德国,来自法国和英国,事实上几乎来自世界各国。国际纵队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是共和国方面唯一有效的战斗力量——直到最后好不容易才着手训练一支统一的

共和国军队,但为时已经太晚,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了。国际纵队在保卫马德里的紧要关头发挥了主要作用;当时尽管有法国和英国的反法西斯人士,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人,竭力给予援助,国际纵队仍缺乏必要的供应品;但面临着这种情况,它仍英勇作战,表现十分突出。这是人民阵线作为一个国际运动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但是,在英国由于劳工运动中的大部分人摒弃人民阵线的策略,在法国则由于人民阵线本身固执地遵守不干涉公约,而且在人们公认法西斯分子早就不遵守公约以后很久仍然单方面继续遵守公约,因此使这一国际运动遇到了困难。 145

在英国当时的情况下,援助西班牙主要成了英国共产党和支持它的左翼人士的呼声,而官方的工会运动和工党则置身事外,表示不同意,原因不在西班牙,而在于它们担心与共产党人纠缠在一起。在勃鲁姆政府下台以后,法国的局面与英国颇为相似,当时法国共产党事实上已离开残存的人民阵线,并且越来越反对企图破坏人民阵线工作的各届政府。这样,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就孤立无援地维持着激进党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所支持的政府。这三派继续紧密合作,直到最后。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部分原因是大多数西班牙政党(其中包括勒鲁的右翼激进党)极端反动,使左翼激进党没有选择余地;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决定不与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争吵,免得削弱他们在国内外的号召力。如果共产党越来越多地控制西班牙的事务,这也许并非主要由于共和党人依赖俄国的物资供应,或由于西班牙共产党人想要大显身手,而是主要由于各敌对集团的宗派主义态度使局势日趋危急,而共产党的政策最适合当时的局势需要。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做得对而它的反对者们做得不对;因为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反对工团主义者和他们所谓的“托派分子”到了极端荒唐的地步,而且共产党人所用的方法非常残酷和专横。此外,在 146

内战结束以前，苏联已几乎停止供应物资，共产党的影响已经显然呈现衰退迹象。

人们常说，西班牙人由于强烈的个人主义和排他主义，不可能齐心协力地来适应巩固革命的需要。他们曾一再显示出进行革命的能力；但是推翻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是一回事，用另一个能存在下去的政体来代替它却是另一回事。西班牙人在1931年轻而易举地推翻了阿方索十三世，并立刻着手进行摆在他们面前的建设性工作。但从一开始的时候起，他们的新政府在治理国家方面几乎不比它所取代的旧政府高明；无数单独的集团和派系纷纷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政府不得不向它们让步，以安抚它们。尽管如此，阿萨尼亚政府在两年内仍取得了很大进展，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一大批最初的支持者，并且终于在1933年遭到惨败。接着是执政两年的所谓中派政府，这些中派政府肆无忌惮地破坏前任的成就，为极右派提供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得以投身于希尔·罗夫莱斯的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而在议会外，则投身于更为右倾、而且公开煽动其追随者采取暴力行动的确确实实的法西斯主义组织。1936年初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获得的，接着左翼也采取暴力行动，与法西斯分子针锋相对，时隔寥寥数月就爆发了内战。

到这时为止，左翼一直联合一致地反对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和法西斯分子；左翼联合起来反对什么固然是明确的，但是他们联合起来争取什么就比较难说了。的确，左翼与其说是积极的团结一致的运动，不如说是许多压力集团，每一集团都竭力追逐自己的目标。要让政客们就加泰罗尼亚或巴斯克的自治问题，或者甚至就工会的作用问题，在口头上达成协议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尽管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简单的。但是要让政府说服它的支持者相互信任，或者把各自所能掌握的力量集合起来，就远不那么容易

了。每一政党和集团都有自己的民兵组织和它所控制的派系，同时还有妒忌外来干涉的独立的派别组织；政府企图取得各敌对集团的帮助而不用强硬手段制止它们争吵。这样一种结构绝对不可能建立这样一支共和国军队：在野战中堪与法西斯分子相匹敌，或适当统一协调每一党派往往据为己有的军需物资。因此，即令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怀疑斯大林派的中央集权制方面是很有道理的，在内战的情况下反对这种制度等于自取失败。实际上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了；尽管人们可能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许多愿望，但是要想在 1937 年的战争情况下实现这些愿望，至少是非常愚蠢的，而且表明这样的人没有能力进行现实的分析，只能受到谴责。大多数西班牙共和党人士实际上谴责了这种无能，他们认识到必须集中全力进行战争，并且必须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推迟到战争胜利以后，但是等到恢复这种正确理解，已经太晚了。

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人意见一致，并不等于说对其他共和党人、甚至对在这个问题上与共产党人意见一致的人来说，共产党人就不是难以对付的同事了。因为共产党人的特点是不论在任何情形下都为苏联辩护，并且绝不承认苏联或苏联的政策会有什么差错；当大叛国案的审讯在苏联进行的时候——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其他老布尔什维克领袖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在最严重的罪名加在苏军最著名的将领头上的时候，这种辩护就尤其不容易了。毫无疑问，西班牙共产党人与其他国家中他们的同类一样，全都自以为是并且瞧不起别人。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的主要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至于拉戈·卡巴勒罗，他的缺点并不是做错了什么事，而是没有力量实施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主要是一位工会领袖，有工人总联合会作他的工具，但他认为需要使工人总联合会与全国劳工



148 联合会协调起来：当时后者在加泰罗尼亚和南部地区的人数远远超过前者，不过在马德里和北部地区则远远落后于前者。他想要使两个机构紧密地合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作出巨大让步——事实上他所做的让步非常多，以致于使他心目中的团结目标成了泡影，作为一个社会党人，他倾向于中央集权制；最初他似乎站在右翼方面反对左翼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他就这样稳步地向左倾，成为反对普列托和贝斯太罗的社会党左派领袖。他以左翼分子的身份出任总理，但是由于他不愿意压制那些力图维持派系主张的极左分子，他失败了。最后，他被在凌驾一切之上的统一管理问题上与共产党人抱同一态度的、比他右得多的社会党人赶下了台，失去了主要是社会党人与工团主义者所组成的政府的总理职位。同时我们还必须记住，他已年迈力衰——1937年他下台时已六十七岁。

西班牙的斗争虽然存在种种复杂混乱的情况，对三十年代后期的许多青年人来讲，它不失为反法西斯战斗的象征。面对着法国和英国方面的胡说八道的“绥靖”论调，青年们慷慨激昂地投身于西班牙的正义事业。许多人作为国际纵队战士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牺牲。有些人，例如乔治·奥威尔和英国独立工党的某些领袖由于加泰罗尼亚发生的种种事件而极为失望，他们在那里的冲突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方面反对共产党人。但是，大部分外国的同情者都不想提出批评：他们只不过是支持拿起武器反抗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西班牙人，而法国和英国却在法西斯危机面前踌躇不决，甚至还有一半同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认为他们是左派的敌人。西班牙成了青年们豪放的理想主义的主要中心；那些在青年时期经历过这件事的男男女女，是不会轻易忘记它的。在英国，这些日子是维克托·戈兰茨组织的左派读书俱乐部和共同编辑左派丛书的哈罗德·拉斯基和约翰·斯特拉契的全盛时期。即使他们

没有能够赢得工会和工党的大部分人的支持,但是在酝酿社会主义的舆论使之对于 1939 年在“绥靖政策”破产时爆发的战争有所准备方面是起了作用的;他们之中其余的人与共产党人不一样,并没有随着《苏德条约》的签订而彻底改变态度,而且继续不断地在 149 反法西斯的道路上前进,经过了 1940 年那几场灾难的考验,直到 1941 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共产党人重又采取他们这种立场。的确,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都没有给予西班牙共和党人以应有的支援,但是英国的左派却大可以深自庆幸,因为至少在这场斗争中它尽力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事情。

## 第六章

### 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消亡

15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衰亡的时期，在陶尔斐斯和舒施尼格的统治下，衰亡的过程尽管已经很久，但并没有结束；在1938年纳粹入侵和并吞奥地利以后，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如我们在本书第四卷中所见，实际上至少从1927年起，社会党人就已开始退却。这一年，奥地利法西斯党的非正规武装的暴行，在奸诈的教士塞佩尔博士的政府的纵恿和积极怂容下，达到了新的高峰；一些家乡自卫团团员在布尔根兰的沙滕村发生骚扰时犯有杀人罪，证据确凿，已依法起诉，但陪审团开释了他们。开释一事引起了工人们极大反感；大批人游行示威，队伍向维也纳内城进发，不顾警察制止，纵火焚烧了司法部。这次示威游行出人意外，并非社会党领袖或工会领袖事先布置，因此工人阶级准军事武装力量舒茨本德<sup>①</sup>没有被调来帮助维持秩序。人数众多的示威群众中大部分人没有武器；而在惊魂初定以后把力量集合起来的、在人数上超过示威群众的警察，用强硬措施驱散群众，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射击，结果85名游行示威者或者只不过在旁边看热闹的人被击毙，受伤者在1,000人以上。这一屠杀行动引起了工人们更

---

<sup>①</sup> 舒茨本德，德文 Schutzbund 音译，意为“保卫同盟”，全称“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武装组织。1923年根据工人群众的要求为抵抗反动派而成立，曾积极参加1934年2月的反法西斯起义，但由于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叛变，那次起义遭到失败。该同盟大部分成员加入了共产党，部分成员成立了同盟的秘密组织，一直持续到1938年德国占领奥地利。——译注

大的愤慨。塞佩尔总理公开同情奥地利家乡自卫团,而该团的领袖则不断公开扬言,要以武装暴动来摧毁民主共和国;塞佩尔尽管正在等待时机,却毫不隐讳他要扫除民主政体的决心。社会党人稳固地控制着维也纳,在其他工业城市也很有势力,但在农村地区没有什么力量;而且当它与主要敌手基督教社会党、该党的同盟者家乡自卫团和农民联盟以及泛日耳曼国民党四派的联合力量较量的时候,他们似乎注定要在国民议会中永远成为少数派。基督教社会党中包括那些准备在议会制度下工作的人物,但它越来越处于塞佩尔的控制下,而塞佩尔却是民主政治的公开敌人,他曾宣布打算消灭社会党人,并且按照一种新模式改造奥地利的制度,使教会的权力在其中能有效地恢复。 151

社会党在1927年7月的大屠杀以后,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应采取什么行动。社会党的领袖不能无所作为:因为追随者们的情绪过于强烈。问题在于:他们诉诸内战,从而以武力作为答复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其实除了投降以外,只要有任何旁的路可以避免诉诸武力,他们是很不愿意诉诸武力的。在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初期,当社会党执政而它的反对者节节败退的时候,社会党人曾十分努力地创建过一支忠于共和国宪法的新军队,并曾一度很成功。但自从1920年起,他们就退出了联邦政府,不过他们继续控制着在联邦政府内据有自治州地位的维也纳市;在社会党人下台以后,基督教社会党人所控制的各届联邦政府破坏了社会党在这方面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撤换了社会党所任用的军官,代之以他们自己能够信赖的人。社会党人确信:就1927年的情况而论,军队将拥护塞佩尔,反对任何暴动企图,而共和党人的保卫同盟尽管人数众多却武装羸劣,不善作战,而家乡自卫团的非正规军则装备比较精良,并且残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党人企图武装起义,失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社会党领袖力图找出另一种途径,

来表示要采取行动的决心，以足以防止他们的一部分追随者擅自行动。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号召举行总罢工，当时这一号召得到了大规模的响应。但是，总罢工显然是不能持久的。它不是必然迫使塞佩尔政府辞职，就是必然转变为一次革命运动，否则就必定会失败。塞佩尔由于十分了解这一点，而且很可能深信社会党不致于诉诸武装起义，干脆听凭罢工自然发展，拒绝一切让步；罢工工人不久就复工了，一无所成。塞佩尔是一个很有胆量、斩钉截铁的人，他能够加强对基督教社会党的控制并且继续与家乡自卫团的领袖紧密合作；这时社会党开始采取有所约束的策略并企图妥协，结果在 1934 年的斗争中以毁灭告终，不再是一个公开的力量了。

为什么社会党在 1927 年时认为上策是忍受极其严重的挫折而不是诉诸武力呢？关于这一点，还有另一个理由：甚至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开始和纳粹党人在德国执政以前，奥地利的国际地位就十分困难。奥地利共和国在经济上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它必须争取国际联盟援助，从而接受国际联盟的经济控制。社会党人十分清楚：如果他们发动战争，就会遇到国际联盟各成员国的强烈反对，而且，即使他们在内战中获胜，此后在维持人民生活方面也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奥地利反动派已经惯于放肆地指责奥地利社会党人是准备引导国家屈从于共产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诽谤的论调已深深嵌入外国政治家的思想；这样一来，奥地利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一出现，就肯定会遭到外国政治家的猛烈反对，尤其是在内战后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就更加是如此。

当然，奥地利社会党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共产主义运动在奥地利工人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人支持。奥地利共产党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赢得一个议席，或者在巩固的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行列中引起任何重大的分

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有它的右翼和左翼；奥托·鲍威尔<sup>①</sup>领导的左翼总的说来在制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方面起着较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认为鲍威尔或道伊奇是秘密的共产党员，那纯粹是异想天开。我们知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曾经强有力地支持总部设在维也纳的“第二个半国际”。“第二个半国际”曾经拒绝承认对立的第二国际的这样一个宣言：民主制度就其取得议会多数这个意义而言，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被认为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第二个半国际”还坚决认为：至少就某些国家来说，可能已存在一些具体条件，可以据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社会党人可以遵循的唯一道路。它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反对下，主张成立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又包括共产党人的单一国际，并且为了实现这种团结，在存在一线成功的时候就进行不懈的斗争，不过没有成功。但是，奥地利社会党人曾利用它执政的短暂时期在奥地利建立的并不是苏维埃制度，而是纯粹的民主议会共和国；它之所以这样做无疑是希望自己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但同时也是因为民主议会共和国正是社会党诚心诚意认为是正确的制度。在当时的共和国中，奥地利社会党作为一个统一的政党行动，不仅得到本党的右翼、也得到左翼的支持。的确，它曾坚持认为，尽管奥地利的面积和人口有限，然而在这个联邦国家的共和国内，社会党的堡垒维也纳应该成为具有制宪权的联邦单位，它在社会和工业事务方面应该具有广泛的自治权；那时社会党人认识到：要使社会党在整个国家据有大多数议席，这个可能性势必取决于社会党是否能获得相当数量的农民的支持。但是在新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这个希望看来并非不近情理。在具有大批农民党员的基督教社会党

---

<sup>①</sup> 奥托·鲍威尔(1881—1938年)和尤利乌斯·道伊奇(1884—?)都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译注

中,有一些人既在原则上接受议会民主,同时在实际上又准备以此为基础与社会党人合作来共同管理国家;而社会党人则希望奥托·  
154 鲍威尔为他们拟定的农民政策将赢得可观数量的人转入社会党。1927年时社会党人仍抱有这种希望,不过这时候无论是塞佩尔影响下的基督教社会党还是农民联盟,都已反动得多,并且更加赞成天主教会的反民主主张。除了这些政党以外,社会党人还不得不对付主要由旧贵族和前帝国军队的军官领导的家乡自卫团日益严重的挑战,家乡自卫团从一开始就宣称是民主制度的敌人,并公开威胁要用武力推翻民主制度。家乡自卫团的一些分队与工人阶级团体之间经常发生日益狂暴的冲突;当家乡自卫团在社会党占支配地位的城市里举行进军和示威游行时,在政府拒绝禁止这些进军或拒绝保护工人阶级居住区免遭其暴力行动的危害时,这种冲突就更带有威胁性。

家乡自卫团尽管一再声称要用武力消灭民主共和国,实际上从未进行武装暴动尝试。它之所以不敢这样做,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它的人数居于劣势,并且得不到基督教社会党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或许是由于它认识到共和国的军队尽管已经整肃了大批社会党领袖,在它悍然暴动时仍然会服从命令来进行镇压。在1927年以后,家乡自卫团像从前一样,仍被允许拥有武器和获得新的武器,但是社会党的保卫同盟的武器却经常被查抄,结果大量武器被警察没收。尽管遭到这样的查抄,仍然有大批军火暗藏在社会党人的手中;可是越来越多的查抄严重地妨碍保卫同盟建立新的武器库。塞佩尔自始至终与斯塔海姆贝格以及家乡自卫团其他领袖紧密勾结,利用他们作为工具来使基督教社会党和农民联盟更加全面地支持他的反革命政策。

塞佩尔在这个时期没有企图用武力来推翻民主共和国,而是打算修改宪法,以便除去宪法中的民主成分,代之以他公开称作是

“真正”民主的内容。他尤其想要大大扩充在此之前只不过是傀儡的总统的权力,以便使总统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唯有他拥有任免部长的大权,并有权在议会休会期间发号施令管理国家大事。塞佩尔还主张修改选举制度,不由获票的多寡来决定代表权,而是按照沃格尔藏<sup>①</sup>所提出的总体国家的路线将代表权给予社会集团和权益集团;在这种国家中,教会的主张将得到很大的尊重。这些概念与社会党坚持议会民主的路线之间不可能有相互沟通的桥梁;但是塞佩尔,更不用说他的继任者,却不断与若干社会党人进行谈判,要想达成需要社会党人为了全国团结而作出若干牺牲的妥协。通常参加谈判的主要代表是社会党书记、社会党右翼领导人丹尼贝格。谈判经常是秘密进行的,但从未有过获得最终成功的希望。

在1927年的事件以后,塞佩尔继续担任总理一职仅有一年半时间。以后他辞职了,由一位多少比较圆通的基督教社会党人继任,但塞佩尔仍在幕后指导政策。修改宪法的计划又被提了出来,社会党人又被邀请进行“妥协”。这一次(1929年)社会党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妥协了。塞佩尔以往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共和国总统不由议会选举,而由全民直接选举。这时社会党人同意接受这项提议,但提出条件说:这项变更不适用于下届选举——实际上是最后一次选举——,只适用于下届以后的选举。所有其他主要变更都没有被采纳,因为按照宪法规定,修改宪法须经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而没有社会党人支持,要想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是不可能的。

社会党就这样平安无事地摆脱了1929年的危机;但不久便发

---

<sup>①</sup> 沃格尔藏男爵(1818—1890年),十九世纪奥地利社会改革家和政论家。——译注



生了其他的麻烦。对 1927 年的枪杀事件应负主要责任的维也纳警察总监舒贝尔在 1929 年出任总理，他与社会党人就宪法改革问题进行协商，谋求妥协。在协商以后，舒贝尔又与德国谈判关税同盟，但此事立刻遭到法国拒绝。自从 1919 年以来，德奥全面合并一向是社会党政纲的一部分，但是和约明文禁止德奥合并而要求奥地利保持独立。德奥两国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接触仍然非常密切——考茨基本人和鲁道夫·希尔费尔丁原籍是奥地利——，在新成立的奥地利国家中，几乎全部人口都讲德语，文化素养也是德国的。德国这时仍是魏玛共和国，纳粹主义运动虽然开始得势，仍不过是一种反对党的运动。因此，关税同盟或德奥合并，在民主议会制的基础上似乎仍然是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奥地利以具有制宪权的邦或州的地位加入德国，民主议会制似乎会在奥地利巩固起来。但是当时既遭法国拒绝，而法国又获得其他对奥和约签字国的支持，于是一切便都行不通了。

此后不久，舒贝尔政府由于与家乡自卫团发生争执而下台，因为该党一直企图夺取社会党人控制铁路人员的权力，并曾经要求任命一位将在这个运动中与他们携手的铁路总经理。由于家乡自卫团所提的具体人选过去有些劣迹，舒贝尔拒绝任命他为总经理；舒贝尔就此被赶下台，由坚决支持家乡自卫团的副总理卡尔·伏戈因继任总理。这时舒贝尔就企图以若干小党为基础，建立一个介于天主教徒和社会党人之间的中间党派，并争取到了足以剥夺伏戈因在议会中的多数的支持力量，尽管当时塞佩尔本人随即同意入阁担任外交部长，并有包括斯塔海姆贝格在内的两名家乡自卫团领袖在内阁任职。政府不愿意举行选举，因为无论是对舒贝尔还是对社会党人，政府都毫无获胜希望；但是社会党人提出威胁说，如果政府企图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进行统治，它就要诉诸武力。政府被迫举行选举，结果没有获得多数。家乡自卫团以一个

独立的政党身份参加竞选,只获得8个席位,这就暴露了它的软弱。伏戈因政府辞职,由较温和的基督教社会党内阁接替;但是原先在选举中遭到惨败的基督教社会党,此时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它仍有大批农民支持,但是包括塞佩尔在内的该党领袖,由于与家乡自卫团结盟而声誉扫地,使得基督教社会党地位不稳,到了绝望的地步;而曾经保证不用不合乎宪法的手段来达到改革宪法的目的的舒贝尔,这时获得了足以绝对阻止塞佩尔达到目的的支持——这个目的首先就是消灭社会党,从而恢复教会的权力。

塞佩尔认识到了所处的绝境,而且对舒贝尔极为恼怒,于是采取步骤,表示愿意与社会党人一起组成联合政府,而社会党却是他曾赌咒发誓要消灭的。塞佩尔本人打算在这样一个政府内担任总理,由鲍威尔担任副总理。然而这种联合政府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社会党人立刻拒绝了 this 建议。这事发生在1931年春季。塞佩尔提出这个要求的直接原因是:路特希尔德家族<sup>①</sup>所控制的庞大的奥地利信贷银行由于被迫接收不久以前倒闭的反动地产信贷银行而陷入困境,因而倒闭。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奥地利的国境的信贷银行的倒闭,标志着严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确已降临。奥地利由于失去了以往奥匈帝国的继承国<sup>②</sup>中的市场,自从1918年以来,无论经济情况是好是坏,都经常存在严重的失业。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党人的第一项举动几乎就是提出一个社会和工业的立法制度,其中包括由公家供养失业者的办法;维也纳曾利用它相

---

① 路特希尔德家族起源于德国银行家迈尔·安姆策尔·路特希尔德(1743—1812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开设的一个兑换所,是一个分支很多的财政寡头家族。——译注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分裂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其他部分则划归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等国。以上这些地区称为奥匈帝国的继承国。——译注

当大的立法权,从各方面来补充国家的供养,尤其是在控制房租方面和为工人阶级租户建造政府补贴的住宅方面。这些社会保险措施获得基督教社会党中较进步分子的某种支持,这是该党中反社会党的多数所无法破坏的,尽管他们曾千方百计使维也纳在财政上陷入困难境地。但是 1931 年降临在奥地利头上并且在若干年内几乎毫不减弱的经济打击,确实是空前严重的,而且大大削弱了工会的谈判权,不过经济打击丝毫没有动摇工会对奥地利大部分地区的产业工人的控制。只有一家大工业联合企业——阿尔卑斯矿业公司——利用这个机会在它的雇员中间粉碎了社会党的工会,并将这些工会改组为附属于家乡自卫团的“公司”的工会。这家公司后来由德国资本家买进;1933 年当希特勒上台的时候,这些资本家将这些“公司”的工会转交给纳粹领导,这就使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拥有了第一批力量雄厚的工人阶级追随者。

塞佩尔要求与社会党人组成联合政府的目的,是要以民族团结的名义把社会党人拖下水,让他们一起来采取激烈措施应付经济危机——如削减工资,尤其是对包括铁路员工在内的公务人员削减工资;削减社会公益金,尤其是对失业人员削减救济金等等。如果社会党人当初同意参加执行这样一个纲领,他们一定会被谴责为出卖工人,因而失去许多群众的支持。但是,即使当初社会党人另有一套自己的纲领,也没有机会实施,因为当初想要组成社会党少数派政府,就会立即使所有其他党派联合起来把它搞垮。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软弱无力的基督教社会党内阁在没有获得多数议席的情况下执政。在这个过程中,奥地利的民主制度便日趋消亡了。

但是从这时起,奥地利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新因素——这就是纳粹主义运动作为舆情中的一个流派迅速崛起。1932 年 4 月在奥地利大部分地方举行的地区和市政选举中,在德

国尚未当权的纳粹党人在奥地利政治生活中突然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出现了。纳粹党人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并不是靠削弱社会党人的力量取得的,而是靠削弱基督教社会党人的力量取得的,前者保住了自己的地盘,而后者在维也纳则几乎有半数议席落到纳粹党人手中,并且有一部分家乡自卫团从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运动转到了德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从此以后便有两个十分敌对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在奥地利争夺权力,它们同样下定决心要推翻民主共和国,但是一个发誓要在旧帝国军队、地主阶级以及维也纳的银行家和金融家等等代表所控制的反动政权下保持奥地利的独立,另一个则发誓要实行德奥合并——而德国已在1933年1月归于纳粹党人控制之下。与这两种法西斯主义组织相对立的是社会党人,他们一向支持德奥合并,但是当德奥合并意味着把奥地利并入纳粹德国而不是成为魏玛共和国中的自治成员国的时候,他们对德奥合并的看法就开始完全不同了。残余的基督教社会党处在这些相互矛盾的势力之间,态度暧昧不明,该党在塞佩尔领导下已成了家乡自卫团的同盟者,但该党的大部分成员是农民,他们对于国家的政策毫无明确概念,只是听凭别人系统地向他们灌输社会党如何可怕的思想,别人告诉他们说,社会党人是决心要夺取他们土地的布尔什维克。

这时(1932年),社会党人的主要敌人塞佩尔死了,基督教社会党不得不物色一位新领袖来接替他。塞佩尔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多年来毫无疑问是奥地利的铁腕人物,他奉行一种不正当的阴谋策略有两个明确的目标——一个目标是彻底消灭社会党和该党强加在奥地利国家身上的民主制度,另一个目标是恢复罗马天主教会在政治方面和整个国家生活中的权力和影响。这两个目标得到他的继任者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博士的充分赞同,陶尔斐斯出任总理,在议会中仅有一票多数,他设法拼凑了一个内阁,因此这

个内阁完全不可能制定有严重争议的法律。天主教会要想获得这个基本多数,就必须依靠一小撮家乡自卫团议员的支持。但是家乡自卫团对天主教会的支持已经由于奥地利纳粹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大为削弱。在议会外面,天主教会与斯塔海姆贝格以及费伊少校所领导的残余的家乡自卫团结成的联盟所争取到的支持者大概还没有它失去的多。但陶尔斐斯作为天主教会的孤臣孽子和民主制度的死敌,热心地奉行塞佩尔的修改宪法的计划,同时以塞佩尔从未有过的露骨态度歪曲这些计划,抛却议会代表制,使之确实成为以“等级”结构为基础的、宗教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陶尔斐斯是农民的私生子,由于他资质颖悟,很有前途,因而得到别人的资助,设法进了维也纳大学。他不愿意当神甫,他开始的职业生涯是在天主教团体中充当职员,不久他就成了下奥地利农会的秘书,而且是基督教社会党中公认的农民问题专家。最初他在农民运动中属于比较民主的一翼,但主要在塞佩尔的影响下,他转向了右翼,成了彻头彻尾的独裁主义思想的代言人。尽管他一度成为独裁者,但就其本性来讲,也许并不是独裁者;不过他喜欢弄权,并决心不惜使用他所掌握的一切手段进行反对社会党的斗争。

陶尔斐斯执政不久,就得到了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地取消奥地利议会的意外机会。他的政府面对着经济危机,无法筹措款项,于是便决定将国家雇用的铁路工人的工资每月分三次付给,而不再在月初付给。铁路工人为此举行两小时罢工,以表示正式抗议;政府抓住机会,开始大批解雇工会会员中的积极分子。这事被提交议会,政府方面以一票之差失利,但后来发现有一个社会党议员投票出于疏忽,所使用的是旁边一个人的票而不是自己的票。于是关于这次投票是否有效的问题就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在接着发生的这场轩然大波中,社会党议长卡尔·伦纳尔辞职。接着他的天主教同事——第一副议长也宣布辞职。第二副议长是个民族主义党

分子，一见机会到来也跟着辞职了。于是当时就没有一个人根据宪法规定有资格召集议会。政府方面由于乐得摆脱议会这个死胡同，便支持这样的见解：议会无法召集，但由于它既没有解散又没有休会，所以让它在名义上保存下来。 161

这种奇妙的局面出现在1933年3月4日，也就是柏林的国会纵火案之后几天和希特勒在大选中获得压倒多数票的前一天。那次铁路风潮已经和希尔腾堡军火事件发生了牵连，这一事件主要是由铁路工人揭发的。案件的经过是：希尔腾堡有一家军火厂被证明违反和平条约和奥地利政府的官方政策，私造步枪运到匈牙利去。后来发现此案中的大多数武器并不是在当地制造的，而是从意大利运进来的，打算送到匈牙利去，倒不是为了给匈牙利人用，而是转运给克罗地亚的叛乱分子，那些人正在计划对南斯拉夫发动武装叛乱。与南斯拉夫人水火不相容的意大利人是把武器送到希尔腾堡来改装一下再转到克罗地亚去。墨索里尼在此事被揭发之后感到非常恼火，便从此下定决心尽一切可能帮助摧毁奥地利社会党人，其实这些社会党人如果事先知道后果有这样严重，也许会三思而后行的。

伦纳尔在那个紧要关头提出辞呈，在策略上无疑是犯了一个极严重的错误：因为他没有预见到两个副议长会效法他的榜样，走进一条宪法上的死胡同，使议会根本无法再行使职权。事实上那件事的后果是使陶尔斐斯从有名无实的民主共和国总理变成了独裁者。当时他之所以变成独裁者，远远不是由于他有此野心，而是由于他别无他法。这样一来，那时在奥地利争夺政权的便不止是两大势力，而是三大势力了——一大势力是社会党人，他们保住了实力，但没有进展；第二大势力是陶尔斐斯的基督教社会党与家乡自卫团的联盟，他们已经失去了大块的地盘；第三大势力是纳粹党人，他们已经吸收了大部分旧民族主义党分子或泛日尔曼主义分

子,而且还吸收了一部分家乡自卫团分子,当时在奥地利全国各地  
162 纳粹党人声势骤起。这三大集团谁也不可能在任何议会制度下获得多数,但其中也绝没有任何两个集团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第三个集团。陶尔斐斯与社会党人之间裂痕太深,而且当初如果与社会党人结盟就会意味着促使意大利和德国携手共同反对奥地利继续保持独立。纳粹党人既然一心一意要完全取消奥地利的独立国地位,自从希特勒在德国取得胜利以后,就不可能再与纳粹党人结成联盟了。这样一来,所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由基督教社会党实行独裁,尽管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该党加上家乡自卫团所能获得的选票还不足共和国的总票数的三分之一。

陶尔斐斯的独裁统治完全要依靠德意两国在对奥政策上发生分歧,而事实上也确实存在分歧。希特勒早就扬言要把奥地利并吞到新的泛日尔曼帝国中去,而墨索里尼则不愿见到德国军队控制布伦纳山隘,从而直逼意大利的国门。因此,陶尔斐斯就依靠意大利支持他那一套独特的天主教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根本不同,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基础之上的。在陶尔斐斯的天主教法西斯主义中,根本不存在与德意两国那种党的作用或元首或首相的作用庶几相近的东西。反之,当时倒是回转到沃格尔藏的、主张在“等级”的基础上建立基督教国家的概念上去了,其不同之点在于:沃格尔藏提出他的概念是用以防止大规模工业和金融资本的发展,而他的继承者则有很大一部分支持力量存在于大工业家、银行家和旧帝制时代的残存贵族之中。塞佩尔和陶尔斐斯所主张的制度的确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教会在这种社会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产业工人的控制力,对很大一部分农民也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他们主张不分阶级,把有职业的人口一律重新组织到“等级”中去,这是不现实的。陶尔斐斯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想办法彻底粉

碎工会力量,他那种“等级”结构就没有希望实现,而工会又是社会党的支柱,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对工会进行攻击。然而那时他必须不断地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不但要与社会党人作战,而且要与纳粹党人作战;他也深知,基督教社会党并没有团结一致地支持他,而是在党内存在着一个天主教工会运动和许多农民政治家,前者是他同样要推翻的,后者则绝不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与家乡自卫团结盟。

这时家乡自卫团已经成了一个参加政府的党派,主要是与社会党人作对,不过与纳粹党人也有冲突。陶尔斐斯曾经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安抚纳粹党人,特别是通过对社会党人采取强硬措施,但不久他就深深认识到:要和一个全心拥护德奥合并而且接受希特勒作“领袖”的党取得和解是完全徒劳的。事实上,纳粹党人对陶尔斐斯那种主动表示所作的答复是到处扔炸弹和采取暴力行动,逼得他不能不采取镇压措施。然而他主要的打击仍然是针对社会党人,并且没收了虽经一再查抄仍然残存在社会党保卫同盟手中的武器。当时这种搜查加强了,最后终于在1934年2月查封了林茨的社会党总部。林茨的社会党人决定不等到维也纳党中央准许就进行战斗;战斗由该地蔓延到其他地方,但并没有蔓延到全国。维也纳的党中央委员会得到消息之后以一票的多数决定举行总罢工。当时严重的失业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总罢工绝不是一个有希望成功的步骤。维也纳的保卫同盟成员有一部分人拿起了武器,但终归只是一部分人。总罢工彻底失败了。举行武装起义的那一部分保卫同盟成员节节败退地打了4天仗,但当政府方面把大炮调到战场上来对付他们时,他们就根本没有希望了。卡尔·马克思广场和维也纳市政府所建的大片工人住宅都遭到了严重破坏。那些进行战斗的人表现极为英勇,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成功希望;指挥对他们作战的费伊少校开始枪杀俘虏,其中至少包括一名



164 重伤员。在他就地绞杀了7名起义者以后,就由于外国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而没有继续这种做法。

虽然大部分社会党人没有参加武装起义,整个社会党和工会都被认为有责任。该党被解散,党部被查封,社会党下属各工会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主要的领导人,除了极右翼的以外,都被迫转入地下或流亡国外。奥托·鲍威尔逃到捷克斯洛伐克,在布尔诺定居下来,并企图以那里为中心继续进行宣传。保卫同盟的领袖道伊奇也逃往国外。但是解散社会党和工会并没有能把其中的任何一个消灭掉。党又物色到了新的领袖继续进行地下宣传,并且继续得到大部分工人的拥护来反对陶尔斐斯和纳粹党人。基督教社会党的工会在合并到政府所控制的新整体组织里去之前暂时获准存在,当时这种工会成了前社会党工会会员的集中地,并且在工资和就业条件等有关眼前利益的问题上进行真诚的谈判。就在这种局面下,产生了所谓“统一工会”,其原来的基础虽然是天主教工会,却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劳工组织,并且日益受到社会党人的压力。

对于社会党人说来,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维也纳市行政权易手,社会党人占绝大多数的民选市政会的行政权移交给了一个专员。这位专员立即下令停止市府主持的住房建筑工程,但在某些方面仍然企图争取维也纳工人的好感,特别是任命进步的基督教社会党人恩斯特·温特博士出任副市长。可是,温特本人的观点尽管相当进步,在社会服务事业方面却存在着雷格尔<sup>①</sup>传统,他没有什么权力,不能有所作为,不久就被撤换了。

起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内,陶尔斐斯由于受到家乡自卫团的领袖的怂恿,对社会党人进行报复,不过他的一些部长和支持者对

---

<sup>①</sup> 雷格尔是基督教社会党人,曾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任维也纳市长。——译注

那些比较极端的措施并不表示热心。批评他的人之中有维也纳新任市长施密茨博士、上述的温特博士,以及他那位赞成较温和政策 165 的司法部长冯·舒施尼格博士。接着在 1934 年 7 月,纳粹党人企图发动政变。武装的纳粹党人占领了总理府和广播电台,并从电台上播出消息说,陶尔斐斯已经辞职,由纳粹党的主要支持者林泰伦继任。叛乱分子在总理府抓获了陶尔斐斯,有一个叛乱分子把他打成了重伤,而且在拘押他期间既没有请医师,也没有请牧师。但是在此期间,政府军包围了总理府,外面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会普遍爆发叛乱来支持纳粹党人。费伊少校承认自己被俘以后,与叛乱分子谈妥了投降条件,于是就把总理府交出来了。但这时陶尔斐斯已经死了。至于费伊少校是否曾经答应叛乱分子在投降后可以安全脱身,双方的说法不一。费伊少校否认这一点,而叛乱分子则一口咬定说他答应了;但是至少当时并没有遵守这样的诺言。少数首要纳粹分子被绞死,但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除了维也纳这次未遂政变以外,纳粹分子还在卡林西亚和斯蒂里亚发动了叛乱,经过激烈战斗后才平息下去。许多叛乱分子撤退到国境那边,逃到了当时已经是德国的亲密盟友的南斯拉夫。

这次纳粹党人政变之所以失败,有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武装部队坚决反对纳粹党人,而纳粹党人在维也纳又没有民众支持。另外一个原因在限制叛乱的发展方面可能起了更加有效的作用,那便是墨索里尼将两个意大利师开到了意奥边境的布伦纳山隘。希特勒曾建立了一个由奥地利的逃亡纳粹分子组成的军团,这时也开到边境附近准备越过来。但希特勒打听到意大利军队的动向以后就犹豫起来。当时德国的重整军备工作还在初期阶段,有人力劝他不要冒险与意大利发生纠纷,那样可能立即引起一场欧洲大战。于是他便把奥地利军团调回东普鲁士,让奥地利的纳粹分子自生自灭。

陶尔斐斯之死使得奥地利政府的政策起了重大变化。他的继  
166 任者舒施尼格是蒂罗伦地方一个小贵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  
徒,对农民问题抱着相当开明的观点,在个人情趣方面有点自以为  
有高尚的文化素养。他与斯塔海姆贝格以及费伊少校这类的恶  
棍,或者是与家乡自卫团的一般观点都毫无共同之处;他尽管必然  
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但却并不急于要去迫害和消灭那些宣扬社会  
主义信条的人。因此,他尽管由于别无他路可走而继续维持着陶  
尔斐斯的独裁统治,施政却远比陶尔斐斯温和,而且从未阻止工会  
通过统一工会的形式复活。事实上,他是一个主张恢复反动气味  
最少的旧奥地利国家的老派绅士,自从1934年以后他一心追求的  
就是一个恬静的生活。不久之后,他就首先将费伊少校、接着又将  
斯塔海姆贝格亲王请出他的政府,而且都没有引起严重纠纷。他  
实际上承认,不仅纳粹党人,而且还有家乡自卫团都已大大失去了  
号召力,通情达理的人现在所最需要的是各安生业、不受干扰。但  
1934年的奥地利并不存在能作为舒施尼格所喜爱的政府的基础  
的那样一个温和的贵族阶级。他只有在德意这两个最危险的邻邦  
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或者说只有在墨索里尼愿意保护他抵制  
希特勒时,才能作为一个小小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的领袖苟延残  
喘。但是在这两个大独裁者一旦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一旦希特勒  
下决心行动,奥地利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崩  
溃。

在1934—1935年这个阶段,法国人是在尽一切努力离间纳粹  
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的关系,甚至把意大利算作主要以英法为基  
础的反纳粹阵线的一员。为此,就必须姑息意大利人,让他们攻打  
阿比西尼亚,并且部分地或全部地并吞它,作为意大利殖民者的地  
盘。但是进攻阿比西尼亚就是公开而直接地破坏国际联盟公约,  
尤其是因为阿比西尼亚已经被接纳为国联成员国,所以更加是如

此。这一点并没有对赖伐尔产生威慑力量,他认为,为了争取意大利的支持来反对德国人,纵容意大利的侵略是完全值得的。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与法国外交部长所签订的《霍尔—赖伐尔协定》在英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致使萨缪尔·霍尔爵士(以后是坦普尔伍德勋爵)被迫辞职,而且国联不得不考虑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行为实行制裁。经过一再争论之后,终于实行了某些制裁。但国联各成员国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本来会立即见效的唯一的制裁——对意大利武装部队实行石油禁运。这种方法之所以没有使用,是因为墨索里尼公开宣布,他认为这实际上等于宣战。

167

虽然国联对于制裁问题摇摆不定,它对阿比西尼亚战争的三心二意的干涉已完全足以使意大利投入纳粹德国的怀抱,并且为“罗马—柏林”轴心以及《反共产国际公约》奠定了基础。原先一直资助家乡自卫团的意大利这时停止了他们的资助;事实很明显,希特勒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消灭奥地利共和国。实际上他一直等到1938年3月。那时德国的重整军备工作已经大有进展,而且也显然可以看出:英法两国绝不愿冒任何战争的风险来采取行动制止纳粹的侵略。希特勒这时已经在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恶毒的宣传攻势,而一个时期以来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又极为亲善。事实上问题只是纳粹党先向哪一个国家开刀——是奥地利还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既然意大利对奥地利的保护已经停止,希特勒便决定首先吃掉奥地利。舒施尼格深知他的国家将要遭到什么命运,只不过他无法事先准确地知道进攻将在什么时候开始。接着,在1938年2月,希特勒把舒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命令他任命奥地利纳粹分子冯·蔡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并且拿出进军令给他看,上面载明如果他舒施尼格不服从,德军就将开入奥地利,对此他只好服从。接着舒施尼格回到维也纳,考虑是不是还有办法挽救自己的国家。显然,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抵抗纳粹党人

是绝对办不到的,唯一剩下潜在的抵抗力量就是家乡自卫团以及被取缔和被解散的工人运动。曾与舒施尼格发生齟齬的家乡自卫团显然已经软弱无力,不能依靠,于是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与工人阶级取得和解。当时与工人代表举行了谈判;在末日来临的前几天,在政府同意下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工人集会,会议保证要保卫奥地利。因此,到了最后,原先本来一直在设法消灭工人阶级运动的天主教分子不得不认为工人阶级运动是唯一能够组织大规模抵抗运动的力量,不得不与他们妥协。不过舒施尼格在采取行动时是三心二意的,他在向工人提出呼吁时也没有保证政府如果能够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就将战斗到底。在奥地利保持独立的最后几天里,维也纳街上到处都有社会党人在游行示威,欢呼喊口号。舒施尼格决定在赞成或反对独立的问题上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大概正是这个决定触发了政变。1938年3月11日,纳粹军队开进奥地利,当天晚上舒施尼格毫未抵抗就宣告辞职。他确信,当希特勒不顾将领们劝告而下令进军时,就难逃此劫了。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工人们的武器供应很有限,显然无力抵抗正规军的进攻。

这样,奥地利共和国就在1938年归于消灭,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才在盟军共同占领的条件下重建国家,而且社会党人被迫参加了联合政府,直到如今仍然是其中的一员;目前,占领军已经撤退,奥地利接受了中立的地位,不再参与欧洲的纠纷。但今天的党派阵容与三十年代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塞佩尔和家乡自卫团的激烈反民主派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党人由于认识到无力独自取得多数议席,已经安下心来与基督教社会党共处,后者已经不再一心一意地要摧毁社会民主制,而是在今天的具体环境下欣然把它当作了唯一实际可行的制度。如我们在前文所见,社会党人绝不像他们的反对者所了解的那样是一批革命者,而是始终有一个由伦

纳尔和丹尼贝格这样的人领导的坚强的宪法派右翼；现在该党已经整个地信仰了宪法主义：他们原先想在左右派之间找出一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道路的做法，现在已经放弃了。今天奥地利社会党是一个社会改良党，以往一直大体上是如此；但现在已经不再建立在任何特殊的理论基础之上。有些老一辈领袖，如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等人，目前还在世，但已经不活跃了。至于1934年以前很活跃、而且今天仍然活跃的年轻一代，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工人报》的奥斯卡·波拉克，还有朱利叶·布朗撒尔，后者不久之前已经辞去了社会党国际的书记职务。但大部分老一辈领袖都已去世，换上了一批理论头脑差得多的新人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在奥地利的反社会主义者中一直是一个不名誉的名辞，在共产主义者之中也是如此，后者指责它以康德的唯心主义或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为哲学基础；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过时，不能成为适合于当前条件的活理论了。然而奥地利的社会党人曾经不止一次地清楚地表现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和坚韧不拔的力量，在1938年以后受到纳粹党人压迫的年代里，这种表现也绝未稍减。我认为他们原先始终多少有些拿不定主意，极不愿意相信唯有通过武装抵抗才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时机已经来到——当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从来就不大，所以他们就更加不肯相信了。不过，一方面庞大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在1933年根本没有还手就听凭自己被打垮，奥地利的社会党人，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人，在1934年的确进行了武装抵抗；当时人们广泛地认为，尽管他们失败了，而且起义是局部性的，但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几乎是它的最黑暗的时期，他们的行为却挽救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荣誉。

## 第七章

###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芬兰

170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温和的社会党人和更温和的反社会主义者之中都获得了高度赞扬，赞扬它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成功地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句话的实际意义是：斯堪的纳维亚三个主要国家丹麦、瑞典和挪威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利用战争所造成的机会实行了普选制（其中包括妇女的选举权），并对政治结构进行民主改革之后，继续以此为基础，实行了影响深远的社会保险、累进税制和其他改革措施。这样一来，会员人数大为增加和势力大为扩充的工会就处在了有利地位，可以成功地进行集体劳资谈判。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在社会改革方面实际上没有取得多大成就，因为这三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二十年代里，在他们各自国家的议会中仍处于少数派地位——不过他们尽管是少数派，还是组织了几届短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说来奇怪的是，社会党人取得主要成就是在 1931 年全世界开始出现灾难性的大衰退之后以及纳粹党人于 1933 年初在德国获得胜利的同时。

这种情形不仅在一个国家内出现，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所有三个国家全都出现，不过以瑞典最为突出——该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或主要以社会民主党为基础政府从 1932 年起直到 1939 年战争爆发为止连续执政，中间只有非常短暂的间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瑞典的经济地位比它的大多数邻国好得多。虽然瑞典的失业人数也曾急剧上升，而且极其需

要采取措施救济失业者,却没有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发生浩劫。事实上,出口一直保持较好的状态,因为出口商品大部分是销路始 171  
终较好的纸浆和纸张,此外还有森林产品和瑞典北部所产的品位极高的铁矿砂;关于铁矿砂,三十年代重整军备的计划,特别是德国的计划,提供了几乎没有穷尽的销路,尽管德国在支付方面存在困难。瑞典的进口商品主要是工业用的原料和半成品,因为它国内有粮食和种类繁多的工业制成品,进口量很小。德瑞贸易在世界大萧条爆发的初期,确实曾经急剧下降过,主要原因是德国在收支平衡方面存在困难。但自从纳粹主义崛起以后,这个趋势就扭转过来了,因为德国大量需要瑞典所能供应的铁矿砂、铁和钢制品。这样一来,瑞典人就轻松地逃过了萧条的打击;而且他们比别人更能采取措施对抗萧条,其原因是他们的黄金储备额很高,支付平衡的状况非常好,因而花得起钱来兴建公共工程以提供就业机会,而不致于在支付平衡上陷入困境。瑞典的社会党政府事实上能够清楚地证明,用公共工程政策来解决失业是十分有效的,当时境况较差的其他国家的政府正在诉苦说自己在这方面无能为力,而英国则甚至否认这种政策有效,提出的借口显然是错误的:公共机构所增加的任何就业机会都会由于私人企业就业机会的等量减少而干脆被抵消,整个局面根本不会因此而有所起色。假如瑞典人的支付平衡没有当时那样好,假定他们的出口在萧条中所受的打击比实际所受的打击要严重,那么他们是不是仍然能像当时那样行动,就成为问题了;不过他们仍然是有功劳的,因为首先是他们不把经济危机当成国家对之无技可施的“神意”看待,而把它当成 172  
了采取行动的机会。他们所遵循的政策主要是财政大臣恩斯特·威格福尔先生制定的。他的一大功劳是首先倡导了现在已经成为正统的政府行动方式,即维持就业水平而不诉诸通货贬值的办法。



除此以外,历届瑞典社会党政府的主要成就在于社会保险方面。这个国家当时除了最北方的地区以外,赤贫比较少,有钱人也不多。都市的生活水平很高,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是殷实的小农场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工人具有共同利益。境况较差的农业工人的人数并不很多。自由职业者和商人所形成的中产阶级很庞大,其生活水平只比熟练工人略高一筹,而且大部分与熟练工人一起加入了强大而普遍的消费者合作运动;该运动在阿尔宾·约翰逊的出色领导下,向那些企图剥削消费者的垄断资本家宣战,而且在批发和零售方面,以及在生产方面都直接与垄断资本家竞争,竞争得尤为激烈的是电灯泡制造业和现金出纳机制造业等方面,但也涉及广泛得多的领域。这种消费合作运动在政治上恪守中立,与社会党并没有正式联系。但社会党人的家庭一般都加入了这个运动;双方的非正式联系是很紧密的。合作社联合会是合作运动中的批发生产机构,在所有的城镇中都有巩固的基础,而且还深入农村地区。但农场主则另有自己一套合作社组织,特别是销售牛奶和其他高级食品的组织,但一般说来,这些组织与合作社联合会进行着十分和谐的合作。

173 社会党当政时,没有显示对国有化有多大热忱。当时已经有相当大一部分国营企业,除了铁路以外,还有铁矿和很大数量的公有森林和国营森林产品工厂;以供公众消费的水力发电为基础的电力供应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国营的,如果把自己发电自己用的企业包括在内,就远远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当时如进行土地国有化的尝试,只会遭到大小农场主的强力反抗;同时合作运动的地位也很巩固,实际上根本不容许国家活动伸展到批发或零售商业中去。产业工人中也没有任何强大的压力要求国有化,他们都牢固地组织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工会组织中,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与雇主进行谈判。1908年所发生的声势浩大的瑞典总罢工到三十年

代已经大部分被人遗忘,而且已经有了就工资和劳动条件进行长时期和平协商的记录。对于协商的结果并不是全都感到满意的,中央集权的工会领导被人指责奉行过分迁就的政策,因而出卖了工人的利益。但是到三十年代的时候,左翼工会运动已经趋于衰微,只不过在森林工人中还有一些势力:在整个工业中,中央机构全国总工会几乎具有无庸争论的控制权。

历届的瑞典政府,早在社会民主党执政之前就已经非常关心社会保险。自1901年起,就对雇主强制执行向工人赔偿工伤事故保险金的制度;全体人民的义务治病和老年保险于1913年开始实行;国家在社会服务事业方面的活动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是不断在扩充的。然而在瑞典,国家通常不是单独行事的,而是与地方当局以及自愿创办机构合作行事的;三十年代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对领受者说来很少是完全免费的,领受者一般都必须承担一部分费用,不过在许多情形下所承担的部分很小。此外,有许多社会服务是在自愿参加的基础上提供,只限于提供给自愿缴款购买这种服务的人;通常办理这种事业的会社有的全部由公家管理,有的部分由公家管理,也有的完全与国家无关,至少不接受国家的津贴。因此,强制性的健康保险尽管在1919年就已经提出,却没有通过法令予以实行,于是健康保险事业就由国家年金管理委员会所主持的若干注过册的疾病救济金会社办理,并由国家津贴。到三十年代末,有100万左右的人已经加入了这种会社,而整个人口,包括男女老幼一起在内,只不过650万多一点。1931年,这个计划重新作了调整,成立了两种会社,一种是中央的,另一种是地方的,分别为每一类型的会社的成员保险。按规定,地方会社在一定时期内负责医药治疗、住院治疗 and 疾病救济;超过期限之后就由中央会社无限期地担负医药治疗,如有必要时,还负责2年至3年的住院治疗。但医疗费用有一部分须由病人缴纳,在一定限度内

这笔费用可从疾病救济金内扣除。残废保险和老年保险与疾病保险的情形不一样,自从1913年以来一直是强制实行的;这类保险事业由地方年金委员会办理,或由它代理,并由社会事业部所属的皇家年金管理委员会统筹。1937年时每年所需缴纳的保险费为6克朗至20克朗不等,以其中的最高额计,在缴款者收入中占1%。年龄达到六十七岁或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后所能领取的年金为70克朗,加上该会员每年所缴金额的10%。总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还付给补助年金,所需款项由国家和市政当局共同负担。此外,还有一种特殊年金计划,称为“个人年金计划”,根据该计划,非体力劳动的雇员向一个基金会缴款,该会由种类繁多的权益集团所选出的代表管理,由国家监督。该计划于1915年开始实行,1929年时进行了一次改组。

瑞典的失业保险是自愿投保的,由受国家津贴的工会成立的失业救济金会社办理。在三十年代中期投保的人只有10万人左右。对失业者的照顾主要是以工代赈,大部分由地方当局办理;这种工作中所雇用的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比正式工作中非熟练工的工资低得多。自从1924年以来,社会事业部底下就有一个国家失业救济委员会负责执行公共工程政策。所兴建的工程都是劳动强度很高的,实际上主要是筑路,在性质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国家直接兴办的,一类是地方当局兴办并由国家资助的,还有一类是完全由地方当局出资的。只有在没有工作可安排的时候才发给金钱救济。在失业情况不严重的时候,这种办法的效用还可以过得去。在二十年代里,登记失业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一安排了以工代赈的工作,只有大约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以下的人领取救济金。但是到大萧条开始的时候,被安排工作的人的比例急剧下降,而领取救济金的人数则非常迅速地上升。1932年的情形就是如此,当时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竞选下院议席时获得40%以上的选票,虽

然没有获得压倒一切其他政党的明显多数，却组成了政府。那次选举是在世界萧条中举行的，竞选的问题大部分是关于应付萧条的措施。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党派一样主张除非万不得已不发给救济金；但他们也反对低于工会工资率的以工代赈制度，而要求奉行一种公共工种政策，以标准的工资和劳动条件提供就业机会，所需款项，如有必要，可以借债支付。这就意味着抛弃预算必须逐年平衡的正统看法而代之以这样的观念：在景况不好的年代先让预算出现赤字，等到繁荣的年代再以赢余补足。当时社会民主党由于在议会中没有获得明显多数，所以没有能充分实现其政策。但他们毕竟实行了一项积极的公共工程政策，让劳工按标准工资和劳动条件受雇，并且把以工代赈的工资标准提高到非熟练工的正式工资水平。这样一来，预算上出现了不平衡，但也作好了安排，在以后的年代里征收特税予以补足，后来确实做到了。由此看来，瑞典从1933年以后应付萧条的办法不是紧缩通货，而是增加公共投资来补足私营企业投资的减少，从而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直到特别严重的萧条景况告一段落为止。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这一点在瑞典之所以比较容易办到是因为他们的出口尽管在萧条中也维持得很好，收支平衡的状况也是健康的；但社会党及其财政大臣威格福尔斯的一大功绩是成功地引导瑞典渡过了萧条年代，所受的不利影响比那些企图以正统的紧缩通货方法应付萧条的国家要轻。瑞典社会党人占便宜的地方是他们的政策事先完全制定得当，所以他们行动时心中有数，而无需临时来想办法应付。他们所获得的成功对于批评他们的人来说是一个充分的答复。在以后的年代中，他们坚决维持一定的税额，使他们得以把应付危机时所举的债归还了。但当私人投资恢复的时候，他们却不让公共投资降回到原来的水平，因为他们希望在对国家有益的企业中永远扩大公共投资的范围。他们对于把公私两方面的投资总额保持在繁荣

年代无需进一步借债作资本支出的水平,感到很满意。

这项政策的效果是:失业者所需要的救济金大为减少,而不同于正式公共工程的以工代赈的工程也退居次要地位。此外,征税额一直很高,而没有在萧条过去之后降低,以便为改良的社会服务事业,特别是1937年的年金改革提供资金。

1932年和随后几年的那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是得到农民党支持的少数派政府。在1936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实力增强,所获选票占总票数的大约46%;此后该党的首相佩尔·阿尔宾·汉森组成一个包括农民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新政府,从而掌握了明显的多数。但改变为联合政府一举对政策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新政府着手制定立法,提高年金和失业保险金,规定假日发给工资,并进行了一些其他的社会改革,但并没有打算通过针对私营企业采取任何措施来向社会主义过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政府改组为民族联合政府,由社会党领袖汉森出任首相。瑞典早在1939年以前很久就声明保持中立,但仍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整顿国防,以应付当时愈来愈紧张的局势。战争爆发后,瑞典确保持了中立,但却被迫对德国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在德国侵入挪威和丹麦以后更是如此。在1940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地位,在总票数中获得了明显多数,在议会中也取得了绝对多数议席。战争结束时,瑞典又在汉森领导下组成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政府;1946年他去世,由塔格·艾兰德尔继任。汉森从1932年起实际上不断执政到1946年,他所领导的有时是社会党内阁,有时是联合内阁。当他早年继布兰亭之后领导青年运动时,颇受尊敬和欢迎,并于1928年当选为党的领袖。他为人爽直,毫不摆架子,很懂得怎样使党团结一致,并且与威格福尔斯充分合作,执行了1932年的反危机政策,后来又实行了社会改革措施。瑞典社会党人所提出的那套纲领,主张实行先进的社会改

良措施,并代表贫穷和中等的消费者大众,而不是代表排他性的或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所以让他来当领袖可以说是非常恰当不过的。

瑞典的社会主义就其在三十年代的情形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运动,而且没有受到阶级对抗情绪的推动——其实,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瑞典的社会结构自然而然会导致小农场主与产业工人的联盟,而且使生活水准相差不多的技术工人与低级自由职业者之间的观点相当一致。的确,瑞典也曾发生过严重的劳资冲突,在1908年大罢工时情况尤其突出,当时紧密协调的工会运动与雇主的中央组织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并且遭受了严重的失败。但自从那时以后,雇主与工会除了为数不多的情形以外,都知道怎样友好地和平共处,并通过紧密协调的集体谈判来调整工资和劳动条件。此外,合作运动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且普遍关怀消费者大众的利益,这一切对于社会党政策的影响很大;因为社会党人不能与合作运动者不和,后者大部分赞成社会党人的社会改革措施,而不热衷于社会化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从他们对经济问题的态度上却看不出什么迹象来说明这一点;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愿望或意图,要对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普遍发起攻击。他们的态度实际上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他们大部分人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总的面貌感到不满,不过认为还可以通过具体的改革措施作进一步的修正。在二十年代初期,他们在1919年所建立的普选制之下进行的选举中获得总选票的三分之一的支持,到1924年增至40%,以后一直保持这一水平或更高水平,只是在1928年遭到一次暂时的失利,降为38%;不过只有一次在1940年获得压倒其他一切党派的绝对多数,此后在历届大选中都是获票46%左右。对执政党的左翼始终有一些反对派存在,但这些派别都没有

大到足以根本威胁其势力的程度。如果社会主义的涵义不过是福利国家加上相当程度的经济计划,那么瑞典社会民主党就很可以被认为是模范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有许多人的确是这样看待它的。其实就基本的方向而言,他们如果不以当时那种方式行动,我们也很难看出还有什么其他行事方式可以带来好处。瑞典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是欧洲最高的水平之一,而且由于没有任何人数众多的真正的富人阶级存在,所以就没有任何经济动力促使人们去进行激烈的社会改革。

丹麦的社会结构一般说来也是民主的,生活水平也很高,其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与瑞典有很多共同的特点。自从1920年成立社会党人与自由党人的联合政府以来,到1940年德国人入侵为止,丹麦一直是由这个联合政府执政,由社会党人Th.斯道宁任首相;这个政府所遵循的是大致与瑞典相类似的社会福利立法。而且他们还有一点也和瑞典一样:自从实行普选以后,社会民主党人要在总选票中吸引三分之一以上的票数比较容易,到1935年时所获票数在总选票中所占比例增加到了46%。但他们从未能获得压倒其他一切政党的绝对多数,而是始终是与激进党人联合执政,后者在社会政策的问题上大体是与他们看法一致的。丹麦与瑞典不同之处在于:合作运动虽然在这两个国家都很强大,在丹麦却是农场主的合作运动最为强大,不过消费者的合作运动也是很巩固的,在城市中尤其是如此。然而丹麦与瑞典一样,彼此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而丹麦的激进党在农村有较雄厚的传统基础,所以社会民主党人与激进党人的联盟不仅反映了利益的真正一致,也反映了情感的真正一致。丹麦社会党和瑞典的一样,在理论上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实际上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们影响很小。他们持有强烈的和平主义观点,三十年代在主张单方面裁减军备方面走向了极端;后来当希特勒在1940年破坏他们仅仅在前一年与他们订立的中立条约而入侵丹麦时,他们就无法抵抗而让希特勒不经战斗就占领了自己的国家。但他们在沦陷以前,就已经实行了广泛的社会改革纲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担任社会事务大臣的社会党人 K. K. 史丹克在1933年所实施的统筹社会保险法。这样一来,就使当时已经存在的无数零星的社会立法归各地区专设的公共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而且大大地扩充了公共资助范围。接着又制定了其他一些法律,其中180包括1938年所制定的关于假日照付工资的法律。此外还根据协商的集体协议为改进劳资关系采取了步骤。原先在1910年已经开始实行的劳资纠纷公共调停制度,在1934年又延长了有效期;此后当集体协议到期而需要重订时,这项制度在防止停工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在丹麦和瑞典这样的国家里,虽然真正的反动党派没有什么活动余地,而且各左翼党派只要能携手合作,就几乎肯定能使他们的总票数居于多数,然而情况很明显:社会党不论怎样改变自己政策来争取广泛的民众支持,想要在全票中取得明显的多数来支持它,是很不容易办到的。瑞典只是在1940年获得一次这样的多数,以后便又失去了,虽然差数不大;但是,如果主张立宪民主制的社会主义,似乎很容易获得一定程度的选票,使反社会主义党派难于建立,甚至不可能建立稳固的联合政府;然而,社会党要执政,至少需要得到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如瑞典的农民党或丹麦的激进党——的支持,否则也不可能。我认为其原因并非由于可能为任何一方争取到的选民反对社会党在他们的实际纲领上所提出并打算在近期实行的任何事情,而是主要由于他们不愿与社会党的



较长远的社会主义目标或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联系在一起。农场主特别不容易被吸引到社会党里来,即令社会党宣称打算保留土地私有制并保护农业不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大农场主往往不但反对社会党的较长远目标,也反对它的当前政策。但是连赞成社会立法的小农场主也不容易被吸引到社会党的阵容中来,即使他们所控制的党愿意与社会党结成联盟来反对反动党派,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在小农场主和产业无产阶级都很强大,然而又全都不足以单独执政的国家里,就出现了一种民主政策,其重点是巩固“福利国家”并运用累进税作为手段来重新分配收入和防止贫富悬殊,但却不容许取消营利性质的私营企业,或将工业和服务事业收归公有,除非由于出现了垄断的具体缺陷或企业的效率太低,因而似乎有必要国有化或采用某种其他的公共管理方式——如合作企业——,或者是由公家提出防止失业的计划,因而似乎自然而然地附带采取了这种措施,其实就连根据这些理由所倡导的扩大公有化的措施,也往往由于大概会有可能使任何一方争取到的选民发生反感而推延或搁置起来;这类国家愈是全面地提供公共社会服务,从而成为“福利国家”,它们国内的社会党就愈难沿着同一条路线制定进一步的改革纲领。其他“福利国家”实现了影响最为深远和规模最为宏大的社会改革之后,诚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但是在产业工人与农场主有必要联合行动,从而使切实可行的行动受到限制的地方,困难就会来得更早。

## 挪 威

挪威的劳工运动史在很多方面与瑞典或丹麦的都大不相同。在本书的上一卷中,我们看到挪威工党在马丁·特兰梅尔的影响下

首先在 1919 年加入第三国际,随后又立即退出,而不同意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不论是特兰梅尔还是他的大部分追随者事实上从来就不是莫斯科所理解的那种共产党人。当他们加入第三国际时,那个机构不但争取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也毫不掩饰地争取产业工联主义者和一切左派分子的支持,他们希望而且期待,只要能吸引这批人加入,往后他们就会接受共产党人打算强加在他们所有人头上的领导。我们也已经在前文看到,与莫斯科发生联系以后,就导致了该党的分裂,而且使反对者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直到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之后才又重新与多数派联合。<sup>182</sup>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这种联系中断之后,又形成了一个少数派的共产党,直接效忠于第三国际,但追随者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挪威工党始终没有参加复活的第二国际,也没有参加第二国际的继承者——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从挪威工党分裂出去后组成的社会民主党的确加入了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但在 1927 年重新加入挪威工党之后,他们与该国际的关系又中止了;重新联合的党一直没有与该国际发生关系,直到 1938 年才最后加入。在 1927 年大选中,联合后的党获得了将近 37% 的选票,并以最大的党的身份回到了议会,但离绝对多数还有很大距离。当时他们奉召组成以他们的领袖克利斯提安·霍恩斯洛德为首的政府,他们答应了;但他们没有设法以妥协办法寻求多数的基础,而是宣布打算立即着手制定彻底的社会主义纲领;他们的宣告引起了一阵反对风暴,迫使他们不出数日就辞职了。尽管有这桩事情,而且接着在 1930 年的大选中又受了一次小的挫折——社会党人所获选票降为 30%——,到 1933 年世界性经济萧条达到最低潮时他们又卷土重来,在选举中获得 40% 的选票,成为最大的党,并同意再度组阁;这次他们是以一个名叫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的新领袖为首;1940 年德国人入侵挪威时,他还在台上,接着就在联合政府中担任首相,那届政府

随即离开挪威，在伦敦办公，直到1945年才返回挪威。接着，尼加德斯沃尔德去职，由前工党书记艾纳尔·基哈德森接任，他是纳粹崩溃后从德国集中营里回来的。

在1934年尼加德斯沃尔德担任首相以前，挪威工党拟定了一个特别的应付危机纲领，开宗明义第一款就是维持充分就业。到工党上台时，世界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于是也就比较容易找得财力资源来实现抱负不凡的社会立法纲领了。这个纲领遵循的方针与丹麦、瑞典的纲领大同小异，但地方机构所操的管理权较大，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政府由于并不享有独立的多数，于是便要依靠一个或更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事实上，在1940年以前整个时期里，他们有时得到农民党、即大中农场主的政党的支持，或者得到在社会立法方面有过良好的记录的自由党的支持，有时得到两者一起支持，唯有与保守党始终处于对立的状态。

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挪威是一个劳资纠纷几乎连绵不断的地区，举行了多次罢工，而且雇主协会与工会之间斗争得相当激烈。但是在1934年，由于双方缔结了一项总的协议，这种经常不断的争吵才告结束。这项协议规定了经常性的集体谈判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它在那个十年余下的几年里执行得很顺利，使得双方的态度有很大改变，并且大大方便了工党政府在社会立法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挪威几乎变得与丹麦和瑞典一样风平浪静，而二十年代曾经一度十分得势的左派理论也就不断失去地盘，虽然特兰梅尔作为一个记者和宣传家仍然很活跃，而且保持了他的大部分影响。

## 芬 兰

芬兰在三十年代绝不像上述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平静。坦纳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于1927年辞职以后,便有令人可怕的拉普人(或称拉普运动)崛起,这是特别针对马克思主义而发起的运动,并且使用暴力的方法,时常使人想起芬兰内战时期那些邪恶的日子。在内战结束后,芬兰共产党仍然是一个被取缔的党,但它的拥护者仍设法通过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政党活动,并且渗入了工会,使工会归于共产党控制是非常成功的。坦纳政府做到了使内战时期犯法而一直在押的人释放,但它却没有能制定相当数量的社会立法。取代坦纳政府的反社会党内阁并不热衷于镇压拉普分子,甚至也不热衷于使他们那些过火行为就范;后来情况愈来愈糟,直到1932年拉普人企图发动政变之后才对这个运动依法进行了镇压。在全世界爆发经济萧条的年代里,芬兰也出现了激烈的劳资纠纷。受共产党控制的旧工会运动解体了,1930年所建立的新工会联合会在以后的年代中实力逐步增长。社会民主党人原先有一些阵地丢失在共产党人手里,在1933年的大选中却成绩颇佳,赢得了12个席位,使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总数增加到78个,接着在1936年的大选中获得了成功。在1937年的总统选举以后,他们与农民党一起参加了A. K. 科坚德尔的联合内阁。这届政府一直执政到1939年欧洲大战爆发。曾在1932年与苏联签订为期12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的芬兰人宣告中立。但苏联要求他们割让领土,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列宁格勒免遭德国人进攻。芬兰人拒绝让步后,苏联就举兵侵入芬兰,不久就证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西方盟国为了驰援芬兰,曾试图劝导瑞典允许盟军通过瑞典进入芬兰,但瑞典决心置身战争之外,没有同

184

意,后来盟国就没有能够给予芬兰有效的援助。这样一来,芬兰人就只有承认失败。战争在1940年初结束,芬兰人割让了俄国人声称有主权的那几部分卡累利阿地区以及维堡和汉科地方。在苏芬战争时期,俄国人打算并企图建立一个由老共产党领袖奥托·库西宁为首的共产党傀儡政权,但和平恢复之后,便放弃了这个打算。然而,芬兰人由于对俄国人有恶感而且受阻无法与西方作有效接触,因而受到强大压力,非与纳粹德国妥协不可;1941年,他们允许德国人利用自己的领土进攻苏联。芬兰军队收复了1940年割让的全部领土,并且深入苏联腹地。德国人企图劝使再度出任国家元首的曼纳林元帅进攻列宁格勒,但是他没有同意,而是把军队屯驻在1939年以前的旧边界附近。当局势转为对德国人不利的时  
185 候,俄国军队再次进兵芬兰,重占维堡,芬兰人被迫要求重订停战协定,并于1944年正式签订。根据这一协定,芬兰人再度割让卡累利阿、维堡和波尔卡拉(而不是汉科)等地有争议的地区,此外还同意在6年内支付约占国民总收入的10%的巨额赔款。在大战以后,社会党人又陷于严重分裂,他们的领袖瓦伊诺·坦纳有一个时期以“应对战争负责”以及支持德国人反对苏联的罪名被赶出党。但他保持了合作运动领袖的地位,后来又被社会民主党人请回去担任领袖,他们始终强烈地敌视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不过本书只打算写到1939年战争爆发时为止,所以这些争执已远远超出了本书范围。

## 冰 岛

最后要谈的是冰岛,那里的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916年,自从1921年起在议会中一直占有议席。让·巴尔德文森一直任该党领袖直到1928年去世,后来由斯蒂芬·约尔·斯蒂芬森继任直到

1952年。在1940年以前,该党与工会由一个共同执行委员会领导,那一年工会另外成立了自己的中心。1930年有一部分人脱党组成了共产党,没有得到多少人支持。但到1938年,又发生了一次严重得多的分裂,在此过程中左翼分子——包括许多工会领袖——与共产党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统一人民党,代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9年当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爆发时与保守党和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时,这个新党就成了唯一的反对党。在1942年的选举中,社会主义统一人民党所获选票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全部52个席位中占了10席。但在1946年的选举中,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几乎势均力敌,社会民主党获得9席,社会主义统一人民党再次获得10席。在分裂以前,在1934年,社会民主党曾获得20%以上的选票,而在1942年,他们只获得14%多一点,1946年回升到接近18%,然后又再次下降到大约16%。因此,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三十年代初期总共获得了总选票的大约三分之一。它们全都声称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不过一个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它所信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则直接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法西斯统一斗争的角度来解释他所信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

## 第八章

### 比利时、荷兰和瑞士

三十年代的比利时是社会党人在议会中居于最大政党地位的西欧国家之一,但其所占席位不足以构成绝对多数,所以便只能与基督教社会党人或自由党人组成联合政府,而当这两个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它时,则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事实上,比利时工党<sup>①</sup>时而是反对党,时而参加国民联合政府。在二十年代中,该党从1925至1929年是最大的政党,并与基督教社会党一起、后来又与其它政党一起参加国民联合政府,但在1929年的大选中失利,恢复了反对党地位。世界经济萧条对比利时的打击很严重,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国民联合政府,其中有王德威尔得、德·曼、斯巴克和阿瑟·沃特斯参加。从1919到1940年,比利时出现的内阁不下19届,其中9届代表所有的党派,7届由天主教党人与自由党人组成,另外2届由天主教党人与社会党人组成。自由党在这3个政党中始终是力量最弱的政党,它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天主教党则有一个主要以基督教工会为基础的左翼,这个左翼对于工党最初在1894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并经1932年的代表大会再次肯定的纲领中的许多部分都表示同情。

1938年,王德威尔得在长期领导工党之后,终于去世,由昂利·德·曼继任党的主席,德·曼在三十年代初期曾提出他的“劳工计划”,该计划在工党和工会代表大会上都被通过。在这个计划

---

<sup>①</sup> 比利时社会党在1940年以前称比利时工党。——译注

中,德·曼首先企图修改该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理论,于是便提出一个关于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的方案;前 188 一种经济涉及信贷和银行、公共服务事业以及垄断性的工业企业;后者涉及其他一些工业:其所有权仍归私人,但却由公家进行计划控制和协调。德·曼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代条件下,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没有希望在全人口中构成多数;因此他打算不但要争取无产阶级的支持,而且还要争取所有能够团结起来反对在当前情况下居于统治地位的金融家和垄断资本家的各个社会阶层的支持。这个本质上是一个应付危机的文件“劳工计划”旨在从普遍存在的经济萧条中恢复元气,在比利时国内外都引起了相当大的注意。该计划最初由比利时工党在 1933 年提出并通过,在第二年于法国蓬蒂尼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成了主要论题,1935 年由费边社译成英文发行。直到 1940 年为止,该计划一直是比利时工党所采用的现行纲领,而且在中间这段时期里,该党企图以此为基础与范·济兰所领导的天主教堂左翼取得和解;不过该党在 1936 年曾与工会一起发动过一次总罢工,迫使政府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四十小时工作周制。当德国人在 1940 年侵占比利时时,德·曼认为德国人已经赢得了战争,于是便解散工党,并留在比利时在纳粹占领下任国王的顾问,从而丧失了他对比利时社会党人的影响;该党的大部分领袖在战争年代里逃往英国,于 1945 年回国并将该党改组为比利时社会党,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该党 1894 年的《原则声明》。这样一来,比利时社会党人便又回到了完全独立于其他党派之外的老政策上去,而且在选举中再次与从前一样不能掌握明显的多数,重又与天主教社会党为争夺领导地位发生冲突,而自由党人则仍保持其为第三党的地位,掌握其间的均势。

在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德格勒尔所领导的雷克斯党和佛拉芒国民运动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三党鼎足而三的局面。这两 189



个新团体都采取法西斯方针,在1940—1944年沦陷期间与德国人合作。所以到战后他们就失去了大部分追随者,变得无足轻重了。共产党在三十年代相对说来并无重要地位,但在1946年的大选中获得了23个席位(增加14席),而天主教社会党则获得92席,社会党获得69席,自由党人获得16席;相形之下,在1919年的大选中,天主教党获得73席,社会党获得70席,自由党获得34席。三十年代的比利时在提供社会服务事业和生活水平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落后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但在战后有了相当大的改进。妇女直到1949年大选时才获得选举权,那一年由于妇女参政的结果,社会党人所获选票降到总选票的30%以下,可是第二年又恢复到35%以上;1954年该党所获选票接近总选票的39%,1958年又降到37%多一点。

德·曼的“劳工计划”不论我们同意与否,对于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学说的修正毫无疑问是一大贡献。这是在大萧条的影响下,本着议会民主的精神拟定的,目的在于找到一条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并使失业者恢复工作;其方法是一方面抵制消极的通货紧缩政策,另一方面在金融资本家和垄断资本家阶级与中产阶级(包括小业主)的主体之间插进一个楔子,以便使后者与社会党人联合起来反对大资本家。在这种联盟的基础上,银行和信贷机构应完全实行公有和共管,并扩大到垄断资本家所控制的工业和服务事业。其他企业仍归私人所有,并由业主经营,但由公家根据各种具体情况下的公共利益的要求进行控制与统一调配。德·曼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不但在比利时阅历很广,而且在美国和德国也多所见闻,他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或者无产阶级革命即将爆发,因为他也不相信,即使在普选制之下,无产阶级可望在不久的将来构成全体选民中的多数,从而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确相信只要采取正确方法,就可以逐国

成功地应付世界性经济危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社会主义者就必须物色同盟者。他认为,在比利时寻求同盟者,主要应该通过吸引天主教党的左翼(其中包括天主教工联主义者)与社会党人结成同盟;但他感到,要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必须同意让小工业和其他小企业留归私人所有,其所受的控制不超过实现统筹规划所需要的程度,而且一切企业必须依靠彻底社会化的信贷制度。该计划的侧重点始终是两个问题:第一是信贷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作用;第二是必须实行一种唯有国家才能安排的发展的信贷政策。即便在工业和服务事业应予收归公有的地方,他也强调必须避免官僚主义的管理法,因而建议把公共服务事业交由基本上独立的公司执掌,由它代表整个社会进行管理。该计划所强调的是管理的重要性,而不是所有制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大多数企业即使不实行公有制,也可以通过管理使之符合公众的要求。

德·曼的主要目标没有能实现,他既没有能为比利时工党争取到广泛的中产阶级支持,也没有能够分裂或者争取到天主教党或其工会。事实上,在三十年代的后几年里,面对着雷克斯党和佛拉芒国民运动的兴起,尽管它们对天主教党人的威胁比对社会党人的威胁更大,独立社会党多数派的前景甚至变得更加黯淡了。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劳工计划”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国家同样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其社会党没有什么希望或根本没有希望独自取得多数。荷兰和瑞士的社会党尤其如此,它们各自拟定了应付危机的纲领或计划,基本上都是以德·曼的计划为蓝本,只不过没有那样明显地认为混合经济是恢复经济最有希望的办法而加以接受。在法国,德·曼的想法特别符合新社会党人的胃口,他们团结在戴阿、马尔凯以及列诺德尔周围,不久就作为右派分离集团脱离了社会党,不过带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追随者,大部分社会党人宁愿与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而且到了一定的时候

都支持勃鲁姆实验。德·曼本人肯定不是一个纳粹分子,但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他在1940年时,由于相信纳粹党人已经赢得了战争,便与自己国家的占领者拉扯上了极深的关系,而与原先党内的同僚则疏远了,以致他的影响完全丧失,等到祖国获得解放时,他竟然无法回国。他在战后所写的晚期著作中,极力为自己的通敌罪开脱,并且写了一些饶有风趣的文章来谈论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以及人类个性因此受到压抑之后对文明构成的威胁。但由于他在大战期间声名狼藉,这些晚期著作无人问津;1953年当他遭车祸身亡时,仍然是流落瑞士的异乡客。

## 荷 兰

在三十年代,荷兰的社会民主党没有多少可资记述的事迹,他们在大选的总票数中所能掌握的票数不足四分之一。在1937年的大选中,他们在100个席位中获得了23席。德国人占领荷兰以后,它与形形色色的其他团体合并后改组成为荷兰工党,企图以此团结各种类型的进步舆论,并能在战后的选举中赢得29个席位。早在三十年代,该党就已经对政策作了相当大的修改,以便争取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支持,并力图摆脱经济危机;但由于遇到天主教和新教两方面的反对而殊少进展。宗教的分野不仅在党内,而且在192 工会内都存在,所以工会运动也分为天主教和新教两派。1944—1945年解放后,曾经企图使两派统一,但是没有成功;不过他们与社会主义工会以及独立工会之间却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并一直维持到1954年才被天主教人士破坏。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sup>①</sup>,荷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始终主要是一个

---

<sup>①</sup> 见本书第4卷第512页以下。

非常温和的运动。有几次左翼分子曾与党的主体分裂,其中包括以艾多·费芒为首的集团于1932年的分裂,但他后来不得不脱离这个集团,以便保持他在工会运动中的地位,继续领导强大的国家运输工人联合会。但是这些左翼的分裂活动对于党的主体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这个主体在特鲁尔斯特拉于1930年去世后一直保持着朴实无华、大体上平安无事的道路,所注意的是眼前的社会改革,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问题;但由于它居于少数派地位,所以即使是在它所选定的范围内,也无法产生多大影响。社会主义工会在三十年代无疑是荷兰工会运动所分裂成的四个派系中最大的一个,但却不能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的明显多数,不论是社会主义工会还是社会民主党都不能有把握地代表统一的工人阶级说话。

## 瑞 士

在前一卷<sup>①</sup>中我们看到,瑞士社会党人起初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修改党纲,列入赞许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后来在发生一次分裂之后,又改变路线,仍然效忠于社会民主主义;在那次分裂中,持不同政见的左翼退党加入了瑞士共产党,而该党则始终只获得瑞士工人阶级中人数日渐减少的一小部分人的拥护。社会民主党在三十年代历届大选中所获选票不足总票数的30%。在1935年,该党由于纳粹主义运动在德国兴起而大受影响,因而彻底修改了党纲,宣布支持国防和国防所需信贷,并删去了党纲中有关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部分。该党还把当前的抱负局限于建立计划经济和对垄断资本家所控制的工业实行国有化,并宣布赞成进步的社会保险纲领。1943年,该党进一步修改纲领,派

<sup>①</sup> 见本书第4卷第509页以下。

出第一个社会党部长参加国民政府,并一直任职到1953年才由于抗议政府的反动倾向而退出。1955年它在总选票中获得28%的票数,并要求在国民政府中占两个职位,但在资产阶级政党拒绝这一要求之后,决定仍然保持反对党地位。

在三十年代的萧条中,瑞士社会党人也制定了特别的应付危机纲领,呼吁采取全国性的行动来消除失业并实行计划经济。该党虽然采取激烈的反法西斯路线,可是对有关与共产党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议一概拒绝,而宁愿与较为右倾的反法西斯集团——如青年农民会以及白领阶层的组织等——联合一致。它加入维也纳联盟以后,于1923年加入工党和社会党国际。

## 总 论

上述三个社会党具有如此不同的历史,但其结局却大体相同;因为这三个党最后都与左翼分裂了,而左翼的大部分人接着就参加了共产党,只不过后来他们中有许多人又退出了。所有这三个党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都提出了应急计划,企图以此感召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集团。在瑞士方面,社会党的计划后来虽提交公民投票表决,但投赞成票的人只占43%。在所有情况下,这些建议全都没有得到社会党所希望得到的多数,或严重地破坏其资产阶级对手的号召力。所有这三个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有两国沦于法西斯之手)的锻炼以后,在一个时期内都变得比较强大。但后来就出现了某种走下坡路的趋势,处在这样一种境地:即使它们在各自己的国家内仍然是最强大的党,却没有希望成为绝对多数,或者能够不要其他党派支持而独自组成政府。不过它们在这种局面之下无疑能在社会立法方面获得重大进展,并使集体谈判权得到更多的承认,但却不能打算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

任何影响深远的改造。即使是在福利国家问题上,它们也远远落后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党。就它们所得选票在总选票中所占比例来看,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在其中的两个国家内主要是由于宗教党派——特别是天主教党——始终保持强大,在另一个国家瑞士,则是由于中产阶级人数较多而且团结一致,同时天主教党的力量又很强大——1943年天主教党选入联邦议会的议员是43名,激进民主党是47名,社会民主党是56名——由此看来,社会民主党仍然是最大的党,但离多数还有很大距离。

## 第九章

### 东 欧

在东欧,本世纪三十年代主要是进行地下斗争和镇压日益加强的时期。这些国家次第建立了某种反动派当政的独裁政权,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残余力量则大部分被赶入了地下。一般说来,这种条件有利于左翼,特别是有利于共产党人,他们在地下活动方面比社会民主党强得多——后者大部分不是接受反动政权所给予的非常有限的宽容,便是把总部迁往国外,在本国不再具有广泛的追随者。在东欧各国中,唯有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以前一直没有受右翼的独裁统治,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到纳粹党人蹂躏,它的民主制度被摧毁了。在别的地方,在原先没有独裁政权存在的地方,也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了程度不同的地道的独裁政权。这些独裁政权中有一些主要是在德国的影响下,以反动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群众运动为基础,日益具有法西斯性质,另有一些独裁政权则从来也没有具有真正的法西斯性质,但是却依靠旧贵族与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联盟,匈牙利的情形便是如此,波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

在三十年代,东欧各国仍然是以农为主,但可以分成两类:一  
196 类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广泛分散在小自耕农手中,另一类国家的大庄园仍然大部分保持在大地主手中没有分配。在巴尔干各国,大部分居优势的是小农所有制,例如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就是如此,罗马尼亚在1918年以后也大部分建立了这种所有制。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匈牙利和波兰,大庄园占着统治地位,在匈牙利土地分

配已完全停止，在波兰土地分配则像蜗牛爬行一样地缓慢。在保加利亚，由斯坦姆波利斯基在群众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农业权益集团在1923年的斗争中被粉碎了，没有再有效地重新抬头，不过仍然不失为一个地下群众运动。

东欧各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萧条中所受的打击极为严重，农产品价格受影响最大，正在建设中的投资费用高昂的工业也遭波及。反动政府没有怎么帮助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就连政府没有怎么提倡的合作社运动也主要只对富裕农民有益。一般说来，农业生产率由于大多数农民完全无力使用改进了的耕作方法而没有提高，在大庄园被分配以后甚至还有所降低。巴尔干各国的总人口与西欧各国相比虽然要少，但比较他们的生产效率水平而言，农村人口仍然严重地过剩。每公顷耕地的小麦产量仅及丹麦的三分之一，依靠土地生活的人远远超过了能使用在土地上从事有益劳动的人。工业在经济萧条出现以前虽然一直发展得十分迅速，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却不足以对农村的过剩人口产生多大的影响。此外，小农和无地的农业工人仍然大部分没有组织。工会和社会党即使在被允许进行公开活动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被严格阻止到农村去发展组织和吸收成员，而只能在城镇中存在；并且它们只有在城市手工业工人之中才免遭消灭，所以还有一些势力，在其他方面没有多大势力，或者说在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任何势力可言。各国的农民党在二十年代初期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它们不是被排挤出去，便是由于其领导机构被其他阶级的人渗透进来而日趋反动。它们大部分从一开始就是主要由知识分子而不是由真正的农民领导的；当各国相继沦为独裁统治之下时，它们作为农民运动的现实就日益消逝。在三十年代，整个东欧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都是土地不足以养家的小自耕农。所以他们家里有些人就要到大农庄或城镇里去找工作。要改变这种情况，只



有采取长远措施,实行技术教育,对贫苦农民发放农业贷款、修筑公路和铁路以及按计划实现工业化。但那些政府完全无意于采取这些措施;至于工业化问题,至少三十年代的条件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外资已经抽走,而本国资本家则由于人民极度贫困化,使得国内市场萎缩,而不愿冒投资的风险。各国政府非但不打算扶植工农业的发展,反而因为采取日益严厉的镇压措施,把一切有关工农业改革的要求都当成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形式看待,甚至连那些打算满足贫苦农民需要的合作社也遭到了迫害。

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各国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总人口中直接依靠土地为生的人不到半数,该国的代议制政府一直维持到1938—1939年德国人灭亡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时为止。但是在整个三十年代,工人阶级始终壁垒分明地分裂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两派,后者自从1920年分裂以后一直无力组成政府。因此,农民党在这一时期内始终掌握着政府的领导地位,有时是单独一党执政,有时是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人在刚分裂以后在共产党人手中遭到惨败,但以后实力相对增强了,虽然从未强大到足以恢复早期的鼎盛状态。捷克农民党开始时主要是一个较富裕农民的政党,到了三十年代就基本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代替了在社会事务方面过分保守的、克拉马日领导的民族民主党。

198 在这一时期内,捷克社会党人有时参加以农民党为主的内阁,有时又成为反对党,但由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分裂成为敌对的派别,所以不可能对国家的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斯洛伐克地区,农民的景况比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要穷苦得多,也落后得多,而且受天主教会的影响也要大得多。他们主要支持赫林卡神甫所领导的斯洛伐克人民党,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法西斯倾向的政党。在此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二十年代经过一段尖锐的内部冲突以及一再与共产国际发生分歧的时期之后,终

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始终不够强大,难以有效地向该国的农民党领导地位提出挑战。1938—1939年,纳粹掌握了控制权之后,他们当然暂时被肃清了,但他们的领袖逃往苏联,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又随着俄国军队从那里回来。在他们流亡期间,有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与他们在一起,其中包括泽旦涅克·费林格,此人后来在俄国控制下的联合政府中任总理,在1948年的共产党政变以前一直执掌政务。

在此时期,波兰的皮尔苏茨基早就通过1926年的总统政变夺取了政权。开始时,社会党人对这次政变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后来他们一致起来反对他,并且在1928年将65名议员选入议会;但在1930年的大选中又丧失了大部分席位,由于那次选举是在恐怖状态下进行的,他们的席位下降到了23席。到1933年,恐怖状态仍然存在,他们却成功地选出了41名议员,但他们的领袖有很多人以扬言要用暴力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捕入狱。这时共产党已被宣布为非法,但却选出了少数几名议员,作为他们的合法外围组织工人与农民党的代表。两年之后,也就是到1935年时,议会被解散,并根据取缔所有反对党的一条新法律举行了选举。此后,社会党人继续在议会外反对政府,但在1939年整个波兰被德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之前,只能取得很少成就。接着在战争期间,他们积极参与了抵抗运动,尤其是在华沙。有成千上万的社会党斗士遭到纳粹分子杀害。在此期间,俄国人于1942年处决了两个曾积极参与抵抗运动的社会党领袖,一个名叫亨利·埃尔利希,另一个叫维克托·阿尔特;此外,俄国人还清洗了逃亡到苏联的波共领导,然后改组波兰共产党,让一些更愿意听命于他们的新领袖来领导。当纳粹党人被赶出波兰之后,他们扶植这个新党上了台。

在此期间,在匈牙利,社会党经过1919年的失败之后,始终软弱无力。当时成立的霍尔蒂独裁政权,并未依靠以法西斯意识形

态推动的任何群众运动支持,所以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政权,而是受民族主义和反民主思想强烈鼓舞的旧统治阶级的专政。因此,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只要不到农村地区去宣传,就得以苟延残喘。同时,该政权也没有完全镇压城市工人的工会组织。不过,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全然不起作用了:在1939年的选举中,这个运动在匈牙利下院的323席中只当选为5席。被宣布为非法的共产党人,不顾镇压,继续进行鼓动,但是他们的许多领袖都被判处了长期徒刑。在这些人中,有玛吉阿斯·拉科西,他曾参加1919年贝拉·孔的短命的共产党政府。1924年他从俄国回到匈牙利以后就被逮捕,并在监狱中关了16年,直到1940年才被交换出来,成为俄国军队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在巴尔干各国,在不同的年份建立了独裁政权。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早在1924年就被镇压;社会民主党则惨淡经营,甚至到1938年国王卡洛尔建立独裁政权之后还在维持下去。此后,他们就被纳粹肃清。1940年,纳粹迫使国王卡洛尔退位,并扶植法西斯铁卫团上台;但到第二年,该团就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无能和残暴,于是便让安东内斯库将军取代了他们。卡洛尔独裁政权执政期间,具备了法西斯运动的一切外部标志,但是没有群众——追随者,并且始终一贯地镇压铁卫团,该团的领袖们在1938年被他逮捕,并在那年早些时候因“企图逃走”被枪毙了。

在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921年就被镇压,而且此后与共产党一起不断遭到迫害,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三十年代以前很久就不再是一支起作用的力量;工人的主体宁可追随共产党的地下领导,该党的领导人和方针都经过一再变易,直到1937年才在约瑟夫·布罗兹·铁托领导下改组;他在此后的两年里帮助共产党大大地恢复了声望,并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成为南斯拉夫抵

抗德国的领导和先锋。

当南斯拉夫共产党在 1921 年遭到镇压时,该党最著名的领袖是西蒙·马尔科维奇。此人强烈批评民族主义,并且反对南斯拉夫境内各种不同集团对民族自治的要求,说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他这种态度后来在 1922 年在共产国际遭到了谴责。在此后的数年内,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发生了尖锐的派系斗争,该党的领导和总部都已迁到国外,并在国外连续开了若干次会议。1926 年,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猛烈攻击南斯拉夫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于是该党就改变了论调,并发表一项声明支持民族自决;但党内的派系斗争仍在继续。在 1926 到 1928 年这一段期间,南斯拉夫工人曾多次罢工,反对生活状况的恶化;然而这些罢工都于事无补,因为遭到了无情的镇压,而且流亡的领袖日益与国内的工人失去联系。1928 年,共产国际就南斯拉夫党内派系斗争的倾向问题向全体党员发出一封公开信。那年该党在德累 201 斯顿会议上抛弃了左右两翼领袖,另外推选茹利克·札科维奇为领导,此人在第二年就被警察枪杀。在 1929 到 1931 年间,在君主专制建立以后出现了警察恐怖统治,有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以拉特科·马丁诺维奇为首的其余的领袖再次逃往国外,并从流亡处所鼓动南斯拉夫境内发动武装起义,但起义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一时几乎使党的组织完全解体。到 1932 年,共产国际任命米兰·戈尔基奇组成新的临时领导,于是该党又开始恢复元气,马丁诺维奇及其集团被解职。第二年,在南斯拉夫国内又重新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甚至组织了地区性组织;到 1934 年,共产党就已经强大到足以在南斯拉夫境内召开一个正式会议,会上批准了戈尔基奇的领导。但到 1936 年,戈尔基奇被指责为与资产阶级左派过从甚密,他与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发生了争执。同年,组织上的领导权被转移到南斯拉夫境内的党的手中,而政治上的领导权仍然留

在身在国外的戈尔基奇手中。到了 1937 年,戈尔基奇被革除了领导职务,党的全部控制权在南斯拉夫的国土上重新建立,铁托成了主要领导人。接着就迅速清除了所谓宗派主义分子,其中包括被指责为托派分子或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人,铁托本人很快就对这个磐石般巩固的政党建立了统治地位;该党遵循第三国际的路线,努力争取人们支持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随着德国对南斯拉夫的压力增加,统一战线的实力也大为加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经派出一个分遣队去参加西班牙内战,并且在 1938 年的慕尼黑危机时期宣布愿意派遣志愿军去支援捷克人作战。在这些岁月里,南斯拉夫共产党无疑已经建立起优势,成为国内的主要反对力量。在 1938 年的大选中,克罗地亚劳动人民党(1937 年建党)与克罗地亚民主联盟联合起来与政府对抗,进行竞选;不过这种政策受到大部分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谴责,他们认为本党应当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一般说来,克罗地亚共产党人的力量比该国其他地区的都弱,唯有马其顿是例外,后一地区的地方党的领导萨尔罗由于拒绝参加铁托的游击队对法西斯侵略者以及南奸进行武装抵抗,因而于 1941 年被开除出党。

铁托在 1937 年担任领导,实际上是原先的领导人企图从国外的流亡总部强行进行领导失败以后,国内的南共党员重新维护其既定政策的权力的结果。在克罗地亚,原先奉行激进政策而且愿意与城市工人联合的农民党,在 1928 年斯特芬·拉迪奇被谋杀以后,就日益转到克罗地亚的商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新领导人马泽克是一个律师;该党发展成一个亲法西斯的右翼与激进的左翼相对立,而中派则企图以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的身份,反对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王国内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在左右两派之间维持一种朝不保夕的均势。在另一方面,左翼在德拉戈札布·乔凡龙尼奇教授的领导下,主张实行激进的社会改

革政策，并试图与塞尔维亚的农民结成同盟，但大部分没有效果。

在保加利亚，由季德夫领导的农民党的温和派于 1931 年参加了马利诺夫所领导的自由党联合政府。但是随着 1934 年独裁政权的建立，所有的党派都被取缔并被赶入地下。但是共产党人保持了他们的地下组织，在城市中尤其是如此，并为人民阵线政策赢得了许多公众的同情。可见，不仅是南斯拉夫，还有保加利亚在 1939 年时都存在一个有强大潜力的共产党，准备随时夺取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则除了小的流亡派别以外，实际上已不再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存在了。

在希腊，三十年代主要是在比雷埃夫斯、萨洛尼卡和卡瓦拉等工业中心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在共和派与保王派几乎平分秋色时，在它们两者之间有一个时期大有举足轻重之势，只不过力量要比 203 它们小得多。在 1935 年议会里，共产党拥有 15 个席位。一般所谓的赤色恐怖给 1936 年麦塔萨克斯独裁政权提供了一个口实，共产党在这个政权下遭到严厉的镇压，但仍然在有组织的工人中保持了势力，并在知识分子中继续得到一些支持，这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政党和独裁政权对该国迫切的社会问题没有设法去解决。

因此，在三十年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有波兰以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几乎已经消灭。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还可以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回一些早先失去的地盘；在波兰，该国的社会民主党仍在议会外面对独裁政权进行一些反抗。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到处遭到取缔，却继续博得相当多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那几年里，他们尽管遭到镇压，实际上却取得了进展，至少在巴尔干国家是这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一向比社会民主党强大，而且社会民主党人有好几次还由于和组织独裁政变的人有牵连而深受损害。至于反犹主义，则只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三个国家中

才成为主要问题。这当然是德国人千方百计地制造出来的问题，并且在建立当地的法西斯运动中，特别是在根据德国模式建立起来的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因为在意大利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很少，就防止了大规模的反犹运动，而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反犹主义有着传统的根源；当 1930 年以后那几年的大萧条将这几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卷入漩涡时，就不啻对反犹主义火上加油。当然，那次萧条断绝了外资的供应，使农产品价格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因而必须认为，当时之所以有许多国家实行独裁，并严厉迫害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主要是由这种局势造成的；因为半饥饿状况促使人民大众怨声载道，因而资产阶级政府无法以宪政方式维持其政权，于是有产阶级就不免要诉诸武力了。

在三十年代后期，形成了一种风气，特别是把东欧各国的反动政府一律称之为法西斯政权；其实其中有些政权的性质更多地是 204 属于旧式的寡头独裁政权，没有任何群众运动支持，不像希特勒在德国或者甚至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能够纠集群众跟在后面那样。如我们在前文所见，罗马尼亚的真正法西斯分子——铁卫团——直到 1940 年德国人强迫卡洛尔退位以后才上台，而且执政不久就由安东内斯库将军的那种较温和的军事独裁政权取代了。波兰和匈牙利的独裁政权由于没有任何明确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也不能恰如其分地被看作法西斯政权。然而它们是十分明显地反对民主的，并且尽一切可能敌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只要工人组织起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它们就往往认为有共产主义在幕后指使。它们也和法西斯分子一样具有强烈的反犹主义思想，因为它们面对着相当多的犹太人与它们争夺生计，至少是犹太商人在争夺生计方面还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外，犹太人在产业工人中以及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中都相当有地位，所以可以轻而易举地指责犹太人是煽动骚乱的主要祸首。

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就同主要从事争取绝对生存的日常工作很相似。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仍有少数杰出的思想家,其中著名的有匈牙利的乔治·卢卡奇和罗马尼亚的 C. 多勃罗格阿努-格烈阿(即卡茨,死于 1920 年)。后者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的缔造者。正像布拉戈也夫在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一样。但是在三十年代,社会民主党人主要关心的是明确自己对独裁者的态度,而共产党人则在警察不断的迫害下大部分被迫过着地下生活,所以新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时候出现几乎是不合情理的。诚然,这种局面并没有能使共产党人避免由于剧烈的派系斗争而四分五裂——斗争的主要起因是它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该国际本身变化不定的政策,但这种主要偏重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 205 政策,而不是它在各国的国内政策的斗争,并且没有产生出什么新的东西。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中期转而采取人民阵线政策,无疑对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有好处。这些党在该国际存在的时期内遵循这种政策之后,在各自的国家里逐步建立起了基础较为广泛的民族抵抗运动的支持力量,而且在 1939 年大战爆发时还在得到这种政策的好处。这些共产党中的大多数都由于 1939 年的《苏德条约》而感到吃惊;但是德国人在侵入并占领这些国家时的所作所为,却让它们之中的某些党恢复了暂时失去的原先领导地位。战争年代的抵抗运动为他们准备了条件,使他们得以在 1944—1945 年在俄国武装部队扶持下夺取了政权(唯有南斯拉夫没有受这种扶持)。接着,他们就在共产党控制的人民阵线政府下稳定下来,并强制力量较弱的社会民主党与他们合并,当它们拒绝时则将对方并吞掉。这样一来,罗马尼亚社会党在 1948 年召开党代表大会同意与共产党合并,反对此举的领袖都被迫流亡国外,于是整个的党就终于被消灭了。南斯拉夫的社会民主党人也由于在抵抗运动



中支持米海伊洛维奇而不支持铁托,而同样被消灭或被迫流亡。菲埃尔林格领导下的捷克人被迫投入共产党的怀抱;波兰人只保持了一个名存实亡、流亡在外的社会民主党。至于保加利亚人,则继续发扬布拉戈也夫及其“有限派”的传统,而该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则在1946年的大选中与农民党人联合竞选后被无情地消灭,他们以前的领袖和议员全被逮捕和监禁,或被关进集中营。他们有一个名叫克利斯汀·帕斯托科夫的领导人在狱中被杀害,另一个名叫兹维提·伊万诺夫的领导人在集中营里。保全了性命的人都逃往国外,后来在纽约设立了流亡党总部。所有的政党都在1934年基蒙·乔治也夫的政变以后遭到镇压,自由工会也被取消,而由国家控制的一个新工会运动代替。但政治活动仍在地下继续进行,社会民主党人在独裁政权崩溃以后马上就在1944年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参加了最初接管政权的联合内阁,他们在内阁中的主要代表是季米特洛夫·尼科夫,担任国民经济部长,在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于1945年退出政府后,他仍然留任,后来他参加了共产党。

### 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

在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得势的十年,而是大萧条和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的十年。新政结束了“公司”工会运动并形成了大为加强的另一种工会运动,它具有一种新的社会态度,使美国劳工运动得到了公众从未有过的重视。如果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甚至只要朝着福利国家的方向取得真正巨大的进展就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那么三十年代便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空前发展的十年。但是这个十年也是美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但继续衰落,而且几乎已经消失的时期。1938年,美国社会党党员减到7,000人以下,而1934年则有23,000人;1939年时,该党就几乎不复存在了。美国共产党虽然更为喧嚣,但在工人阶级中也没有多少人支持;他们的追随者主要是知识分子,这批人是他们颇为技巧地通过反法西斯阵线和反战运动等形形色色的“外围”组织罗致进来的。工会在1935年联合起来组成工业管理委员会,不久之后就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分裂而成为产业工会联合会,它破天荒第一次吸收了钢铁、汽车、石油等等大规模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人入会。这种新工会运动所代表的政策与美国劳工联合会根本不同,与西欧的劳工运动的政策则更为接近。但是,虽然欧洲的工会大部分有密切联系,甚至与社会208主义的政党有组织上的联系,产联却没有这种联系,他们非但不打算建立独立的工党或社会党,反而通过其政治组织委员会日益被吸引到罗斯福和民主党一边去支持新政。虽然当时的社会党人

和共产党人都忙不迭地指责新政是一种阴谋,想使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稳住脚跟(这诚然是新政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使活跃的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分子日益受到形势的逼迫,不得不在下列两种选择之间任择其一:要么就根据工会的要求,通过产联积极支持新政的政策,要么就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第三党”的社会主义鼓动,而这却是毫无成功希望的,并且还会危及通过与新政执行者合作所取得的成果。瓦尔特·鲁瑟等人面临这种抉择时就退出了社会党。该党的领袖诺尔曼·托马斯在1932年作为该党总统候选人曾获得90万张选票,但到1936年再次竞选时,却只得到107,000张选票。

三十年代初的世界大萧条在美国所造成的灾难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严重。山雨欲来的第一个明显的风声是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但很少人认识到当时普遍存在的繁荣景象的基础不稳,许多人都信心十足地预言经济很快就会复兴并重新获得发展。事实上在第一次危机之后,确曾出现一个短暂的恢复元气时期;但不久之后就更为急剧地向下跌落,并且开始出现一片竞相“停业清理”之风。1932年的生产和就业人数几乎降低了一半,工资收入惨跌,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地倒闭。当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早春时节就职时,整个经济体系陷于瘫痪,美国商业的信誉已经完全破产。显然,美国必须采取彻底的步骤来挽救当时的局势,但计将安出呢?整个美国经济的传统基础是相信企业家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业,并且不承认国家对维持就业水平有任何责任。只有少数经济  
209 异端派才主张一些形式的计划经济,或是认识到国家的行动与货物和劳务的需求水平是什么关系。几乎没有人想到竟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由于企业界丧失信心而使投资减少成涓滴之流,并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而又没有为他们安排好社会服务事业。看来新总统本人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怎么办,而只是承认他又不

容辞地必须设法挽救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他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只是用一些临时凑合的办法来解救燃眉之急。他们那一派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当时的情况,从而准备好一套思路明确的补救办法。事实上,其中某些办法,如降低美元的金价值等,从美国当时的国防经济地位来看,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但有两桩事情显然是必须做的,而且也办到了:第一是必须以种种方式大量支出公款以便提高总需求水平;第二是必须制止大幅度削减工资,因为这样只会使局势恶化。

在经济崩溃的时期,有一大部分美国企业仍然拒绝承认雇工有任何集体谈判权。在某些工业中,属于劳联的工会基础稳固,赢得了集体谈判权利。但劳联只组织了一小部分劳工力量,其中大部分是熟练工人;至于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大工业则完全没有能进行有效的组织,其中有些根本没有组织,另一些则由雇主所控制的“公司”工会把持,雇主们利用这种工会来遏制真正的工会运动。新政通过《工业复兴法》建立了一个机构,立时制止了工业工资和产品价格的下跌;这一法令后来被最高法院审定为违宪,但是这是在该法令已完成了本身的任务之后的事情;此外还通过了《劳资关系法》,使工人获得了组织和参加不受雇主控制的工会的合法权利,而且可以强制雇主进行谈判。于是,关于“公司”工会以及所谓“自由雇佣制”的全套办法便整个崩溃了;因而在美国工人阶级历史上作为整个阶级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解放,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会并放心大胆地进行组织,而无需害怕别人打着自由的旗号抬出国家和法律来压制他们。

这是一项巨大成就,工会马上就得到了好处。得益的是劳联所属各工会,以及在新成立的产联主持下成长起来的工会。劳联的会员在1933年只有230万,到1938年就上升到370万,这一年产联的会员有350万,此外还有100万左右属于铁路工人兄弟会

和其他未加入联合组织的工会。非但如此,原先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指责为“非美”活动的工会运动,在新政之下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认地位。当时人们认为这种地位仍然岌岌可危,因为当资产阶级惊魂未定而市场情况又恢复到多少接近于危机前的正常水平时,许多雇主就直言不讳地指责原先使他们得救的措施,并设法恢复旧时的反工会作风。然而这时工会的基础已经十分稳固,不容易顶回去了,大企业主大部分都认为较妥当的办法是与工会妥协,而不要冒全面劳资冲突的危险。资产阶级尽管仍然很不喜欢原先把它扶植起来的人,但在三十年代后期还是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威信已非昔比,并且深知自己必须依靠国家来维持本身的地位。

社会党人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的实际后果是使美国资产阶级起死回生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话言之不谬。其实罗斯福当初根本无法为社会结构找出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基础,除了他所走的那条道路以外他又怎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在大萧条时期,社会上的不满情绪的确普遍存在,但并没有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有效的挑战,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提出任何其他有关国家经济事务的组织方式。劳联和产联等工会组织并不主张改变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只主张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并在更大程度上进行社会保险。为实现这两点,他们一方面固然向国家要求,另一方面也通过“固定薪金以外福利”<sup>①</sup>的劳资谈判,日益扩大集体谈判的范围。在大萧条时期,社会改良计划层出不穷,如年金计划、合作社区生活计划等等不一而足。但等到经济从萧条的最低潮中恢复过来,而大部分工人(虽非全部)又能找到职业时,这些设想大部分都烟消云散了。例如1933年厄普顿·辛克莱所提出的

<sup>①</sup> 指年金、假日工资、保险金等。——译者

《结束加州贫困》计划等，一时之间曾在公众中引起极为广泛的反响，但当新政产生效果的时候，它就迅速地消逝了。三十年代后期的新美国，在某些重大方面与旧美国大不相同。不过，它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未减少，尽管已使其资本主义比较可以信赖，对舆论也比较尊重了。

当萧条乍一爆发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其他表现不满情绪的运动一样，都暂时有所发展。美国社会党的党员人数在1928年跌到7,000人至8,000人之间，在1932年增加到15,000人，在1934年增加到23,000人，但在1936年的分裂以后，又迅速减少了。该党的杰出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于1933年去世，此后该党的元老中就再没有人能接替他的位置。自他谢世以后，美国社会党就日益成为微不足道的小集团之间进行派系斗争的舞台。希尔奎特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是纽约的一个犹太籍律师，他在当地的追随者颇多。共产党人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尽管他们把他骂得一塌糊涂，他却是一个操进步见解的左派社会党人；他与社会党右派的议会民主主义者的距离不下于他与共产党人的距离，不过他的声望和影响却足以维系一个政党。他去世之后，旧领导（也可以说是其中的遗老）不久就失去控制力。1934年，极左派夺取了美国社会党的整个机构，把兰德派的阿尔杰农·李以及其他老一辈忠诚的党员全都排挤出去，一直发展到1936年发生最终的分裂，右翼终于脱离社会党。那一年，美国社会党实际上曾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准备采取共同行动；但后来谈判破裂了，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的路线发生变化，转而支持罗斯福，美国社会党却仍然强烈反对他。同年，美国的托派集体加入美国社会党，以詹姆士·P·坎农和麦克斯·沙施特曼为首的美国托派原先在1928年被共产党开除，其后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党存在。这种混合为时很短，经过10个月不愉快的共处之后，到1937年托派就被开除

出了社会党,重又成为一个自立的政党。此后,美国社会党的名人几乎只剩下诺尔曼·托马斯一个人了,他的政策几乎完全只限于促使美国不惜一切代价置身于战争之外。因此,在1941年之前的几年里,美国社会党实际上是一个孤立主义和非战主义的团体,而不是在任何建设性意义上说来的社会党。其实,美国社会党究竟采取什么路线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它已经丧失了它的全部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说,共产党人至少表现得活跃得多。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二十年代,他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分裂,每一个反对派都分裂成一个新的党,与第三国际所承认的正式党派水火不相容。其中有些分裂的党派一时颇具地方势力,有的一直维持到了三十年代,比如约翰·克拉奇在底特律组成的无产阶级党就是其中一例,该党一些领导人在组织汽车工人工会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大多数这种党派都很快消失,或者是缩小到接近于零的程度;不过L.P.坎农的托派却保持为一个专门捣乱的小团体。还有一个以1929年被共产党开除出党的杰伊·洛夫斯通和本杰明·吉特洛领导的所谓共产党反对派一直维持到1940年;此后他们两人都肯定投入了反共行列,洛夫斯通终于在1947年担任了劳联所建立的自由工会委员会的秘书。共产党在二十年代所分裂成的敌对党派中,有一派由威·泽·福斯特和厄尔·白劳德领导,另一派由查理斯·鲁顿伯格领导,后者在1925年差一点儿被开除了,是由第三国际出面干预才保住党籍的。但鲁顿伯格在1927年死了,第二年,坎农和他的托派追随者就被开除出党。后来在1929年又把洛夫斯通和吉特洛开除出党,并在莫斯科的直接指示下改组美国共产党。威·泽·福斯特本来希望被任命为总书记,但后来这个职位却给与了他的追随者厄尔·白劳德,并一直由他任职到1945年被开除出党为止。1929年以后,美共一直唯命是从地遵循着莫斯科的指令,叫他们的政策怎么变就怎么变。这样一来,他们在以后的

几年里便献身于“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意味着把社会党人当成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看待，并力图把他们的群众从他们的领导者手中争取过来，从而破坏他们的组织。这一政策在大萧条年代里以及纳粹党在德国取得胜利的时期里一直坚持实行，到1935年夏才由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民阵线政策所代替而告终结，该阵线是由共产国际的新任书记季米特洛夫组织的。这时美共马上改变态度，着手把美国人民团结到以最广泛的支持作为其基础的反法西斯运动中去。不过这种路线的改变并没有能改变他们与社会党人的关系，因为这样一来就使美共与产联合作，从而间接支持了社会党人始终极力反对的罗斯福和民主党。共产党人打入了产联的一些工会，并夺取了其中少数几个的控制权，后来产联的领导人才认识到这种挑战的性质，于是便与这批原先的同盟者翻脸，把他们赶了出去。接着，在1939年签订《苏德条约》时，美共的路线又突然转变，只不过到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时又一次变了回来。

从美国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即使把社会党和共产党所有的派别加在一起，也力量太弱，不足以对政局产生任何真正影响。如果美国工人阶级能在美国政局中起作用，也是通过劳联和产联，而不是通过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各派别；至于产联本身，前文已经说过，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他们在新政之下所已获得的成果以及如何逐步加强它作为一个集体谈判机构的实力问题，而不是任何比较遥远的目标。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1936年曾经十分有效地动员工会投票选举罗斯福，所以别人企图勾引它在联邦政治局中组成第三党时，它一概置之不理——虽然这没有妨碍1936年在纽约组成一个独立的美国劳工党，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对当地的政局还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美国的托派在1937—1938年由于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为他们发表了两



篇报告而声名大振,该委员会由约翰·杜威主持,成立的宗旨是公正地调查共产党人对托派所提出的攻击;然而在宣传领域所获得的这种成功,虽然有助于使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美国公众眼中丧失威信,却与政局发展无其他关联。美国在三十年代中期和晚期所获得的巨大的社会发展,干脆把社会主义者抛到一边去了,不论是社会党人还是共产党人没有在里面起什么作用。尽管如此,在大萧条和新政的推动下,美国社会在这些年代里经历了一次阶级关系的革命,这次革命虽然基本上没有改变它的总的经济结构,却使这个结构的效果从根本上变得有利于工人阶级了;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推翻之后没有真正可代替它的制度——,而是它的转变,从一个以毫无控制的经济力量进行无情剥削的制度转变成了社会责任的概念在其中得到明确承认的制度,虽说这种承认是勉强的。美国的社会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解决,但却建立了一种远为过得去的社会关系,而且看来只要该国不再发生1929以及此后几年所出现的那种大灾难,这种关系似乎就可以维持下去。

在这种形势下,要期待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任何重大发展会是徒劳的。共产党人有一部分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叫他们说什么就说什么;另一部分则脱离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分散成一大批你争我夺的小集团,把力量全都消耗了,根本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思想。社会党人有些毫不动脑筋地模仿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路子,另一些在分裂出去之后就卷入了派系斗争之中,根本没法找到一种一方面能使自己有别于共产主义运动,而同时又能遵循一条独立的道路的方针政策。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没有一个是有一个可以呼吁的强大的舆论界,因为新兴的工会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而是听任他们自己去进行派系斗争,根本没有人听他们那一套。诚然,产联下属各工会的团结不久就破裂了。戴维·杜宾斯

基把一度掌握强大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共产党人击败之后,拒绝追随产联的其他工会一起坚决脱离产联,反而回到了劳联的怀抱之中。产联的实际缔造者约翰·L.刘易斯与该联合会以及罗斯福都发生了争吵,并率领他那一批矿工回到了原来独立于两个对立的运动之外的立场。产联就与会员中的共产党分子翻脸,把共产党所把持的工会开除出去。不过产联的主体仍然团结一致,并在已经获得成功的集体谈判方面开辟了新园地;同时,他们还率先与国际工会运动逐步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到1940年,美国成了一个实际上没有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国家。然而它同时又是一个一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却获得了很大发展的国家;它已经铺平了道路,可以与其他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进行紧密得多的合作,而这在十二年前看来是办不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西欧各国的社会党人和工会领袖与瓦尔特·鲁瑟及其产联同仁会晤时,发现与以往的接触相比较,在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交谈要容易得多。这主要不是由于欧洲人的社会主义色彩更淡了——如果有这种情形,也非主要原因——,而是由于美国人所达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阶段使他们远比在新政以前接近欧洲的同行人在这方面达到的阶段。

在加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由农民组成的进步党早已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理论而解体,三十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形成了一个以农场主与城市工人的联盟为基础的新党,名为平民合作联盟。该党实际上成立于1933年。当进步党在1925年垮台以后,<sup>216</sup>西加拿大地区就出现了一个独立工党和一个农场主政治联盟,这两个组织为组成一个反对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新党进行宣传。1932年7月,独立工党在萨斯卡通召开代表大会,拟定政治纲领。就在当时当地,原先一直不带政治色彩的加拿大农场主联合会也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政治纲领。后来发现,双方的纲领几

乎一模一样,于是农场主联合会就提议两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共同行动问题。这些会谈的结果是决定成立农场主工党。截至那时为止,这个运动几乎完全只限于萨斯卡通省的范围之内。后来根据新团体的建议,在1932年8月于卡尔加里召开了范围较广泛的会议,但代表主要仍然来自西加拿大地区;会上决定创建平民合作联盟使之成为一个大致具有社会主义目标的全国性政党。它的原政纲的确十分接近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政纲,只不过它更多地主张国家需要采取旨在保持或建立工业和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公平比例的措施来帮助农场主。该组织还极力主张制定社会保险法来保障在萧条中失业的多数人的利益。翌年,平民合作联盟在里贾纳开会,发表了《里贾纳宣言》,更详细地规定了它的政策。宣言要求实现“有计划的和社会化的经济,使我国的自然资源以及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归人民所有、管理和使用”,以便终止加拿大的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遭受的灾难。该宣言比较具体的主张有以下几项:财政和金融、交通运输、电力“以及社会计划所必须的其他企业和服务事业”要实行社会化;保障农场主的土地使用权;鼓励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恢复并维持农产品与其他产品价格之间的公平关系;通过进出口商会调整对外贸易;制定劳工法典保障组织自由;工人须有效地参加工业管理;制定范围广泛的社会保险法;保健事业社会化;修正《大不列颠北美法案》,以赋予自治领政府以更充分的权力;普遍实现言论和集会自由,并取消种族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歧视;彻底改组税收机构;根据全民就业或全民维持生计的原则制定紧急救济纲领;住房或其他实用工程由公费负担,该计划的资金应“以国民财富为基础发行债券”筹集。

在1921年曾初次当选为工党议员的J.S. 伍兹沃斯这时被推选为平民合作联盟的主席,该盟在以后的年月里在西加拿大地区发展很迅速。它在选举上获得初次胜利是1934年,那年它在萨斯

喀彻温省的省议会中获得了 5 个席位。到 1938 年增加到 11 个席位；而在 1944 年，平民合作联盟获得了 52 席位中的 47 席，并在这压倒多数的基础上，在 T.C. 道格拉斯领导下执政，此人现在仍担任该省的省政府总理。它在其他省份的进展不那么迅速，但平民合作联盟却以第三党的身份向自治领中轮流执政的自由党和保守党挑战。该盟在整个自治领的政治中力量仍然比较弱；1940 年时，它在加拿大下议院只拥有 8 个席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发展速度比以前快得多，特别是在安大略省；1934 年时，它在该省省议会中占有 34 席，成为第二大党，所占席位大大超过了总额的三分之一。那年，该联盟在 4 个加拿大省份中都成了主要反对党。伍兹沃斯在 1942 年去世后，由萨斯喀彻温省英国出生的教师 M.J. 科德韦尔继任主席，如今他还继续领导该党，不过在加拿大于 1958 年出现一面倒的选举胜利之后，他就不在议会中了。组成平民合作联盟的成分中，除了劳工运动人士和农场主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他们以麦克吉尔大学的 F.R. 斯科特教授为首，此人曾组织社会复兴同盟，并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加拿大社会计划》的重要报告。为这个集子撰文的人大部分都成了平民合作联盟的积极支持者。该联盟从一开始就极力强调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才能 218 公正对待城镇和乡村，并使拥护该盟的不同人物和谐相处。

在这一时期内，拉丁美洲一方面具有大量的未开发的资源，另一方面当地的白种后裔贵族又不断地与当地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形形色色的民主和人民运动进行斗争；工人阶级运动则由于工业不发达而仍限于少数人，他们不断发生派系纠纷，并且大部分与农业工人完全没有联系，而后者则几乎在该大陆的每一个国家中都占人口的大多数。白人只在乌拉圭、阿根廷和哥斯达黎加才构成人口的主体，其他地方的人口主要是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在三十年代的后期，在差不多 13,000 万的总人口中，印第安

人和黑人各占大约 1,600 万。巴西的人口中几乎有一半是黑人；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的居民一半以上是印第安人；而秘鲁和厄瓜多尔则有 40% 以上是印第安人；墨西哥将近 30% 的人口是纯粹的印第安人。唯有阿根廷的生活水准才能与较先进的国家勉强可以相比——即使在该国，其平均水准也远远低于欧洲的先进国家。工业化主要依靠输入外资，而外资则主要来自美国，虽然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公用事业中仍然占支配地位，尤其是在阿根廷。美国的渗入主要集中在中美洲，得到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的联合果品公司在该地区具有非常强大的势力，而且一向与最反动的分子——当地的大庄园主——相勾结。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阿雅·德·拉·托雷在 1924 年创立了阿普利斯塔运动，号召拉丁美洲人超越民族小集团的界限，实现印第安—美洲爱国主义，并号召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与农民联合起来，  
219 反对帝国主义的渗入。<sup>①</sup> 这一运动与共产党人发生了尖锐冲突，后者坚决反对这种阶级联合，并力求建立一个受他们控制的统一的无产阶级运动，并使农业工人受无产阶级领导。有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运动，除了在阿根廷和智利等少数国家以外，并没有强大的力量。但根据欧洲的楷模建立起来的五花八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却拥有相当多的工人阶级追随者。至于墨西哥革命，自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获得初步胜利之后，就一直陷入与教会的剧烈斗争之中，在 1934 年卡德纳斯总统上任以前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位总统由于恢复了土地分配过程并奖励工人阶级组织的成长，而大大地促进了工会运动。莫罗内斯于 1919 年建立了他的工党，在三十年代中继续领导该党，但所获成就有限。1936 年，作为莫罗内斯的合作者开始他的事业的左翼律师隆巴多·托莱

---

<sup>①</sup> 见第 4 卷下册第 761 页以下。

达诺担任了新成立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书记，后来利用这个有利地位进一步在1938年建立了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有一个时期该会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隆巴多·托莱达诺始终否认他是共产党员，但他无疑得到该党的支持并与之密切合作，同时还是卡德纳斯的劳工问题顾问。墨西哥共产党最初是由第三国际日籍特使片山潜于1922年建立的，领导人是美国公民B.D. 沃尔夫，该党势力很小。沃尔夫于1930年与著名的艺术家迭戈·里维拉一起被开除出党；以后该党就亦步亦趋地反映着第三国际的政策变化，在1935年以后，他们言听计从地转变态度，鼓吹人民阵线，并支持卡德纳斯的改革，尽管这位总统准许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避难仍然给予支持，后来托洛茨基终于在1940年被斯大林派来的密使暗杀。但到1940年当卡德纳斯不再担任总统而由卡马乔继任时，复活的革命运动就失去了动力，墨西哥也就稳定下来，安心于在资产阶级 220 政权下发展经济。当时工商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农村也出现了一些使用经过改进的耕作法的大农庄和中等农庄。卡德纳斯大力发展的村社(ejidos)不再具有公社机构的性质，而是成了单纯的个人所有和个人管理的农业村庄组织。而且不久之后，工会也分裂成许多互相倾轧的派别。隆巴多·托莱达诺也渐次失势，最后在1948年被开除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只是仍然领导着几乎徒有其名的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该会在首倡国已经完全失势。墨西哥工会运动即使在鼎盛时期，也几乎完全与农民隔绝，根本没有帮助他们与地主和教会——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作斗争。在卡德纳斯担任总统时期，墨西哥的城市工人(至少是技术工人)像工人贵族那样曾为自己取得了大为改善的地位，但在1940年以后，他们就江河日下；不过特别是油井工人，生活状况仍然大大高于1937—1938年卡德纳斯实行油井国有化以前的水平。

因此，在三十年代的后五年，墨西哥的工会运动一度似乎成了

全拉丁美洲产业工人运动的主角,不过当卡德纳斯时代在1940年结束时又急剧地走上了下坡路。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所经过的道路非常曲折,但总的说来是输给独裁者了,这种人一上台几乎立即就把左派赶走。例如智利,当1932年6月世界萧条的影响在群众中掀起一阵广泛的不满情绪时,在玛麦杜克·格罗维上校领导之下,一个确确实实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维持了14天;那时该政府把前独裁者伊巴内斯赶走了,并且扬言要实行影响深远的改革,但不久就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然而这次政变的结果不是重新实行独裁,而是让前自由主义派总统亚历山大里再次执政,推行一种宪政统治,取得了相当大的社会进展。智利那次社会主义革命显然是不成熟的,那些部长的政策是模糊而混乱的,但却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尽管那次革命失败了,智利在三十年代仍然有着全拉丁美洲最强大和最巩固的一个党,还保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工会运动,为1938年人民阵线所获得的决定性胜利铺平了道路。

除了墨西哥和智利以外,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唯有哥伦比亚还稍有资格称得上是一个民主国家,该国实行了长期的自由宪政,直到1949年才告终结。其他国家则有一系列的独裁者上台:1930年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约和巴西的格托里约·瓦加斯;1931年有危地马拉的豪尔赫·乌必科;1933年有洪都拉斯的蒂武尔西奥·卡里亚斯;1937年有玻利维亚的托罗和布什两上校。在此期间,在秘鲁,1924年在墨西哥创建了阿普利斯塔运动的阿亚·德拉托雷赢得了巨大影响,尽管这位领导人流亡在外,直到1931年莱卡里亚垮台后才回到祖国,托雷回国后当选为总统,但立即被桑多斯·卡罗所领导的军事政变所推翻,并被后者关进监狱。1933年卡罗被刺杀后,他获释出狱,恢复了自己的活动;但再次遭到迫害,所以阿普利斯塔运动不得不继续进行地下活动,不过力量仍然很

强大,迫害者虽千方百计要消灭它,也没有办到。最后,在1946年,温和派的候选人布斯塔门特·里维罗在阿普利斯塔运动支持下当选为总统,该运动中有几位成员入阁任部长,但由于反动派大力反对他们的政策,结果并没有获得多大成就。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8年,那一年又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接着就对阿普利斯塔运动采取了严厉措施。

本书第四卷中已经说过<sup>①</sup>,阿普利斯塔运动在一个时期里看 222  
来很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左翼运动,非但在秘鲁如此,在整个拉丁美洲也是如此。然而除了秘鲁以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能成为一个群众运动。这个运动遭到共产党人的激烈反对,起初的原因是;他们主张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与农民结成反帝联盟,使拉丁美洲从外国、尤其是从美国的入侵下解放出来,而当时共产党人却提出了“以阶级对抗阶级”的口号,并且坚持革命运动要由无产阶级领导;后来则是由于当共产党人转而采取人民阵线的政策时,这两个运动竞相争夺对同一批人的领导权。当共产党人邀请阿普利斯塔运动的成员参加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时,他们回答说;他们的运动已经是一个人民阵线运动,仍在运动之外的人应当参加进来,以免分散人民的力量。阿普利斯塔运动的成员还极力反对各拉丁美洲国家单独的民族主义运动,力图用一个比较广泛的、超越国界和种族界限的民族主义概念来取而代之;这种广泛的运动不但号召产业工人,而且号召农民团结一致反对美国佬及其反动领袖。1933年,罗斯福总统彻底改变了美国以高压手段对待拉丁美洲的传统政策,并宣布了他的“睦邻政策”,结果缓和了与北美的紧张关系对阿普利斯塔的反美政策产生了反响,当时的舆论已经从反北美主义转向了国家民族主义。阿普利斯塔运动的领导者尽管提出广泛

<sup>①</sup> 参看第4卷下册第765页。



的社会主义纲领,但是秘鲁之外只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支持。事实上,他们的基本理论远远脱离了群众,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号召群众的基础,因为他们的在国际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化计划必然带有不现实的色彩。而且他们力图号召的广大贫苦的农业工人,也完全无力在全大陆的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除此  
223 以外,阿普利斯塔运动的领导者所采用的方法也带有很大的独裁性质,他们旨在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央集权的政党,服从强有力的中央纪律,而这种纪律是他们无法强加在他们力图吸收来支持统一政策的形形色色的分子身上的。共产党在1935年以前也受到同样的掣肘,但在那一年转而采取了人民阵线的政策以后,就能表现出更为灵活地适应不同拉美国家的不同情况,并且更愿意与各种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潮妥协。因此,阿普利斯塔运动与共产党人竞争时,除在秘鲁以外,整个说来是失败的。在秘鲁建立运动时却得到农村中几乎未曾有人去组织过的印第安人的广泛支持。共产党人与这一运动结下了不解之仇,有时甚至愿意与军事政变分子勾结起来与这个运动对抗,这种对立状况一直到战后年代还未消减。

从某些方面说来,毛泽东在中国所提倡的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拉丁美洲某些革命家的思想颇有共同之处,不过这些革命家不像毛泽东那样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毛认为前者是他暂时的目标,而后者则会不可抗拒地随着前者之后出现。这种类似之处并无丝毫令人惊奇之处,因为毛提出自己的理论时,认为不但可以实用于中国,而且可以实用于遭受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权压迫的一切国家,农民大众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在拉丁美洲与在中国一样尖锐。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早期主要是在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较先进的国家中从那些处处着眼于城市的社会党里分裂出来的运动,与农民很难建立任

何联系,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运动与农民根本不相干。不过第三国际不久就认识到,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地区,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各国的共产党都接到该国际的指令,着手建立由无产阶级控制并领导的工农联盟。在反帝和反对美国佬的运动达到高潮时,这些策略在某些农业国家一度建立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或者受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是很成功的。刚开始时,这些运动不仅针对外国人,而且也针对本国的资本家和中产阶级;但是当共产党人在1935年明确地转向人民阵线政策时,就不得不扩大这些运动的范围,把中产阶级、甚至一部分本国的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这一做法本身原来是会加强反帝运动的,但与此同时,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大大削弱了仇视北美的情绪,于是重点实际上就从反帝转移到了反法西斯方面去了;尤其当时又受到西班牙事件的影响,大大地推动了舆论转向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并大大激发了反纳粹和反意大利的情绪。在1939的前几年中,共产党人成了全拉美反法西斯运动的领袖;只不过正像其他地方一样,在1939年签订《苏德条约》的第二天,就态度突变,并采取一种新的反战政策,这种政策到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候,又同样突然地来了一个彻底转变。这种政策一变再变的情况对拉丁美洲共产党人的损害很小,主要原因是欧洲的斗争与他们的潜在拥护者事实上主要关心的事情关系很小。

如前文所见,毛泽东在中国将各个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的爱国阶级结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民族运动。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也企图以类似的方式把各个反对帝国主义渗透的阶级结合起来,这种渗透的象征就是美国佬在他们那里的控制和对拉丁美洲人中最反动的分子的支持。到这时为止,双方的政策是相同的;但在拉丁美洲,由于种族的分歧和整个地区分成许多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情形比中国要复杂得多。诚然,在阿根廷和乌

拉圭,并没有种族分歧存在;但在本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墨西哥在内,城市工人多半是欧洲人后裔,而其他大部分人则主要是混血种人,并且包括人数众多的纯印第安人集团和以黑人为主的集团,在这两者之间,种族分歧造成了很深的鸿沟,情况比较严重。共产党人竭力抹杀种族隔阂,并且宣称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但是他们这种做法虽然在某些国家对他们有帮助,而在另一些国家其中包括在墨西哥,还有在乌拉圭和阿根廷,却遭到反对。然而他们对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他们没有能把这种影响化为群众组织的行动,而且他们所建立或控制的许多工会都只是徒有其表,而没有得到群众的任何实际支持。他们在知识方面的影响却超出了他们的组织能力,因为正像阿普利斯塔运动一样,他们出现时也是提出一个挑战性的信息,那就是在国际间煽起对压迫人民的反动分子的仇恨,这些分子在大多数的国家里都继续盘踞着政治和经济的要津。但是他们比阿普利斯塔运动强的地方是能够自称为阶级运动的领导者并以反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世界力量的地方代表面貌出现。在三十年代后期,他们一致起来支持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总统,并在隆巴多·托勒达诺领导下协力组成一个旨在从墨西哥的基地出发,囊括整个拉美大陆的工会运动;那时,他们大有组成实力强大的大陆反帝运动之势。可是,正如前文所说,当主要的帝国主义分子——北美洲人——也卷入了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时,这个运动就逐渐消亡了。直到1945年以后,反帝运动才得以实际恢复。

在所有的拉美国家中,唯有居民几乎全部是欧洲人后裔的阿根廷和乌拉圭才始终维持着亦步亦趋地仿效欧洲模式而建成的社会党,或在1914年以前与第二国际曾有联系。还有一些工会运动与这些党同时发展起来,其中有一部分与社会党有松散的联系,另一部分则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例如阿根廷地方工会联合会

以及乌拉圭的类似组织——乌拉圭地方工会联合会就是如此。在阿根廷,在二十年代里,阿根廷工会联合会与社会主义总工会的会员人数大致相等。但到1929年,名叫总工会的新团体吞并了社会主义总工会和阿根廷工会联合会的某些工会,从而取得优势地位,并且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俄国革命以后,社会党中的左翼退出,从多数派分裂出去的国际社会党不久就变成了共产党。在1927年,社会党又发生了一次分裂,这次不是左翼分裂出去,而是安东尼奥·德·托马索所领导的集团分裂出去,这一批人认为该党的政策不够民族主义化。像这样构成的独立社会党在1930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获得109,000张选票,有10名代表当选为议员;而旧社会党只获得83,000张选票,只获得一个议席。这是世界经济萧条前夕的情形,那次阿根廷受了严重的打击,因而引起了规模相当大的罢工运动,激进派政府曾经企图加以镇压。这一行动加上萧条所造成的严重贫困状况,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到1930年9月,军事首领废黜并监禁了乌里武鲁总统。独立社会党支持了这次政变,投票选举该集团的首领胡斯托将军为总统候选人;后来此人以166,000张选票当选,而旧社会党所支持的民主进步党候选人则获得126,000张选票。以后,独立社会党就失势了,并发生了内部纠纷,最后造成了党的分裂。社会党最初大有发展,当选的议员增加到46人,但后来也因为共产党所提出的人民阵线问题而发生争吵,并在1938年的选举中失去大部分议席,只剩下7个议席勉力撑持。而且,它还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党内的青年派分裂出去组成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且加入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阵线。此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旧社会党逐渐恢复势力,但仍然是一个少数集团,特别是相对于方兴未艾的 227 阿根廷民族主义势力来说更是如此,庇隆在后一集团中崭露头角,成为杰出的领袖。

在这一时期里，乌拉圭的共产党于1920年控制了旧社会党，并劝说该党加入了共产国际。持反对意见的人组成了一个对立的社会党，并于1931年加入社会党和工人党国际，但很少得到人民支持。世界危机在乌拉圭导致了政变，总统加夫里埃尔·特拉以违背宪法的方式维持了自己的职位，社会党领袖埃米略·弗鲁戈尼逃往阿根廷避难。1938年，当巴尔东尼将军参加选举想继特拉为总统时，弗鲁戈尼与他竞选，但遭到了惨败。不过巴尔东尼并没有追随特拉的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的政策，而是恢复了巴特列总统在20年前所通过的法律，这些措施得到了社会党的支持。有一个反动分子企图在议会中刺杀弗鲁戈尼，但没有成功，社会党获准自由进行活动，没有遭到其他地方的社会党所遭到的那种迫害。

在二十年代的巴西，共产党原是主要的工人政党，而且大部分时间是作为非法组织进行地下活动的。1929年组成了新的工党，第二年该党党员达到13万人。1934年，该党加入民族解放联盟，这是反对瓦加斯日益独裁的行为的联盟。1935年夏季，该联盟发表宣言，号召实行进步的社会改革政策，几个月以后便宣布举行反对瓦加斯政权的总罢工。后来瓦加斯挫败了这次罢工，为进行反击，他宣布解散一切政治党派并建立一个总体国家，一直维持到1945年他辞职时为止。

228 鉴于拉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对这些运动无法作出任何概括的总结；这不是因为每个国家各走各的道路，不受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而是因为那里舆论的动向不论影响多么广泛，总会因为表达方式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具有极不相同的形式。在广泛流传的学说流派中，大部分来自欧洲，而不是来自拉美本土。但是到了三十年代，这些欧洲的影响，除了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外，都削弱了——特别是一度强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

也来自法国；随着这些国家的鼓动家来到拉美的人数的减少，随着他们很大一部分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投向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影响就更加削弱。欧洲传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其影响也是江河日下，原因与上述情形大体相同。但共产党人想要叫拉美人接受他们那一套中央集权的党纪概念，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因为拉美人已经习惯于松散得多的组织形式，尤其是习惯于每隔几年就改组一次工会，使之适应于变化无常的群众情绪的潮流。当地一个具有全拉美规模意义的运动就是阿普利斯塔运动，但是该运动不但与共产党人发生冲突，而且与排他性的民族主义也发生冲突，后者在许多国家中势力不断增涨，在阿根廷尤为如此，有一个时期它几乎把社会主义运动消灭了。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总统也执行着一种根据本国情况所制定的政策；他本人虽然基本上是一个土地改革者，却一度与隆巴多·托勒达诺成立全拉美范围的工会组织的雄伟计划密切合作。但墨西哥的革命在卡德纳斯以后日益转变为一种经济开发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国家鼓励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发展，并且听任农村公社中的合作成分被消灭。

因此，一般说来，拉美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共同特点是理论上不成熟，而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没有能够在城市工人与农民之间建立任何有效的联系，农民的生活水准与城里人相比还是非常低的，而且在许多情形下也由于种族和肤色的鸿沟而与城里人隔绝。这种鸿沟已经由于工业的发展而逐渐消除；在矿区尤为如此。但是除了阿根廷以外，三十年代的产业工人人数与农民相比依然很少。<sup>229</sup>农民只在某些地方受到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吸引，在秘鲁则受到阿普利斯塔运动的吸引，除此以外大部分人始终没有组织，而且往往成为天主教会反动领袖手中的工具。

## 第十一章

230

###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苏联

本书第四卷叙述苏联的发展时，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实现和农村地区即将进入农民土地的大规模集体化运动。接着我们就会看到，斯大林是怎样成功地首先把托洛茨基，然后又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他们在共产党内的职位上排除出去的，以后又把矛头指向布哈林和原先的右派。我们还会看到，斯大林怎样设法巩固他对党的控制，以便使他实际上大权独揽地决定党的政策，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只是百依百顺地对他唯命是从。此外，我们还会看到，斯大林原来与托洛茨基唱对台戏，反对全面计划和加速工业化的节奏做法，可是他后来又怎样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极力鼓吹他原先所嘲笑的措施；以及他在农业方面也同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发动一个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并对所谓“富农”进行普遍进攻。

现在我们必须比较详尽地讨论一下这些新政策的实际内容及其执行情况。在二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在内战结束而新经济政策推行之后，国内的紧张局势显著缓和；俄国人民虽然仍旧很穷，然而已经能够生活得稍好一点，严格的强制组织化也比1917年以后的头几年放松多了。当然，在那几年里，斯大林并没有站在党的极右翼的立场上。他并没有附和布哈林对富农的劝告，要他们充分利用新经济政策来发财，也没有明确反对工业化。但他曾经反  
231 对托洛茨基为尽量推行加速工业发展的运动，并且反对托洛茨基的一个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唯有在高生产的基础上才能立足，唯有

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也无法达到的高生产基础上才能立足,而克服城乡矛盾的唯一出路则是大大增加工业产品的供应来与农村进行交换。托洛茨基提出这一主张时同时承认,俄国生产力要赶上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须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因而得出结论说:苏联社会主义的前景仍然取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或多个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现实和自相矛盾的政策。托洛茨基责斥斯大林说,宣布“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现实的目标,就是对世界革命事业的背叛。斯大林也努力促使俄国在他所认为的安全限度的尽快工业化,但他在与托洛茨基争辩时始终指责他打算在无法借到外资的情况下强行过快地实现工业化,从而造成与农民的对立。斯大林曾坚持新经济政策,而且鉴于苏联的工业基础很弱,城市要依靠农民供应粮食,特别是要依靠较富裕的农民供应粮食,所以不愿意在农村中掀起阶级斗争。在实现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基础工业生产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煤、钢、石油、电力的生产水平都远远超过了原先的计划草案所拟定的水平,而那些草案的特点是高度集中注意资本货物的生产,对于消费品、交通运输业以至住房等,都只给予极次要的注意,而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城市中心,住房是极其缺乏的。当时的希望是尽快发展基础工业,因为这是工业生产力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当这些工业提高到足够的水平之后,就可以满足消费者关于提高生活水平要求,但也只有到那时才能满足。当时也考虑到:基础工业可以提供战争实力所必要的生产力,换句话说,首先必须尽可能使苏联强大,才能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发起的武装进攻,而资本主义国家则被认为是下定决心要推翻苏联的。 232

苏联投入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的局势无疑是朝不保夕和不稳定的。在苏联当时的工业条件下迅速实行工业化,看来需要大量输入资本货物,而这只有大大增加初级产品的输出,特别是谷物的



输出,才能偿付。但是革命后的土地重新分配使俄国按战前规模输出小麦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俄国在沙皇时代的农业耕作大体上仅足糊口,大量的小麦输出主要靠大型资本主义农场,而不是由农业耕作者的主体提供的。革命把这些农场全瓜分了,取得土地的农民自然希望消耗出产物中大为增长的部分,而不愿意拿出来供应城市或提供出口。即使在好的年景下,政府也发现很难劝说农民把自己的剩余谷物吐出来。遇到坏年景时,就完全没有供出口的剩余谷物了,有时甚至还要用掉本已拮据不堪的外汇来进口谷物。此外,政府如果采用强制手段压榨农民,诸如没收或以极低的价格收购等等,农民往往就不但会拒绝出售他们的收获物,而且会限制谷物生产,以此进行报复——他们或是让土地闲置起来,或是转而种植收购价格较好的经济作物。在1926—1927年间,政府的情况较好,所以就能出口大量的谷物;但在1927—1928年度,谷物收购量剧减,它在国外购买工业品的能力也骤降,从而严重地影响到工业的发展。

危机的严重性已经被普遍认识到了,问题是怎样去应付危机。可能采取的一种政策是帮助农民,把农产品的价格大大提高,或者让他们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售。但这种政策势必会主要使掌握大部分剩余产品的富裕农民受益,而且势必会加强农村中已经存在的一种趋势,即让富农经济在由富裕农民向贫苦农民租赁土地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并增加农业雇工。

“富农”在当时的苏联是一个有伸缩的字眼。原先似乎是指景况较好、并在自己家人之外雇用劳动力的农民。因此,他就是一个剥削者,是一个实际的或雏型的资本家,因为他使用雇用劳动来牟取利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人除了自己的土地以外还租种一部分别人的土地;后一种土地总是一块或几块小土地,其面积太小,土质太贫瘠,原主耕种时养不活自己。除此以外,他还可能经

售别人的产品,收购别人想立刻换取现钱的谷物,从而可以在价格相当大的季节变动中牟取利润。不过即使没有这一切,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雇佣了一个人作为帮手,从而造下了罪,他就算是一个富农——至少是经常雇人、而不仅是在收割季节临时雇人的农户,可以算是富农。但定义是语焉不详的,中农怎样就会变成富农,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如我们将在下文所见,富农的帽子可以多给几个人带上,也可以少给几个人带上,要看掌权者和他们周围的人所实行的政策如何。苏联的领导人并不打算使较富裕的农场主的地位足以左右城市,甚至可能使资本主义复辟,从而刺激生产。斯大林在1929年以前一直走一条中间路线,处于左派的托洛茨基与右派的布哈林之间。

可是斯大林在彻底击败他的对头之后,突然改变了他的路线,宣布把五年计划早期草案所规定的资本投资大大提高,而且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他不再把这种集体化限制为在下一个五年中最多不超过农户的20—25%,而是下令以最高速度推234行集体化,在农村中派出一批干部,命令他们立即执行该计划。造成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直接原因无疑是农民中大规模出现囤积居奇现象。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除非价格大大提高,否则拒绝出售谷物,因此城市面临饥荒的前景。当初原来会采取的一种解决办法是提供农民所要求的高价,另一种办法是向富农开战,强行夺取农产品。但必须避免造成一种促使农民联合起来与政府作斗争的形势;必须尽量争取贫苦农民支持政府的政策,斯大林认为,只要让贫苦农民看到取得富农的土地和牲口——这些土地和牲口将归并到新的集体农庄中去——的前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苏联领导人深信集体农业的优越生产力,集体化以后就可以大规模使用机器,并采用较高级的生产技术。他们已经主要

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建立大规模的国营农场——主要是谷物基地——，企图以实例证明这一点。但它们在已耕地总面积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不过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主要是由于缺乏足以执掌这种大型农业企业的农场主，也是由于苏联的工业装备不好，不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机器。不过这并没有动摇马克思主义者对大规模农作制的优点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仰。可是他们也认识到，要很快扩大国营农业是办不到的，而且要把个体农民的土地转化为大型国营农场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这种农场所能雇佣的人手很少，而农村人口相形之下则大量过剩。然而，当时农业合作运动已经有了迅速发展，既进行农业必需品的购销，也提供信贷，不过并没有实际实行合作化的耕作。当时认为，这种合作化的经验已经使许多农民有了心理准备，可以把合作化的办法推广到生产方面去。

- 235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新的“剪刀差”危机，就决定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计划，其方法是建立合作农场，邀请农民把他们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起来，并且把农具和牲口也集中起来；如果他们愿意，甚至可以进一步建立公社，吃大锅饭，大家一起生活；不过当时预计到，大部分农民宁肯不走这一步，而保持独门独户和独立的生活安排。因此，当时所提出的集体农庄，在大多数地区都只打算成为合作社式的劳动组合，而不是正式的公社，其性质类似于已在小规模工业中盛行的手工业生产者劳动组合，但这种集体农庄将享有大规模生产的一切好处，尽快和尽可能地得到在国家控制下建立的机器拖拉机站供应的机器。此外，他们由于一开始就能从富农手里接收土地、牲口和农具，所以就有了良好的开端；富农则要被强制地剥夺财产并被赶出家园，甚至不得加入集体农庄。当时对这种改变曾寄予厚望，认为很快就会大大增加总产量；并认为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还可以大大减少农业方

面所雇佣的人手,从而大量增加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力。

上述的结果有些实现了,有些则没有实现。当时有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寻找工业方面的职业。因为在许多农村,除了最繁忙的季节以外,人口都大大超过了能够充分雇佣的人手;而在五年计划期间加速了的工业化,不久就需要大量增加工业劳动力。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一公顷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没有迅速提高,牲畜头数也大为减少。其直接原因是集体化运动所采取的方法不当,也是由于“富农”一词所包括的范围扩大化了。

如果富农要被剥夺财产,他们的土地要被集体农民接收,那么有人显然就会情不自禁地扩大富农的人数,以便增加集体的财产;在当时派到农村里来推动集体化运动的一伙热心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压力下,有两种现象无疑是发生了:第一,把合作化运动强加在 236 许多对此毫不热心的人身上;第二,富农的帽子被加在一些并无剥削行为、而只出于个人主义目的、不爱强制组织化的中农头上。毫无疑问整个过程名义上是自觉自愿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当一个村庄里或一批村庄的大多数人都赞成集体化时,或者是通过宣传的压力可以促使他们投票赞成集体化时,个别的农民仍然可以拒绝参加。还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一个所谓富农不能反对邻人的决定;甚至在他被划定为富农之后,就无权参与决议。

那些作为富农被剥夺了财产的人,遭受了深重的苦难,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他们被一群群地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的财产被充公,他们本人被流放到遥远的伐木营去,或是投入开凿大型运河等建筑工程,实际上被迫在奴隶式的条件下从事劳动,所受到的待遇是惨无人道的,以致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成千上万地在悲惨中死去。当他们被赶出去之后,就没有一个人——或者几乎没有人——对他们表示同情,或者哪怕是费心去过问他们的下落。究竟有多少人拖家带口地在苦难中死去,这似乎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他们难道

不是“阶级敌人”吗？如果当初听任他们得势的话，岂不是引导苏联重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吗？这种“阶级敌人”难道还能有最基本的权利吗？共产党人认为，他们不能有这种权利。

其直接后果本来是可以预见的。那些可怜的受害者把牲口杀掉而不交出来。苏联的马、牛、猪、绵羊、山羊等牲畜的头数陡降，引起了普遍的奶荒和肉荒。<sup>①</sup>而且，被无情地逐出家园的人包括很大一部分技术较高和较先进的农业工作者；这就意味着新的集体农庄开始时极其严重地缺少称职的管理人员，于是管理不善的事大量出现。

237 草率集体化的副作用是后患无穷的，以致斯大林不得不发表他那著名的文章《胜利冲昏了头脑》，命令大家停止，重新强调集体化是自觉自愿的，并谴责下级干部执行他们下达的命令时过火。停止进行集体化以后，有许多一窝蜂似地进入集体农庄的人，又一窝蜂似地退了出来，恢复了个体生产。集体化的办法本身也作了修改，允许庄员保留小块的自留地，参加集体农庄劳动之余可以在自留地上工作，而且也允许他们个人保有小量的牲畜，只要他们不发展到富农的地步就行。但是，在延迟了一段短暂的时期以后，集体化过程又重新大踏步地前进，直到苏联大部分已耕地都归集体农庄控制，并且向集体农庄作出法律保证，它们所取得的新土地保有可以无限期地维持。这样一来，土地就不是苏维埃国家的财产，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独立的集体农庄以合作社所有制为基础永远保有；同时，由于集体农庄的工作远不足以使所有的庄员全部时间从事劳动，所以很多人就可以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自留地和自有牲畜方面，还有更多的人则离开土地到城市里去找工作。

这种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的劳动力的流动，对于苏联

---

<sup>①</sup> 关于在1931—1932年随着发生的粮荒，见第241页。

生产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农村无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人口,需要提供另一种就业机会。工业在五年计划实行以前,本来就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失业问题,可是不久就需要大量增添劳动力。在工业中,正像农庄上一样,熟练工人和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和管理人员奇缺,因为当时苏联在技术和工艺的教育和训练方面的大规模活动还刚开始。新从农村里来的人原来本是农民,不习惯于工厂的纪律,也不具备必要的技术,至少是在他们受到训练之前,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但后来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一方面去提高训练的速度和扩大训练的范围,同时也尽量保证原先的农民及其子女可以在受训练者中占很大的份额,保证他们从这种教育和训练中受益的机会与除了产业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一样好,甚至比其他阶级更好。至少在这一方面,苏联表明它迫切希望尽量形成一个以工农出身的人为主的新的领导集团,首先录用这种人,而把阶级出身可疑的人放在后面。 238

不过,他们一方面像这样首先照顾阶级出身,同时又急剧改变了五年计划之前的一种倾向:缩小报酬的差距,至少把相对的经济平等保持为良好的社会目标。在这方面,斯大林也自称他是从马克思那里引伸出来的新学说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横亘着一个过渡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分配收入的正确公式不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因此也就是说不平等的报酬是适合于这一过渡阶段的。这一公式的意义显然会由于衡量劳务的尺度不同而大有差别。因为种类不同的劳务又怎样能相互比较呢?由此十分简单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在行得通的地方,计件工资是比计时工资要优越的报酬方式。但这丝毫不能解决性质相差悬殊的行业中从业人员的相对报酬水平问题。即使人们认为有可能规定出一些相对尺度,并认为它适合于各种不同的体力劳动,可

239 是这种工资又怎样与技术人员, 监督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人员等的报酬联系起来呢? 在革命的早期, 共产党员的工作不论多么重要, 其报酬是有极其严格的限制的。毫无疑问, 马克思曾经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给予政府人员的报酬不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做法, 这种做法摒弃了政府人员或行政人员构成一个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的特权阶级的观念。但这种办法是不是符合苏联当时尽最大可能鼓励提高生产的迫切需要呢? 难道不是有必要尽一切可能提供刺激以提高产量和加强劳动强度吗? 要做到这一点, 岂不是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人与人之间以及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现存报酬差异吗? 斯大林认为情况的确如此, 而且早在 1935 年发起斯达哈诺夫运动以前, 计件工资就已大大推广, 快手督促慢手, 就已获得很高的报酬。事实上, 斯达哈诺夫运动中所引入的新成分, 与其说是大大有利于快手的计件工资制, 倒不如说是为斯达哈诺夫式的工作者提供特别的帮助, 使之能把一切力量集中在主要工作上, 从而完成生产上的奇迹——倘若没有这种帮助, 那样的奇迹是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不仅如此, 当时在有意地加大工资差距的同时, 还取消了优越职位所获报酬的严格限制; 后来竟至发生了这样的争论: 苏联的劳动收入比起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来, 其不平均程度有所减少吗? 当然, 苏联始终没有人能占有生产资料, 或使用雇佣劳动创造财富, 但就劳动收入而言, 其分配状况至少在苏联与英国之间没有多大差别, 甚至于在苏联与美国之间也没有多大差别。

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 与其说是由于斯大林个人喜欢极度不平等, 倒不如说是苏联的政策在他的影响下, 开始几乎完全受尽量提高生产这个目标所支配。根据他的看法, 苏联的任务首先是在煤、钢、石油、电力(也许最重要的是化学产品)等先进工业的总产量上赶上首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然后再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上赶上并超过它们。当五年计划刚开始实行的时候, 曾经作出保

证：不但总产量要大大增加(至少在重工业方面)，而且当生产率提高而使工作成本降低之后，物价就会降低；前一保证现在已经实现，后一保证在早期绝未实现。毫无疑问，未能实现后一保证的原因，一部分是当时必须雇佣大量不习惯于工厂工作的新劳动力和未受训练的监督人员和经理人员；另一部分是新工厂建成并投产所需要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得多，而且往往一个工厂安排就绪以后，赖以提供原料或部件的另一个工厂却没有准备好，需要等候。这种情形当然主要是指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不是指以后的几个五年计划。因为等到后几个五年计划开展得相当好以后，许多早期发展过程的困难已经过去，而且安排计划时，也已经能够比较接近现实而准确了。然而，在早期阶段里，开始时期的困难是很严重的，只是由于大量增加工业劳动力才使总产量得以提高。预计的物价降低，还受阻于另外两个紧密相关的因素：一个因素是工资总支出急剧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工资差距加大，另一方面是由于物价上涨；第二个因素是通货流通额迅速增加——当更大量的货币作为工资支出时，通货流通额自然就要增加；但由于当时所考虑的最高目标是几乎不顾成本地尽可能提高产量，所以通货流通额的增长速度就超过了单纯由于工资支出所造成的程度。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政策大转变以前所制定的五年计划初步草案大部分是非常稳重的，所提出的工业生产增加量非常有限。但每经过一次修改，目标就提高一次，而在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以后，目标甚至更进一步提高。这些初步目标大部分都没有达到，甚至在重点发展的重工业方面也没有达到，在消费品和轻工业方面则连边也没有沾着。因为计划虽然是在国内外环境看来都十分有利的条件下开始推行的，事实上却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的逆境，这些逆境当初很可能使整个计划完全破产。其中最严重的是世界性的大萧条，粮食和许多主要原材料的世界价格在其中受到了最



大的打击。苏联主要输出原料产品,并打算输入资本货物,所以这种价格跌落使它的贸易条件急剧逆转。打算输入的货物不得不削减,以适应已减少的外汇储备,工业发展不得不转而更多地使用国内生产的原料。从长远来说,这也许是一桩好事,因为这样就迫使苏联加紧寻求并供应国产原料,苏联在这方面拥有大量未开发的资源。然而从眼前来看,这却是耽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扩充后的计划对农业生产作了乐观的估计,并引以为依据。谁都没有预计到,牲畜会大量被宰杀,也没有预计到随之而来的奶荒和肉荒。但除了这一切之外,在1931—1932年又发生了祸患无穷的歉收,使乌克兰以及其他受灾地区发生饥荒,并使全国严重缺少粮食。诚然,在这种严重的灾难之前,还曾有过两年较好的收成。但收获物都已消耗殆尽,等到灾难临头时,就没有应急的积蓄了。在灾区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这一点对城市和工业都不能没有影响,因为归根结蒂,工业化总是受到农产品供应的限制。难怪苏联当时尽量向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隐瞒灾情,竭力否认有灾害发生;他们辩解说,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而主要是富农以及其他反对集体化的分子故意反抗所造成的广泛缺粮现象,这些人或是千方百计阻挠田地里下种,或是听任谷物在地里烂掉。他们几乎不否认:在那些发生了灾害的地方,凡是被认为犯有破坏罪的地区都任其遭灾,而没有想多少办法去救济,即令有大量的人活活被饿死也没有理会。比如韦伯夫妇在他们的巨著《苏联共产主义》中就用了这种解释,否认苏联曾经发生任何一般所谓的饥荒,说什么乌克兰和其他地区严重缺粮,主要是由于大规模反抗集体化。他们对受灾者缺少同情是令人惊异的,他们指责民族主义领袖——比如流亡巴黎的乌克兰人马泽巴——出于政治动机而千方百计制造“饥荒”。也有可能缺粮确实是由于富农或其他农民反抗强制的集体

化造成的,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证明像那样冷酷是言之有理的,因为大部分反抗是由于强制贯彻名义上以自愿为主的过程而激起的。

然而,五年计划经受住了这种狂风巨浪,苏联在重工业生产方面获得了巨大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有一部分是放弃了轻工业的目标,把负担过重的大部分铁路改进计划推迟了,为大批新城市居民提供适当住宅的计划也推迟了。五年计划原来预定尽可能提高生活水平,只不过速度应低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可是实际上许多消费品的供应量在城市消费者大增的情况下仍然剧减,所以就大部分人民来说,消费水平是否有任何提高是值得怀疑的。当时制定了一种应付危机的权宜办法,为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制定了一套精密的差价制度,首先照顾体力劳动者,让他们以特别低廉的价格购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其他消费阶层则少给配售额,或被迫以昂贵得多的价格购买。这种差价制度使我们无法说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活费用究竟上涨了多少。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不仅在农村里,而且在城市中,都有许许多多消费者过着物资奇缺的生活。然而就食品来说,当时曾经大力开办工人食堂和饮食店,工人可以用相当低廉的价格买到比较有营养的饮食。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产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压力,不过并没有减轻农民所受的压力,而其他的非工业人口也获益很少。

事后回想起来,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当年大多数经济学家竟然<sup>243</sup>那样满怀信心地认为五年计划必然会失败,甚至连苏联的整个制度都必然几乎立即会崩溃。我清楚地记得读过一本冯·密塞斯教授写的书,他在书中曾经公开宣称:这种制度根本不能存在,更不用说长久地维持下去,因为它完全违反了一切合理的经济原理和法则。冯·密塞斯教授所谓的“合理”自然是指服从市场规律而言,这一点至少我个人就不认为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冯·密塞斯教授

当初确实有这种看法,他不相信违背了这些法则的制度能够存在下去,而且他的看法广泛地被接受。有些市场法则是苏联不能逃避的,关于这一点,该国的领袖们理应知道。比方说,它的进口额不能超过它以出口所能支付的限度,除非它能说服外国人借钱给它——然而它企图以对外租让的方式来吸引外国人一举却显然完全没有成功。它愈是不相信市场经济法则,在对外贸易中就愈要严格遵守这种法则。我们难道不能作出推论说:苏联在国内也会被迫遵守这种法则,不得不根据国家能引导消费者牺牲眼前消费所能达到的最低限度来削减投资,从而放弃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希望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情况的确是如此。但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没有看到的是,它还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法:先规定一个很高的投资目标,并强制公民把消费限制在投资目标完成后所剩下的数量范围之内。拟定五年计划正式方案的人的确是本着这种精神行动的。他们把极大一部分生产资源投入重工业发展计划,这种计划只有经过一段时期之后才能在商品方面产生收益,于是苏联的公民就只有依靠与投资计划相适应的消费品供应来勉强过日子。像这样导致的生活水平,好坏如何,要取决于某些部门尽量提高产量的努力成败如何——这些部门并不是投入最大量资本的部门,而是重工业倘若获得充分投资就会发生资本极度缺乏的部门。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有充分的食物使生产者能活下去并维持健康状态,然而能够用于农业的资本却微乎其微,尽管农业在争取成功的斗争中处于关键的地位。当时他们把提高农业产量的希望寄托在集体化的成功上面。可是集体化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投资购买农业机器(尤其是拖拉机),没有机器,大规模的耕作制就无法有效进行。在一段时期里,根本无法得到足够的拖拉机,所以必须尽最大努力来确保能够得到的那一部分拖拉机充分发挥效用,方法是把它们集中在能将这些拖拉机利用到最大限度的拖拉机站里。

当时，布尔什维克人不得不作出一个事关重大的抉择：一条道路是用传统的方法刺激农民增产——这样就会使工业中的高额投资率无法实现，并且会大大加强富裕农民的力量，另一条道路是使农民或其中的大部分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耕作，并尽可能地在机械化方面提供帮助，希望通过集体耕作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总产量，并将农业方面的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供工业雇用。当时所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其结果在上面已经说过。最初加入集体农庄的户数本已达到1,400万左右，可是在饥荒发生之前，当斯大林发表了《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之后，就降为600万左右，后来又迅速回升，到1933年初重新达到1,400万，或者说占全体农户的80%；那时共有20万个以上的集体农庄，耕种面积达全国粮食作物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除此以外，还有规模更大、而数目却少得多的国营农场，1933年时农场所雇用的工人达100万，所占面积为粮食作物总面积的十分之一。而且，这种农场所占有的拖拉机达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附设有500个左右的所谓的巨型“谷物工厂”，此外还有远远超过此数的小型企业，生产茶叶、烟、甘蔗等特种作物，或是饲养牲畜。从经济上来讲，这些农场效率并不高，其经营不善也曾遭到过许多批评，但是它们在紧急时期曾经大大增加了国家所掌握的谷物；不过到1932年时，又有人说这样的农场规模过于庞大，经营不便，而且根本没有注意使用土地从事小麦等单一作物连作的效果。于是，不久之后就有许多农场划分为比较便于经营的单位，并改用套种法，或者至少也使用轮作法，使作物多样化。

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总效果，至少是增加了商品粮食的数量，从而可以为迅速增长的工业人口提供食物。当歉收的年景一旦过去之后，苏联就的确出现了一种形势：产业无产阶级的快速增长和除了肉类和牛奶以外的基本食品的供应都有了保障。但消费

者在其他方面的景况还很差,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遇到巨大困难而作了修正。重工业生产之所以能达到目标,完全是因为把发展消费品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所用的已经很少的一点资金作了进一步削减;在紧张的年代里,衣服的缺乏的确很严重,但靴鞋的供应情况要好一些。不过新衣服少几件并没有发生太严重问题——而鞋子要是少了的话就不好办了,尤其是鞋子质量差而又穿得费的时候更是如此。总而言之,不论一般生活水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人民总算无灾无难地过来了,他们对于自己的信心以及对于自己出力建立的制度的优越性的信心都大大加强了;当然,富农和饥荒的牺牲者不在此列,他们的困苦是很少人同情的。不要任何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帮助就在一个国家之中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看来已经得到清楚<sup>246</sup>的证明。当时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但看来已经颇具规模了。要取得成功,似乎并无须进行世界革命,也无须把俄国革命发展到西方去。这种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当然仍然是值得欢迎的,但如果永远不发生,也不会使革命事业毫无希望。布尔什维克曾经有一个时期普遍相信:除非取得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先进大国的帮助,否则革命不可能在落后的俄国获得持久的成功,“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被斥责为无法实现的梦想。但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32年完成的时候,这种说法就已经完全过时了。只有“托派”还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新的一套在骨子里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并且继续希望在苏联还办不到的较高技术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它被允许的四年半时间内,实际上并没有全部完成。煤、钢、生铁的产量比原先所定的非常高的目标还相去很远。煤的产量只有将近6,500万吨,而计划产量为7,500万吨;钢的产量不足600万吨,计划产量为1,000万吨;生铁产量为620万吨,而计划产量为1,000万吨。但资本货物的工业产量整个说

来增加了两倍半，比原定目标略高一点。其中机器制造业增加四培，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石油也超过了原定指标。电力虽然没有达到计划数字，但发电量也增加了两倍半以上。

煤、钢和生铁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由于新厂的建成有所耽搁，在预定日期未能开始生产。消费品工业，除了靴鞋以外，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要多得多，因为它们的资本和原料分配额在五年计划遇到内部和外部的许多困难之后，都被削减了。不过靴鞋工业的产量却增加了三倍，其中有一部分无疑是牺牲了小规模手工业而来的。消费品的全部工厂产量据说增加了 87%，主要落后的是纺织业，其根本原因是棉花和羊毛不足。

因此，整个说来，即使五年计划没有能克服种种困难，在四年<sup>247</sup>半的时间里完成，却最为动人地证实了苏联的生产力。的确，这些成绩完全是由于劳动力的增加远远超过了五年计划的预定数字才获得的。工薪劳动者的数目实际上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五年计划所预定的总增加额却只是 40%，其中工业领域增加额不超过三分之一，工业和建筑业领域的总增加额不超过 58%。实际上建筑业的劳动力增加了四倍——这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正在大力集中建筑工厂以及类似的工程。因此，总产量虽然很高，生产率却仍然很低；在发展的地区，由于工人缺少，工资陡涨，产品的单位成本多半仍然很高。当然，这样可能使产品实际增加量的估计数在一定程度上被大大夸张；这一数字应当按 1926—1927 年的价格估计，若是新产品按第一次上市的实际成本估计，而这种成本却又很可能是昂贵的，应当除外。

然而，即令五年计划完成的公布数字在某些方面大大夸张了实际成就，其结果仍然惊人，联系世界其余地区的情况来看，尤其如此。因为到 1932 年时，苏联已经成了“没有失业的国家”，而所有其他国家——从最严重的美国和德国，到只有比较轻微的不景

气的法国和英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萧条现象存在。如所周知,苏联的生产率按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仍然很低,但是苏联却正在证明:有些人信口雌黄地说它的经济制度不能积累,纯属欺人之谈;实际上它正把前所未有的国民收入的比重变成资本货物,而这却只有经过一段时期之后才能提供可资享用的商品和劳务。当然,原先不肯承认这一点的人又提出解释说:这完全是党的独裁者强制人民的结果,并且预言,心怀不满的受害者很快就会发动叛乱。后来叛乱并没有出现,于是他们又说是专制政权太强大了,无法发动叛乱,并且继续指责苏联是少数人的官僚集团大规模压迫群众的牺牲品。这种种说法无疑也说着了一些实情。农民当中——不仅是富农和饥荒的灾民当中——的不满情绪是相当普遍的,同时工人也有一些牢骚存在。但有一点看来是肯定的:产业工人的主要情绪是为政府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正在开始的惊人的建设而感到自豪;这样就使消费品缺乏的问题比较容易忍受,而且使反对大规模投资的情绪以及甚至是反对集中搞重工业而牺牲住宅等其他事业的情绪,都没有能发展起来。那些岁月中的一般情绪十分清楚地说明,人不是单靠消费品过日子的。全国的青年男女都在大讲其高产量和集体化,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尽管也为十分冷酷无情的共产党官僚机构及其领袖斯大林辩护,但肯定是受着一种真诚的理想主义的鼓舞。

而且城乡的工人大部分看来并没有受到独裁统治的感觉。在许多集体农庄中,有不少庄员感到的倒是自己的权力扩大了;特别是由于允许他们保有自留地和牲畜,并且在集体工作以外还有时间为自己劳动,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有许多人无疑仇视集体农庄,并且对自己财产的损失感到悲叹;但除了富农以外,这种人中有许多都希望在日益发展的工业和建筑业里找到报酬较好的职业,于是他们对集体农庄的反感也就由于本身职业的更换而冲淡。

至于城市中的新老工人，则由于工资差别愈来愈大以及提升的前景更加广阔，而展示了个人日臻佳境的希望；而且工业方面的工作声誉愈来愈高，还可以得到许多社会上公认的特权，如工人餐厅中廉价进餐的就餐券以及工资照发或有津贴的假日等，这些都是颇值得享受的。苏联的工人阶级根本就不是带有被压抑的反抗情绪一触即发的无产阶级奴隶。相反，他们大部分人由于对于政府所做的事情深感自豪而明显受到鼓舞，而且在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sup>249</sup>凡属领导者认为是防止“反革命”而必须加以限制的，他们都完全愿意顺从。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苏联所进行的压迫辩解，与此同时采取的残酷手段就更不用说了。但我的意思的确是说：这两者没有受到那样广泛的反对，以致会引起强大的暴力反抗。在农村，饥荒过去之后，大部分农民都安于一种经过修改的集体制度，其所允许的个人活动范围愈来愈大。在城市里，就业机会很好，足以满足大部分生产者，只有沮丧的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集团才会大有发牢骚的理由。

因此，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主要的情绪是对已经获得的成就感到自我庆幸，而且决心巩固已经赢得的成果，并使之进一步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指标，整个说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低得多，预计的总投资额一年比一年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24%降到19.5%，而投入消费品工业的相对资本额则较高。对于资本货物仍然广泛强调按计划规定，其中有更多的部分是制造消费品的设备，如纱锭和织布机、制鞋机、食品机械等等，此外还有工作母机和加工原材料的机器。在1934年最后规定的年增长率，就整个工业而言是16.5%，就资本货物而言是14.5%，就消费品而言是18.5%。实际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指标远远没有达到，总产量的增加额只有6%。但1934年和1935年的增长率有所提高；即便在1933年，生



产率也比工资增长得快，所以成本开始降低。事实上，随着新厂——往往是姗姗来迟——投入生产，生产率变得更加重要起来。根据五年计划，到1937年时，将有五分之四的产量来自在第一个或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建造的新厂或改建的旧厂。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苏联就可以省去大部分进口的机器，并且能够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自己制造机器；原料也可以主要依靠自给，在这方面还要开辟几个新领域。需要进口的天然橡胶将用合成橡胶代替；而苏联的化学工业扩大范围以后，将使苏联不再依赖进口的化肥。

250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仍然任其保持十分落后状况的一个部门是交通运输业，特别是铁路和公路。这的确愈来愈成了严重的障碍，严重地限制了工业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由于兴建边远地区的新工业中心时，一般都会延长原料、食物和成品的铁路运输距离。至于运河发展方面，当时已经在兴建巨大的工程，其中大部分是使用强迫劳动者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但铁路和公路的建筑在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没有被放在优先地位，听凭它们日益落后于所负担的任务。据估计，即使在1939年，苏联每一公里的铁路，按运载吨位计，利用率仍比美国高两倍以上。然而货物总是设法运送了，虽然严重的耽搁在所难免，这样就减少了工厂的产量；而且即使总供应量足以周转，局部缺货现象仍然发生。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进行的时候，世界经济萧条正达到最低点，希特勒也正处在夺取德国政权并摧毁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前夕。但该计划的制定当然在魏玛共和国最后被推翻以前，因而没有作任何努力来估计这一事件的后果。前文已经讲过，苏联的领导人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完全理解错了，对于它上台的后果也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在1934年以前，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对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作出正确的估计。但当他们确实认识到它的含

251 义时，很快就改变了方针：一方面是改变政治态度，再一方面是重

新调整经济计划。在政治方面,他们的第一个变化是在1934年加入国联,并且号召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投入一个共同的运动,把所有的左翼党派吸引到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去;在经济方面,他们的反应是修改五年计划,以便为军备方面以及为扩充可以迅速转入军火制造的工业提供更高的费用。

因此,在实行到1937年为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有很大一部分费用转到了军备开支方面。后来当苏联拟定自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尤其迫切地需要如此转移费用的重心了。1938年的国防预算开支增加了一倍。由于国防的需要,必须持续地高度集中发展重工业,尤其必须在德国轰炸机航程以外的乌拉尔和亚洲地区建立新的工业中心。这种迁移工业的工作在1941年及以后的时间里,当然更进一步地大规模进行,就不可避免地要认真对待铁路运输问题;一方面要修筑新线、加修复线和重新铺设老线,另一方面要重新设计终点站和中途站的设备。这一过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开始,但一直任其落后。事实上,铁路发展问题在缺钢问题没有克服以前是无法解决的;因为铁路建筑对于钢的需求很大,只是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才有足够的钢使这一问题得到认真的解决。那时虽然比较容易供应消费品工业以新工厂制造的机器,但由于国防和运输的需要日益增长,消费品工业再次居于次要地位。农业也由于更紧迫的要求而推到后面去了,但这方面的问题看来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食品的供应,除了肉类和奶类以外,都已经有了保证,而拖拉机的数目也足以满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需要了。到1937年,新的经济结构的困难最严重的阶段似乎已经过去了。

可是事实上却绝非如此,而且也不是由于国防计划所需作出的计划修改造成的。因为在1937至1938年的清洗严重打击了工 252  
厂经理们,因而使这几年五年计划的完成方面出现了严重的缺陷。

直到1940年,这些清洗的后果才得到有效的克服;可是刚做到这一点,苏联的工业就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而且不得不从西部地区大规模撤退。但本书并不打算把苏联的发展写到那个时期去。就我来说,所要写的只到1940至1941年,即从1938至1939年期间所造成的挫折恢复元气为止,这些挫折主要来自清洗和缺乏新的管理干部所造成的混乱。

1941年,苏联还刚刚经过清洗所造成的大混乱,就马上能够那样抵抗德寇并维持下去,的确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谁也说不清苏联究竟有多少领导人和他们的部下在这些清洗中受害;有人说,在全部这样的人之中被杀害、被流放或者至少被解职的,远远超过了一半,说不定达到了三分之二,所以必须为军政各部门提供新领导,苏联的驻外人员,如大使、公使、大使馆和公使馆的参赞等,有三分之二被消灭了,其中有的被杀害,有的干脆失踪了。军事将领们所受到的处理也同样严厉。1937年6月应邀作为临时审判员参加对于图哈切夫斯基的审讯的8个高级将领中,只有布琼尼一个人在往后的清洗中幸免。其余的7个人中有1人是自然死亡,有6人被消灭了。1934年所选出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委员71人。到1939年初,只有21人还健在。有3人自然死亡,1人(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1人自杀,9人被宣告枪决,其余36人失踪。在主要的大城市中,有一半以上的共产党员被开除。1934年时,正式党员超过200万人,候补党员计有1,200万人。到1937年底,党员和候补党员总共才不过150万人。在1938年夏天,在50万新党员和候补党员入党以后,党员总数仍然不足200万人。

253 这样大规模的清洗,当然会造成极其混乱的现象;因为即使在逃脱了清洗的人之中,由于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的邻人,而且到处都在进行十分荒诞无稽的指控,所受的影响也必然极大。直截了当

地说,此事主要应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属该部编制——负责,内务人民委员部最初由亚戈达、后来由叶若夫领导,后者一直掌权到1938年12月;可是在那年8月间,贝利亚出任他手下的副委员,于是他的权力便被大大削弱。事实上,到1938年8月时,该部运转终于逆转过来,此后清洗运动就渐次消亡,重建被打乱了的苏联社会组织任务可以认真地开始了。

即使到今天,我们也很难说:在十月革命和以后的二十年里一直担任领导职位的那些人,像这样大批地被消灭,究竟有多少事实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从一个极端来看,图哈切夫斯基和一批将军被指控为谋反的说法无疑是事实,当时的确已经准备进行军事政变。从另一个极端来说,我感到自己完全不能相信托洛茨基真正是苏联内部破坏运动的领导者和鼓动者,也不可能相信他以任何方式与纳粹勾结。他当然完全有可能与苏联内部的反对派共谋推翻斯大林,但却几乎不会去鼓动或参与苏联内部那些被指控的阴谋分子所进行的毫无意义的破坏活动;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他完全不可能为纳粹的阴谋推波助澜,他之极端仇视纳粹绝不下于他对斯大林及其周围的那一批人的极端仇视。在以上对图哈切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的两种说法之间,存在着一段广阔的中间地带,要断言其中实情就难得多。当时是不是真正有什么文官的阴谋或军官的阴谋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以及被消灭的反对派的其余人物,究竟是真正与纳粹勾结的奸细,还是只不过是正直地批评和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只是由于公开批评的权利被压制而转入地下并被迫进行阴谋活动、但与苏联的国外敌人绝没有勾结的人呢?其实,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是阴谋者,在反对斯大林方面真打算大干一番,这一点看来是无可否认的。至于说他们是纳粹派来的奸细,或者哪怕是有意识的煽动者,看来始终没有提出过一点点可靠的证据。我说这话并不是否定、

或者哪怕是怀疑纳粹在苏联雇佣了许多特务，他们想尽一切方法要破坏苏联的经济，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挑拨离间；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些犯罪的人无意中成了纳粹特务的牺牲品，与他们合作了还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何许人。

那么，审讯期间的招供又作何解释呢？我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供词是用神秘的药物逼出来的，甚至也不是用极端的刑罚逼出来的。因为为了亲友也许起了一部分作用，使他们那样异乎寻常地作贱自己。但看来连这一点也不大可能是主要因素。我认为，这些供词大部分应该认为是真实的，这话的意思是说：那些招供的人已经在诱导下认了罪，甚至连他们自己没有做或者没有打算做的事也承认了。如果事实上既存在军官的阴谋（我认为确实存在），又存在文官的阴谋，在后者中可能有纳粹特务对国内阴谋者加以教唆和煽惑，而国内阴谋者又大部分不明真相——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难了解：完全未曾有意识地勾结纳粹的阴谋者，为什么会在勾引下做出了远不是本意的事情，而当他们发现自己被勾引到了什么程度之后，又深感后悔，于是便卑躬屈膝地招供，以便拯救自己的灵魂。一个国家哪怕存在有限的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可是三十年代的苏联却没有这种自由存在，过去也没有这种传统。即便如此，这些供词仍然很特别；但我们无需用奇特的“俄罗斯灵魂”这类复杂的说法来作解释；除非就这样一种意义而言：“灵魂”一词仅仅是指俄国政治中那种特别的传统和流行的气氛。

255 现在很少有人怀疑，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有许多人，就控告他们的罪名来说，完全是无辜的；他们充其量只是犯了“牵连”罪，甚至除了一些人适当加给他们的罪名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罪名。但是如果我们作出结论说，整个清洗运动无非是一种陷害，根本没有事实作根据，那是不妥当的。当时苏联国内至少存在

着极大的不满情绪,托洛茨基正在尽一切力量从国外加以组织和煽动。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大概已经足以构成对政权本身的真正威胁。这次清洗对于西方对俄国的看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使人认为这个政权马上可能即将崩溃,并且严重地低估红军的力量和可靠性。对于这种对外国舆论所产生的影响,斯大林要不是没有预计到,就是没有理会,这种影响无疑对英法与俄国达成协议一致抵抗法西斯一举所持态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他们在1938年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讨论中完全没有考虑俄国人。不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斯大林无疑达到了他的主要目标——完全消灭了苏联境内反对他个人或他那个政权的异己分子,巩固了他自己的独裁统治。苏联境内的反对力量不仅是被粉碎了:这支力量被消灭得十分彻底,使托派以及其他流亡中的反对者与国内的力量完全失去了联系。苏联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那种迫不得已的顺从,使整个国家活动陷于瘫痪的境地。相反,事实证明,当一时的混乱现象一旦被克服之后,斯大林就成了无可争议的国父式的人物,领导着投入最紧张的集体防御和组织工作的苏联人民。所以斯大林在1941年以后所掌握的赤忱效力的力量大概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这并不能说明清洗是有理的,更不能说明其中的过火行为是有理的,特别是后期的过火行为;但这件事情说明:如果世界上只有权力要紧,理想根本算不了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认为清洗的确获得了成功,虽然即令如此,这种成功也是在付出了极高代价之后才获得的。

与此同时,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在贯彻执行。这项计划在1934<sup>256</sup>年实际开始实行以前就作了修改,为的是更加着重国防的需要,一方面加速重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把新工厂远远地建在在德国轰炸机的航程以外;在清洗过程中把很大一部分经理人员清除之后,这项计划自然难免有些混乱,但大体说来,其目标仍然达到

了。对俄国人来说,幸而集体化农业所大量需要的拖拉机工厂,在有必要时可以很快地改变为生产坦克或其他军械的工厂,生产化肥的化工厂大部分也可以同样地转入战争用途。此外,也可以紧密地结合农业开发,建立纵深的防御军事体系。这样一来,消费品生产所受到的损害,便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第二个五年计划起于1933年,止于1937年;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越来越注意国防方面,因而作了相当大的修改。就其主要的规定指标而言,并没有完全达到,虽然有某些方面大大超额了。煤产量在1932到1937年之间增加了一倍多,但1937年的产量只有128,000,000吨,而计划产量却是152,000,000吨。生铁产量也增加了一倍,但没有完全达到计划总数。从另一方面来说,钢的产量从1932年的600万吨提高到1937年的1,760万吨,超过了指标;至于机器制造业则超过原产量的三倍,而计划原定增加两倍。石油产量原来计划将近4,700万吨,实际只达到3,050万吨,这是最落后的一个基础工业部门。不过官方承认,这些工业作为一个总体来说,达到了计划产量,而消费品工业作为一个总体来说却没有达到计划指标。棉织品产量原计划增加一倍,但只增加了42%;毛织品产量原计划也是增加一倍,但增加量只不过22%。轻工业产量整个说来在1932至1937年之间增加了一倍,而按计  
257 划却要增加一倍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重化学工业、非铁金属冶炼业、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田拖拉机和其  
他机器制造业等。新的集体农庄得到了充分的机器供应,拖拉机数增加了一倍,汽车“场”增加了八倍。在工业总产量中,到1937年时有五分之四来自1928年以后新建或彻底改建的工厂。

现在不妨问一问,“清洗”一词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角度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意义。首先,它意味着实际上抛弃了

单一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概念。对于托派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高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并且进一步发展这种技术而随之带来富足。落后的俄国在他们看来显然不能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他们尽一切力量加速工业化也办不到。因为俄国要费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赶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竟然能够赶上的话),以便使社会富裕,而敌对阶级的你争我夺,又唯有在如此富裕之后才能告终。在托洛茨基看来,“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整个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所涉及的这个国家在运用现代技术方面落后的话,就尤其站不住脚。除此以外,社会主义对于托洛茨基来说,除了意味着权力以外,还意味着公众福利;对斯大林来说,社会主义只意味着权力,最多也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的权力;斯大林要证明的是,即使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要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其组织又能把空前未有的大量生产力用于增加投资,而且甚至降低生活水平的消费也在所不惜,那么它就能够在不存在福利或平等的情况下具有权力。斯大林只要苏联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强大起来——首先能够防御敌人,然后又能愈来愈多地把自已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他就不管全体人民是否继续贫困。他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希望,他深信到时候只要资本主义一崩溃,这种革命就必然会实现,他认为资本主义在长远说来是必然要崩溃的。不过,他却放弃了他的愿望:立即鼓动世界革命来作为加强已经在俄国实现的革命的手段。他认为,只要能使俄国强大到足以避免在战争中覆灭,不要这种支援也行,同时他又把苏联内部的巩固当成施政的最高准绳。如果像这样做就要扩大而不是缩小经济上的差异,并且会形成一个统治阶层,这个阶层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一个新的阶级,他认为这并没有关系,只要他认定这个新的统治阶层不会起来反



抗他就行。如果大部分人民都穷困不堪，根本没法过令人满意的生活，他认为这也不算什么，只要他们的穷困不会从可能导致造反的表示不满的运动中找到出路就行。由于他看得很清楚，如果让人民去自由表示他们的选择，他们就会选择较好的生活条件，而不会选择高的资本积累率，这对他来说就有必要消灭每一个反抗的中心，并且把所有可能批评他那套政策的人全都清除掉。可是不论这样会逼出什么问题来，他是毫不畏缩的。此外，他正像大多数满脑子权力欲的人一样，也很贪权，并且愈来愈多地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愈来愈念念不忘个人的权力，把权力当成了目标。

这并不是说，斯大林在他把托洛茨基赶下台的前后在与托洛茨基发生的重大争辩中全然错了，托洛茨基就对了。首先，托洛茨基也是一个最危险的思想家，他也死抱住他的世界革命的观点不放，就像斯大林一心要建立起受他个人统治的非常强大的苏联一样。托派分子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少数派出现时，往往是最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一心讲革命而不管有没有成功机会；他们死板地坚持革命要有无产阶级基础，而不问无产阶级本身所表现的革命情绪多么小。也有可能，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有这种小集团存在，他们是天生的叛徒和武断的唯心主义者，决定目标时根本不考虑人这个因素，绝不愿意为了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于环境而在观念上有任何妥协。这类人很可能自然而然地聚集到托派集团中去了。然而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托派理论当时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且特别指责斯大林“背叛了革命”，因为他使革命脱离了原来所追求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目标，而单纯追求权力，根本不问运用这种权力来达到什么目的。但我认为在三十年代对斯大林采取这种看法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误解了他，因为斯大林当时事实上并没有单纯为权力而追求权力。他的确真诚地相信，重要的是使

苏联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而且要紧的是苏联社会要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把私人营利行为当成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消灭掉,以便使收入和地位,不论高低都以个人的贡献为基础,而不以资本主义的剥削为基础。在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看来,丰厚的收入和优越的地位如果实际存在的话,究竟取决于哪一种因素,似乎无关宏旨;但我认为,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个差别的确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斯大林认为个人自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他在考虑人类价值时,把阶级而不是把个人看成权力的所有者;而且看待阶级时,他也是从整个阶级出发而不是从构成阶级的个人出发,并认为阶级利益要由一个领导者集团来规定和实现,而不是由阶级的全体成员来规定和实现。他是一个集权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他的集权主义是一项真正的信条,而不仅仅是追求权力本身的必然结果。也有可能,当他代表整个社会有效地行使绝对权力、尝了一个时期的甜头之后,情形就不再是如此了。但是,不论他晚年变成了什么样子,我相信他在三十年代是一个本着他的良知、热烈崇奉俄国的使命以及他力图在1936年的新宪法之下加以团结的各族人民的使命的人。那部宪法在把苏联境内许许多多民族、语言和文化集团团结在单一的大俄罗斯国家这一观念的周围,至少起了显著的作用;在苏联这个国家里,各个民族不分种族与文化的区别,一律平等,并且在<sup>260</sup>不违背团结的条件下,可以保持各自的文化。这种团结也表现在共产党的统一组织上,这个党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并不按照苏联各个共和国或构成全体苏联人民的民族和文化团体而分成若干独立的党。但在政治以外的事务中,党却主张在统一体内有差异;我们不能否认,苏联在这一方面获得了出色成就。

然而,有一个不无关系的事实是,斯大林作为领袖和政府首脑尽管具有种种优点,也仍然是一个极其讨厌的人——他狡猾,喜欢

报复,完全不择手段,残酷,甚至具有迫害狂,而且他后来的确愈来愈不能容忍他认为可能对他的权力形成任何威胁的人存在。因此,他自认为一手缔造的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大多数社会主义提倡者所崇奉的那些性质——这些人大部分是志士仁人,满腔热忱地追求自由和社会平等,反对苦难和不正义。斯大林根本不管平等或自由,并且对于苦难和不正义行为的憎恨,完全无动于衷,除非是他所熟悉的那种阶级的不正义行为。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必须消灭他所能认识的那种形式的阶级,至于被驱逐的“人民公敌”究竟遭受了多少苦难,他是不管的;而且个人收入和地位上的极大差异,只要能够帮助新社会增进其集体力量,他也不认为是不正义。在我看来,后世对他的评价必然是毁誉参半。没有他的领导,苏联能不能克服生存的道路上遭遇到的巨大困难,是很成问题的。可是他出了很大力气缔造的新俄国,经过他的手之后,从人道主义观点来看,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这些都是由于他的行动方式以及他不能充分运用他帮助赢得的巨大权力而酿成的。至于斯大林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或者哪怕是优秀的军事领袖,我没有资格判断;但我认为不论这个具体问题的结论如何,上述的评语大致上是正确的。我认为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无论是在私人方面还是在公共事务中,伟大与善良并不一定是形影相随的。

261 与斯大林比起来,托洛茨基是一个很富人情味的人。我认为他也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确不仅是一个出色的讲演家,还是一个伟大的组织者。但是看起来他的缺点几乎不下于他的优点。在他与斯大林的长期斗争中,换了别人是绝不可能犯他那样多的错误的。他生平最大的错误也许是没有去为列宁送殡,即使有病也不应当如此;当初他果真有心勉强撑持着去,是一定能及时赶到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正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让自己的行动听凭一时的感情的支配;并且认为,凭他的人品,可以不

作出让步。在后来争夺权力的斗争中,由于不肯在幕后耍阴谋的战场上与他的对手较量,而且由于孤芳自赏,直到为时过晚的时候才打算建立自己的班底,他无疑听任斯大林占了上风。他在行为上独断专横,而且动辄蔑视他自认才智不如自己的合作者。他的确能够激发别人赤诚地效忠于他,但却从不善于与别人在平等地位上合作。他一心崇奉着一种概念,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来讲,粥少僧多、竞相争夺的现象已经消逝,于是他就构想出一种不断的革命,其进程绝不应在达到这种境界之前终止。而且,由于他无法预见到这种革命单单在落后的俄国完成的前景,他就成了世界革命的主要倡导者,而那时正是别人都承认进行这种革命的机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已经消逝的时候。他作为1917年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不能说那次革命是一个错误,也不会承认当时没有真正的机会把那次革命迅速推广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国家中去。与此相反,他即使在毫无成功的希望时,仍然不得不继续追求他的目标;他也不得不继续指责斯大林不进行这种革命,指责他坚持要在单独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建成没有真正社会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他对于斯大林主义的俄国的批评,有许多话是深中肯綮的——特别是关于俄国的官僚主义以及斯大林在造成这种现象方面所起的作用的批评,尤其中肯。不过斯大林大量地借鉴了托洛茨基的实际政策,只是目的不同;而托洛茨基却提不出多少别的东西来作为代替。他和苏联失去直接联系之后,对于国内的情形就愈来愈不了解了,在大清洗之后,他连原先那一点联系也丧失殆尽。至于说他有意识地与纳粹勾结,却是纯属无稽之谈,一点证据也没有。可是他运用一切机会在苏联国内给斯大林制造麻烦,则是同样毫无疑问的。于是,斯大林就能够把他说成是象征罪恶的人物;甚至直到今天,在苏联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几乎不可能不加以唾骂,而他在革命和内战中的丰功伟绩则由于历史的伪

262

造而几乎完全被抹杀了——这方面的伪造至今仍然维持着。托洛茨基是一个刚愎自用、独断专横的人，抓到权力就自以为了不起，但他仍然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说他是一个善良人，我同样也感到犹豫，不过他的为人至少没有斯大林那样令人反感。我敢断言，他的《俄国革命史》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至于他的任何其他著作，我就不愿意这样说了，甚至连堪称极品的小册子《十月革命的教训》和《新方针》等也是如此。他对西方世界和西方的思想尽管横加指责，却比斯大林和列宁理解得透彻得多。最后，他在待人接物方面，虽然傲慢和冲动，却天生是一个主张和解的人；因为一般说来，他认为分歧应当用说服的方法去解决，而不应扩大成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冲突。这就是他在老布尔什维克眼中的主要罪恶之一，而他并不是老布尔什维克——这一点虽然被当作武器用来把他推下台，实际上却是他最大的优点之一。如果新俄国的主要缔造者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它是否会在一系列的斗争中取胜后达到现有的大国地位，就很值得怀疑了；但我敢肯定，它如果能幸存下来，它做到这一点的手段要清白得多。因为托洛茨基不论有多少缺点，总是憎恨不必要的残酷手段和压迫，而且确实相信社会平等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主义目标。

263 至于1938年的主要牺牲者布哈林，我们应当记住，列宁在他著名的遗嘱中，一方面高度赞扬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又对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表示怀疑。我想，列宁后一说法的意思是说，布哈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与他自己的解释不一致，因为布哈林对于产业无产阶级的地位重视不够，并且坚持要公正地对待农民，希望把新经济政策更加推进一步。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布哈林一直居于运动的极右翼；但在纳粹兴起之前，他并没有离开这种地位很远；在纳粹兴起之后，他就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联系，后来又由于愈来愈敌视斯大林而与托洛茨基

有一定的联系。不过如果说他是领取纳粹或英帝国主义津贴的走卒，这纯属无稽之谈。他在言行上可能有欠谨慎之处，但他除非打算完全放弃立场，怎么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错误呢？事实上他并没有打算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至于与他一起被清洗的许多不那么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大部分人十有八九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即使做了错事，最多也不过是说话有些不留神而已。他们之所以被清除，只是由于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地被怀疑为没有百分之百地效忠于斯大林的俄国——此外就没有任何别的问题了。

## 第十二章

### 三十年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sup>①</sup>

264

在本书的第四卷中，我极其概略地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叙述到“长征”阶段，毛泽东被赶出华南基地以后，通过“长征”，把他的总部迁到西北，并建立了他的以延安为中心的新苏维埃政府。但是在本卷中，我必须把其中的某些事情重提一下，以便与三十年代后期共产主义运动在延安的发展衔接起来，如我们在前文所见，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1927—1928年险些被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支持者对之发动的战役全部歼灭。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眼皮底下，在遥远的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拟订了适应已改变了的形势的新政策，除了指责蒋和国民党右翼以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应对那次惨痛的失败负全部责任，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所做的事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甚至是由它主使的。联合并渗入国民党的政策当时已经不再可能继续贯彻下去，国民党一直在无情地开除党内的共产党人，受共产党影响的工会之类的劳工组织也已经遭到破坏，共产党的领袖或其外围的领袖，只要能够抓到的，都成批地被处死了。在1927年之后，城市的共产党人已被迫转入地下，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来说几乎已经被消灭，产业工人中的中共党员几乎全部损失。有些城市中曾零星地爆发一些暴动，企图挽回局势，但只能使

---

<sup>①</sup> 此篇讹误极多，所述史实与我国实际情况颇有出入，所用名词也多有不合之处。译文及引文完全根据原文确定，未作任何更改或注释。——译注

崩溃更彻底。一度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剩下的只有农村中的少数农民起义中心以及城市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与人民群众很少接触的地下小组。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会议不得不承认农村问题和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但是由于他们教条主义地相信革命必须由产业无产阶级领导，否则农民就不可能有任何建设性的行动，而且由于他们根深蒂固地敌视小农经济和贫农运动中把平分土地当作自己的目标的倾向，都使得他们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时受到了严重的妨碍。由于他们实际上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当前的目标只能是实行一次暂时以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为止境的革命，共产党人就不能强求像苏联当时正在开始进行的那样，立即实现国有化，甚至也不能立即实现集体化；因为这两种措施都只适合于社会主义革命，而不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也不能明确地站在贫农一边反对富裕农民，因为这样一来，至少将在许多地区严重地破坏农民起义运动的团结。因此，莫斯科会议对土地问题没有能够提出明确的指导原则，而是在理论上继续坚持工业无产阶级是根本，并否定农民的建设性作用。

然而，实际情况很快就无法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否定了。共产党人被赶出大城市之后，要么只好完全屈服，要么不得不充分利用在农村仍然还能得到的机会——特别是在有些农村地区存在着强大的农民骚乱运动，而且地形险阻，国民党军队以及与国民党妥协的军阀部队都难以进入，更是有机会可加利用。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便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农民在起义反抗了当地的压迫者之后，便拒绝交租交息，并且没收和重新分配不得人心的地主的土地，有的甚至是所有地主的土地；在许多情况下地主和高利贷者被罚款和受侮辱，有时则被砍头。在某些地区里，农民对于雇工耕种自有土地和租入土地的富农，也采用同



样的办法,而另一些地方,全体农民则结成一体来反对地主和高利贷阶级。农民大半只有临时拼凑的武器,没有军事装备,但农民游击队与地主和地方政府的自卫队之间发生了多次非正式的战斗,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许多有组织的“赤卫队”武装。这种农民起义大半只是昙花一现,但在少数情况下,凭借有利的地形,还在起义之后产生了一定的地方苏维埃政权,完全取代了旧政权。在整个二十年代里,甚至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年代里,一直在发生这样的起义;但在1927年之后,这种起义更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并且更加明确地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一

这些苏区中最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所控制的湘赣<sup>①</sup>地区和毗邻的华南省份。那里由于地形崎岖多山,毛控制了一片相当广大而人口稠密的区域,那里的地主被赶走,地租被废除或大大减少,正规红军的核心理已从非正规的农民部队中产生而且与之并存。这支红军不但着手训练军官忠诚地为革命服务,而且教育全体士兵掌握革命原则。他们受到平等观念的强烈鼓舞,而且在几乎所有供应品奇缺的条件下生活,于是他们便一方面坚持实行严格的革命纪律,同时又特别强调士兵与军官以及文职人员的社会地位平等,大家同甘共苦。

267 蒋介石在大城市稳住脚跟之后,于1930年转而把他的注意力去发动坚决的进攻,以消灭这些叛乱地区。在许多地方,他轻而易举地镇压了地方苏维埃,不过在摧毁地下反抗力量方面就不见得始终如此了。但是在毛所控制的湘赣地区,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在获得初步胜利之后,都被毛的部队击退,大量的作战物资被红军缴获,大批的逃兵都补充到红军里去了。在这

---

<sup>①</sup> 原文中 Kiangsi 全误作 Kiangsu, 为了避免混乱起见, 一律改正, 不另注明。——译注

些战役中,毛的战略是在敌人进攻以前作有组织的撤退,逐步退到深入苏区内部事先布置好的阵地中去。等到敌人的交通线拉长并且感到在敌方所控制的地区作战的困难有增无已的时候,伺机而动的红军就发动反攻,击退敌人和收复失地;在有利的条件下还把逃敌一直追击到原先不属苏维埃控制的地区中去——其目的不在于永久占领这些地区,而只打算在那里建立游击队,从而使敌人将这种地区用作重新进攻的基地时,没有那么方便。这种先撤退然后继之以反攻、并且不追击过远的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在1930—1932年间,红军成功地击退了蒋介石发动的四次规模越来越大的大战役,进攻部队投入的兵力从20万人到50万人以上不等。毛在反攻时并不打算夺取大城市,至少不打算保有大城市,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部队不足以从事这种战斗,而只能在地形确实有利于他们的防守战略的地方固守自己的阵地。有些共产党人始终反对毛的这种策略,他们由于坚持认为革命的动力需要有产业工人的指导,因而迫不急待地希望夺取大城市。但是毛是毫不动摇地反对他们那种办法。另一些共产党人反对他先行撤退的策略,因为这需要暂时放弃领土。他们力主红军坚守自己已经获得的地方,即使必须抵抗数量上大大超过自己的敌人时也应该如此。毛也反对这种主张,坚持必须诱敌深入,直到能够把他们分割成许多小股,彼此相距很远,足以使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各个击破。

最后,当蒋在1933年发动第五次大规模进攻时,毛被击败了,他曾企图在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就寸土不让地进行抵抗。结果<sup>268</sup>红军仍然被击退,并且无法整顿自己的部队,进行成功的反击。那次敌人的进攻虽然被击退,但失去的土地却无法收复,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形下,蒋在1934年发动的第六次攻击使苏区的主要根据地无法守住,于是红军便决定撤出整个区域。但是蒋包围和消灭红军的计划失败了,红军开始了“长征”,并在克服了难

以置信的困难之后，重新立足于中国的西北部；这支军队把当地存在的游击队政权统一为正式的苏维埃共和国；该共和国不久之后就在1937年初把总部设在陕西省延安，蒋虽千方百计地要把它赶走，但仍然保持下来了。

在此之前两年，亦即1935年初，毛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他在中共中央占绝对优势的时期从此开始。早在1928年党的莫斯科会议上，他已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在1935年以前，他只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在历次全会上并不是最有影响的领袖。事实上，他曾对自己认为是背离正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右倾和左倾的偏向提出批评，为此而不止一次地与其他领导人发生齟齬；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种政策必须在某些重要方面与过去适合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政策有所不同。在1927年的惨痛失败之后，他最反对的观点是：在当时的局势下，首先应当依靠城市无产阶级的支持，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重建为一个城市的运动，并为此而对大城市发动袭击，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和占领大城市。他认为这种企图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并且斥之为“冒险主义”或“盲动主义”。当李立三在党的会议上占优势的时期，毛曾为此与李立三发生冲突。后来李立三在其“偏差”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之后于1930年11月被迫辞去政治局的职务，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并于翌年初被送去莫斯科；1931年6月，中央总书记向中发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被处决；甚至在这两件事情之后，毛仍然只是许多领导人中的一个。直到1931年11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才当选为主席，主要由他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制定了宪法和基本法。此后，作为新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居于比较有权威的地位。在1932年，当陈绍禹不再担任中共总书记职务而去莫斯科时，他的继承者不是毛，而是秦邦宪；

当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时，毛再度当选为主席；但张闻天继秦担任总书记。直到1935年1月，毛才既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又担任政治局的主席——也就是说这是1934年10月开始的从赣区撤退之后的事。

毛不但与李立三以及党内所谓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发生冲突，而且与某些右倾分裂主义者发生冲突，这些人和他争辩说，当时进行冒险活动会倒楣，因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希望静待较有利的时机出现，毛虽然不主张从事那种必归失败的冒险勾当，但这绝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毛确信国民党及其同盟者占领城市是绝对无法阻挡的；但是他们的势力却远不足以对整个中国的广大农村进行有效的统治。地主、高利贷者、税吏、地方军阀以及一切形式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剥削在农村中已经弄得民怨沸腾——毛自认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剥削到处都在起坏作用。他相信可以利用这种普遍存在的农民不安情绪，不仅可以发动会被迅速镇压的地方起义，而且还可以驱逐地主和高利贷者，并在地形有利地区建立起能够270维持相当时期的地方苏维埃；通过日益扩大的农村地区，就可以破坏蒋介石的权力，并为起义铺平道路：这种起义到时候就会变得十分强大，足以重新攻占城市，并使产业无产阶级重新回到革命中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必须按照农民的要求去做，也就是说必须驱逐地主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且必须暂时和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放弃将农民组织为集体农庄或将土地收归公有的一切打算。但如果可以因此对革命的敌人实行有效的打击，毛是完全愿意这样做的。他认为采取这种行动绝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因为他关于当前政策的设想的出发点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首先必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会与工人和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现存社会中的封建势力和军阀势力。所以他和彭湃、朱德等其

他许多领导人一道,主要在山区和难以进入的地区,着手建立主要由农民领导的地方或区苏维埃控制的独立的地区,致力于土地所有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并且不仅逐步建立赤卫队(游击队),而且还要尽快建立有纪律、有训练和接受彻底的共产主义灌输的红军;此外还要培养干部,其人员主要由国民党部队的逃兵补充。

的确,毛在叙述自己的观点时,始终坚持农民应该在产业无产阶级的理论指导下行动,并坚持只有产业无产阶级才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他也坚持认为,虽然目前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必须永远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是长远的目标,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以便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271 绝不应该允许自己与同盟者混同起来,在支持民主革命中把它当成最终的目的。但是毛把这种必不可少的领导地位赋予具有任何具体形式的产业无产阶级,他的用意究竟何在,很难有十分把握;因为他往往把产业无产阶级与中共相提并论,就好像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甚至当大部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肯定不是产业工人——在1927年失败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产业工人出身的党员很少——的时候,毛的说法也是如此。毛认为不管实际上组成中共的成分如何,至少在概念和定义上,它是社会经济性质上最进步的阶级——产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虽然产业工人在数量上不仅远比农民为少,而且也远比从事小生产的工匠为少,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必须以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名义才能获得胜利;中共党员尽管很少属于这个阶级,但却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

我认为,毛提出这种学说时,思路有欠清晰,而且用字不当,容易引起误解,这一评语大概不失公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确实认为,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不可或缺的领导,不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是在以后它必然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都是如此。他还认为,他和其他领导人最初在江西和湖南、后

来在陕西和西北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过是地方性的和预备性的组织;当共产党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恢复其对大城市的控制并使产业工人的主体重新投入其党员行列或投入共产党人能够进行有效控制的工会等外围组织时,这种地方性的和预备性的组织就注定会丧失其领导作用。不过,农民在革命中暂时起着主导作用,并且必须最充分地利用农村地区提供的机会,以便帮助革命渡过其艰难时期。到1935年初,中共的领导至少已经彻底接受了这一观点;此后,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领导人, 272 毛几乎掌握了无可争议的权势。

毛的思想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既不进步,在政治上也不独立,而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掠夺的对象,这一点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这部分地说明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中国内部的封建主义者为什么能始终保持权势——因为封建阶级分子是帝国主义者的仆从和帮凶,没有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他们就休想维持其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因此封建阶级分子始终准备把中国人民出卖给帝国主义,并对帝国主义者唯命是从。不过对中国来说,幸而帝国主义阵营有纷争。1931年以来,无论如何,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最直接、最紧迫的危险,它就有时与英美帝国主义有矛盾,甚至连英美帝国主义之间也有时发生矛盾。必须对于所有帝国主义作斗争;但是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利用他们之间的纷争,有时甚至要利用危险性较间接的敌人去打击危险性较直接的敌人。在整个三十年代里,各帝国主义中最危险的无疑是日本帝国主义。因为1931年日本在满洲发动了进攻,以后又把它的力量进而向南扩展到中国本部;直到1937年,它的侵略已发展到遍及中国所有主要地区的全面战争。从1931年起,国际联盟就未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这一点被认为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在与中国人民为敌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者

已经难辞其咎；但是中国人民的怨恨和愤慨自然主要是指向日本，因为它征服全中国的目的和企图已越来越明显。新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早在1932年2月就对日本宣战，并号召全中国各党各派以及各个阶级联合起来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只要苏维埃总部设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就无法直接与日本人接触，而只能在北方的日本占领区以小规模的游击战来抗击他们。直到“长征”之后，苏维埃总部于1935年迁往西北之时，苏维埃部队才正式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开始在抗日战争中起领导作用。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发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并要求国民党与它合作，来组织民族抵抗运动。

这一在以后几年里又曾反复重申的采取统一行动的号召需要根本改变中共的政策和毛对共产主义的提法。共产党在早期和国民党的合作在1927—1928年完全破裂之后，已经宣称资产阶级出卖了革命，并设法将他们的运动重建为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由产业无产阶级领导的联盟——更正确地说，由作为产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共领导的联盟。但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渗透的运动不仅延及这些阶层，而且也延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人。在这种局势下，毛和中共开始愿意承认他们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以便把这一部分人与更为反动的分子分开，作为抗日战争中的可能的合作者，并力主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不仅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他们一直呼吁请参加统一行动的其他阶级。

这显然是回到1927年早已彻底崩溃的阶级合作的政策上去，当时中国有人为此发表了很多辩解的言论。当然，这次提出统一战线与共产国际在欧洲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不谋而合；1935年夏，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特别要求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来抗击日本。问题是统一战线应该向右扩

展到什么程度,它的组织基础应该是什么。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共产党人始终在某种意义上提倡统一战线。但是这个名词的意义从一个极端来讲,可以是“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从另一极端来讲又可以是“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其间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前一种说法实际上是共产党号召群众背弃他们的改良主义领袖,投身到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而后一种说法则意味着在为了某一目标而进行共同斗争时,与改良主义的领袖进行合作。1935年,共产国际由于意识到法西斯的危险,尤其是在德国,他们过去大大低估了这种危险性,于是就从上述第一种“以阶级对抗阶级”的态度,转变为上述第二种态度,并且对一切可能被吸引到反法西斯十字军中来的团体发出呼吁。但是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局势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在中国,恰如其分地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当的组织似乎就是抗日统一战线,也就是反抗帝国主义最危险的代表和中华民族民族独立的现行敌人的统一战线。鉴于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感情,显然就可以发动一个抗日群众运动;并指责和孤立蒋介石及其拥护者,这批人不把自己的主力用来反抗日本,而是决心要打内战,企望摧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产业工人、农民(包括富农和贫农)、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无疑都会响应这种呼吁;但是曾经与蒋联合击败1927年大革命的大资产阶级态度又如何呢?其中有许多人也强烈反对日本,并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因此也可以呼吁他们加入反法西斯阵线,如果这种阵线的形式是中国人民反对洋鬼子和普遍的爱国民族阵线,就更加可以吸收他们。毛和他的战友于是便对中国的阶级结构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其中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抗日统一战线之内的爱国阶级之一;因此,被摒弃在战线之外的便只有那些明显地表示愿意与日本人勾结,或者无论如何要先对中华苏维埃发动内战,然后再抗日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从这种意义来说,成立统一战线就要准备有



条件地与国民党以及蒋本人合作,这里所说的条件是: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抗日;国民党同意重新实行某种民主制度,并出面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未来的共同纲领;对工人和农民作出让步,立即提高其生活水平。只要国民党接受这些条件,中共就宣布准备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改编红军,使之并入国民党军队建制之内,取消“苏维埃”的名称,并同意撤销苏区的独立建制,把苏区并入全国性的民主结构之内。

共产党在发表了提出这项行动纲领并要求国民党接受它的宣言之后,国民党未作答复。当时内战仍在继续进行;但是共产党在1937年3月建立了陕甘宁苏维埃政府,并把总部设在延安之后,对西北各省的日军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公开的战斗,并加强了统一战线运动。1937年8月,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9月中央政府又公布了他们在7月间送交国民党的《国共合作宣言》。同时在9月,红军改名为“八路军”,进入河北北部和山西,不断以游击战骚扰日军,而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也改名为“边区”政府;从而去掉了“苏维埃”一词。11月,晋察冀地区又成立一个新的“边区政府”;在此之前,江西和福建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分子已组成新四军,并开赴江苏和安徽骚扰日军的后方。

276 1937年8月发表的《十大纲领》最能说明中共对于7月间爆发的中日公开战争的态度,这《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总动员;(3)全民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召开国民大会,起草民主宪法,成立包括除亲日分子以外的各个党派和团体的革命分子的国防政府);(5)支持和平阵营,反对日德意侵略阵营;(6)改革税收制度,没收汉奸财产,扩大生产和禁绝市场上的日货;(7)改善工人、农民、公务人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经济条件,减租减息,救济失业;(8)实现新的普遍免费义务教育,实现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课程;(9)肃清汉奸、傀儡和亲日派;(10)关于国共

两党全面合作问题,建立各个党派、阶级、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中国共产党在提出这个纲领时,着重强调它与孙逸仙所制定并为国民党在名义上接受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没有矛盾。与此同时,中共宣布“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体现了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要求。共产党人丝毫不想掩饰他们的意图,即在适当时机要跨越这个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而且要保持他们组织上的独立,以便在时机到来时可以不受拘束地进一步前进;但是他们强调一点,即他们暂时不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只争取实现一个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主阶段,这个阶段必然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毛在1941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提出的说法,但其中大部分都已在前几年的著作中预先提出过。《新民主主义论》并不仅仅是1935年以来详述统一战线政策的各个声明和宣言的扩充,而且是作为中国人根据本国情况对共产主义理论作出的新贡献提出的。直到1935年为止,共产国际将其总政策应用于中国的环境时,曾经提出过一系列方针,并承认中国环境有其特殊的历史特点。但从1935年以后,共产国际由于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就不再提出自己的政策要中共接受,而是听凭中共按照统一战线的总指令去具体拟定自己的路线。毛所企图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一点。

《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始就强调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这个国家已在封建状况下存在了约3000年之久。接着此书又说明了他对中国的设想,即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两个本质不同的阶段。但是其中的第一个阶段,即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其本质不仅与封建主义不同,而且与旧民主主义不同。据此书说,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可以

追溯到 1839—1942 年的鸦片战争；但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 1917 年的俄国革命止，这种革命一直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后者的一部分。可是从 1917 年以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就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暂时的目标虽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革命本身即使在这个阶段就已不再是老式的革命了，也就是说已经不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而是一种新式的革命，整个地或部分地由无产阶级领导，其暂时的目标是建立以所有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基础的新国家。换言之，从 1917 年

278 以来，世界革命已进入新的时期：它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所有阶级意识到这一点与否，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了无产阶级推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因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本质的不同。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肩上。据此书说，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这个共和国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的专政”。因此新的民主共和国本质上与旧式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不同。在共和国的总范畴下列举的有三种国家：(1)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2)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3)一些社会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其中第三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过渡形式。在这种共和国中，将制定适应于其政治结构的经济政策。银行、大工

业、大商业,包括原先的外资企业在内,都将收归国有并加以整顿;但只要不“操纵国民生计”,其它企业仍可存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但富农仍然允许其继续有自己的财产。

毛继续谈到了农民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我们所作的一切事情,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但是毛又补充说,虽然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阶级。“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但还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没有产业工人,人民就不能生活;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因此,毛在表面上肯定了农民的首要地位以后,仍旧回到了认为产业工人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说是革命的必然领导者的概念;但他所说的“产业无产阶级”究竟是指工业中的工人呢,还是指必然要被认为他们的先锋队的共产党呢?我认为这一点是含混不清的;但两者在他心目中显然是密切地等同起来的。

接着毛又谈到反映政治和经济革命并为之服务的“文化革命”。他说,社会主义的文化暂时还不可能实现,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而这种政治和经济现在还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然而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却是必不可少的任务;因为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就不但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连民主主义革命也不可能完成。共产党人必须使人民为将要到来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作好准备;但是他们必须把这种准备工作与逐步建立适合于革命的民主主义阶段的新大众文化的工作区别开来。

后者的实质是它的民族特点：“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点。”新的文化必须大量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但必须避免生吞活剥地吸收。“‘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比如我们吃食物时，总是把吃进来的东西分为精华和糟粕，然后排泄其糟粕，中国借鉴外国文化时，也必须是这样。正规的马克思主义  
280 除非能适合于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否则对中国毫无用处。这种新文化必须十分科学化，要抛弃一切形式的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通过研究具体事实来寻求真理。它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传统的伟大，并从中吸取多少具有民主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东西，但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最后，新的文化必须是大众的；它必须直接投合人民的心意，绝不能脱离人民而进入象牙塔中去；为此，必须改革和简化语言，并使用简化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以上这一段话无疑是不全面地概括了毛的论点，而他的论点又绝非每一点都很清晰，不过我认为以上概括已经相当清楚地说出了他的论点的实质。毛的论点中有一个主要的新因素是：强调中国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实行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除非承认某种形式的专政，否则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被认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形式。共产党人一向主张，不论任何形式的国家，都必须以某一阶级的专政为依据，资产阶级的专政也罢，无产阶级的专政也罢；但是毛所提出的理论却主张参加革命的各阶级实行联合专政，所以除了封建阶级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同盟者之外，所有的人都可以包括在内。不过他认为这种专政并非建立在不分阶级的全民基础之上，而是以几个阶级分享政权为基础。这的确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特点，这种制度并不适用于全世界，而是适用于暂时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国家，特别是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占主要地位

的国家。实质上这是一种过渡的概念,因为这些国家注定要从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中,共产党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参加民主主义革命,同时又使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作好思想准备;因此,共产党人与其他分子在统一战线中一起工作时,绝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或是让自己消失在统一战线之中,以致损害他们的长远的任务。毛指责那些如此行事、以致助长这种消失过程的人为右翼异己分子;另一方面,他又同样激烈地指 281  
责左翼极端分子,因为他们否认在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当前任务时与其他阶级合作的合法性——在这一方面,他特别指责中国的托派,他们于1931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以陈独秀(1880—1942年)为首的自己的组织,但第二年他们的领导人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毛在1938年11月给中共所作的报告中,把托派与帝国主义者同样看成是革命的主要敌人,当时他曾特别激烈地谴责韩林福(译音)的第三阵线。中国的托派不断地老调重弹,认为1927年的惨痛失败是与国民党合作的结果,他们是统一战线和毛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强烈的批评者;同时,他们又遭到了与托洛茨基在欧洲的追随者和所谓的追随者所遭到的同样激烈的谴责。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共产党人于1937年表示愿意在某种条件下放弃独立的苏维埃政府,取消“苏维埃”的名称,将红军并入统一的抗日国民军中,并停止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以此作为与国民党共同抗日总协议的一部分。这些条件实际上执行到了怎样的程度呢?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蒋介石被张学良绑架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劝告而获得释放。国民党对于1937年中共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没有作正式答复,但是两党之间进行了种种谈判,有一个时期双方之间的内战实际上中止了,而且两

282 军共同抗日。在1937至1938年之间,两党之间的关系大有改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但在1938年10月汉口沦陷之后,又逐渐恶化起来;1941年1月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之后,公开的冲突再度开始。前文已经说过,在关系改善的时期,共产党人确实改变了苏区的正式称号;1938年7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与国民党的领导人举行谈判。但在1939年夏,蒋介石就下令完全封锁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地区。然而,共产党人坚持为统一行动而努力;1940年7月,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实行了所谓“三三制”,成立由人数相等的共产党、国民党和“无党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甚至在1941年1月的事变以后,“三三制”的政策仍在继续实行;那次国民党的顾祝同将军袭击新四军,俘获其军长,击毙其副军长,并打垮了整个部队,其残部逃往苏鲁地区与其他共产党人汇合。某些地区实行合作而另一些地区发生战争的混乱局面,一直继续到欧战结束时为止。接着,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修改了党章,听取了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报告。在党章的修改中,大会加了一篇总纲,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全党工作的指导原则”,并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确定中国革命方针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称自己为“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以全体党员必须认真自觉遵守的纪律联合起来的统一而紧密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就这样把毛泽东的地位抬高到与马克思和列宁相等,或几乎相等;并且至少含蓄地把他远远地置于恩格斯和斯大林之上;这样做是向党的领袖表示极大的尊敬,即使不是明确把他尊为创造性的理论家,至少也把他尊为战术和战略的大师,认为他已清楚地懂得如何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应用到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环境中去,甚至还可以应用到其他类似的环境中去。

但毛泽东的学说实际上是否并不限于权通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条呢？毛本人说没有超过这个限度；他正如马克思、列宁一样明白地宣称，产业无产阶级注定要成为领导革命的阶级，这不仅在他认为必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时期是如此，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说来，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也是如此。如果按照字义来理解他的话，那末无论在这两个阶段中的哪一个阶段内，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革命才能成功。诚然，他也说过：在“新民主主义”阶段，革命必定主要是农民革命，而且他本人一生也主要是农民暴动的领袖和组织者。不过，他仍然认为，尽管农民在早期阶段可以进行革命，但是没有人指引，他们就不能领导革命；因而他深信，他们无论如何就不能使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因此，他所讲的“无产阶级”领导，在两个阶段都有必要；在第一阶段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领导，为的是保证立即进行应有的准备，以便将革命继续进行到第二阶段，并且保证党不致于蜕化成为仅仅是一个农民党，也不致于同暂时需要结盟的其他力量混同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毕生始终竭力坚持，不应重犯二十年代的错误——中共不应渗透到国民党中去；也不应由于与国民党合作或与国民党企图代表的阶级合作，从而失去自己的独立行动的权力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毛认为，当时工人阶级进行有效地领导是不可能办到的，意思是说，当大城市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时候，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群众性政党的实际领导，是不可能办到的——实际上，甚至在产业无产阶级通过工业化的进步而大为扩大和集中之后，也不可能办到这一点。但是关于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实际占主导地位，而中共在产业工人中又没有任何巨大影响的问题，毛泽东也能自圆其说地作出解释；因为他认为，即使产业无产阶级中很少有人是党员，或者能够在党的工作中起积极作用、从而具备成为党员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产业无产阶级的自然的、不可



避免的和唯一可能的领导和先锋队。对于毛泽东来讲，“共产党”和“产业无产阶级”这两个观念本身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光想到这一个而不想到另一个，或者考虑把两者分开的可能性，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根本基础；他所讲的一切都无意脱离这个基础。就当时的情况来讲，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必需团结一切能够被吸引来参加统一战线和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每一阶级和团体。但是，“新民主主义”不过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的一个过渡阶段；当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成熟时，领导权就必定只能落在作为产业工人的先锋队和代言人的中共身上。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若干阶级的联合专政被认为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我认为他心里也从来不曾这样想过——联合专政可以持续到随后到来的社会主义阶段。

如果在革命的初期，也就是在民主主义时期，农民个人或农户占有了土地，那么毛又是怎样认为有可能使革命进入随后到来的社会主义阶段呢？当然，他并不相信个体农民的耕作制度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基础，甚至哪怕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相一致。但他几乎没有谈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条件，而只是预测这种过渡到时候一定会发生。实际上他似乎同马克思或列宁一样完全相信大规模企业的优越性，并相信大规模企业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他也就具有了这样一种根本信念：当帝国主义恶魔被赶走以后，以大企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一定会成功。他大力提倡发展工业，当1943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起增产运动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开始明显了，但这一点早就十分明显。但是个体农业如何转变成集体化的或国有的农业，他从不认为有责任加以解释，他主要关心的始终是两件事：第一是当前革命战略的需要，第二是中共维护其根本学说，使之不因暂时妥协的需要而受到

损害。

关于后者,前面已经说过,他始终竭力坚持。在提倡与各反帝集团结盟时,他从不掩饰或希望中共掩饰它进一步的社会主义目标。相反,他把中共看成非但是当前大局中的领导力量,而且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他始终大力强调共产党的教育作用以及全体党员使自己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责任。他还十分坚持他所谓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党的组织和控制所不可或缺的方法。毛泽东坚持中共的政策应该由全体党员以纪律严明的方式加以执行,而且这个政策应该由党的中央组织产生,而不应由基层组织向中央组织传达。因此,他强调,在还没有作出具有约束性的正式决定以前,全体党员和党支部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最充分的讨论;但是他还强调,这种讨论只能在党内和党员中间进行,在党外没有进行自由讨论的相应权利。当党必须与统一战线中的其他人士合作时,这条限制就尤其重要,因为这样就取消了在党外的联合组织中自由讨论的权利。

遵照这些方针制定的条款,列入了1945年所通过的党章中,其中大部分已见于1928年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草拟的党章。但新党章一方面更加强调由中央决定政策,另一方面也更加强调一条纪律,规定只有党员在内部讨论时才能对党的事务进行讨论和自由发表意见。党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委员会没有作出决定以前,各地方党组织或其他党组织以及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委员会就这种问题提出建议外,均不得公开发布意见和决定。”当然,这仅限于“全国性的问题”;但在涉及区域和地方组织的条文中,有相应的有关“党内民主”的条款。讨论党组织结构的那一章开宗明义说:“党的机构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起来的,”并且规定了一套精密的组织系统,自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的党内各单位都明确了上

下级关系。此外关于每一个单位还作了这样一项决定：“在各级代表大会闭会时期，由各级大会所选出的党的各级委员会，即为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权力机关。”这样更清楚地规定，除了在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以外，中央委员会具有最高权力。比方说，地区代表大会就无权反对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组织被赋予“就地方性的问题作出决定之权”；但是这些决定“不得与中央委员会及上级组织的决定相抵触”。党支部被说成是“党的基础组织”，而且“在政府组织、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凡有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组”，但是这些党员及各级相应的党委员会领导，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最后是关于违反党纪的党员的处分的条例，其中包括最严重的处分——开除出党；但是无论是党组织或党员个人对于他们所受的任何处分，如欲提出申诉，都有严格的程序；党章规定：纪律措施的目的是教育，“绝无意在党内实行惩办主义”。党章劝阻党组织不要采取过分严格的态度。一般说来，对于初犯或错误情节较轻的人，采用警告或劝告而不采用开除党籍的办法，似乎被认为是较合适的。然而毫无疑问，全体党员对于中央委员会所作决定，或对于服从中央委员会的下级党组织所作决定，都有严格遵守的义务；政策无疑要从最上级发出，往下传达，而不能相反地从党员和支部向中央传达。

287 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中共提出统一战线纲领时，曾宣布它准备停止实行没收土地并将其重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在1937年开始的中日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确是这样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已经因此而丧失了对农民的主要号召力。虽然残存的地主除确系民族大业的卖国贼可予清除者外，一律任其保有财产，中共仍旧可以不受限制地实行减租减息，取消或减少向农民征收的苛捐杂税。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42年1月发布的政策决定中，详细规定了共产党所控制的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地租要

大大减少,利率要降低;但是,同意减租的地主,甚至连同意这样做的封建士绅在内,都可以保证得到减租后应得的地租,并保有他们的土地和资本。中共要求它的党员“认识到大部分地主是抗日的,某些开明士绅还赞成民主改革”。因此,中共的政策“只是帮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并非完全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攻击拥护民主改革的开明士绅。因此,在减租减息以后,应当保证收租收息;并规定除了保障农民的公民自由、政治、土地和经济权利以外,必须保证地主的公民自由、政治、土地和经济权利,以便联合地主阶级和我们共同抗日。消灭封建剥削的政策只适用于那些死不悔改的卖国贼”。地主和佃户之间的争执要尽可能协商解决;政府的“三三制”应在“各级参议会和政府中坚决、严格和广泛地执行。”政府的法令规章不可“有偏向”,应该既对农民、又对地主有约束力。

毫无疑问,中共以这个十分温和的土地政策为基础,仍然能够有效地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实行这种办法的时候,中共所依靠的<sup>288</sup>一方面是由此而得到的实际好处,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直接诉诸民族情感。中共自从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其号召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声调,作为早期态度中强烈特色的国际主义已经日渐消失。毛泽东学说的整个效果是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与别国的实际情况截然区分开来,从而也就是与苏联的实际情况截然区分开来。因此,苏联的榜样已不再是审慎模仿的对象,大力强调的倒是中国需要制定适合自己的政策。基本上,这个学说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学说,因为它被认为可以适用于一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并不仅限于中国;但是,由于问题主要是中国人在本国的条件下怎样才能采取最有效的行动,所以主要仍然是怎样制定适合于中国的行动策略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已明确规定为首先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时,中共的政策与中国的民主化的

民族主义之间就没有任何显著的差别了；这种民主化的民族主义也就越来越成为中共的官方政策的一部分。这就使中共疏远了共产国际，尽管共产国际热烈地提倡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实际上，早在斯大林于1943年取消共产国际以前，共产国际就几乎不再干预中国的事务了。毛泽东继续确认中共的行动原则是：与苏联结盟以及把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部分；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准备同意莫斯科对中国政策发号施令，或者当中华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彻底实现之前，就向着世界革命的方向前进。中共就这样使自己的声调具有远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且远比以往为甚地动辄要求人们缅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繁荣传统时，其所采取的路线大体上与苏联的路线相似，至少是与苏联1941年以后的路线相似，并且同三十年代后期法共等其他共产党的路线相似；但是中共所走的路线是独立自主的，并非苏联强加给它的。

因此，大致上说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在毛泽东的影响和鼓舞下，在中国出现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其中农民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中共尽管在原则上继续肯定产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认识到无论在目前还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革命实际上主要是、而且必然主要是农民革命；产业无产阶级名义上的领导权即使存在，实际上也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领导而已。在毛泽东看来，农民必定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角，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努力帮助促成这一革命，而且要为随后必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人们作好思想准备。此外，由于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之中，所以就必须将人民中一切能够被吸引来参加反帝运动、并承认有必要建立“民主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分子，都团结到革命的一边来；这就需要大力坚持民族团结，作为争取支持的手

段。中共在理论上转而信仰民族主义,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是很难讲的。至少在实践中它变得高度民族主义化了,同时我们必须记住,理论与行动的一致是毛泽东本人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之一。1937年毛泽东作过一篇名为《实践论》的讲演,接着予以发表,其中力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贡献是同这一论断相一致的。

本章我所谈到的完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其他各种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完全没有谈到。事实上,除了共产党以外,简直谈不到其他发展。该党一旦开始从1927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后,几乎是在独家倡导社会主义,在实际推行方面也是独树一帜。在中共之外,始终有若干团体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实行仅仅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较有限的无产阶级政策,并要求更加紧密地与世界革命——以有别于单纯的中国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这些就是被毛泽东斥责为“托派”的团体,其中有些自认是托派,另一些则不然。这些团体包括:曾参加1931年上海会议并建立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敌对的中央委员会的那些人;1938年遭到毛泽东斥责的韩林福的“第三阵线”和刘仁静的“列宁阵线”,以及其他若干“反对派”运动。对于1930年追随李立三的领导的那些人,毛泽东也斥为“盲动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接着,李立三在第二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被派到莫斯科去,还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右翼人士被斥为“机会主义者”。例如,谭平山在1927年末由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而被开除出党,后来他组织了“第三党”;顾善中(译音)在1932年被捕后,投靠了国民党。

除了这些“异端分子”以外,中国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同情社会主义,但他们与中共没有联系,与那些意见与共产党相左的分裂派别也没有联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人有着强烈

的吸引力；他们并不拥护共产主义，但他们愿意与中共合作，而且在当前的政策方面多半愿意接受中共的领导。在1945年以后民主同盟兴起以前，这些知识分子缺乏一个使他们能够团结在一起的中心组织；他们大部分人要么是在统一战线中工作，要么就是在某些诸如合作联盟这样的非政治性团体中积极活动——当然还有在两方面都活动的。但是，这些非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大批追随者，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域内也似乎贡献不大，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曾企图将欧洲社会主义的多元学说应用到中国的环境中来，而且直到1949年为止，主要在共产党控制以外的地区内；他们在合作运动方面的影响一直很大。

291 然而，中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唯有毛泽东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种显著的共产主义态度的变种的宣传者和实际推行者；这种变种对农民的重视以及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统一战线的民族意义的重视，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而他力图使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既成为苏联的同盟者，又成为其他遭受帝国主义渗透的国家中的民主主义民族运动的同盟者。他的政策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的发展情形，就远远超出本卷的范围了。

\* \* \*

C. 布兰特, B. I. 施瓦茨和 J. K. 费正清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件汇编》(哈佛, 1952年)是一部出色的原始资料译文选集。此外请参看: P. H. 克莱德著《远东》(纽约, 1948年); J. K. 费正清著《美国和中国》(哈佛, 1948年); H. 费斯著《中国的混乱局面》(普林斯顿, 1953年); H. R. 艾萨克斯著《中国革命的悲剧》(斯坦福, 1938年);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1941年, 英译本, 纽约, 1945年);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正在出版中, 1954年); R. C. 诺思著

《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斯坦福, 1953年); D. B. 罗斯著《列强之林的中国》(纽约, 1945年); B. I. 施瓦茨著《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哈佛, 1951年); R. H. 托尼著《中国的土地和劳工》(1932年); 约瑟夫·斯大林著《斯大林论中国》(孟买, 1951年); H. A. 斯坦纳著《毛泽东主义》(洛杉矶, 1952年);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北京, 1951年); R. C. 诺思著《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知名人士》(斯坦福, 1952年); 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1938年); P. 瑟尔伯著《美俄在远东的关系》(纽约, 1949年); F. 莫雷斯著《关于毛泽东的中国的情况报导》(纽约, 1953年); W. W. 罗斯托著《共产党中国的前景》(1954年)。



## 第十三章

### 回顾和展望

我把这部社会主义思想史写到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大战后的发展不过是近年来的事，历史学家不可能有把握地对之作出评价。但是，我在结束这部概论时不能不估价一下：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运动来讲，在 1939 年的情况如何，或者说，它的前景看来又将如何。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已截然分为两个相互斗争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前者在苏联掌握了专制权力，后者在 3 个主要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中组成了立宪政体，虽然在这 3 个国家的任一个国家中都没有得到明显多数的选民的支持。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以及大部分东欧国家中，除了若干地下活动以外，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都已被消灭。法国有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少数派存在，同时也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少数派存在；在英国，追随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很少，而工党则已经缓慢地从 1931 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并且正在向 1935 年的选举以后仍然大权在握的保守党挑战。美国的社会党从 1914 年以来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这时已经分崩离析，而工会在新政期间则大大增强了力量。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中，共产主义是人数不很多、但却是很活跃的少数派的信条，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一支占优势的力量；两者在秘鲁都和势力强大的阿普利斯塔运动发生矛盾；在墨西哥，卡德纳斯总统曾大力提高和维持原先的土地革命的传统。当时澳大利亚和新

293 西兰成立了工党政府；后者已经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

进展。在加拿大,各传统政党仍占优势;但社会民主主义联邦合作联盟已开始威胁它们的权力,尤其是在萨斯喀彻温省。在南非,劳工运动仍处于瓦解状态;不容异族存在的民族主义是一支新兴的力量。在印度,国大社会党已经成立,但仍在国大党的范围内活动,而且与共产党的矛盾日趋严重。在日本,由于民族军国主义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运动已暂时消亡。在中国,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的各派意见中已经占了上风,并且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渗透的人民阵线的领袖自居;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仍然掌握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手中。在中东的若干国家里,有一些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 and 社会主义运动,但它们的规模还很小,而且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在比利时、荷兰、瑞士等欧洲小国家里,有很多社会民主主义少数派,但没有迹象表明它们能变成多数派;葡萄牙牢固地处在萨拉查博士的独裁统治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少数派都很强大,但两者都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控制整个国家的程度;波兰从皮尔苏次基手中转到了继承他的一批上校手中,处于半独裁的统治之下;芬兰的社会党已在不久前下台。

总的看来,对于作为一种世界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形势。二十年代初期,人们曾经满怀信心地预言必将发生共产主义世界革命,这时不但没有发生,反而暂时几乎被俄国的倡导者置诸脑后了,他们正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竭尽全力“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致力于旨在保卫苏联免受纳粹侵略威胁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当时,尽管拥护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在少数几个国家内朝着福利国家的方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大部分宪政国家内却显示出安于人数众多的少数派地位的明显趋势,而且即使在它执政的时候,也并不热衷于迅速向社会主义前进,以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 294

1939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彼此水火不

相容,但全都声称自己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根源。除了马克思学说几乎没有什么势力的少数几个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而外,在其他国家里,无论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的信徒,但是对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他们却作了根本不同的解释。两派都公开表示相信马克思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都一致认为有产阶级用低于产品价值的代价购买商品和劳动力,从而剥削无产阶级。两派都主张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这种解释昭示无产阶级,它有希望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并将在未来无产阶级的社会中运用自己的权力消灭它本身和其他阶级。两派都相信资本主义曾经一度是先进生产方法的先驱者,但它注定要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取代,在这种公有制下,人剥削人的现象将消灭,然后人们就将为了使用而生产,不再为了利润而生产。这两派不同的地方是,共产党人宣称需要革命,将来需要由一个本质上崭新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此后这个国家将消灭自己,并用对物的管理来代替对人的统治;而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现在的国家可以逐渐转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工具,因此不必推翻,而只要把大多数选民争取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就可以夺取这个国家。社会民主党主要存在于这样的国家:就其主要立法机构来讲,至少在1918年以后都已经有了普选权或成年男子选举权,这些社会民主党宣称,议会民主和多数人统治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基础;而共产党则主要存在于没有议会民主的国家,所以不是从选举者个人或多数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从掌握权力的有组织的阶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些共产党根本不准备把选举权给予敌对阶级的成员,而是准备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一种不许所有的“阶级敌人”分享任何政治势力的专政之上。不过共产党人所竭力主张的专政始终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领导下所实行的工农阶级联合专政。阶级的专政变成了阶

级政党的专政,其原因完全是因为阶级政党被看作是阶级先锋队的主要代表,它体现了整个阶级的愿望,因而有资格以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则否认马克思曾经倡导过、共产党人所解释的那种专政。他们说,马克思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作对比,意思只不过是赞成多数人的统治而反对少数人的统治,并认为无产阶级是由全体人民的大多数组成的,其中不仅包括在近代工业中工作的城市居民,也包括被剥削的农村居民。至于共产党人,则经常把“无产阶级”这一名词用于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意义是指整个被剥削的阶级,另一种意义只指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或者甚至只指大规模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他们对农民的态度最多不过是把大批贫农以及无地的农业工人当作无产阶级反对富有阶级的天然同盟者,有的人甚至看不起农民,认为他们是从事陈旧的小规模生产的人,应当在纯粹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管理下使农业生产方法工业化,从而使他们脱离原始状态。

从共产主义运动刚一开始时起,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争论就尖锐地表现在怎样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下的殖民地这一问题上。在这些地区中,社会民主党人大部分力主改善对待当地人民的态度,主张向殖民地内实行完全自治的方向逐渐发展的自治制度——这些意向与他们的渐进主义的国内政策相一致;然而共产党人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公开敌人,则竭力鼓动殖民地叛乱并致力于完全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因此,在共产主义运动生根的任何殖民的地区,改良主义的政策与革命的政策是针锋相对的。<sup>296</sup>

如果从全面的世界观点来看问题,不难看出,无论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事实上都没有带来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切合实际的信息。一方面,比方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或英国等国的人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希望发动一次共产主义革命来推翻现存的

制度,只要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有意选出厉行改革的政党执政,对这种制度至少能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另一方面,俄国在1917年以前,除了革命以外却没有别的道路可行,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要求改良的愿望没有得到认可,同时也没有合乎宪法的方法来促进民主的进展。有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则处于这两种对立的形势之间,因为它们拥有使用广泛选举权选出的议会,其权力相当大,但却根本不能控制有行政权的政府,后者始终保持在不对议会负责的人手里。因此,有群众基础的议会与掌握行政权的政府之间发生重大冲突时,要不是妥协了事,就必须诉诸武力,方能得到解决,法国由于不同的原因,也处在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由于法国有肇始于1789年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由于法国内部有大批从未接受议会共和国制度的人物。意大利因为议会传统薄弱,而且由于教会与政府之间长期争执不休,也在议会制民主国家和实施独裁统治的国家之间,站在一个暧昧不明的地位上;至于日本,议会中的各党派从未地位稳固到有资格向军方发号施令,或者把神圣的天皇降低到立宪君主的地位。

从全世界的观点来看,1919年重新恢复的第二国际在伯尔尼所发表的宣言显然具有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这个宣言根本没有为俄国人、中国人或日本人带来信息;而且除了尚未经过考验的新魏玛共和国制度以外,给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带来的信息也不多。但是新近成立的第三国际几乎在同时发表的一个宣言(大约一个月以后在莫斯科发表)至少也是同样狭隘的,因为宣言所根据的是这样一个武断的说法;各国的无产阶级面前有一个明显的任务,那便是在各方面走莫斯科的道路——实际上这种主张对英国,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或美国来说,都是很不现实的;对法国和意大利也几乎同样不现实,而且事后的结果证明,对于魏玛德国也是如此,至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更不用说了,印度和锡兰

当然也不例外。只有维也纳“第二半国际”的中派人士看出：不顾各国的客观情况和传统，不顾各国人民所能取得的机会，制定一种各国适用的独一无二的方法是十分荒唐的事情；维也纳国际打算承认第二、第三两国际的这些观点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应用，从而使争论双方和解，但这一努力却被敌对的主张持不宽容态度的双方彻底拒绝了。

现在我们不妨更远地回顾一下历史事实，看一看社会主义思想怎样从十八世纪末最初开始发展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的运动的。像这样追溯往事时，需要提出的最早的社会主义设计者是格拉古·巴贝夫和他在1796年组织的“平等派密谋”<sup>①</sup>。虽然“社会主义”一词当时还没有产生，巴贝夫却显然有资格被认为是第一位领导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意图的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耐人寻味的是，他以革命的密谋者起家，力图把法国大革命进一步推向平等主义阶段。从巴贝夫及其密谋开始，接着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密谋者——诸如布朗基和巴尔贝斯<sup>②</sup>、英国宪章运动派的极左翼、巴黎公社以及从某些方面讲还有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袖，尽管别人指责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却常常受到强烈的反驳。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的若干传统中，毫无疑问有一个传统是由一个精英或忠诚的革命者团体举行暴动的传统，这些团体旨在借助身教言教的力量引导不如他们积极的群众进入新社会。古往今来在许多国家中，有许多人直觉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

298

---

<sup>①</sup> “平等派密谋”是1796年法国所出现的空想共产主义运动。这次运动由巴贝夫(1760—1797年)所领导的秘密团体平等派组成，主张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建立劳动者专政的“平等共和国”。1796年5月密谋暴露，参加者一部分被处死刑，一部分被判处流刑。——译注

<sup>②</sup> 阿尔芒·巴尔贝斯(1809—1870年)，法国革命家，他和布朗基共同策划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1839年因举行暴动被判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848年被释放，为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译注

这样一种起义；即使在这种暴动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国家里，今后大概也始终会有很多人持这种看法。因为这种暴动主义主要是个人气质问题，以及在体质上根本不能从其他角度来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也有许多人在气质上并没有这种意志，但却为特殊环境所驱使而采用暴动作为政治武器。

第二种社会主义传统思潮与此根本不同，是由早期的公社设计者罗伯特·欧文和沙尔·傅立叶肇始的；他们设计了小规模公社，避开四周的竞争，由生产者与消费者组成小规模集体追求美好的生活，大部分做到自给自足，彼此通过合作而不是相互争夺来谋求生活资料并且为相互友好的社会哲学所激励。傅立叶的做法是诉诸人类的自然倾向，而欧文则诉诸公社团结的道德原则，毫无疑问彼此大相径庭，所投合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欧文在工人运动发展的一定阶段与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这是傅立叶所没有做到的。但他们两人都是乌托邦主义者，企图依据小规模公社中彼此面对面的联系来重新改造现存的社会，他们都希望这种小规模公社到时候就会遍布全世界，各公社之间的关系则以广泛的联盟为基础；由于各成员公社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整个权力问题就变得毫不相干和没有意义了。他们的继承者卡贝与他们两人都有所不同。因为卡贝企图创立一种较大的公社，用严格得多的平等主义纪律联合起来，在这种公社里欧文和傅立叶所主张的那种面对面的自愿原则至少在意图上被更广泛的联系纽带所取代。但是，卡贝也属于乌托邦主义者的阵营，他设想新社会是这样来临的：人们自动退出那种因自由竞争而搞得一团糟的、即欧文所说的“不道德的旧世界”，进入一种举国团结的和谐生活，其基础是诉诸人类天性中的优良品质。

早期的第三派与这两派根本不同。昂利·圣西门既不是主张暴动的平等主义者，也不是乌托邦幻想者，而是一位精心制定历史

发展学说的规划者。他认为十九世纪所肩负的使命是把人类从“游手好闲者”——法国大革命以前和以后管理国家事务的帝王、贵族和黠武主义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让“学者们”代替他们，后者是具有科学知识的人，他们将发展生产资料为大家服务，尤其是为“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服务，从而重新建立失去的社会统一和秩序。在圣西门看来，行将到来的并不是雇主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冲突，而是两者相互合作，以共同制止战争和剥削，并且建立计划经济，使财富的生产飞跃发展。在他们仁慈的统治下，将产生一种“新基督教”，一切神学教条将会从中提炼掉，只有科学真理受到尊敬。圣西门的门徒在这位“大师”的学说上增加了一点：公开宣称一切遗产都是不合法的，并宣称必须严格地按照人们合理利用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来谋求公共福利的能力，来分配这种职能。其中有些人，尤其是安凡丹，对这位大师的宗教性学说作了光怪陆离的神秘解释，因而使运动信誉扫地，其社会意义因而受损。但是，使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鼓吹者并列的思潮，以及将社会主义与技术发展和大规模工业化运动联系起来，认为这两者是社会主义秩序的必要基础的趋势，却是圣西门及其门徒首倡的。

社会主义思想的第四个主要发展是随着路易·勃朗的著作而出现的，后来在某些方面由斐迪南·拉萨尔加以发展。路易·勃朗的最大贡献是“劳动权”的观念，也就是他在1839年第一次出版的《劳动组织》一书中所提出的国家有责任向全体愿意劳动的工人提供职业的观念。勃朗提倡一种自治的国家工场制，这种工场由经过改革的民主国家建立并供给经费，但是可以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只由全体人民的代表作一般的统筹规划。拉萨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继承了 this 想法，把它运用到普鲁士的具体环境中去，要求普鲁士国家提供资本来发展自治的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普选制的政权下工作，将使国家从人民的敌人转变成为人民获



得解放的根本工具。

路易·勃朗和拉萨尔两人共同对于社会主义需要国家干涉这个观念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谓国家干涉,不仅是为了规定社会和工业条件,而且是为了由它主办并促进工人联合会,通过这种组织来实际负责经营工业。这种社会主义概念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布的新“科学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与普鲁东大约在同一时期倡导的根本不同的学说也是南辕北辙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那一套唯物史观中提出一种学说,把人类的历史总结为一系列阶级斗争的记录;在这场斗争的最后阶段,相互斗争的主要阶级只剩下了两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地继续下去,直到资产阶级(资本家)最后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的暴乱所推翻,而且整个社会在没有阶级、没有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时为止。马克思认为除了这两个阶级以外的其他一切阶级在技术进步的冲击下正在消失的过程之中——他认为封建主的权位越来越被资本家取代,小资产阶级、小工匠和农民则被大规模生产的优越经济效率逐出市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大规模资本主义在达到某一点以前,本质上是一种起进步作用的力量;但它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必定会阻止它超越这一点,并且把由于它的成长而壮大起来的无产阶级带进反对它本身的领域,成为越来越具威胁性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对这种结果的预测可具有科学的准确性,即资本主义被推翻,生产资料在无产阶级的控制下社会化。

毫无疑问,马克思期待这一结局作为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所遭受的周期性危机的一次结果很快会来临。他一方面低估了资本主义的恢复能力和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国家挽救濒临危境的资产阶级的能力,同时又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力量,也过高估计了被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发展送进无产阶级中来的社会集团以及由

于农业逐步工业化而日趋穷困的农民吸收到无产阶级的旗帜下来的可能性。但是,他正确地预见到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是十九世纪晚期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占重要地位的冲突;并正确地预见到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将有所发展。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第一次对先进国家中的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1867年他发表了他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他的追随者在他的影响下于同一年创立了德国爱森纳赫派社会民主党,与拉萨尔几年以前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形成尖锐的对立。在此后若干年的冲突中,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派之间的争论焦点首先是铁的工资规律,这是拉萨尔派所拥护而马克思却反对的;其次,具有更大的直接意义的是社会主义者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拉萨尔派指望在普选的基础上重新组成的国家将会促进工人的生产企业,反对资本家;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宣称,必须把资本主义国家彻底摧毁,然后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以工人的力量作为稳固基础的新国家。

这是两派学说的尖锐冲突,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能阻止德国社会主义党的马克思主义派与拉萨尔派在1875年的哥达代表大会上根据一个一致同意的纲领合并,这个纲领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指责,他认为纲领对拉萨尔派的观点,尤其是关于国家的观点,作了过分的让步。马克思的德国追随者不顾他的反对,继续与拉萨尔派联合,他们认为要成功地与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运动作斗争,就必须如此联合。在这场斗争中产生了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此后成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社会党的楷模;但英国例外,因为在英国,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的社会民主联盟从来就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拥护,不久之后又由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长而变得无足轻重——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是1893年基尔·哈迪的独立工党,随后是1900年的劳工代表委员会,该会在1906年成为工

党。但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大多数西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中起了支配作用；而在法国和俄国，则是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分庭抗礼。

于是，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赋予的这种形式下，在1889年于巴黎成立的第二国际中成了主要力量，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914年第二国际瓦解时为止。不过这派马克思主义的势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免于别人的挑战，尽管表面上看来它却一再战胜了反对派。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第一国际内部就曾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当时马克思不得不首先与蒲鲁东的门徒交锋，接着又与强大的反对派——俄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派论战；后者在第一国际某些部门的势力非常强大，以致使马克思宁可把第一国际总部迁到美国，从而宣告其死刑，也不愿冒使之落入巴枯宁派手中的危险。

蒲鲁东和巴枯宁时常被人们看成是同一派，因为他们的追随者都在同等程度上反对马克思；其实他们的见解是大不相同的，尽管他们都非常仇视中央集权和作为官僚政治控制机器的国家。蒲鲁东实际上坚信自耕农小生产者所组成的独立农民阶层的品德，以及以类似方式直接为消费市场经营个体生产或合作社生产的小工匠的品德。他主张这些生产者由人民银行供给无息贷款，以保证他们具有就业的手段；他主张每个生产者根据自由契约获得相当于他个人或家庭的劳动成果的报酬。因此，第一国际中的蒲鲁东派是反对（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公有的；他们提倡一种不由国家资助而由他们控制下的信贷银行资助的自由合作企业。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涵义中包括国家所有制，那末蒲鲁东派实际上便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在第一国际中被主张公

有制的人击败这一事实实际上是第一次明确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是融为一体的。但是,蒲鲁东派刚被打败,巴枯宁的追随者就立刻以马克思的新反对派的姿态出现,他们得到第一国际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支部的大部分成员的拥护,并得到以莱洛克尔和拉绍德封周围的汝拉制表区为中心的瑞士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支部的拥护。这个新反对派向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根本性的挑战,他们否认马克思所控制的伦敦总务委员会有权、甚至否认任何权力机关有权制定政策或纲领来约束松懈地组成国际的各国支部和地方支部。巴枯宁的基本社会哲学强调作面对面接触的地方团体首先需要独立,并且必须有权决定自己的策略,不能服从任何外来的独裁控制。他想把国际降低到没有权力约束各国支部和地方支部的单纯咨询机构的地位,他公然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认为它们都是统治人民的官僚政治的权力机构。巴枯宁认为,地方集团有天然的团结性,它能以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合作为基础管理自己的局部事务,但民族国家等较大的政治单位就一定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的,在这两者之间不可能有天然的团结。对于财产权问题,巴枯宁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有分歧。巴枯宁派希望集中力量进行一次取消遗产的运动,而马克思则争辩说,遗产不过是私有财产这种疾病的症状,他主张直接医治疾病而不应攻击症状。<sup>304</sup>然而这场争论虽然在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实际冲突中显得很重要,但是与他们在统治权和中央集权等问题上的主要分歧相比这不过是鸡毛蒜皮。因为马克思认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工人阶级政党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的下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但巴枯宁却认为这种政党只不过是出卖工人利益的工具,因为在这些政党中不可避免地会滋长官僚政治的趋势,并且不以彻底消灭专制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根本目标,反而倾向于与专制国家妥协。

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在意大利人拒绝参加的

情况下,终于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接着又把国际的总部迁到美国,它在美国苟延残喘了一段时期,几年以后就结束了。但是,主要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主持下,马克思的反对者在欧洲搞了一个残余的国际,继续维持了好几年,后来它在1877年的根特统一代表大会上再次企图统一各派力量,但结果也宣告结束。1881年在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一个纯粹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国际的架子。但是,除此以外,在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之前,就没有正式的国际社会主义联络组织,只是偶然有几次代表大会。在这些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立刻重新爆发,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猛烈地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一再被开除出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只不过他们每回都在下一次大会上重新出现,并再次进行挑战。第二国际关于接纳会员的标准是:社会党须是正式组成的党,在有议会竞选的地方参加过议会竞选,而且仅限于接纳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社会党。这种标准有时候是不容易解释的,例如,英国工党在宣布政策时并没有公开承认阶级斗争,但是无论它是否这样讲,却  
305 作为实际参加了阶级斗争的政党而被接纳;至于无政府主义者集团,虽然它们自豪地宣布了阶级原则,只要它们拒绝参加议会活动,就被坚决地排除在国际之外。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直到1905年革命以后还没有可以竞选席位的议会,于是就看他们的意向而不看实际表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都被接纳加入了第二国际;保加利亚的两个死对头——“广义”社会党和“狭义”社会党也同样被接纳了。

在第二国际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巩固而统一的政党出现。而法国社会党则不然,它直到1904年由于受到国际的强大压力,才被迫统一起来。因为在法国,社会党人截然分为若干相互

竞争的派别。茹尔·盖得领导最老的一派——工人党，它严格地遵循马克思的学说，在大部分问题上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让·饶勒斯领导独立社会党，他的周围聚集着大批追随者，他们保证要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共和国的反民主和反犹的敌人，在有必要时，他们准备在这种保卫工作中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合作，而盖得派认为这样做是与社会党的独立原则相违背的。由爱德华·瓦扬领导的第三党继承布朗基派的不妥协传统；还有一个在保尔·布鲁斯领导下的第四党宣称自己是“可能派”，他们主要集中力量在社会改革的措施和市政活动上。此外，法国的情况由于法国总工会下属各工会的态度而变得错综复杂，该工会宣布赞成与各政党断绝一切联系，但各会员如果愿意，可以自由参加各政党；同时，总工会还赞成无政府主义中的工团主义派，该派有意识地继承普蒲东而不是马克思的衣钵。

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生了根的工团主义，在某些方面与美洲和大洋洲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运动相类似，尽管不完全类似；在本世纪初期，它无论在革命方面和改良主义方面，都的确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新挑战者。欧洲与美洲的情况不同，工团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并且从同样的地方主义和联邦主义的观点猛烈攻击传统的社会党人。工团主义者争论说：政党必然会将追随者引入寡头政治的邪恶道路上去，并且破坏各地区在工场日常生活的共同经验中所产生的自然团结。他们说：“阶级斗争只能在阶级的领域内进行”，也就是只能在工业的领域内进行。政治不仅导向官僚制度和寡头控制，而且为了迎合可以投任一方的票的选民的口味，还会导向妥协。因此，政治活动模糊了阶级斗争观念，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锐气的致命伤。诚然，列宁持有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政治是革命活动的主要领域，要求对工会进行政治控制，因为在没有政治控制的情况下，工会就容易仅仅

满足于改良主义的活动。但是,列宁所考虑的是俄国,因为俄国的政治活动几乎必须具有革命性,而工团主义者考虑的是西方式的议会政治。然而工团主义者既反对列宁式的政党,也反对议会式的政党。因为他们仇视一切形式的中央集权的控制,认为这种控制破坏了局部劳资纠纷中工人的自然团结,他们不愿意理睬“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特征。共产国际在1919年成立时,毫无疑问曾向那些与工团主义者同样反对集中纪律的革命的工厂代表和其他左派分子发出号召;但是不久情况就明朗化了:不论这些人是多么左,他们在共产国际中也没有容身之地,除非他们放弃对集中纪律的敌视态度,并将领导工会和指导政治政策的权力赋予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那些在开始的时候拥护共产国际的工团主义者或非工团主义者,不久就与共产国际的莫斯科领导发生争执。法国的罗斯默和蒙纳特,西班牙的安吉尔·佩斯塔纳,很快就离开了共产国际,成了最激烈的反对共产国际的人;马丁·特伦麦尔领导的挪威人和跟随着博尔迪加加入共产党的意大利支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307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中的美国工团主义者,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因为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与其说赞成地方自治,不如说赞成与美国大企业的较大组合相应的全国规模的产业工会运动。但是,美国工团主义者,至少是威廉·达德莱·海伍德等主要领袖,也对苏联的高度集中的纪律有反感,因而竭力反对这种纪律;因为实际上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已经是高度地方化的组织,在劳伦斯纺织工人大罢工等地方性的劳资纠纷中推举本地区的领袖;该会负责人大部分是欧洲移民,他们从欧洲带来了工团主义观点,感到自己与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各工会的高度有组织的官僚制度格格不入。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的许多拥护者在1919年都加入了共产党,但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有些

人退出了共产党,另一些人参加了这个或那个美国左翼中几乎是无数的分裂运动。

工团主义者,尤其是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性政党还提出了另一种批评。他们说,这些政党非但不是在阶级基础上使工人团结一致,而且是让他们分化成许多对立的意识形态的追随者集团,从而破坏了自然团结。这种批评在法国很容易提出,因为法国存在着许许多多互相斗争的政治派别,而在大多数国家中却只有一个明显突出的社会主义政党,尽管可能在党外还存在一些人数不多的持不同政见集团。法国与其他各国之间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主要是历史原因。法国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倾轧由来已久,其中没有一派曾取得过主导地位。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派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独的政党;在许多其他国家中,主导地位则已经归于主要以德国党为模式组织起来的政党。当然,西班牙社会党并没有这样统一起来;不过该国的工会也分裂成了实力大致相等的敌对运动;而法国总工会在二十年代初期从事工团主义活动的时候,却没有有力的对手。

在欧洲,工团主义除了在拉丁语系的国家以外,并没有多大势力。不过有一个时期在荷兰相当有势力,在战后的挪威也是如此。在英国,它在1914年以前劳资关系多事之际,曾经进行过一些活动,但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基尔特社会主义兴起而退居次要地位。后一派人附和许多工团主义的论点,但却不像工团主义那样反对国家;他们大多数人主张把国家在民主化的形式下保存下来,作为一般管理机构,与基尔特并存。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对工党的改良主义很有意见,同时也从未完全支持大陆工团主义运动的地方主义实质。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英国的工会已经巩固地组成了全国性组织,于是全国性的集体谈判很快就代替了地方性的集体谈判。基尔特社会主义一般都把这种劳资关系的集



中处理看作当然的事情,目的在于建立以全国工会为基础的全国性基尔特,而不像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工团主义者主要构想的那样,以地方公社为基础。尽管侨居英国的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周围聚集着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英国的无政府主义的力量仍然非常薄弱,在工会中根本没有影响,代议制政府的传统还是极其根深蒂固的。因此,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于明确反对议会民主制度的人啧有烦言,他们集中力量宣传,主张民主制度必须扩大到工业范围里去。

欧洲工团主义的地方主义,后来变成了工联主义,这就是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思潮。这一方面是力量的泉源,另一方面也是弱点的根源;其所以说是力量的泉源,是因为大规模组织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的发展,使许多人都对现代世界泯灭个性的趋向产生了反感,并赞成美国人所谓的“平民民主”;其所以说它是弱点的根源,是因为工人运动本身必然会大受工业规模发展的影响,从而不论大规模组织对人性有什么不利,往往会认为大规模组织是斗争中所必不可缺的,于是也就被当成是与大规模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条件。由此看来,不为无故的是:工团主义学说的拥护者主要出现在诸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那里的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虽然存在,却不像美国、英国、德国等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发达,而且远不是那样普遍。整个说来,在二十世纪初期拉丁语系国家仍然有着这样的工人运动:其地方性的团结纽带比各工业部门作为全国性单位而言的团结纽带要强。因此,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团在当时仍然是地方性的团体,各工业部门的全国性组织通常只不过是地方团体的联合组织,这些地方团体,感到它们与由地方工会组合而成的地方劳工联合会的从属关系,至少与它们同全国性工业中心的从属关系一样强有力。当全国统一化的过程得

到发展,而国有化问题又在公用事业和采煤等基础工业中引起重视以后,工团主义作为一个运动来说,往往就会趋于消歇。显然,为地方性企业拟定合乎实际要求的地区工人管理计划要比为全国性联合企业的单纯地方分部拟定这种计划容易得多。即使在有人鼓吹在具有全国性大规模组织的工业中务必要做到权力高度分散的时候,采取这种做法也容易遭到全国工会领袖的反对,他们害怕在权力和责任广泛分散以后,就会丧失自己的权威地位。

直到1914年,工人运动内部的集中主义者与工联主义者曾经一再发生冲突,后者一般总是遭到失败,因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因素都有利于集中主义。工会越是发展壮大而被承认为劳资谈判机构,它们就越是不得不在广泛的范围内寻求谈判的机会,并以全国性谈判来代替地区性谈判。在此期间,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社会党力图在国民议会中取得议席,向着这同一个方向前进,从而使地区集团或派别更加难以维持其独立地位。工会和政治领域都日益强调统一,与多数派意见持异议日益被看作是一种罪恶,因为这种做法破坏了运动的团结。这种情形虽然没有能阻止分裂集团的出现,却使它们的地位更加困难,并使全国性行动日益代替地方性行动。不论全国性团体趋于左倾还是右倾,情形总是如此,只是在它右倾的时候,就显得更明显,由于大多数团体是右倾的;因为至少在西欧,当愈来愈多地从事议会活动的社会党适应了日常议会行动和群众性竞选活动的客观条件时,趋势肯定是右倾的。然而,即使当趋势左倾的时候,同样的趋向也能出现。比如在俄国,当1905年革命的失败为革命的重新发展敞开了道路以后,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作为一个地下革命密谋组织进行活动,他们几乎迫不得已地采用了一种最极端形式的集中的纪律,并根据他们自称是师承马克思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把它发展成一条原则。孟什维克派在硬性的集中纪律方面远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走得很

远,但是与组织松散得多的社会革命党人相比,他们仍然是集权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包括着从右派到极左派的各种观点,允许有很大的地区差异存在,对于个人成员或组织成员并不强制接受统一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只是笼统地支持在土改方面采取革命行动并推翻维护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专制政权,除此以外事实上很难说有什么共同理论。可是他们除了在1905—1906年当俄国革命运动达到高潮时很短一段时期以外,几乎没有在第二国际的事务中起过什么作用,而在第二国际中,几乎百分之百地主张集权的德国人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有影响的力量。

311 德国人之所以是集权论者,是因为他们对抗的是作为德意志帝国的首要因素的高度集权的普鲁士专制政体。不论他们在修正主义的大辩论中究竟是赞成考茨基还是赞成伯恩斯坦,他们总是一致力求组成强大而团结紧密的社会党;他们希望用这个党来团结多数德国选民,以便推翻专制政权。他们一心一意维护党的团结,所以几乎没有人希望把伯恩斯坦及其支持者驱逐出党,从而强制造成分裂。事实上,那时要维持党的团结也比较容易,因为考茨基与伯恩斯坦的分歧在理论上虽然很大,对党在当时的局势下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却很少影响。考茨基及其多数派支持者虽然在言论和思想上都从主张与现存政权进行所谓革命的决裂的角度出发,伯恩斯坦虽然强调在走向社会主义方面出现渐进的发展的可能性,可是哪一派也没有认真打算及早采取革命行动;考茨基和修正主义者同样认为党的任务是争取选民多数,因而认为团结是取得胜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工会在党的事业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这也助长了集权的倾向。因为工会要希望成为有实力的集体谈判机构,就只有在越来越广泛的地区内采取联合一致的劳资谈判行动;而劳资谈判又显然需要少数完全愿意服从多数的决定,即使他们不赞成多数的意见也必须如此。工会坚持少数必须接受这

种多数的裁决,很容易被带到它作为社会党的联盟者进行政治活动的政治领域中去——这种趋势在英国比在德国表现得甚至更为明显,因为英国工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主要是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政策决议最终是在工党会议上由工会集体投票决定的。

然而在1917年以前,社会党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始终是少数,并没有明显的希望可以早日取得政权。分裂和派别活动在党的领袖看来可能是党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的障碍。不过即令没有这种障碍,也很少有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权。到1917年以后,有了一个公开宣布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府在一个大国里实际掌握了政权,并且不得不肩负起这种新权力所带来的责任,于是情形就起了根本的变化,因为当时第一次地出现了一个实际问题:获得胜利的党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实行集中的纪律,这种纪律是不是要带到新国家的制度中去呢?反对党是不是要予以宽容并作为新秩序的 necessary 成分而接受下来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获得胜利的党意见不同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党派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代表着根本敌视革命的势力的非社会主义党派和团体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毫不犹豫地用否定的态度解决了这两部分问题。作为属于公开的反革命分子的反对派的任何权利问题,他们根本就不予考虑承认;同时,他们虽然在短时期内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新国家的政府机构,并且让孟什维克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党派存在,但不久之后就可以明白地看出,社会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正像非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一样,在新政权下不能存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其中有许多人在内战期间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反抗深有牵连,在立宪会议被解散之后,他们立即瓦解了。孟什维克中只有极少数人在内战中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过武装抵抗,其他许多人都尽力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合

作。但是,后来布尔什维克虽然使用了许多孟什维克分子,尤其是在新国家的外交职位上和经济机构中,但不久之后就可以看出,孟什维克党的一切独立行动的权力都被剥夺,他们的代言人将从地方苏维埃和许多工会的有利岗位上被赶走,任何社会主义党派如果不完全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就没有存在的余地。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做了工作让他们的普通党员集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但却不让他们的领袖有机会用任何集体行动来推行他们的观点。

313 因此,俄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紧接就出现的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它根本不打算容许任何可能形成的反对势力中心存在,而且在该党之外也不打算接受任何有组织的党派的合作。不仅如此,不久之后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内的派别也像党外的派别一样遭到了彻底的镇压,“工人反对派”和不久之后其他持不同政见的派别或所谓的派别,都被无情地粉碎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当初是作为在反对旧政权的密谋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出现的,后来成了新统治者的教条;它先是出于击败外国干涉和俄国国内反革命分子的需要,而不久之后它就成了要为世界革命提供推动力的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根本基础。在这种精神下,共产国际着手对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建立纪律性的控制,甚至命令它们采用它所同意的政策和领导人选。除此以外,民主集中制在理论上虽然承认在约束性的决定没有作出之前,可以进行充分自由的讨论,可是这种讨论的范围却愈来愈受到限制,因为只要是组织集团来支持党的领袖所反对的任何政策,就被指责为宗派活动;而且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讨论的权利严格地限于党内会议,并且无权把这种讨论向外发表或宣传不同于党的领袖的派别观点;还有一个问题是,政策只能由领导上提出向一般党员发布,而不能自下而上地由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发布。

实际上“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没有民主的集中制。假定对于一切可能提出的问题,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党的答案,即合乎科学的正确的阶级的答案,那么党的领导作为先锋队的先锋,对这种答案就起着支配作用;于是,绝对服从领导的意见就成了严格考验一个人是否忠于党的标准。当时的俄国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元首或首相具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样的地位,可是集体领导所要求的权力却和他们一样独断专横。布尔什维主义的制度,不久就在许多方面十分类似于法西斯国家的独裁主义制度——其类似程度之深,使得许多批评两方面的人把它们仅仅当成同一形态的两个变种看待,根本不理会它们之间相去霄壤的许多因素。在这类评论家中,表现突出的有西方国家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俄国及其毗邻国家的流亡的社会党人当成客人接待,并让这些客人作为流亡社会党的代表去参加工党和社会党国际的会议。自然,这些流亡分子都猛烈地抨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有他们这一批人存在,不可避免地会使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与苏联的关系恶化,直到后来,看起来好像社会民主党人对于他们那套民主概念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更加重视——这种态度共产党人从未鼓励,到他们眼见着法西斯主义咄咄逼人地发展,从而姗姗来迟地转变到人民阵线的政策上来以后,情况才改变。当这种转变到人民阵线的政策上时,正与苏联内部进行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的时间相一致,即使如此,布尔什维克关于一党专政和严格党纪的极端理论并没有作任何改变;因此,有共产党在其中起作用的人民阵线要得到承认并和谐工作,都遇到了莫大的困难。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势必难于在一个时候忘记共产党人一直是怎么骂他们的,他们也没有任何把握,共产党的政策不久之后就不再咒骂右派和中派领袖——事实上它在1939到1941年之间就是这样骂的。

1939年的《苏德条约》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若干年来苏联曾经

致力于逐步建立人民阵线来遏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再的侵略和背信弃义行为,可是那时突然放弃了这项努力,并与纳粹德国订立条约,其条件显然与上述努力格格不入;这样就让德国人可以腾出手来在西方发动进攻,而在东方则暂时不致于遭到攻击的危险。

315 事后回顾起来,斯大林此举的理由是不难理解的。他至少是在争取时间。当时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僚和许许多多下级军官被定罪,苏联的武装部队因而发生了混乱,而文官方面的“清洗”也造成了麻烦,所以对于整顿和改变军力和经济力量说来,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这个条约还提供了瓜分波兰的机会,这样就掩护了苏联,不致于遭到来自西方的直接攻击;而且当西方各国无法有效地驰援芬兰的时候,它也可以加以控制。此外,与西方各国进行谈判的经验清楚地说明:它们根本不怎么打算信赖苏联的军事援助,而且它们的观点与苏联也相去甚远。它们在慕尼黑危机时期拒绝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实说明,这些国家即令不是在暗中祝福、从而蓄意鼓励希特勒“东进”,至少也绝不打算阻挡他。

然而,《苏德条约》的签订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们当时正在许多国家建立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忙碌,这样一来,他们要不半途而废地放弃自己的政策,就必须抛弃党籍,二者必居其一。他们大多数人都在说服下坚信,保卫苏联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永久职责,所以便采取了前一条道路;还有些人则是经过一个时期的动摇之后才决定采取这条路线的,而这样做就使他们至少在当时失去了自己在共产党组织体系中的地位,他们在这样做了之后就不仅要反对1939—1940年之间的“声东击西的战争”,而且要追随莫洛托夫采取公开反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并说这次战争是敌对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与苏联完全无关。这至少与苏联在它反法西斯时期所采取的路线十分矛盾,而且事实上也与明显的事实十分矛盾。因为西方国家即使主要采取资本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平等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说来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分散权力和责任,以便尽可能多地使公民积极参加民主自治的任务。



## 附：主要人物表

姓名年代			出现章次
Kautsky,	1854—1938 <sup>①②</sup>	考茨基	2
Lansbury,	1858—1940 <sup>①②</sup>	兰斯伯雷	3
B. Webb,	1858—1943 <sup>①②</sup>	比阿特里斯·韦伯	3
S. Webb,	1859—1947 <sup>①②</sup>	悉尼·韦伯	3
Bracke,	1861—1955 <sup>②</sup>	白拉克	4
Vliegen,	1862—1947 <sup>②</sup>	弗利根	8
Henderson,	1863—1935 <sup>①②</sup>	汉德逊	3
Jowett,	1864—1944 <sup>①②</sup>	约维特	3
Snowden,	1864—1937 <sup>①②</sup>	斯诺登	3
MacDonald,	1866—1937 <sup>①②</sup>	麦克唐纳	3
Vandervelde,	1866—1938 <sup>①②</sup>	王德威尔得	8
Addison,	1869—1951 <sup>②</sup>	艾迪生	3
Cachin,	1869—1958 <sup>②</sup>	加香	4
Gandhi,	1869—1948 <sup>②</sup>	甘地	—
Krupskaia,	1869—1939 <sup>②</sup>	克鲁普斯卡娅	11
L. Caballero,	1869—1946 <sup>②</sup>	拉戈·卡巴勒罗	10
Delos Rios,	1870—1949	德·洛斯·里奥斯	10
De Man,	1871—1947 <sup>②</sup>	德·曼	8
Pieok,	1871— <sup>②</sup>	皮克	2
Huysmans,	1871— <sup>②</sup>	休斯曼斯	6
Blum,	1872—1950 <sup>②</sup>	勃鲁姆	4
Savage,	1872—1940 <sup>②</sup>	萨维奇	—

① 在第3卷曾论及。

② 在第4卷曾论及。

Blair,	1873—1958 <sup>②</sup>	布莱尔	3
Rakovsky,	1873— <sup>②</sup>	拉科夫斯基	11
Th. Stauning,	1873—1942 <sup>②</sup>	斯道宁	7
J. H. Thomas,	1873—1949 <sup>①②</sup>	J. H. 托马斯	3
Kalinin,	1875—1946 <sup>②</sup>	加里宁	11
Litvinov,	1876—1951 <sup>②</sup>	李维诺夫	11
Scullin,	1876—1953 <sup>②</sup>	斯库林	—
J. Longuet,	1876—1938 <sup>②</sup>	让·龙格	4
U. Sinclair,	1878— <sup>②</sup>	厄普敦·辛克莱	10
F. Adler,	1879—1960 <sup>②</sup>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6
Nygaardsvold,	1879—1952 <sup>②</sup>	尼加德斯沃尔德	7
Jouhaux,	1879—1952 <sup>①②</sup>	茹奥	4
Stalin,	1879—1953 <sup>②</sup>	斯大林	11
Azaña,	1880—1940	阿萨尼亚	10
Tranmael,	1879— <sup>②</sup>	特兰梅尔	7
Trotsky,	1879—1940 <sup>①②</sup>	托洛茨基	11
Tawney,	1880— <sup>②</sup>	托尼	3
O. Bauer,	1881—1938 <sup>②</sup>	奥托·鲍威尔	6
Bavin,	1881—1951 <sup>②</sup>	贝文	3
Fimmen,	1881—1943 <sup>②</sup>	费芒	8
Foster,	1881— <sup>②</sup>	福斯特	10
Grimm,	1881—1958 <sup>②</sup>	格里姆	8
Rykov,	1881—1938 <sup>②</sup>	李可夫	11
V. Tanner,	1881— <sup>②</sup>	V. 坦纳	7
Voroshilov,	1881— <sup>②</sup>	伏罗希洛夫	11
Wigforss,	1881— <sup>②</sup>	威格福斯	7
Dimitrov,	1882—1949 <sup>②</sup>	季米特洛夫	9
Attlee,	1883— <sup>②</sup>	艾德礼	3
Companys,	1883—1940	孔佩尼斯	10
Kamenev,	1883—1936 <sup>②</sup>	加米涅夫	11
Prieto,	1883—	普里托	10
Vyshinsky,	1883—1955 <sup>②</sup>	维辛斯基	11

Zinoviev,	1883—1936 <sup>②</sup>	季诺维也夫	11
Shinwell,	1884— <sup>②</sup>	辛威尔	3
Sandler,	1884— <sup>②</sup>	桑德勒	7
N. Thomas,	1884— <sup>②</sup>	N. 托马斯	10
Vincent Auriol,	1884— <sup>②</sup>	文森·奥里欧尔	4
Hansson,	1885—1946 <sup>②</sup>	汉森	7
Radek,	1885— <sup>②</sup>	拉狄克	11
Chu Teh,	1886—	朱德	12
Béla Kun,	1886—1936 <sup>②</sup>	贝拉·孔	9
P. Murray,	1886—1952 <sup>②</sup>	P. 穆雷	10
Ben Gurion,	1888— <sup>②</sup>	本·古里安	—
Thaelmann,	1886—1944 <sup>②</sup>	台尔曼	2
Dalton,	1887— <sup>②</sup>	多尔顿	3
Károlyi,	1887—1955 <sup>②</sup>	卡罗利	—
Morrison,	1888— <sup>②</sup>	莫里森	3
Sokolnikov,	1888— <sup>②</sup>	索科尔尼科夫	11
Bukharin,	1889—1938 <sup>②</sup>	布哈林	11
Nehru,	1889— <sup>②</sup>	尼赫鲁	—
Cole,	1889—1959 <sup>②</sup>	柯尔	3
Negrin,	1889—1956	内格林	10
Cripps,	1890—1952 <sup>②</sup>	克里普斯	3
Ho Chi Minh,	1890—	胡志明	—
Molotov,	1890— <sup>②</sup>	莫洛托夫	11
Pollitt,	1890— <sup>②</sup>	波立特	3
Tito,	1890— <sup>②</sup>	铁托	9
Braunthal,	1891— <sup>②</sup>	布朗撒塔尔	6
Nenni,	1891— <sup>②</sup>	南尼	—
Rakosi,	1892— <sup>②</sup>	拉科西	9
Nin,	1892—1937	宁	5
Mao Tse-tung,	1893— <sup>②</sup>	毛泽东	12
Laski,	1893—1950 <sup>②</sup>	拉斯基	3
Gollancz,	1893—	戈兰茨	3

Lombardo Toledano, 1893— <sup>②</sup>	隆巴多·托莱达诺	10
Togliatti, 1893— <sup>②</sup>	陶里亚蒂	—
Khrushchev, 1894—	赫鲁晓夫	11
Evatt, 1894— <sup>②</sup>	伊瓦特	—
Bulganin, 1895— <sup>②</sup>	布尔加宁	11
Haya de la Torre, 1895— <sup>②</sup>	阿亚·德拉托雷	10
Mikoyan, 1895— <sup>②</sup>	米高扬	11
Zhukov, 1895—	朱科夫	11
Li Li-san, 1896—	李立三	12
Peng Pai, 1896—1929	彭湃	12
Gottwald, 1896—1953	哥特瓦尔德	9
Bevan, 1897— <sup>②</sup>	比万	3
Chou En-lai, 1898— <sup>②</sup>	周恩来	12
Beria, 1899—1953	贝利亚	11
Chang Wan-t'ing, 1900—	张闻天	12
A. Phillip, 1901—	A. 菲利普	4
Strachey, 1901—	斯特拉契	3
Diaz, 1902—1940	狄亚斯	10
Orwell, 1903—1950 <sup>②</sup>	奥威尔	3
Ch'en Shao-gü, 1904—	陈绍禹	12
Gaitskell, 1906— <sup>②</sup>	盖茨克尔	3
Durbin, 1906—1948	德宾	3
Silone, 1906—	锡朗内	—
Chim Pang-hsein, 1907—1946	秦邦宪	12
Reuther, 1907— <sup>②</sup>	鲁瑟	10